西安交通大學

文革風雲——回憶與紀實

【上册】

◎本文集编辑组 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安交通大學文革風雲——回憶與紀實

作　　者　本文集編輯組
出版發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28 號遠東發展大廈 25 樓 06 室）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53
字　　數　4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988-15887-2-2
定　　價　HK¥ 180 元（上、下册）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20 世紀 60 年代西安交通大學校門



1966 年 6 月 2 日貼交大第一張大字報



1966 年 6 月 2 日同學們貼出大字報高呼交大要革命



1966 年 6 月 2 日更換黑板報向牛鬼蛇神開炮



1966 年 6 月 3 日同學們在行政樓前聽工作組進校後的廣播講話



1966年9月，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應交大學生之“請”來校看大字報。



文革中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左）和彭康校長被批鬥後坐在地上



1966 年 9 月彭康校長被監督勞動



1966 年 8 月歡慶《十六條》發表的我校游行隊伍



1966 年 8 月慶祝八屆十一中會議公報發表我校游行隊伍



1966年8月5日我校召開萬人平反大會



1966年9月16日歡迎毛選到學校



1968 年校革委會委員及部分工作人員合影

後排：

鄭叔良　蔡元基　劉軍智　丁傳鶴　李能貴　何敬成　程宗武　邵樂冲　苗俊德　葉雄波　沈文鈞　段會林　李印生　羅洪濤

中排：

徐文明　趙瑛　郝衛東　宗正榮　李松青　尹茂林　張國强　申成崙　王學周　劉維娜　劉德成　張宗仁　史維祥　戴慕蓉

前排：

朱奎林　沈榮水　程快樂　武登才　蘇文藝　李世英　陳柏榮　馮成武　馬書林　楊文　盧鴻興　王春傑



1967 年文革期間被統指和工聯一方砸壞的校牌



1967 年文革期間被統指和工聯一方打砸壞的廣播臺宣傳車



文革期間的交大圖書館



1968 年 8 月，歡迎軍宣隊進交大



2016年4月9日交大120周年校慶部分革委會成員和校友合影



2014 年 10 月 15 日交大原革委會正副主任武登才、李世英、沈榮水（左起）



2017 年 4 月 25 日杭州聚會
左起：戴慕蓉、武登才、陳柏榮、王春傑、鄭叔良

前言

2017年11月30日，西安交通大學十五位老教授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體會和弘揚奉獻報國精神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對老教授的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向當年響應國家號召、獻身大西北建設的交大老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大家健康長壽、晚年幸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師生傳承好西遷精神，爲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

1956年，以黨委書記、校長彭康爲首的交通大學廣大師生員工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從上海遷往西安。六十多年來，西安交通大學堅持“扎根西部、服務國家、世界一流”的定位和目標，爲國家特别是西部地區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創造了許多重大科技成果，并形成了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爲主要内容的西遷精神。

同全國一樣，西安交通大學也經歷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期間，學校裏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對西安交通大學的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也對西安乃至全國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有所影響。西安交通大學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有與全國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共性，更有其不同凡響的特點。正如像周恩來總理所説，西安交大全校衹有一個統一的文化革命組織，没有對立面，這在全國

都是罕見的，“全國僅有”、“獨樹一幟”。

文化大革命期間，西安交大的師生員工没有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避免了群衆之間無謂的争鬥和厮殺。特别是在當年西安地區武鬥高潮期間，校革委會果斷采取緊急疏散措施，保護了全校師生的安全，保護了教學設施和國家財産的完好無損，全校無一人因武鬥而死于非命。

西安交大旗幟鮮明地反對“打砸搶”和武鬥，對凝聚社會各界力量，認真貫徹黨的路綫方針與各項政策，抵制錯誤思潮，對推進當年運動健康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由于受社會大趨勢的影響，西安交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些不當的行動和舉措，這也是需要認真反思和吸取教訓的。因西安交大在文革期間鮮明的個性和别具一格的特殊性，這段時期必將是校史工作者和文化革命研究者特别關注的重點課題之一。

文化大革命已過去五十年了，當年西安交通大學文革親歷者有的已經作古，健在者也都已過了古稀之年。由于濃烈的母校情結和對學校發展的關注，不少校友撰寫了當年在校期間學習、生活、工作經歷回憶文章。作者以親身經歷和翔實叙述還原了當年若幹事件的真相，從而澄清了各種流言和一些文獻上的差錯。這些回憶文章大多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近年來，幾位史學愛好者收集了這些親歷者的文稿和散見于書刊和民間的部分文章，略作修訂，整理出版了這本《西安交通大學文革風雲——回憶與紀實》，爲以後的西安交大校史研究者積累了一批可供參閱的史實資料。

盡管本文集的編者們努力對文集中各文所述史實，進行了大量搜集與核實工作，但由于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條件所限，文稿的搜集範

圍還不够廣泛，資料檔案的查證也還不够充實，導致史實記述也還可能存有錯漏。不過，從文集現有的各文中，也可以管窺西安交大的文革概況。

本文集收入的各文，有的是約稿，有的是已經出版發表過的，對于出版過的各文，編者也作了個別字詞的修訂；有的文章中使用了當時一些流行的詞語，編者未作變動。文集中的各文已經作者本人確認，一律文責自負：即作者本人對文章的内容負責，文章的觀點也衹僅代表作者本人的看法。對于半世紀前發生的同一事件，各人的記憶可能會有不同，記述也會有差异，看法也不盡一致。收入文集中各文所記述的事實及闡明的觀點，并不意味得到編者的完全認可和贊同，編者也未能對各文所述之事一一核實，僅將作者的記述如實呈現，供各位讀者明鑒。

本文集編撰歷時一年多，有數百名校友對本文集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們或親自撰文，或積極提交各種資料，文稿、照片，或幫助尋找校友進行協調溝通，或提供資助。没有校友們的全力支持，本文集不可能問世，爲此編者僅對他們表示最衷心的感謝，謝謝了，各位校友！

這是一本抛磚引玉的粗略文集，相信有關人士還會繼續更好更細致的進行西安交大文革史料的挖掘和搶救工作，實現自己的歷史擔當，爲母校的發展與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

目　錄
（上 冊）

前　言

一、全國僅有、獨樹一幟的“交老總”

/ 鄭叔良 ······················· 01

二、西安交通大學文革縱述

/ 閻保定　陳沾緯 ············ 14

三、往事的回憶

/ 李世英 ······················· 92

四、紀念李世英

/ 李志傑 ···················· 250

五、我與交大文革總會

/ 沈荣水 ···················· 254

六、西安交大文革飄絮録

——我的回憶與反思

/ 鄭叔良 ···················· 276

七、我的西安文革回憶

/ 戴慕蓉 ························ 328

八、風雨未同舟

——我和李世英與楊克劍

/ 劉維娜 ························ 381

（下 册）

九、懷念彭康校長

——紀念彭康逝世五十周年

/ 鄧正德 ………………………………… 393

十、難以忘懷的回憶

——游鬥彭康事件始末

/ 趙傳平 ………………………………… 405

十一、親歷文革二三事

/ 閻保定 ………………………………… 414

十二、初邁職場和湯峪學習班的故事

/ 蕭國信 ………………………………… 464

十三、1966 年 8 月靜坐的起因和我所知道的“817 調查組”

/ 陳沾緯 ………………………………… 477

十四、我與“三六專案組”

/ 馮偉年 ………………………………… 490

十五、我所知道的《驚回首》

/ 黃善康 ································ 496

十六、西安交大文革六六通訊社的回憶

/ 陶文銓　陳輝 ························ 502

十七、在六六通訊社工作的日子

/ 陳立群 ································ 508

十八、將往事留在風中

——還原歷史情境

/ 戴克剛 ································ 513

十九、兩篇大字報的回憶

/ 孔祥騮 ································ 521

二十、文革中難忘的二三事

/ 李宣城 ································ 530

二十一、西安交大文革回憶點滴

/ 王希平 ································ 533

二十二、櫻花樹梢上的教室

——我與“交大六六事件”中的“應物 31 郵局事件”

/ 梁蘊綿 ································ 557

二十三、交大“復課鬧革命”的始末

/ 李能貴 ························ 577

二十四、回憶文革中的復課

/ 王培鈺 ························ 580

二十五、大山裏的回憶

/ 高喜愛 ························ 583

二十六、五年的交大歲月

/ 樊哲民 ························ 590

二十七、母校歲月

——西安交大六十年代廣播臺的記憶

/ 王　經 ························ 616

二十八、我對文革初期的點滴記憶

/ 張良銘 ························ 627

二十九、文革回憶

/ 孫惠民 ························ 633

三十、念　想

——追憶與陳學俊先生相處的日子

/ 張學曾 ························ 653

三十一、風雨春秋

——文革往事

/ 付登華 ························ 659

三十二、歷史的記憶（文革時期）

/ 李鏡吾 ························ 702

三十三、人生的拐點

——交通大學生活回憶（文革部分）

/ 李志傑 ························ 766

後　記

全國僅有、獨樹一幟的“交老總”

■/ 鄭叔良

近日，校阅文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五十年前，1967 年 2 月 11 日下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礼堂接见我们西安交大和西安地区造反派代表时的情景再次清晰地湧现眼前：

首先周总理就亲切地问我们：你们是什么组织？

我们答：文化革命委员会。

总理问：交大就一个组织？

我们答：就一个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啊呀！全国仅有，是啊，这是独树一帜。

文革初期，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与单位，都无一例外地分裂成所谓造当权派反的“造反派”，和所谓反对造当权派反的“保皇派”。两派之间争斗不休，特别是在造反派掌权以后，都对保皇派采取错误的高压政策，致使两派群众之间对立更加严重，打砸抢成风，甚至武斗，就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未能幸免。可是在西安交大，自陕西省委工作团撤走以后，却始终是一派统一领导，校内从未发生过打砸抢和武斗的情况。因此，敬爱的周总理会这样感慨地称我们“全国仅有，这是独树一帜”。

在那动乱的文革岁月，独树一帜的“交老总”（这是西安人民对交大文

革总会、交大和交大人的一种昵称），上演了一幕幕与众不同、独特的文革历程：

一、反对盲目的破四旧，巧妙地保护了校图书馆前的学生塑像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南下猛砸孔府，人民日报呐喊助威，全国上下刮起了破四旧的狂风。一批外地来的红卫兵和校内少数跟风的红卫兵认为校图书馆前象征向科学进军的两座男女青年学生塑像，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样板，是白专道路的苗子，往塑像上贴上要求坚决砸掉的大字报，有人泼墨水，有人砸塑像，因为塑像较结实未能砸动。外来红卫兵扬言第二天拿工具来再砸……情况十分紧急。交大文革总会马上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塑像没有问题，充满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激励鼓舞同学们向科学进军，应该保留。可是，怎么保留？文革总会里的工人委员，提出用木板把塑像包起来，刷上油漆，外面写上毛主席语录的好办法。这些红卫兵来了，即便他们知道塑像





西安交大老图书馆前的塑像摄于2016年4月

包在木框里面，但外面是毛主席语录，他们想砸也不敢砸。大家一致同意，马上落实，连夜树起两座毛主席语录碑，并请学生书法高手王永祥在两座碑上赶书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毛主席语录，巧妙地保护了图书馆前的学生塑像！

敬爱的彭康校长生前就对很好地保护了图书馆前的学生塑像表示欣慰。他说，两座塑像是交大的象征和希望。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两座塑像依然神采奕奕屹立在交大图书馆前，成为交大学子奋发向上的象征。这也是对彭康校长在天之灵默默的最好告慰吧！

二、反对抢、烧黑材料，保护了档案材料的完好无损

1966 年八、九月间，由于在省委工作团领导期间推行“查上当，放包袱”，引发群众斗群众，整理了不少被整群众的“黑材料”，因此工作团撤走后，全国各地抢、烧“黑材料”成风，交大也同样如此。省委工作团撤走后，就有少数人到人事处档案室要抢所谓省委工作团整的黑材料。根据国家关于档案的处理规定，任何个人不得任意私自处理，必须由组织按国家的政策规定予以处理。因此校文革总会决定有关档案立即封存。为防止抢、烧，加派了校红卫兵到人事档案室加以保护，从而很好的保护了西安交大的档案材料完好无损。

三、正确对待临委会，坚持团结大多数，维护了全校的团结与统一

1966 年 8 月，省委工作团撤离后，全校师生员工不满当时由省委工作团成立的原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决定采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成立新的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后来，有极少数群众不同意文革总会深挖陕西省委、西北局黑线的观点，组织成立了西安交大文化革命临

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

西安交大临委会成员主要来自：交大少数复转军人；原交大党政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和政治辅导员；极少数学生等约百余人。他们不同意文革总会的观点，因而另立了临委会。

校文革总会对这部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所成立的临委会，按政策予以正确对待：批给了他们要求的房间作为临委会的活动场所，还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工具；正确对待加入临委会或具有临委会观点的同志，在工作上都尽可能予以安排使用……。

当时有些同学对文革总会这样处理有看法，认为应该像其他学校一样，对临委会采取“打、压、挤”的高压政策。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因而没有多久，西安交大临委会很快就自行解散了。文革总会坚持正确对待和团结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反对反动的血统论，坚决反对打砸抢，维护了全校的团结和统一，避免了象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都难以幸免的校园武斗。全校的校舍建筑、教学仪器设备、档案资料全部保存完好，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的师生员工。使西安交大真正成为一派统一领导，全国仅有的一枝奇葩，文革沙漠中的一片绿洲，独树一帜的“交老总”！

四、坚决抵制“反右倾”，反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采用“打、砸、抢”政策，坚持保护社会上大量被打压的另一派群众

1966 年 8 月以后，西安地区的 11 所高校联合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在如何对待“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李世英认为“联络站”与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

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反对继续“挤、压、砸”搞关门主义。“统指”中的西工大、西电等其他十所高校一致反对李世英的观点，并把他的观点归纳成“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从12月中旬起在各种场合予以批判，说李世英“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调和了”，提出了“打倒右倾！”“打倒折衷！”“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错误口号。1967年元月28日下午，“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将“文斗”变成“武斗”，把“反右倾”演变为“打、砸、抢”行为。

“统指”一派夺了西安晚报社的大权，于元月14日创办了《革命造反报》，并从翌日起在全市开展对“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运动。在西安晚报上长篇累牍地发表大反所谓交大右倾的社论，把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无限地扩大到全社会，以致两派对立更加严重。2月10日，西北光学仪器厂的两派为该厂夺权发生武斗，东郊韩森寨国防工厂的1000多工人前去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成为轰动全国的2·10事件。

2·10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电话向中央请示报告说要：“站到西军电和西工大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2月14日上午9时，毛主席在《要事汇报》第八号上作了“二一四”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西安地区反右倾的分歧与争论在毛主席作了“二一四”批示后，有了关

键性的转折，并得到迅速的解决。3月2日下午4点40分，敬爱的周总理再次接見西安地区造反派的双方代表。在会上，周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长达三个余月的反"右倾"正式告一段落。

五、坚持"八五静坐"，是交大校革委会成立后最大的失误

1967年春，全国极左思潮泛滥，西安地区极左思潮死灰复燃。虽然在3月2日周总理代表中央早已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但"工联"仍打起"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旗号继续迫害工总司的基层群众，越来越多的工总司基层工人只好流浪到交大暂住，最多时曾达近万人。他们没有了生活来源，有的还携家带口，生活十分凄惨。由于省支左委员会对"打、砸、抢、抄、抓"熟视无睹，对武斗制止不力，引起了工总司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

加之西安工总司成立后，西工大等称工总司是"保守派"、是"大杂烩"。1967年2月23日，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更在西安市体育场大会上公开亮相，说工总司是"反革命小联合"。交大师生愤起高呼"霍士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退出会场。导致双方在批斗、军管霍士廉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交大、工总司要打倒霍士廉，西工大、西军电和"工联"一方力保霍士廉。支左委员会则明显偏袒西工大一方。

1967年8月5日，支左委员会同意以宣传"打砸抢万岁"反动口号而臭名昭著的"西安红卫兵报"复刊，成了八五静坐的导火线。当天下午，成千上万被"工联"组织暴力驱赶、无家可归的工总司的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支左委员会门前集会，讨要说法，工总司随即组织数万人游行。当天晚

上，交大“402”辩论会后，一群年轻人激动地率领上千人的队伍冲出校门进行支援，由此爆发震惊全国、近十万人参加、持续四十多天的“八五静坐”。

“八五静坐”发生后，若省支左委员会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本可顺利解决。但省支左委员会未及时答复，加之“工联”又千方百计刺激、诱导，使八五指挥部深陷感情用事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不计后果，不顾大局坚持静坐，不倾听校革委会委员要求撤离静坐的正确呼声，以至在中央几次来电要求撤走静坐时，仍坚持不撤，一坐再坐，錯失解决问题的良机，終成大错，直至发生九二武斗惨剧，五十多名无辜的群众成为屈死的冤魂。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9 月 16 日才撤离静坐。

1969 年春，在陕西省革委会举办的汤峪学习班期间，曾有人问过时任八五造反指挥部负责人的校革委会头头：“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撤出八五指挥部？”，他动情地回答道：“在交大最困难的时候，工总司支持了交大，现在把那么多工人扔在那里不管，于心何忍呀！”我想这可能就是西安交大之所以坚持“八五静坐”，犯下校革委会成立后最大错误的原因所在。

六、坚持反对武斗，全校紧急大疏散，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的师生员工

在西安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校革委会在电机系实验室多次开会商议，确定坚持交大决不参与任何武斗的原则，做好交大可能遭受对方武攻的应对准备，组织护校队，立即隐蔽学校的档案和贵重物资设备；同时决定一旦情况紧急，全校立即疏散。

1967 年 8 月底，“工联”和“统指”中激进派开始对交大进行野蛮挑衅：首先是陕西工业大学学生及部分东郊“工联”的工人故意多次用汽车撞击交大正校门，人为地摔坏西安交大的校牌；对交大的一些重要对外通道实

行戒严；并在交大周围架设了机枪……，形势十分危急。

因此，西郊“九二”武斗发生后，全校一万二千多名师生员工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时在校的革委会全体委员紧急开会讨论，一致决定交大校革委会坚持决不参与任何形式武斗的原则。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毅然决然地作出“大疏散”，立即“化整为零”的正确、果断决策，使交大又一次避免了武斗的劫难。并马上派人赴京向中央汇报，以请求中央及时处理解决。同时采取：专人看管特殊人员（重要干部和教授）；保护贵重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和档案資料；組织护校队伍等有效措施，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师生员工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随后，校革委会便在 402 紧急召开大会，向全校师生通告校革委会的决定：我们的原则就是交大坚决反对武斗，我们不能让交大的师生员工作无谓的牺牲，让交大的国家财产受到任何损失。所以，决定“化整为零”，全校人员立即“大疏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疏散是被迫的，就是等待中央对西安地区武斗问题的处理决定。一旦有消息，就会立即通知大家返校。大家对校革委会的决定一致表示拥护、信任和支持。就这样，第二天，对方工联组织所看到的交大，就几乎已是一座空荡荡的校园了！

九二武斗发生后的形势非常严峻，交大的紧急“大疏散”，有力地化解了大规模武斗的爆发。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省支左委员会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西安地区的武斗渐渐平息。交大师生员工从 9 月 20 日起，开始陆续返校。

七、率先在全国复课闹革命，其规模和质量，在全国高校中绝无仅有

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校革委会率先响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复课闹革命”方案和实

施意见。10月23日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李世英作动员报告：确定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学习专业课，有条件的安排生产实习；五年级完成毕业设计。

第二天，全校立即开始复课，教师热情讲授，同学认真听课，主动要求增加开课门数，热火朝天的学习干劲，感染着每一位交大学子：学习《工业电子学》，就自己动手安装电子管和晶体管收音机；一时买不到教材课本，就自己动手油印人手一册；电机专业同学与老师一起，以原教研室的实习工厂为基地，学习专业课，创办电机厂，试生产交流异步电机……。

在全校复课时，还是有极少数同学要求所谓的停课继续闹革命。校革委会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复课闹革命。为保证实践教学，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安排十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实习。生产实习以就地就近本省为主，必须出省的须审定和批准。为保证教学要求，有近一半约1000多名学生到华东地区工厂实习。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交大学子，至今仍怀念文革期间复课闹革命的激情岁月，深情的回忆道：是母校“为同学们创造了好的学习环境，这在全国的高校是罕见的。文革中的复课是我们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走向社会打下了基础。”

五十年来，七千多名交大莘莘学子，无不深深感念文革期间的母校交大：没有两派争斗、没有打砸抢、更没有校园武斗，是团结统一、宁静有序的母校，养育他们成材。更不忘交大西迁的初心，三千多名交大学子奔赴祖国大西北，无私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日后有不少成了各条战线上栋梁之材，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有的成了高工、教授，有的成了院士、将军，有的成了留学海外的精英……

八、彭康校长不幸被游斗致死，是校革委会在工作中最大的遗憾和无法挽回的失误

关于彭康校长之死，我曾较系统的阐明了我的观点：在省委工作团宣布彭康为叛徒；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多次扬言“彭康什么时候斗都没有错”；全国刮起清队十二级红色台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校革委会尽管在内心上并不认为彭康是叛徒，指派监管小组进驻彭康宿舍，名义上是监管，实质上是保护，而对外只能違心地仍把彭康作为叛徒来批斗。

1968 年 3 月 28 日晨，群众组织“抗大战校”工企排，对彭康校长采用了革委会一贯反对的游斗方式，进行长距离游斗；特别是在彭康校长因肺气肿明显体力不支时，还继续游斗；校彭康监管组严重失职，未及时制止、组织抢救，致使彭康校长不幸气绝身亡。校革委会对彭康校长的不幸去世显然负有直接的监管不力之责。

2016 年清明前夕，文革五十年祭之际，李世英写了《我和彭康校长》长篇悼文，对彭康校长不幸被游斗身亡，表示深深的自责和痛心：“作为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之一。每每想起都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对彭康校长，我们是一片诚心，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客观的符合事实的结论，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而且为了‘彭康不是叛徒’这一句话，交大文革总会当时差点陷入灭顶之灾，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最终却得到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只能说，百密一疏，一个蚁穴毁灭了整条大坝；一个细节的失误断送了之前的全部努力。”，“正值清明节前夕，我向敬爱的彭校长赔罪，鞠一个 90 度的深躬，并且祝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

九、不忘交大西迁初心，全校动员奋战生产 2300 台深井水泵，为祖国大西北作出无私的贡献

西安交大是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北清华、南交大”的赞誉曾广为流传。西安交大全校实验室有工人 500 多名、校办工厂工人 200 多名，聚集了众多技术高手，1969 年底，集中全校 700 多名工人成立了五七机电厂，下设机械厂、动力机械厂、电机厂和无线电厂。

1970 年初，交大主动请缨接受了一项支援陕西农业生产的光荣任务——在旱季前生产 2300 台深井水泵。工人师傅们创造性地进行了技术革新：用球墨铸铁的法兰盘毛胚替代钢材锻造的毛胚；用胀管工艺代替焊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成本。

全校师生員工总动员，在操场上排列起胀管机、油漆流水线，大干苦干，挑灯夜战，流血流汗，有的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终于按时胜利完成了任务！

交大工人师傅们和师生不仅生产了 2300 台深井水泵，还生产了近百台 C616 车床，二套 300 千瓦发电机组，大马力柴油机，生产了几十台出口的电阻噪声测试仪，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农业生产！

交大还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搞科研，如计算机教研室教师经过 10 个月的日夜奋战，研制成功西北地区第一台延安 701 型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

在那动乱的文革岁月，交大人不忘交大西迁的初心，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多年来，我一直在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我想，独树一帜的“交老总”现象虽然是偶然的，但是偶然性中包含必然性。“交老总”之所以能做到全校团结一致，没有两派严重对立，没有打砸抢，没有武斗，决不是偶然的。

两年前我在拙文《西安交大文革飘絮录》中，曾详细论述了独树一帜的“交老总”现象决不是偶然的，是下面四个原因和情况，使之成为必然的结果：

（一）首先是当时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同志对待曾经迫害过自己的群众，有着正确的认识和宽容的胸怀；

（二）当时的文革总会委员，都是各系、部采用巴黎公社原则推选出来的群众代表，大都是共产党员，有较好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做法，成为独树一帜的“交老总”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是独树一帜的“交老总”切实的理论基础。

（四）是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民主，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自己教育自己，这就是有名的“402”大辩论，它使独树一帜的“交老总”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往事并不如烟……，我已是一个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交大的这些文革往事总会不时湧现眼前，不免伏案提笔，“只存史，不评论”，如实地记录下这些远去的往事和感悟。

俱往矣，公道自在人心！是与非、功与过，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2018 年 5 月 5 日



作者简介

郑叔良，1938 年生，浙江宁波人。

1960 年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本科毕业，196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人大工经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至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任教，历任校生产物资处处长、计算中心主任等职。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访问学者。

1991 年调至杭州大学（1998 年与浙江大学合并），任中心实验室、计算中心主任。1987 年后，历任全国高校计算中心主任联席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1999 年后，浙江大学退休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文革縱述

■/ 閻保定　陳沾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号召投入其中，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坎坷历程。

一、风云初起

公元 1966 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

5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干部文化革命座谈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书记处书记舒同作了报告。

5 月 19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地区大专学校、企事业单位、机关负责人会议，讨论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5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5 月 22 日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多次主持召开党委扩

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研究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六位教师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彭康主持党委扩大会议，在陕西省委压力下，会上重新提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的问题，认为凌雨轩的问题，过去定为政治性认识错误不对，应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6年6月2日 星期四

社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

北大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播出后，交大校园内出现了异常气氛，学生们纷纷酝酿写大字报，无心再去上课。电机系电制41班和全校其他班级一样，正在进行“革命大批判”，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为了紧跟形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学们商议给校党委写一份大字报，督促校党委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于是，成常同学找来墨汁，由班级大批判小

组组长黄步钧同学口述，戴国民同学执笔，很快写好了大字报，然后由黄步钧、戴国民、成常等五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学校行政楼南墙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交通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 年 6 月 2 日电制 41 班黄步钧等贴出了交大第一张大字报

交大校刊编辑部把这第一张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行动拍了照片。不久，校园里出现了更多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彭康抛出凌雨轩，企图丢车保帅”、“彭康亲自策划抄写、拍照大字报，企图秋后算账”、“彭康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等等。学校秩序大乱，校党委宣布全校停课。

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端棻来交大浏览大字报，并会晤交大党委书记彭康。

彭康主持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下午，彭康给全体党员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党员大会后，校园里出现了许多“誓死保卫校党委”、“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但紧接着，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却愈来愈多，迅速掩盖了“誓死保卫校党委”之类的大字报，少数大字报已把矛头指向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傍晚，中心楼走廊、行政楼、图书馆四周的墙上，甚至图书馆大门前的水池边上和马路边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二、六六事件

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决定向西安交通大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后领导不力，引发了6月6日西安交大师生反对工作组的重大事件，史称“六六事件”。

1、六六事件真相

6月3日凌晨2时，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带领陕西省委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工作组进校后，马上要求交大师生主攻“三家村”，并提出“反对上街游行”、“反对派代表赴京”等要求。

6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对交大文化大革命作出四点指示，包括“要把主要矛头对准‘三家村’”、“大字报不要上街”、“不提倡漫画活报剧”和“要有良好的革命秩序”等。

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动力系压缩12班王永婷同学贴出大字报指出：“校党委抛出凌雨轩是大阴谋”。

6月5日早晨，省委工作组提出“重点放在揭发校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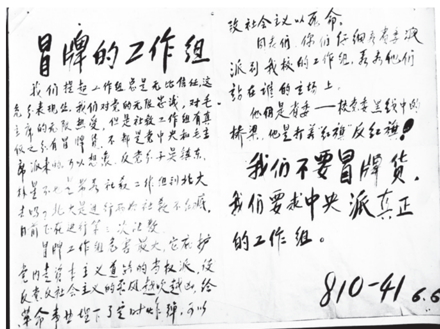
上午，机械系机制五年级贴出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质疑：为什么一再强调集中火力对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为什么要公布工作组同志的身份？等等。

下午，省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共青团员大会，会上工作组多次强调：不要怀疑省委和工作组，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省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广播大会，工作组组长严克伦讲话。他说：彭康同志犯了错误，要作检讨；彭康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交大全体师生要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相信工作组完全有能

力解决交大的问题！要求从6月6日起以班级为单位辩论“校党委是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

许多师生听了严克伦的讲话，产生了很多疑问：严克伦对彭康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暧昧？为什么省委一直强调主攻“三家村”？为什么问题刚刚触及陕西省委、西北局就要急刹车？大家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纷纷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发电报，汇报工作组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有的师生整理材料准备赴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有的师生通宵达旦地写大字报。



冒牌的工作组

我们提起工作组总是无比信任，这充分表现出，我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社教工作组有真假之分，有冒牌货，不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可以想象，……

冒牌工作组危害最大，它庇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歪风越吹越凶，给革命事业埋下了定时炸弹，可以……

……社会主义以死命。

同志们，你们仔细看看……派到我校的工作组，看看他们站在谁的立场上。

他们是省委——校党委黑线中的桥梁，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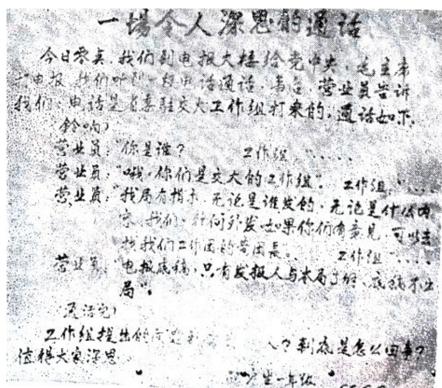
我们不要冒牌货，我们要求中央派真正的工作组。

810-41 6.6

1966年6月6日810–41班贴出的大字报

动力系锅炉31班同学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交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全班同学签名后，于6月6日凌晨5时，派同学骑自行车送往邮局。为了赶上飞往北京的班机，邮局职工用专车把送信的同学送到了机场。

6月6日清晨，工程物理系810–41班共青团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李世英等同学贴出了《冒牌的工作组》、《省委——交大党委反党黑帮的十大阴谋》、工作组及省委黑帮的《十大罪状》和《呼吁书》四张大字报，提出了工作组的许多问题，认为必须赶走工作组，才能彻底闹革命！同时指出陕西省委——工作组——校党委是一条黑线，写出了“彻底挖掉省委西北局反党黑根”的大标语，在广大师生员工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場令人深思的通話

今日零点，我们到电报大楼给党中央、毛主席……营业员告诉我们，电话是省委驻交大工作组打来的，通话如下：

（铃响）

营业员：“你是谁？” 工作组……

营业员：“哦，你们是交大的工作组”。 工作组……

营业员：“我局有指示，无论是谁发的，无论是什么内容，……可以找我们工作团的局长。” 工作组……

营业员：“电报底稿，只有发报人与本局了解，底稿不出局”。

（通话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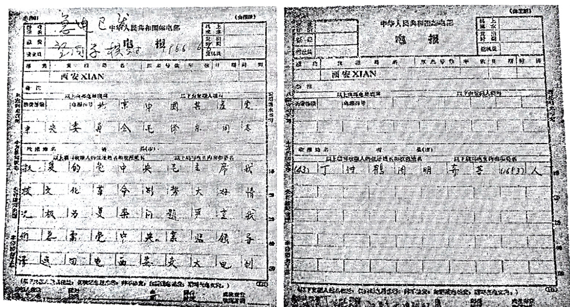
工作组提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值得大家深思。

……生一年级

1966年6月6日研究生一年级贴出的大字报

研究生一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张题为《一场令人深思的通话》的大字报，揭露 5 日深夜工作组向邮电局追查交大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人的姓名、班级并索取电报底稿。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师生们对工作组的做法强烈不满，校园中揭发工作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一群群学生在校园四处聚会并发表演说，批评工作组的错误，大声疾呼：交大要革命！

电机系电制 43 班丁传鹤等同学在校园宿舍区报亭旁边摆起桌子征求大家签名，准备联名给毛主席发电报，电文内容是：“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我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请速回电。”签名者多达 1683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电报
西安XIAN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请速回电西安交大电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电报
西安XIAN
(43)丁传鹤周明奇等(1683)人

6 月 6 日电制 43 班丁传鹤等 1683 人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

数理系应物 31 班曾兴玲、徐伟等同学买来了大幅毛主席画像挂在行政楼前，两边悬挂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巨幅标语，广播台不断播放歌曲《红军想念毛泽东》和《毛主席派人来》，人们期盼着党中央、毛主席早日派人来交大领导文化大革命。

交大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压缩 12 班王永婷以及机械系机制 52 班赵瑛等分别带领一部分同学去西北局反映工作组阻挠交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西北局有关人员回答说：“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对解决交大问题决心很大，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交大的一切问题。”

机械系金相 42 班写了三张评严克伦讲话的大字报：《同志？错误？检讨？——一评严克伦讲话》（陈沾纬执笔），《红线？黑线？——二评严克伦讲话》（朱德荣执笔），《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三评严克伦

讲话》（陈钧凯执笔），贴在学生二食堂大门口。

数理系应物 31 班的梁蕴绵同学起草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全班同学分头抄写后，寄给一起参加社教的总参解放军同志请他们转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郗友农同学执笔书写了“强烈抗议西安邮局扣押交大师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和信件”的大字报，全班同学签名后，派郗友农等三位同学前往钟楼的邮电局张贴。

动力系锅炉 31 班派人将大字报贴到《陕西日报》社门口并发表演讲。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门口也贴有交大同学写出的大字报，要求报道交大文化大革命情况；还有许多同学到工厂、农村串连。

学生第 1 宿舍出现大字报，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

李世英和一部分同学在行政楼 402 大会议室与严克伦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同学们慷慨激昂地揭露工作组的一系列问题，严克伦辩解说：“我们是陕西省委派来的工作组，你们把矛头指向我，是什么意思？”辩论刚一结束，工作组就授意交大广播台广播告示全校师生：402 大会议室的辩论是“把矛头对准了工作组”，是“围攻工作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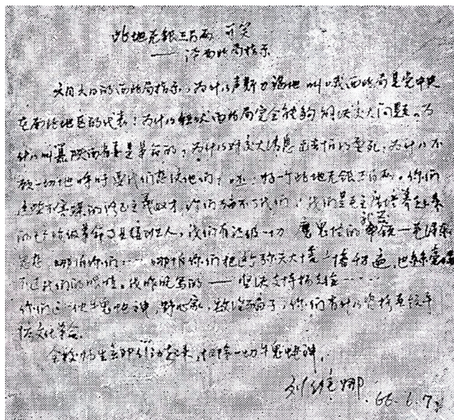
下午，省委工作组强令交大广播台播送《愤怒声讨 810–41 班反革命分子李世英》的稿件。

傍晚，交大广播台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播送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交大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交大的反革命势力不是小势力，他们捣乱是必然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上京请愿，不同意上街游行。我们认为：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关，不相信西北局完全是污蔑。西北局认为：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对解决交大问题决心很大。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交大的一切问题，……”。

师生们处变不惊，不为所动。

晚上，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干事、数理系应力31班刘维娜同学贴出题为《坚决支持杨克剑》的大字报。

师生们纷纷观看、议论刘维娜的大字报，表示赞同和支持。


此地无银三百两 可笑
——评西北局指示

刘维娜 66.6.7

1966年6月7日应力31班刘维娜贴出的大字报

6月7日早晨，交大广播台又开始一遍接一遍地播送西北局的指示。刘维娜同学贴出大字报：《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评西北局指示》，指出西北局强调“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和“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的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许多师生关注刘维娜同学贴出的大字报，同时也隐隐为她担忧。

一些班级的同学和工作组的辩论和抗争仍在继续，后来被说成是“围攻工作组”。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

6月6日晚，驻交大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了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北京的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是“假左派、真反革命”，但由于陈伯达不同意，最终没有发表。

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发生的反对工作组的行动，开启了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工作组之先河。

2、白色恐怖五十多天

“六六事件”发生后，西北局连夜从正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财贸工

作会议”上紧急抽调大批县级以上干部进驻交大加强工作组的力量。

在工作组的高压和分化瓦解之下，一部分同学的态度发生转变，校园内开始出现“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大标语。

6 月 7 日上午，工程物理系工作组找李世英谈话，追问是谁指使反对工作组的，为何反对工作组，李世英被监管。下午，工程物理系召开全系批斗会，开始批判斗争李世英。

刘维娜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评西北局指示》大字报贴出不到两小时，工作组就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群众斗争她，逼着她交出后台老板，交出“反党组织”，交出“反党行动计划”。

6 月 8 日，陕西省公安厅布置交大保卫处执行三项任务：①掌握敌情动向，注意发展左派；②加强校内要害部门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敌人破坏；③注意工作团的安全，特别是严克伦的安全。

6 月 9 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决定将“省委工作组”升格为三百多人的“省委工作团”，成立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团委员会，严克伦任团长兼党委书记，渭南行署副专员吴沙浪任工作团办公室主任。

省委工作团接管了交大全部权力。此后，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大规模的“查上当，放包袱”、“深挖‘六六事件’幕后策划者”的运动在全校展开。

早上，工程物理系工作组责令李世英贴出原来写的“坚决赶走省委工作组，彻底挖掉省委、西北局反党黑根”的标语，企图以此引起群众“公愤”。上午，工作团将李世英押解到行政楼 402 大会议室接受批斗，而后在他身上涂浆糊、贴标语，脖子后面插上棍子，戴上高帽子在学校里游街。中午，李世英留下三封遗书后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救活。6 月 9 日至 20 日，李世英在

住院治疗期间，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揭发西北局、陕西省委及工作团在交大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医院里监视的人把李世英看得很紧，他不能亲自去寄信，偷空利用买报纸的机会托一个卖报的同志送到邮局。但西北局陕西省委控制了邮局，邮局把这封信扣压下来，转给了省委交大工作团。

自 6 月 9 日开始，各班级在工作团成员的直接指挥下开始“查上当、放包袱”，要求每个同学汇报自己 6 月 6 日当天的表现，如果有反对工作组的言行，必须检查交待。自我检查之后，还必须相互揭发，找出“重点对象”批判斗争，稍有不同意见，即被指认为“反革命”。无休无止的检查、交待、揭发、批判，分裂了原本团结友爱的班级群体，摧毁了同学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往日的一些误会和分歧被无限放大，平时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被上纲上线，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动力系锅炉 31 班，工作组把 6 月 6 日组织上京汇报和贴大字报的同学打成“反革命”，调动外班同学贴大字报围攻，组织全班批斗他们并强迫每个同学“查上当，放包袱”。凡是反对过工作组的人，一切言行都被上纲上线，不仅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还要交出“幕后策划者”。

在电机系电制 43 班，工作组于七日凌晨强行取走 1683 人的电报签名作为“反革命罪证”，他们挑动一些同学对电报签名发起者丁传鹤施加压力，强迫他承认“做了反革命也不敢做的事情”，企图把丁传鹤打成“反革命分子”，全班 31 人中就有 17 人被工作组内定为“牛鬼蛇神”。

动力系压缩 12 班王永婷同学被省委工作组打成“反党分子”，工作组指挥一些同学贴出“打倒反党分子王永婷”等标语，还在电影广场召开大会批斗，无中生有地说王永婷和在上海、成都等地实习的同学有“反革命的黑线”联系，是这些黑线的总根子。在外出实习的 30 个同学中，有 8 个同学被打成“反革命”。

数理系应力 31 班刘维娜同学的大字报分析有据，语言犀利，工作组对她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组织全系大会批斗她，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还说她这位年仅 21 岁的女大学生是“老奸巨猾的反革命老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数理系应物 31 班被列为“敌情严重”的尖子班之一。工作组首先煽动其他班级贴出“应物 31 班是反革命魔窟！”“把大闹邮局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等标语进行围攻，接着搞人人过关，追查幕后策划者。梁蕴绵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遭到一次次残酷的批判斗争和人格侮辱。后来，徐伟同学也被揪出成了“反革命”。

行政楼前不断出现大字报专栏，每个专栏一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反革命”被揪了出来。往日里欢声笑语、充满朝气的校园，现在却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生机，有的只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和惊心动魄的群众斗群众场面！

6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彭康、林星（交大党委副书记）、凌雨轩（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决定“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并对西安交通大学党委进行改组，在西安交大党委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党委代行校党委职权。”



陕西日报

SHANXI RIBAO

18

毛主席语录

我們的教育方針，应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

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試办法

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新华社北京十七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全文如下：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西安交大党委

撤銷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記彭康的一切职务

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党委代行校党委职权

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

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康

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高呼毛主席万岁！

陕西日报关于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报道

6 月 18 日，《陕西日

报》发表通讯：《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同时发表社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交大“六六事件”说成是“精心策划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详见 1966 年 6 月 18 日《陕西日报》】

同日，省委交大工作团在校内组织一万五千人大会，批判彭康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 月中旬到 7 月初，工作团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交大师生进行迫害。他们把一些“大反革命”杨克剑、王永婷等人关到学生 12 宿舍搞所谓的“动物展览”。工作团勒令他们把头从窗口伸出去，强迫全校学生轮流“参观”、指认、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子，对这些优秀的青年学生施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和人身侮辱。

6 月下旬，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解放军报》记者来西安调查“六六事件”。

7 月 6 日至 8 日，省委交大工作团主持召开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交大武装部部长董树梧担任校文革委员会主任。工作团团长严克伦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彭康为“叛徒”。

7 月 9 日上午，王永婷不堪受辱，以死抗争，在工作团组织的批斗会结束后，从三楼纵身一跳，结束了年仅 23 岁的年轻生命！

王永婷自杀后，工作团办公室主任吴沙浪恶狠狠地说：“把狗日的拉去烧掉！”并且不准通知家属，可怜王永婷的父母终究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 7 月 5 日，电真空 31 班学生沈丙辰因对前途无望服毒自杀；7 月 21 日，图书馆职员龚起武因对运动产生恐惧跳楼自杀，经抢救无效于 8 月 16 日身亡。

7 月 12 日，严克伦传达刘澜涛对交大工作团的批评，说违反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中发 [65]26 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编者注），没有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搞了“查上当放包袱”。

7 月 18 日，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参见《中国共产党 80 年大事记》】

7 月 19 日，交大工作团内部开始整训。

7 月 28 日，北京颁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7 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并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7 月 31 日，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刘刚与李世英个别谈话，通知李世英不是反革命，李世英在工作团的安排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参见《中国共产党 80 年大事记》】

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 4 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 月 3 日，党中央宣布为交大“六六事件”平反。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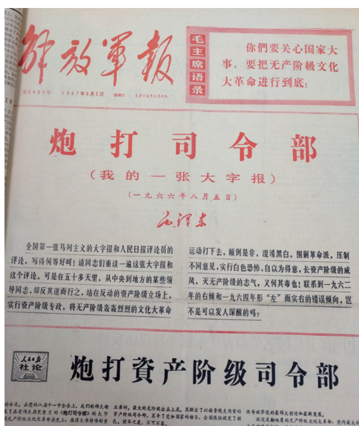
布“撤销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

根据交大工作团的统一部署，各系工作组召开“查上当，放包袱”重点人员座谈会，初步承认了错误。

8 月 3 日晚，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交大的大部分师生员工参加了大会。

8 月 4 日晚，全校师生在大操场集中收听 7 月 29 日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讲话的录音。三位领导说：对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强调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同学。他们对同学们说：“你们是主人！”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白色恐怖”。


解放軍報

毛主席语录：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3495号 1967年8月5日 星期六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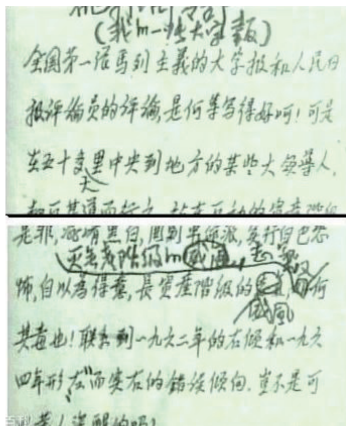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人民日报社论

炮打資产阶级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評論員的評論，是何等寫得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

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吗？

8 月 5 日晚，西安交大在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王甫、胡锡奎、候补书记刘刚、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章泽、严克伦等参加了大会（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北京开会），王林、肖纯分别讲了话。

王林说：“交大工作团党委书记兼团长严克伦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错误，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无产阶级！现在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严克伦同志交大工作团党委书记和团长的职务，并责成其向交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公开检讨。”并宣布：“所谓‘六六事件’是交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事件！”“这里我向因为‘六六事件’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员工表示慰问！表示道歉！”

严克伦和吴沙浪代表工作团在会上做了初步检讨。

8 月 8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上印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关于“六六事件”的调查和交大李世英写的材料。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作检讨。

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发生后，遭到陕西省委工作团的残酷镇压，全校近千人被揪斗，许多同学被打成“反革命”，许多教职员工被打成“彭康黑帮分子”，导致两位同学和一位教工自杀身亡，一位同学自杀而抢救生还。

从 6 月 7 日陕西省委工作组宣布“六六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开始，笼罩西安交通大学的“白色恐怖”持续了五十多天。

三、“八一六”静坐与“九六”绝食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西安地区的红卫兵运动渐入高潮，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开始走向社会，揭露和批判西北局、陕西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西北局、陕西省委应对失当，导致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连续发生两起大中专院校师生的抗议活动。

1、“八一六”静坐行动

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六六事件”平反，把交大师生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但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

8月5日交大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王林、肖纯在讲话中都把责任推到工作团团长严克伦身上，强调“西北局、省委的指示都是正确的”、只是“在认识上、分析判断上的错误”、“对交大工作疏于检查，犯了官僚主义”，在宣布“‘六六事件’是交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事件！”的同时又说“至于极少数坏分子从中捣乱，那是另外一回事”，暗示“六六事件”中有“坏分子参加”，更有工作团的干部在下面散布“‘六六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还值得讨论”。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引起了交大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

8月3日晚上，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王林宣布撤销工作组，揪出反党分子、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说赵守一是陕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总头目，是黑綫总根子。可是师生们认为：赵守一的问题早已得到处理，现在把赵守一抛出来，是在“丢车保帅”，企图转移斗争目标，于是纷纷到位于建国路的陕西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

8月4日，西安其他院校的工作组也检查了错误，但仍然限制师生的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上街贴大字报等。师生们渴望听到中央的声音，急切需要知道外面的情况，于是开始相互串连，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8月4日至7日，在西北政法学院（简称“政法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简称“陕师大”）、西安医学院等院校发生多起工作组和西北局工作人员策划的扣押、围攻、斗争、殴打串连学生的事件。

8月7日，接连不断传来中央首长的讲话指示精神，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西安地区各大、中学校之间的串连普遍展开。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西安各高校师生立即响应，交大、

西北工业大学（简称“西工大”）等院校师生员工还集合队伍，高举红旗，敲起锣鼓，上街游行、庆贺、宣传。

8 月 10 日，毛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会见革命群众，发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

8 月 11 日凌晨 2 时许，西工大师生代表一百多人前往《陕西日报》社张贴大字报，遭到不明真相的报社职工的刁难和围攻。

同日中午 11 时，交大、铁一中、西安矿业学院（简称“矿院”）的同学在陕西省统计财经学校张贴大字报时遭到围斗、殴打，铁一中的团总支书记郝振华身遭践踏受重伤。

8 月 12 日，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电”）的大操场上，交大、西工大、陕西工业大学（简称“陕工大”）、西北大学（简称“西大”）、西电（临委会）联合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表大会，各校革命师生员工逐渐联合在一起。

同日，由于各校揭发出来的问题更多地牵扯到省委、西北局，有的还牵扯到了前中宣部和高教部，前往省委、西北局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师生越来越多。

8 月 13 日下午 5 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布。此后，西安市大规模开展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报喜活动。陕西省委调动前来报喜的工农群众以“辩论”的名义围斗、殴打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的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简称“冶院”）等校的师生，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

8 月 13 日中午 12 时许，交大金相 42 班陈沾纬等同学去省委贴大字报，鼓励省委机关干部揭发省委和严克伦的问题。发现了一个专抄学生大字报署名名单的省委通讯员方根纪，陈沾纬等人收缴了方根纪抄的黑名单，要求省

委机关处理此事并将处理结果告诉交大。

晚上，陕西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何志云、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委办公厅干部王封家等人通知省阶级教育展览馆、庆安公司、省话剧院、抗大豫剧团、西安东风平绒厂、人民大厦等单位组织群众来斗争“以交大为首的右派学生”“保卫省委”。省委门外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打垮交大、冶院、西工大、师大、西大一小撮右派学生的猖狂进攻！”等巨幅标语。

8 月 14 日上午，交大学生在省委附近的和平门墙上贴出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省委门前有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前来“报喜”，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打垮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贾晓东、副厅长兼机械工业局局长张成功等人在省委墙上贴出一份大字报《打垮交大一小撮的进攻》，声言“保卫省委、西北局，坚决镇压交大右派分子！”并指挥“报喜群众”围斗学生。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还亲自动手打人，后来被受害学生指认。

上午 11 时左右，交大电制 52 班顿胜利等一行 4 人到省委看大字报，因为不同意“两个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遭到周围“群众”的围斗和殴打，还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下午 3 时左右，事态不断扩大，又有十几名交大学生被围斗、殴打，背心被撕破，脸被涂黑，也被戴上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游街。

下午 4 时左右，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乘车前往省委，学生强烈要求他下车给受殴斗的学生解围。肖纯把被围斗的顿胜利等人带进接待室，却对学生说：“这是工农群众激于义愤。”学生们要求省委纠正“两个口号”的错误，肖纯承认“两个口号”的提法“有些不妥当”“在必要的时候再研究决

定”，但接待室的同志却说“两个口号”“是对的，有道理”，省委副秘书长王景铭还和前来“报喜”的人一起高呼这两个口号。肖纯离开后，围攻、殴斗学生事件仍在持续。

交大、冶院大批学生到省委附近解救被围困的同学，半夜 12 时左右，陆续聚集到省委办公大楼对面示威抗议，直到第二天凌晨 4 时多，被围斗了一夜的学生才被解救出来。

愤怒的学生们贴出了“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的大标语。

8 月 15 日早晨，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出面接见反映情况的同学，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学生不满意，坚持不走，接待室工作人员强行推拉学生离开。

上午 11 时许，西安工业学院（简称“西工院”）的大队人马到省委报喜，有人高呼：“西北局万岁！陕西省委万岁！”

西北局附近殴斗革命学生的事件也偶有发生。

外地来西安串连的学生一下火车就遭到围攻。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还接到一封匿名信，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

同日，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的数百名师生到西北局请愿，要求西北局派人前去省委制止殴斗学生的行为。第二天早上 7 时许，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李登瀛同志才和同学们一起来到省委门前，结果连李登瀛也挨了打。

晚上，省委附近的大街小巷里，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谁敢说“两个口号”是错误的，就立即被围斗。后来发展为见到交大、冶院、西工大的学生就围斗，有少数坏人乘机在女同学面前耍流氓，一些社会渣滓也趁火打劫，许多同学的证件、团徽、校徽被抢。

8 月 16 日，李登瀛在同学们的保护下，通过省委的高音喇叭纠正那两个错误口号，并讲了三点意见：“1．立即停止辩论；2．不准打人；3．谁打人就抓谁。”但收效甚微。

此时，省委附近殴斗学生的严重事件已经持续了两天两夜，“受围攻的学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遭到殴打的多达六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

8 月 16 日，省委门前的千余名冶院师生自动汇聚在一起，坐在通往省委的建国路上示威抗议。中午时分，近万名交大师生员工冲出校门，来到了省委门前静坐示威，声讨一小撮挑起工农群众斗学生的黑手，队伍从建国路一直排列到和平门。接着，西工大等院校的师生员工纷纷前来支援，队伍达到三万余人，红旗如林，口号震天，革命歌声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

当日，参加静坐示威的交大、西工大等院校联合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静坐示威抗议活动。临时指挥部在现场召开“声讨陕西省委黑帮大会”，各院校师生员工愤怒揭发和控诉陕西省委的一些干部策划、组织、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罪行。一些附近的街道居民也出面作证，大会向省委提出了“八点最最强烈的要求”，限令省委尽早答复。

8 月 17 日和 18 日，西北农学院（简称“西农”）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员工、临潼华清中学的部分同学乘火车赶到建国路静坐现场；远在三桥的陕西省机械工业学校的部分师生步行三十多里前来支援；西安医学院、西工院、西北财经学院（简称“财院”）、西北政法学院、陕西师大一附中、西安中学的部分同学也冲破重重障碍赶来参加，静坐示威人数达到五万左右。

8 月 18 日凌晨 2 时许，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杨植霖来到现场。刘澜涛作了长时间讲话，主要精神是：1. 承认西北局在文化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2. 肯定并赞扬同学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3. 肯定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革命的口号，完全正确。指出“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是错误的。4. 指出发生的打人、抓人事件决不是什么广大

革命师生与工人、农民的冲突，要追查，一定要追根到底。5. 要文斗，不用武斗。6. 支持革命串连等。

刘澜涛讲话说当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请革命师生顾全大局撤离静坐现场，此后参加静坐示威的师生员工陆续回校。省委门前的静坐结束了，但是围斗革命师生的行为还在持续。交大队伍回校经过和平门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阻拦。随后几天，反对静坐示威的标语、传单和流言蜚语满天飞。

8 月 20 日，交大师生采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详情在后文中另有叙述）。下午 4 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交大文革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但在中心会场里出现了“严惩交大一小撮右派学生”的巨幅标语，后经中国人民大学代表三次抗议才撤掉。大会上刘澜涛、霍士廉首先讲话，却只字不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轮到学生代表讲话时，又安排“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西北政法学院的代表发言，引起交大等院校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大会提出抗议。

会后举行庆祝游行。当交大游行队伍到达和平门外时，遭到数以千计不明身份人员的拦截和围攻，有暴徒手持棍棒袭击游行队伍，多人受伤，直到 6 时 30 分左右，交大的游行队伍才突破重重阻拦进入解放路。但在回校途中，又在钟楼和百货大楼附近遭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围攻和殴打，许多领袖像、语录牌、标语牌被打坏，很多师生员工的工作証、学生証、校徽、钢笔、手表被抢走，一辆救护车也被捣坏，许多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同学重伤昏迷。但是师生们不畏强暴，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手挽手档在前面，体弱者和女同学被保护在中间，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奋力突出重围，待师生员工全部回到学校时，已近次日凌晨。

8 月 21 日，各校师生员工前来交大慰问，并积极印发传单，写标语、大字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事实真相。

中午，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在北京接见交大等校赴京学生的讲话，指出静坐示威不是反革命，大字报可以上街，也可以在街上辩论，师生们倍受鼓舞。

8 月 23 日，刚刚选举成立的新的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邀请西工大、冶院、西电等院校与交大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交大图书馆二楼开会。经过协商，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简称“统指”），以便统一行动，相互支援。会议推举交大作为主席单位，由交大代表主持统指的会议，李世英参加统指的领导工作。

8 月 25 日，有群众在东大街报栏里发现当天的《陕西日报》第三版一则标题中“纸老虎”三个字端端正正印在了第四版毛泽东的头像上，随即向报社提出抗议。8 月 26 日，交大、西工大、西电等院校的一些学生以此为理由包围了陕西日报社，抗议陕西日报社“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的罪行，要求报社工作组严肃处理。实际上，“头像”事件仅仅是导火索，主要是革命师生早就对陕西日报社积极跟随陕西省委压制师生们的革命行动强烈不满，当天召开了“揭露批判陕西日报罪行大会”。

2、交大文革总会的成立

自从 8 月 5 日省委驻交大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在 7 月 8 日宣布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失去了权威，校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师生们自发组织了许多名目繁多的“兵团”、“战斗队”等，各行其是。有的“兵团”、“战斗队”把彭康和校党委其他成员戴高帽子游街，挂黑帮牌子示众；一些平时十分受同学们尊敬的钟兆琳、周惠久等老教授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游街、罚跪；随意抓人批斗的现象时有发

生，许多师生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也十分担忧。

8 月 13 日晚，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万人辩论大会。王林、肖纯、严克伦等参加了大会，面对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他们没有能够做出满意的回答，后来进入群众辩论，大家矛头一致，愤怒声讨省委、西北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世英同学在会上发表讲话，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更反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谬论，主张全校一致“集中火力打黑帮”，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

师生们贴出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在领导静坐示威活动中的软弱表现不满，也希望尽快结束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强烈要求重新选举成立具有群众基础的、权威性的文化革命领导机构。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立即启动并主持改选工作，采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新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首先，按照各系、部在编人数分配名额，各系、部推选出各自的候选人到学校担任校文革委员会委员。

8 月 20 日，新推选出的校文革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图书馆二楼开会，由老文革委员会的段会林、倪德辉召集主持，先选校文革委员会常委，然后新推选出的常委在一起开会，推选副主任、主任（当时称副主席、主席）。选举结果如下：主任：李世英；副主任：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委员：赵瑛、王春杰、冯成武、程宗武、尹茂林、邵乐冲、戴慕蓉、张国强、蔡元基、沈文钧、郑叔良、朱奎林、罗洪涛、徐文明、李印生、刘军智、曹克明等，并随之成立了交大红卫兵总部。各系、部也相继改选了系文革委员会，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就简称为“交大文革总会”。

当时，交大校内有少数教职工和学生不同意交大文革总会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因而要求另外成立“西安交大文化革命临委会”。许多同学认为这是

个“保皇派”组织，应该对他们采取“打、压”政策，但交大文革总会反对这样做。虽然临委会只有一、两百人，花名册上只有十几人，李世英还是破例批给了他们两间教室作为办公场所，还给了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文具，特别是允许他们使用安装有大功率喇叭“九头鸟”的宣传车。10 月 21 日，“西安交大文化革命临委会”成立。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团结了不同意见的群众。1967 年 1 月 14 日，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临委会自动解散，从此西安交大校内实现了文革总会的统一领导。

由于文革总会懂政策，讲策略，遇事同群众商量，注意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交大校内的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文革总会也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成为了交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核心。

3、“九六”绝食风波

1966 年 9 月初，西安工业学院 34 名学生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贴出揭发校领导和省委问题的大字报，支持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校党委称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下令解散，组织批斗、围攻、殴打这些学生，甚至不给这些学生饭吃。

9 月 5 日，北京的串连学生和交大、西工大等院校的师生 6000 多人在西工院大门外举行集会，声援西工院造反队，揭露和批判西工院党委领导干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9 月 6 日，数十名北京的串连学生和西工院造反队学生来到陕西省委，要求省委出面解决问题，但陕西省委一直推诿、搪塞、拖延，学生们宣布从上午 8 时开始绝食。

西工院造反队派人向交大求援，交大文革总会研究决定全校出动支援西工院造反队，要求陕西省委立即解决西工院的问题：

（1）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动；

（2）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

交大广播台广播宣布文革总会的决定，全校万余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国际歌行进到省委门前的建国路静坐绝食，西工大、西电、冶院等院校的师生也陆续赶来支援，开始时大家士气高昂，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但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只好席地而坐，等着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

绝食行动开始后，统指召开各院校负责人会议统一认识，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推举李世英为总指挥。指挥部随即对静坐绝食队伍的秩序、安全保卫、医疗救护等作出了安排，并派人四处寻找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等负责人，同时，派人给党中央拍电报、打电话，希望中央了解我们的情况，敦促陕西省委火速解决问题。

很快，交大学生食堂送来了几大桶盐开水，交大医院的救护车也开来了，“九头鸟”宣传车也到达现场，校广播台的女播音员王国瑞不停地广播，给大家鼓舞士气。

9 月 7 日，参加“绝食斗争”的人数达到 5 万多人，但是陕西省委主要领导霍士廉等一直避而不见，还发通知要求市民“辩论”绝食问题，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市民围攻、辱骂绝食师生，使得队伍情绪更加激动，有人高呼口号“绝食光荣，保皇可耻”、“坚决改组陕西省委”、“坚决罢刘澜涛的官，撤霍士廉的职”，也有许多市民同情绝食的师生，带着食品和水来到这里劝说他们用餐，市民们的一片好心让绝食的师生们深受感动。省委也安排了一些饭店送来了香喷喷的饭菜、大肉包子等，但师生们不为所动，坚持斗争，不达要求，誓不罢休。当日，天气炎热，骄阳似火，队伍中开始有人昏倒。

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到了绝食现场，并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学们见面座谈，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听取师生们的意见，力劝师生们吃饭，并答应

将师生们的要求转达省委。

同日，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问题作出指示，批评了“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错误行为。

9 月 8 日，昏倒人数不断增加，临时指挥部的李世英等人担心几万师生的生命安全，心急如焚。傍晚，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到绝食现场，经过李世英等人反复追问，霍士廉勉强同意绝食师生的要求。李世英为了师生们的生命安全，当机立断宣布“我们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当天晚上，绝大部分师生撤离回校，但还有交大、冶院、西工大的 36 名同学对霍士廉的回答不满意，继续在省委绝食抗争。

9 月 9 日，周恩来总理两次给刘澜涛打电话处理绝食问题。周总理指示“（1）对绝食停止辩论；（2）不要围攻和歧视参加绝食的同学；（3）指定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为参加绝食的同学治病。”总理还亲派飞机接绝食的同学代表到北京，并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总理仔细地询问了静坐绝食的原因，然后在肯定同学们革命热情的同时，批评了同学们“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新中国，搞这种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周总理还请同学们吃了饭。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绝食风波方告平息。

九天后，即 9 月 17 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检讨说：“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9 月 28 日，交大“文化革命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先后接待前来参观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员工超过十万余人，群众写过的热情洋溢的留言簿有二百五十多本。

9 月份，交大文革总会组织了彭康专案组，由工企 11 班学生史立民任组长，就彭康三十年代的历史开展调查，查清西北局宣传部干部王 XX 的揭发材料不实，不能确定彭康为叛徒。

10 月 12 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成立，其负责人为庆安公司调度员张培信、技术员安文保。

10 月 27 日，交大革命师生员工赴西安市体育场参加“西安地区誓死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1650 多个单位 35000 多人，大会通过了《致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

11 月 1 日，由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的《人民交大》创刊。

11 月 6 日，西安交大在大操场举行“西安交通大学‘六六’革命造反纪念大会”。兄弟院校、工矿企业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杨植霖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作了检查，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刘刚、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韩劲草、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志轩也在会上回答了有关问题，张志轩对“六六事件”的错误处理负有直接责任，被留下继续检讨。

12 月 6 日，由红色公社临委会等七个公社农民组织发起成立“西安地区革命农民文革总会”（简称“农总会”），负责人为田杏云。

四、毛主席检阅和红卫兵大串连

1966 年 8 月初，陕西各大专院校的省委工作团陆续撤离，很多师生冲破阻拦到交大等院校看大字报，了解动态，交流情况，称之为“串连”。后来，交大等院校师生又到工矿企业、党政机关、公检法、报社以及各县市去

串连，还在渭南、宝鸡、汉中等地成立联络站，宣传《十六条》精神，鼓励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党中央和中央首长时刻关注着西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多次接见交大的师生代表。

1966 年 8 月 16 日陕西省委门前的静坐示威发生后，交大校运动队派代表自费赴京反映情况，于 8 月 22 日到达北京。当晚，周总理在清华大学冒雨发表演讲，交大同学在演讲现场给总理递了纸条，总理看到后说：清华的同学，让西安交大和兰州大学的同学到前面来！清华的同学真的闪出一条小道人缝，交大同学挤到前面，近距离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使他们终身难忘。交大赴京学生代表还参观了“人民日报社”，受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接见。这是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交大师生代表。

10 月 4 日，西安交大全体师生（除少数留校外）集体乘火车赴京串连，并准备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接见。

10 月 14 日晚上，西安地区革命师生员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到会讲话。

10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李世英。江青对李世英说：“你的材料我都看了，我们感到非常痛心。”“以后再别自杀了。”【详见李世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文集，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编，1967 年 3 月】

10 月 18 日凌晨 4 点，交大师生从清华大学按系和班级排队出发，先乘火车，下车后步行到农业展览馆前面东三环马路两旁，列队等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

12 时 50 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

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 12 辆敞篷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而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东三环路缓缓驶去，依次检阅红卫兵队伍。

13 时许，当检阅车队经过交大队伍时，毛主席频频向交大师生挥手，师生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解放军报》第三版以《颗颗红心向太阳——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为题报道了这次接见活动。文中对西安交大李世英做了详细报道，真实地描述了李世英和西安交大革命师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候的激动、兴奋的心情。【详见 1966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人民日報

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检阅一百五十万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和伟大领袖一起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表示：誓死保卫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头版

10 月 20 日，交大师生陆续乘列车返回西安。

从 10 月开始，交大大批师生到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连，也有许多师生下厂、下乡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宣传文化大革命。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表扬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自此，全国各地掀起步行串连高潮。交大师生也积极响应，组织起“韶山红色长征队”、“瑞金挺进队”等步行串连队，有的向着延安、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出发，有的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沿途散发毛主席语录，演出节目，参

加劳动，宣传《十六条》精神，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沿途群众的热情赞扬。

从 1966 年 11 月到 1967 年初，西安交大先后有 2500 多师生徒步串连，4000 多人次下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院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所有在外地进行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在十二月二十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车、船不再实行免费。”

1967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的通知》，要求在全国暂时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大串连运动遂告结束。

五、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 年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之类的极左口号开始在西安流行，一些造反派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西安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在文革总会的领导下，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李世英的“三句半”和统指的“反右倾”

1966 年 9 月的绝食结束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逐渐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西安造反派逐渐成长壮大并最终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如何对待曾经“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保守派”群众，如何团结大多数等问题上，造反派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认为：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保守派”群众要帮助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挤、压、砸”搞关门主义，要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通过“谈判”消除分歧，共同对敌；要严格执行《十六条》提出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得到了交大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但统指中的西工大、西电、西大、陕师大等院校的领导人却极力反对，他们把李世英的观点归纳成“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从 12 月中旬起在各种场合批判，说李世英和交大“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调和了！”等等，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反右倾”浪潮，还公开支持“打、砸、抢、抄、抓”的极端行为。虽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公路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一部分负责同志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但统指的决策权已由西工大、西电、西大、陕师大等院校的领导人掌控，“反右倾”浪潮愈演愈烈。

1 月 15 日，统指的某些领导人指挥他们的喉舌“东方红广播站”向全市广播批判李世英“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专题节目，提出“西安落后，西北落后，出路何在，坚决反右！”“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把“反右倾”当作斗争大方向。由统指操纵的《革命造反报》从 1 月 20 日起，先后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打、砸、抢好得很！》、《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动员！反右倾！大联合！大夺权！》等文章。“红造司”领导的《西安红卫兵报》还公然宣扬“革命的打、砸、抢万岁！”

1 月 19 日，交大文革总会发表《牢牢掌握斗争的方向——告西安市人民书》，号召：“师生员工深入工厂、农村，奔赴革命和生产第一线，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1 月 22 日，交大文革总会再次发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再告西安市人民书》，针对统指大搞“反右倾”、煽动群众打“内战”、转移斗争

目标、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1月28日下午，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会”，交大队伍进场时与西工大等校发生冲突，有人被打伤，要求发言被拒绝，会议主持者将“文斗”变成“武斗”，把“反右倾”演变成为“打、砸、抢”行为。交大队伍中途退场，举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

针对统指内部出现的错误思潮，交大的李世英、沈荣水等多次在统指碰头会上摆事实、讲道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李世英还于12月16日在统指的讨论会上系统地阐述了交大的观点，发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呼吁，但是统指的一些领导人对交大文革总会的一片诚意和愿望置之不理。

同时，工联的领导人也违背广大基层工人群众的意愿，大反“右倾”，支持“打、砸、抢、抄、抓”，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不断发生。1月28日，西安庆华电器厂因夺权问题发生武斗，多人受伤；2月10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在工联东郊二分会的操控下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破坏事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周恩来总理派调查组在西安调查，发现“西安二十几个厂子被砸”，调查组2月25日离开西安后的26、27、28日还有工厂被砸，西电在27日、28日连续派数百人去西安造纸厂打、砸、抢，并非法抓捕关押16名造纸厂职工。

针对统指内部出现的分歧，交大文革总会于12月12日召开了“402辩论会”。交大行政楼东侧四楼有一个402号会议室，可容纳数百人，文革期间，这里就成为了统一全校思想和行动的辩论会场。遇到重大问题，广播台就会广播“擦亮眼睛，准备战斗！”的歌曲，同学们听到歌声，就会自动聚集在行政楼402会议室及其周围就预定的议题展开辩论，广开言路，统一认识，这就是交大有名的“402辩论会”。

李世英在辩论会上谈了统指近一时期内部发生的分歧和自己的观点，得



李世英在会上发言

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一致认同。总会组织各战斗队撰写文章，散发传单，派出宣传车、“红喇叭”小分队上街宣传。由53个战斗队组成的“大辩论串连会”到土门、纺织城等地的工人俱乐部演讲，宣传“十六条”精神和极左口号的危害性。所谓“红喇叭”就是交大师生在宣传车被反对派打砸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卷成纸喇叭上街向群众演讲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月6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开会讨论通过了“反对打、砸、抢”的“八项声明”，并以《特别快报》的形式广为散发，《人民交大》报也连续发表《驳所谓“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能万岁吗？》等文章。总会还派遣一部分战斗队深入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宣传交大的观点，受到热烈欢迎。同时，广大师生员工还利用多种渠道了解西安的情况向总会反映，以便总会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

2、《二九呼吁》和工总司的成立

2月9日，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等二十九个群众组织在经过改组后的《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了最紧急呼吁，呼吁停止“反右倾”，指责“打、砸、抢”打的是阶级兄弟，砸的是群众组织，抢的是国家财产，是违背“十六条”的极“左”行为，并指出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权斗争，而不是“反右倾”。

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二九呼吁”。“二九呼吁”发出后，得到了西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但统指、工联少数负责人利用其操纵的“西安

地区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强令邮电局扣押已经印出的《革命造反报》，并“武装”接管“革命造反报社”，打伤报社职工多人。

2 月 18 日，不愿跟随工联继续“反右倾”、搞“打、砸、抢”的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西安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西铁联”）、新华印刷厂文革筹委会等三百多个工人群众组织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工总司成立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以主人翁的姿态大力宣传和支持交大的正确主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抓革命，促生产，给西安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后来，又有支持交大观点的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中革会等组织相继成立。

李世英和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坚持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为维护西安地区形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对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积极的影响。

3、毛主席的《二一四批示》和周总理、中央首长接见

1967 年 1 月底，中央文革电话通知西安统指办公室，要求统指派代表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西安地区文化革命的情况。但统指的西大、陕师大的负责人却背着交大拟定了赴京代表名单，将交大排除在外，剥夺了交大的代表资格。

交大文革总会得知这一情况后，1 月 31 日晚迅即派遣总会组织部长郑叔良、总会秘书吴翼健和红旗战斗队的王希平同学携带相关材料连夜赴京，由

交大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全力配合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三人抵京后，郑叔良立即组织吴翼健、王希平并在驻京联络处贺相等人的协助下快速写出汇报材料，制定了参与汇报的方法和策略。

2 月 2 日，中央文革派西北组副组长到位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西安统指驻京办”召开情况汇报会。交大代表在会议即将开始时进入会场。尽管主持会议的西大代表百般阻挠交大代表发言，但交大代表沉着应对，终于在中央文革首长离席之际递交了汇报材料。

2 月 5 日，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交大文革总会和持交大相同观点的西安医学院“八三一”的赴京代表。交大的郑叔良、吴翼健、王希平、贺相和交大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的另外五位同志共九人参加了接见，西安医学院“八三一”有二人参加了接见。在接见过程中，陈毅副总理讲了中国革命历程中犯过的“打倒一切”的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革命干部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西安高校的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等。最后，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代表们讲：“毛主席在 1 月 22 日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接见即将结束时，王希平代表交大革命师生员工向陈毅副总理献上了交大红卫兵袖章，陈毅副总理戴上袖章后爽朗地哈哈大笑，说：“好，交大，革命的交大！”当远在西安的交大师生员工听到陈毅副总理的这句话时，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2 月 7 日，周总理秘书通知交大驻京代表，要求李世英来京汇报。经研究，交大文革总会决定派主任李世英、常委戴慕蓉、宣传部长张国强赴京。

2 月 8 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交大和统指代表，进一步了解情况。

2 月 11 日下午 2 时 30 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礼堂接见交大和统指代表，交大的李世英、戴慕蓉、郑叔良、张国强、吴翼健、王希平、

贺相等七人参加会见。总理进入会场后，亲切地和每个代表一一握手，并详细询问了每个代表的年龄、籍贯、家庭出身、工作职务及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得知交大只有一个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总理说，“啊呀！全国仅有，是啊，这是独树一帜！”

2 月 13 日下午 6 时 10 分到晚 9 时 37 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小会客室单独接見了交大代表。总理详细地听取了李世英讲“三句半”的全部过程和西安“反右倾”的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提问题，还询问了西安交大西迁的有关情况，同时谆谆教导交大代表要处理好两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

周总理、陈副总理在接见交大代表的同时，也多次接见了统指代表。就在中央首长频繁接见、准备解决双方的对立与分歧的时候，2 月 10 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当天，陕西省军区打电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汇报，表明了支持交大，反对打、砸、抢的态度。但令人不解的是：第二天，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又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更正。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2 月 12 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王明坤的电话请示报告。王明坤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正确名称应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可以预料，如果王明坤的计划实现，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王明坤电话中的原则错误。2 月 14 日，毛泽东在《要事汇报》第八号上批示道：“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

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毛主席的《二一四批示》对西安地区乃至整个陕西省的局势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毛主席对西安局势的关切，还体现在一段关于外国人大字报的批语上。1967 年 3 月 10 日，西安外语学院的外籍教师大卫·库普贴出了一张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有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明确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等，西安市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将这张大字报内容转呈毛主席。3 月 20 日，毛主席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3 月 21 日周总理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参见《周恩来年谱》】

五十一年后，交大应力 21 班戴克刚同学著文披露，这张大字报其实是他起草的，得到大卫·库普的认可并写成大字报发表，署名“大卫·库普”，这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才为世人知晓。

3 月 1 日晚 9 时到 3 月 2 日凌晨 3 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王力、戚本禹、穆欣接見西安交大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派赴京代表。

3 月 2 日下午 4 时 40 分到 7 时 55 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西安交大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派赴京代表，21 军军长胡炜、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和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西安地区部分驻京人员 40 余人及总理派驻西安调查组的同志参加了会见。在会见中，周总理多次严厉地批评“反右倾”是方向

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指名让工联和统指的负责人依次表态，承认错误，做出检讨。总理还指出西安工总司的成立，是“由于统指和工联的反右倾和打、砸、抢的错误造成的。”周总理还说：各造反派组织“要抓整风、整顿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周总理特意提醒交大代表：“你们不要骄傲起来，要欢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这样才能接近。”接见时总理还告知中央决定调胡炜任军长的21军到陕西支左，总理肯定了21军在山西支左工作做得很好，要求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至此，长达七十多天的“反右倾”落下帷幕。交大《六六通讯》、《人民交大》报及交大广播台努力开展宣传，各战斗队也到各行各业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交大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打、砸、抢”和“武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4、“努力整风，准备夺权”

1967年3月3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陆军21军、兰州军区空军及总后西安办事处四家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又称为“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21军军长胡炜、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任指挥，袁克服、孙光、刘建功、方升普为成员。8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改称“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增王明坤、徐立树、苏锦章、刘江亭、白辛夫为指挥部成员。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发[67]8号）要求：“下乡下厂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

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交大文革总会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召回了全部在外的师生员工。

3 月 15 日至 18 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抽调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空军、21 军等单位的干部、战士 2059 名，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 4 所院校开展军训。

3 月 15 日上午，西安交大在大操场举行热烈庆祝“西安组训革命师生第一师”成立大会。前来指导和帮助交大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和组训第一师的万余名战士列队入场，首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接着校文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英、解放军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话，最后大会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闭幕。

军训遵照周总理“努力整风，准备夺权”的指示进行。为了加强纪律性进行了常规的队列训练，同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校文革总会成立了“临时整风小组”领导整风，全校师生对学校前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文革总会成员也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找西工大、西电等统指的领导人谈心。

3 月 29 日，交大在大操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强烈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革命师生员工的残酷迫害，李世英、刘维娜、赵瑛、李群等先后发言。

4 月 3 日，西工大文革委员会成员来交大座谈，交流军训经验。

4 月 17 日，在交大大操场举行“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霍士廉、严克伦到场接受批判，参加大会的还有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肖纯等人。

4 月 19 日，交大散发《再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三告西安全市人民

书》，出动“红喇叭”宣传，师生到市郊张贴大字报。

1967 年 4 月中旬，正值军训期间，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就“支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西安交大、西工大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批评和建议。李世英在会上就军队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得到军队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有记者将此次座谈会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为题报告给中央，其中特别提到李世英的八条意见。1967 年 4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李世英有三处批注：

第一处，在《报告》中写道：“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毛主席在“李世英同学”后面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第二处，在李世英第 6 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第三处，在第 8 条意见后批注：“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毛主席的《四二三》批示是对李世英同志和西安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赞许、鼓励和支持。

4 月 21 日，交大师生冒雨开会，热烈欢送来校帮助和指导军训的亲人解放军，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宣告结束。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67 年初西安交大等四所高校成功开展的军训、整风和谈心活动，为不同意见群众组织之间弥合分歧、消除误会、增强团结做出了榜样。

六、“军民协力，制止武斗”与“八五”静坐

1967 年 4 月，西安四大高校军训结束，统指内部两派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军民互动频繁，西安的形势总体向好，交大师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校内。

然而，正当交大师生专注校内斗批改，期盼早日“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西安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新的打、砸、抢、抄、抓歪风，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冲击和干扰着交大校内斗批改的进程，交大师生员工被迫应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1、交大革委会成立和第一次复课闹革命

军训结束后，交大于 4 月 24 日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各系成立“斗批改兵团”，文革总会开始部署校内斗批改。

4 月 30 日晚，交大在大操场举行军民联欢会，8134、8133、8118 等部队指战员应邀出席。

4 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 8133 部队和兰空的解放军同志五千余人参观了交大“东方红”展览馆，受到热情接待。

5 月 2 日，曾在交大进行军训的 8118 部队解放军同志来校联欢，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5 月 5 日，黄经耀司令、胡炜军长及兰空首长召集交大 22 名代表座谈，询问对大联合问题及支左问题的看法。

6 月 2 日，交大召开批判彭康大会。

6 月 3 日，交大召开批判林星大会。按照支左委员会支夏办公室要求，交大近五千人下乡支援夏收。

6 月 13 日，交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李世英同志任组长。据统计，当时全校共有学生 7055 名，教职工 2727 名。

6 月 23 日，武登才向全校师生介绍革委会筹备情况。

6 月 25 日，交大召开全校辩论会，讨论成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如何节约闹革命。

6 月 26 日，陈柏荣就节约闹革命与交大革委会筹备工作问题向全校作报告。

6 月 27 日，西安外国语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因成立革委会问题发生争斗，倾向交大观点的一派组织“井冈山”前来请求声援。交大师生连续两天召开 402 辩论会，最后决定向支左委员会和中央反映交大的意见，但不出动队伍支援，不上街游行。这说明交大师生已经下定决心排除外界干扰，一心一意致力于校内斗批改。

7 月 1 日，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成立。当天在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给毛主席发送了致敬信。


通知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委託蘭州軍区党委代祉，兰州軍区党委研究决定，批准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成立。

中共兰州軍区党委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給毛主席的致敬信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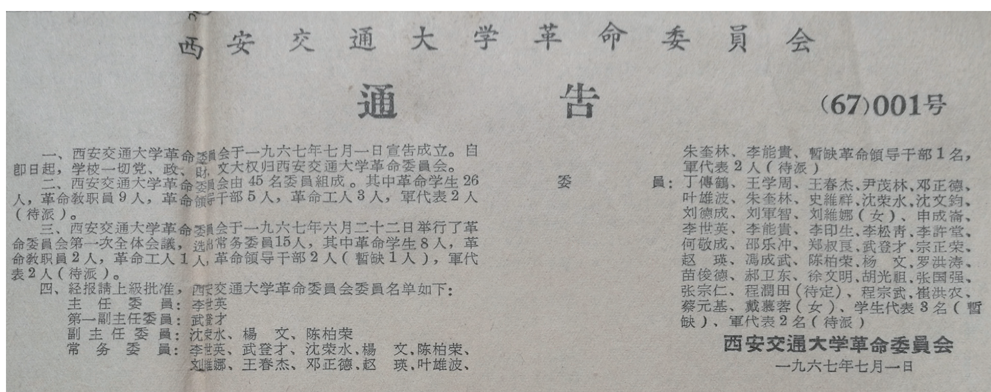
我校革命委員会在红色风暴中宣告成立

人民交大

第56期 1967年7月1日 星期一

陕西省军区黄经耀司令员、袁克服政委、21 军胡炜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关盛志副政委、方升普副司令员等部队首长出席大会。

西安交大革委会发出（67）001 号通告公布了革委会 45 名组成人员名单，其中：主任委员李世英（学生），第一副主任委员武登才（学生），副主任委员沈荣水（学生）、杨文（干部）、陈柏荣（教师）。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

通　告

（67）001号

一、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宣告成立。自即日起，学校一切党、政、財、文大权归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

二、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由45名委員組成。其中革命学生26人，革命教职員9人，革命領导干部5人，革命工人3人，軍代表2人（待派）。

三、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举行了革命委員会第一次全体会議，选出常务委員15人，其中革命学生8人，革命教职員2人，革命工人1人，革命領导干部2人（暂缺1人），軍代表2人（待派）。

四、経报請上級批准，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委員名单如下：

主任委員：李世英

第一副主任委員：武登才

副主任委員：沈荣水、楊　文、陈柏荣

常务委員：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楊　文、陈柏荣、刘維娜、王春杰、邓正德、赵　瑛、叶雄波、朱奎林、李能貴、暂缺革命領导干部1名，軍代表2人（待派）

委員：丁傳鶴、王学周、王春杰、尹茂林、邓正德、叶雄波、朱奎林、史維祥、沈荣水、沈文鈞、刘德成、刘軍智、刘維娜（女）、申成崙、李世英、李能貴、李印生、李松青、李許堂、何敬成、邵乐冲、郑叔㫺、武登才、宗正荣、赵　瑛、馮成武、陈柏荣、杨　文、罗洪涛、苗俊德、郝卫东、徐文明、胡光祖、张国强、张宗仁、程潤田（待定）、程宗武、崔洪农、蔡元基、戴慕蓉（女）、学生代表3名（暂缺）、軍代表2名（待派）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7月3日，交大革委会副主任武登才代表革委会就校内斗批改问题进行动员。

7月5日，交大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全体师生最关心的复课问题。

7月7日上午，交大在大操场召开复课闹革命大会，李世英代表校革委会宣布：全校从今天起开始复课，进行“复课闹革命”。每天上午两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其余两小时学业务，下午、晚上学工、学农、学军，搞文化大革命。

7月19日，李世英及政治部负责人刘维娜就复课闹革命、掀起新的大批判高潮作动员报告。

但是，由于西安形势的变化，这次复课闹革命的计划没能实现。

7月26日，交大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交流在复课闹革命中以毛泽东思想统帅革命大批判的经验和体会。

7月29日晚上，工总司、农总司等群众组织在交大的大操场召开革命领导干部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一百多名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省市革命干部作了揭发与控诉发言。

8月1日，交大召开全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李世英致开幕词，8118部队孙政委到会祝贺。

2、“军民联防，文攻武卫”与“军民协力，制止武斗”

交大校内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按计划进行，校外的形势却发生了剧烈变化。

工联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在总理3月2日接见后，不但没有深刻认识错误，还把自己的失误归罪于西安工总司的成立。他们诬蔑工总司是“大杂烩”、“反革命小联合”等，甚至动辄对工总司各级组织实施打、砸、抢、抄、抓，工厂中的工联基层组织也在夺权中极力排挤工总司，频繁引起冲突。

4月27日，工联、红造司指使一些受蒙蔽群众七、八十人到工总司捣乱，从上午10点到夜里12点，围斗工作人员，砸烂办公室门窗，还绑架了三名人质。

1967年5月，武斗之风开始在全国蔓延。全国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安，工联和工总司基层组织间的冲突逐渐升级成为武斗，并且愈演愈烈。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要求纠正当时出现的打、砸、抢、抄、抓歪风的《六六通令》。陕西省支左委员会贯彻落实不力，打、砸、抢行为依然横行，武斗仍在不断发生。

1967年5月31日，河南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火线指挥部”负责人袁庾华提出了“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导致河南武斗急剧升级，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1967年6月中下旬，统指的西工大、西电等院校和工联把“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升级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广为宣传，同样加剧了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当时经常见到他们贴出的大标语：“军民联防，文攻武卫！”“21军好，21军好，21军支左不支保！”这些口号不仅把他们挑起的武斗合法化，还试图离间21军和交大、工总司的关系，但是，支左委员会却没有及时制止这些错误口号。

6月下旬，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发生大规模武斗，工联的武斗队伍人人头戴柳

条安全帽，手持用钢管制作的长矛，边走边呼口号：“军民联防，文攻武卫！”

6 月 25 日，西安红旗机械厂“红总司”（工总）、“红旗总部”（工联）两派造反组织间发生武斗。

7 月 9 日，西安红旗机械厂再次发生武斗。

7 月 13 日下午，西安工总司、文总司等在新城广场联合召开批判霍士廉大会，文总司与对立派的文艺兵团、工农文艺总部等组织发生冲突。当晚，一伙人到文总司的所在地文化局打、砸、抢，当场打伤文总司 30 多人，重伤 6 人。

由于工总司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党团员多，老工人多，技术骨干多”，所以在争斗中屡占下风，办公室被砸，负责人被抓，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进，有工不能上，越来越多的工总司基层工人只好流浪到交大暂住，教室被占，学生食堂不堪重负，校园秩序被打乱，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极大关注。

7 月 20 日至 7 月 21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外事工作，由于“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肆虐，打、砸、抢和武斗升级，反击极左思潮的再次泛滥又成为当务之急，会议决定除杨文、陈柏荣外，包括李世英在内的其他委员全部抓外事工作，交大革委会被迫又将精力从校内转移到校外。

1967 年 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讲话中肯定了“文攻武卫”口号的正当性，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这个口号。但是，交大革委会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文攻武卫”与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立的，“武卫”成了“武斗”的借口，所以，从来不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所谓“武卫”。当“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出笼后，交大校内有的战斗队提出要“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革委会旗帜鲜明地接受、支持这一口号，安排一部分师生紧急中止校内工作，到工厂、机关、学校，配合工总司等基层组织进行宣传，西安的大街小巷、工厂车间几乎同时

贴满了“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标语，使得“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很快失去了市场。“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道出了西安广大市民的心声，同时也得到了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理解和支持。但支左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放任“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泛滥，不采取得力措施实施“军民协力，制止武斗！”导致交大和工总司的努力付诸东流！

3、“八五”静坐的始末缘由

交大和工总司大力宣传“军民协力，制止武斗！”西安的局面曾经一度缓和，但很快出现了反弹，更大范围的武斗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人们对西安局势的发展忧心忡忡，纷纷寄希望于陕西省支左委员会。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由陕西省军区、21 军、兰州空军和总后 203 部队四家组成，但是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的是 21 军。21 军的军长是胡炜，周总理曾经介绍他是“又懂军事，又懂政治”，在山西支左工作做得好。胡炜到陕西支左初期也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所以交大师生曾经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和尊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交大和工总司的群众逐渐感觉到支左委员会在处理西安两派之间的矛盾时往往支持主张打、砸、抢的统指、工联一派，压制反对打、砸、抢的交大、工总司一派，更未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使得西安的形势不断恶化，辜负了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由于支左委员会在解决工矿企业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中或明或暗地偏袒工联一方，成百上千被工联一方暴力驱赶、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反映情况、请求援助、讨要说法，但工人群众的呼声没有引起支左委员会的重视。

支左委员会在处理西安两派在“三结合”问题上的分歧时也有失公允。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曾经在“反右倾”时选边站，公开表态支持西工大、工联一方，对交大、工总司恶言相向，中央明确表态后他又拒绝检讨，

交大、工总司群众对他极度失望，但西工大、西电一方却要把霍士廉作为陕西省革委会首选的三结合对象。支左委员会不支持交大、工总司对霍士廉的批判，甚至不如实传达周总理对批判霍士廉的指示，进而默认统指派将霍士廉送往北京保护起来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对立和交大、工总司群众对支左委员会的不满。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等报纸不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7月27日，受“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工联所属数千人到陕西省军区静坐。

7月22日至7月31日，中央的报纸、杂志多次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及文章。交大革委会多次召集委员学习讨论，以李世英为首的大多数委员认为：针对陕西的情况，不同意搞“揪军内一小撮”，因为全国几乎瘫痪，军队是支柱，21军是周总理派来的，虽然他们支一方压一方，但这是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有少数委员认为这是中央的新动向，我们应紧跟中央。最后大家统一认识：不参与“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等待中央进一步的指示，并决定由陈柏荣按此精神向全校做广播讲话，动员大家认真学习社论，好好理解中央精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意外事件打乱了交大革委会的部署。

8月5日，武汉造反派组织“武汉钢二司”在西安出版了一份《武汉烽火》报，内容是“揪军内一小撮”，批判陕西省军区的“二月逆流”，也批判了交大。这份报纸在支左委员会军管的陕西日报社印出了几万份，并由21军的军车装运，交大师生对支左委员会和21军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

8月5日下午，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派人到交大北门，交给门卫一份公函，并嘱其转交李世英后随即离开。李世英拿到公函拆开后，发现是一份支左委员会发出的同意《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通知。这份通知签发时间是6月19

日，时隔一个多月才送到交大。按照常规，这样重要的通知应该送达革委会办公室，但支左委员会却派人将通知轻率地交给了门卫。就这样，曾经因为鼓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而被周总理勒令停刊的《西安红卫兵报》，居然在交大的强烈反对声中，由陕西省支左委员会于6月19日批准复刊，直到红卫兵报已经发行了，才极不负责任的通知交大李世英!

李世英和在场的革委会领导陈柏荣、戴慕蓉等考虑到当晚交大附中要成立革委会，为了稳妥起见，研究决定先不要向群众传达此事。当时在场的还有交大“大辩论串连会”负责人付登华，他对支左委员会的这种作法非常气愤，贴出了一张题为《胡炜必须悬崖勒猪》的大字报，披露了《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消息并发出了立即召开“402辩论会”的倡议。

当晚召开“402辩论会”，先由校革委会常委叶雄波主持，后来在部分同学的要求下改由付登华主持。辩论会上，付登华建议去找支左委员会反映要求、解决问题。十时多，他把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结为对支左委员会提出四点要求：立即军管刘澜涛、霍士廉等人；立即把刘澜涛、霍士廉等人交由革命群众批斗；不准《西安红卫兵报》单方面复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等，并带领同学们出发前往位于西五路玉祥门省工会的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叶雄波跟着队伍行动。交大队伍到达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后，发现人去楼空，连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支左委员会领导更是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付登华作为临时总指挥和叶雄波等人商量后，决定再把队伍带到设在建国路8号张学良公馆的支左委员会联络站，继续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解决问题。6日早晨，队伍到达支左委员会联络站，发现也是人去楼空，于是就将队伍停在了建国路，伺机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和联络站的工作人员。5日晚，李世英到交大附中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当得知“402辩论会”后付登华已带队伍前往支左委员会的情况，马上从交大附中赶回学校，急忙前去寻找交

大队伍。

实际上在 8 月 5 日下午，得知《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消息，工总司已经组织了队伍前往支左委员会接待站抗议。当晚，工总司得知交大队伍出发的消息，立即又组织队伍支援。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群众组织也来参加，抗议队伍的人数急速增加。

8 月 6 日，参与抗议行动的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建国路 8 号开会，鉴于支左委员会领导不出面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会议遂决定继续等待领导出面答复，并协商成立了以工总司马希圣为司令、交大李世英为政委的“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五’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五”指挥部）领导该行动。由于连续几日未找见领导，队伍一直坚持未撤回，这次行动就演变成了静坐，后来人们称其为“八五”静坐。“八五”静坐的队伍主要分布在建国路附近，也有小规模队伍到位于西北局的支左委员会和位于陕西省委党校的 21 军军部驻地门前静坐，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反映情况、解决问题。

李世英和武登才代表交大参与“八五”指挥部的领导工作。

“八五”指挥部成立后，随即发表了《造反声明》，向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提出了 5 条要求（大意）：

（1）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继续军管刘澜涛，看管霍士廉；

（2）立即将刘澜涛、王林、霍士廉交给革命造反派批斗；

（3）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宣传通讯机构的规定，不准单方面复刊宗派主义的《西安红卫兵报》，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周总理关于军管陕西日报社的指示；

（4）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

（5）支左委员会必须对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作检讨。

8 月 7 日，李世英在“八五”现场发表广播讲话，强调这次行动不是“揪

军内一小撮”，而是对支左委员会“支一派，压一派”错误做法的抗议行动（大意）。

同日，21 军刘政委建议“八五”指挥部撤回行动队伍，留下代表反映意见，但黄经耀、胡炜不出面，也拒不回应“五项要求”，所以“八五”指挥部没有接受刘政委的建议，认为“五项要求是合理的，首长不出来接见，不答复要求绝不收兵！”随后，行动的人数持续增加。8 月 11 日，“八五”指挥部公布静坐单位 799 个，人数 98000 人，其中外地区组织 90 个，1900 多人。

“八五”静坐发生之初，交大革委会多数委员就表示反对，后来又多次开会讨论，沈荣水、王春杰、郑叔良等多数委员主张尽快撤离，否则越来越被动。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西安问题的批示》（中发 [67]242 号）（也称“8·10 明码电报”），电报中有关西北光学仪器厂 2·10 事件的内容如下：

“陕西省军区：对西北光学仪器厂 2·10 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材料和陕西省军区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2·10 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各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陕西省军区在处理 2·10 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

陕西省军区宣布为 2·10 事件中被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人平反，只是取消了“反革命”的定性，“打、砸、抢”的罪行依然，而且是“教育释放”。可是，在统指和工联的策划下，被“教育释放”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却受

到像英雄一样的欢迎，工联派车前去迎接，给他们带上大红花游行庆贺，助长了打、砸、抢分子的嚣张气焰。

“8·10 明码电报”还指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中央“8·10 明码电报”传达后，21 军刘政委提出要见李世英和马希圣，但胡炜和黄经耀还是不出面。刘政委说代表个人与李世英、马希圣谈心，但是李、马坚持要刘政委代表支左委员会，李、马代表“八五”指挥部，由于身份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而未谈成，错失了与支左委员会正面接触协商的机会。

8 月中旬，沈荣水从武汉等地回来，向革委会介绍武汉及周围地区文革情况后，明确指出“八五”静坐必须马上撤掉，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揪军内一小撮”，多数委员也认为尽快撤出为好，但“八五”指挥部负责人仍然坚持等待支左委员会对五项要求的答复，否则绝不撤离。

自 8 月中旬起，参加“八五”静坐的交大队伍陆续返校，只有少数同学还留在“八五”指挥部工作。

统指和工联利用“八五”静坐制造摩擦、挑起冲突，自静坐开始起，他们就不断派人到现场挑衅，围攻、辱骂参加静坐的群众。

8 月 11 日，统指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工联、红造司和农总会结成武斗同盟，号称“四大组织”，为武斗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还在当地驻军的放任和暗中支持下，通过“明抢暗送”，从军火仓库、公安局等处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其中还包括部分制式武器，为武斗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一些被工联组织赶出工作单位、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工人也失

去了理智，他们不断冲击“八五”指挥部，要求马希圣和“八五”指挥部也要“文攻武卫”，工总司领导层中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人频繁活动，一些基层组织也在设法准备武器，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8 月 21 日，工联人员向西郊的西安变压器电炉厂的工总司发起攻击，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酿成血案。

同日，交大发表紧急呼吁：坚决反对武斗！愤怒谴责武斗！共同制止武斗！

8 月 22 日，统指的矿院、财院、师大等校组织游行队伍到 21 军军部门前向静坐的群众示威、挑衅。

8 月 28 日，工联人员向西安劳动技校开火，引发血案，学校被烧。

8 月 29 日，西安胡家庙地区工联调动大批武装人员向西安筑路机械厂的工总司进攻，双方发生激烈武斗。

8 月底，东郊的庆华厂、东方厂、华山厂，秦川厂；纺织城的国棉三厂、国棉五厂以及水泥制品厂也发生了武斗；外单位因武斗逃到交大避难的人数剧增。

8 月 31 日，关中供电局发生大规模武斗，工联和工总司双方出动数千人，互有伤亡。

9 月 1 日，四大组织通过设立在 8133 部队的拥军广播站，安排播出“揭露‘八五’指挥部打砸抢滔天罪行”专题节目，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也加剧了“八五”指挥部和支左委员会的矛盾。

同日，四大组织调动东方厂、华山厂、西铁总会、773 部队和兴平的秦岭公司等全副武装的数千名武斗人员，包围了 544 厂、西安制药厂和西安红星钢厂，西工大、西电也派出队伍前去支援。工总司的刘安全率领数十辆卡车的工人前往西郊解围。

9 月 2 日凌晨，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工联武装人员用机枪、步枪向工总司队伍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伤数百人。武斗过程中，工联及西工大、西电一方亦有伤亡。这次武斗造成周边地区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损失十分严重。由于这次武斗发生在 9 月 2 日凌晨，故称为“九二武斗”。

9 月 3 日，周恩来总理发出立即停止西安西郊武斗的指示，工总司、工联达成双方立即从武斗现场撤出的协议，武斗才告中止。

“八五”静坐的导火索始终是一个“谜团”，支左委员会明知交大坚决不同意，可为什么在“揪军内一小撮”风潮之时，突然把 48 天前就已经签发同意《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文件发给交大，这是一种轻率的、违背常理的方式。果不其然，看到这个文件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一群年轻人采取了轻率的举动，原本是为了阻止宣传“打、砸、抢万岁！”的《西安红卫兵报》复刊，践行“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初衷，最后却事与愿违，由单纯的抗议行动发展成针对支左委员会的“静坐”，激化了交大和 21 军的矛盾，也使西安另一派推行“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有了借口，特别是“八五”指挥部没有及时撤离静坐队伍，更给对方激化两派矛盾、挑起武斗创造了条件，导致局势不断恶化，以致发生了数百人伤亡的“九二武斗”，给交大和西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八五”静坐问题上，交大和工总司一方应该深刻反思自己，认真从中汲取教训，同时也希望有一天相关档案解密，给出“谜团”的清晰答案。

4、大疏散决策与中央首长接见

8 月中旬以后，西安武斗不断升级，陕工大的一些学生及东郊工联的一些工人多次用汽车撞击交大校门，毁坏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交大师生及过路群众和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一次次挫败了这些人企图挑起武斗的图谋。

9 月 1 日西郊发生武斗后，四大组织就派出武装人员占领了和平门、东

门和交大周边的交通要道，和平门、东门都有武装人员把守并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遇到工总司和交大的人员就抓。和平门城墙垛口和东城门城楼上、兴庆公园、计量局、陕工大校门口和第八设计院大楼顶上都架设了机关枪，对交大师生实行武装封锁和武力威胁。

“九二武斗”发生前后，四大组织更是打着“军民联防”旗号，对交大进行武装挑衅，某部队院校的坦克碾压交大校园的篱笆墙，围着交大示威。在交大北门口，不时有四大组织的武装人员乘着大卡车呼喊叫骂进行挑衅，声称要“踏平交大，活捉李世英！”甚至策划绑架伤害交大革委会负责人，交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交大师生的安全也牵动着主持正义的西安广大工人、干部和市民群众的心。他们向交大通报四大组织武装包围交大的详情，为交大的安全出谋划策。就在武斗气氛最严重的 9 月 2 日、9 月 3 日，就有西安市民冒着危险到交大报告了两起交大学生被西电、西工大劫持的情况，为营救这两位同学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些省、市老干部也建议交大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9 月 3 日下午，因得到消息称工联和统指要攻打并占领交大，校革委会在电机实验室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交大一贯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校内也没有武器，一旦对方进攻，我们绝无还手之力。为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也为了校园、校舍免遭对方的攻打和破坏，决定采纳老干部们的建议，组织学生和教职员工立即离校疏散，返回原籍或投亲靠友，等待学校通知，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到财务处暂借路费。同时，留下少数骨干组织护校队护校。

护校队成立时，只有交大校武装部合法持有的几十支小口径步枪和有限数量的子弹，还有校实习工厂临时打造的几十把匕首，但他们不畏艰险，坚

持护校。9 月 3 日，有同学出于自卫考虑，到西安市莲湖区武装部联系用“明抢暗送”的方式“借枪”，可是莲湖区武装部刘吉尧政委（《智取华山》英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等功臣）坚持原则，提前转移了枪支弹药，使前去的同学扑了空，实际上这也是爱护交大的做法。

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交大校革委会坚持不参与任何形式武斗的原则，果断作出了“大疏散”的正确决策，使交大避免了武斗的劫难！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

交大革委会在组织全校大疏散和护校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力量冒着危险调查九二武斗发生的过程、人员伤亡数据、工厂遭受的损失以及支左委员会制止武斗不力等情况，向中央反映。3 日上午，校革委会派戴慕蓉携带相关材料随庆安公司工总司的负责人王焕如同乘飞机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戴慕蓉到京后，通过交大驻京联络处与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吴斌同志联系要求汇报，也找了中央文革西北组谭同志汇报。王焕如也通过三机部、国防工办系统向上级反映了情况。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

9 月 6 日，吴斌通知交大驻京联络处，周总理叫交大、工总司代表去京，建议去京前把“八五”静坐撤回去。但是，“八五”指挥部没有执行总理的指示。

几天后，革委会决定派李世英、陈柏荣及段会林等人先后到京准备向中央汇报，带去了有关“九二武斗”的一批材料，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人支持武斗向四大组织暗送枪支弹药的统计表等，经过整理、核实后，连同一份省军区部分指战员写的关于“九二武斗”的调查报告一起上报给了吴斌及其他有关部门。等待接见期间，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安排他们入住西苑宾馆，学习

文件并等待中央首长接见。这样，撤离“八五”静坐的重任就落在了武登才的肩上。当时，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一直不出面解决问题，“八五”指挥部坚持得不到答复绝不撤离，双方陷入僵局，撤离工作非常难做。

李世英奉总理指示赴京后，于 9 月 10 日发出《给八五战士的一封信》。

9 月 11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尽快撤离“八五”静坐。武登才向参加静坐的各总司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9 月 13 日，李世英在北京发出《给八五战友第二封信》，要求尽快结束静坐。

9 月 14 日，“四大组织”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刘澜涛大会，会后游行并冲入“八五”静坐现场打、砸、抢。

9 月 15 日，武登才在“八五”指挥部继续对各总司做工作，要求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尽快将人员撤离，为中央首长接见赴京人员创造条件。

9 月 16 日，李世英从北京发出《给八五战友第三封信》，要求执行《九五命令》、《六六通令》，撤离静坐队伍。武登才在各单位基层干部会上宣布决定：下午 17 时结束静坐撤离现场。

从 1967 年 8 月 5 日深夜到 9 月 16 日下午，由《西安红卫兵报》非法复刊引起的大规模静坐示威活动持续了 43 天。

9 月 18 日凌晨，周总理和康生、粟裕、邱会作接见了交大赴京代表李世英、沈荣水、陈柏荣、戴慕蓉和工总司赴京代表马希圣、崔三河。总理和康生谈到：把你们从西安叫来，单独和你们谈心是对你们的关心和爱护，你们是最早的造反派，不愿意你们走向迷途。总理还对交大和工总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你们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你们‘八五’一定受了北京的影响——揪军内一小撮。”“我们打了几次电话，总想给你们主动。你们现在派性高于一切，有私心。这次找你们来也是想让你们转入主

动。”“叫你们来北京就是叫你们接触大问题，头脑要冷静。”还说：“你们6个人不能走，西安问题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这让代表们十分感动。

周总理为了让交大、工总司的赴京代表们在接见后冷静地、认真地反思自己的错误，端正态度，回去在支左委员会领导下两派联合起来，开始新的局面，亲自让秘书吴斌同志安排代表们在北京过国庆。代表们在西苑宾馆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并如实整理总理、康生接见的记录，结合西安的形势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及时把学习的情况向吴斌同志汇报。期间经过吴斌同志同意，沈荣水在接见后回到西安，陈柏荣、戴慕蓉、崔三河三人国庆节回到西安，先行向交大武登才和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总理和康生接见的情况，国庆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学习提高认识，等待下一次的首长接见。

11月2日晚上7时15分至12时，周总理、康生、张春桥、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负责人和交大、工总司代表等四十余人。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协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周总理首先询问了交大、工总司代表这一个多月的学习体会，在严厉批评代表们对9月18日接见讲话精神没有正确理解，未从大局出发的同时，鼓励他们要学好毛泽东思想，脱离派性，“在主席思想指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随后，代表们带着周总理的期望，肩负着中央的重托回到了西安。

11月5日，李世英、戴慕蓉向全校师生认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康生两次接见交大和工总司代表的讲话精神。

11月11日，交大革委会作了自我批评，认真检查了在“八五”静坐问题上己方的错误和责任，还检查了“敌情观念不强”、“放松了对校内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等问题。

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两次接见提高了交大、工总司代表们的思想认识，为实现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立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5、护校行动

早在文革运动之初，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浪潮，许多学校的教学设备被砸，图书资料被烧，档案资料被抢。但是，交大文革总会和革委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坚持保护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图书、档案、资料，其中也包括后来的革委会会议记录、各种刊物等资料，反对以抢黑材料之名冲击档案室。

交大图书馆大门两侧有一男一女两尊雕塑精美的大学生塑像，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象征着交大人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全校师生都非常喜欢。文革初期，一些外单位的红卫兵把这两尊雕塑视为“四旧”，向上面泼墨，还非要砸毁不可。文革总会得到同学们的报告后连夜派人用三合板把塑像围起来，外面刷上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使得这两尊雕塑躲过了一劫，至今仍然屹立在图书馆门前。

九二武斗后，护校队和部分留校的师生在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在地下室、锅炉房、工程物理实验室等处隐藏学校的档案、图章、资料和贵重物资设备，还派专人保护图书馆的贵重图书资料室，完好地保护了学校的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图书资料和档案，为以后的复课和文革结束后的教学、科研工作创造了条件。后来高教部有关人士多次指出，西安交大保护得这么好，这在全国高校中仅此一家。

七、复课闹革命

1967 年 7 月 7 日，李世英代表校革委会第一次宣布“复课闹革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施。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

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交大革委会积极响应，认真贯彻落实了中央指示精神。

1、复课奇迹

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通知的当天，交大校革委会就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通知精神，会议决定由校革委会常委李能贵负责制定学校“复课闹革命”方案和实施意见，并组织各系革委会尽快落实。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复课闹革命”的“复课”方案确定为：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主要学习专业课，有条件安排下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五年级完成毕业设计工作。

由于当时的大部分教室都住有被工联一方逼迫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基层组织的工人，有些人为了自卫还带有枪支、炸药、雷管和手榴弹，清理起来十分困难也十分危险。但为了复课大局，也为了校园的长治久安，校革委会决心全面清理，由各系部组织学生动员这些工人离开学校回原单位或回原籍避难，并由熟悉工总司的战斗队和保卫处配合处理清理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经过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终于全部清理了校外人员，消除了安全隐患，为复课创造了条件。

10 月 23 日，学校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由李世英作动员报告，师生们喜出望外，摩拳擦掌准备复课。

第二天，全校各专业同时开始上课，同学们重新坐到久违了的教室，教师热情地走上讲台，渴望学习的同学认真听课，学习气氛再次充满了校园。

为保证实践教学，学校安排 10 万专项经费用于实习。生产实习以就地就近本省为主。考虑到西安有些工厂生产不很正常，安排了将近一半学生到华东地区工厂实习，保证了教学要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师生们一面复课，一面探索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11 月 14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进一步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

12 月 7 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发表。

12 月 10 日，交大革委会在 402 会议室召开“彻底批判旧交大全盘苏化的教育制度大会”。

12 月 15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愤怒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交大的现象。

12 月 22 日，校革委会发出学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学校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师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开展大批判。

12 月 26 日，毛主席的全身巨型塑像在交大图书馆前的广场落成。

时间进入 1968 年，师生们“复课闹革命”的热情不减。从 3 月初开始，1963 级学生陆续外出生产实习。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同时发表了文汇报、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当时，交大有一些师生为了开展教育革命探索，自发成立了一个跨系、跨专业、跨年级的教育革命组织，名为“抗大战校”，约六、七十人，分为机切和工企两个专业，仿照军队编制，称为机切排和工企排。抗大战校等少数学生认为当时的“复课闹革命”是“复辟”、“复古复旧”，要求停课学习讨论，但多数师生不同意，大部分专业仍然坚持一边上课，一边探索教育革命。

复课期间，数理系应力 21 班孔祥骝同学贴出了一张名为《科学纵横观》的大字报，提出了科学技术革命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极大关注。

8 月 29 日，工宣队进校，“复课闹革命”彻底停止。

十个月的复课，使1966届1431名学生完全按教学计划基本完成了大学学习，1967届和1968届的2415名学生，除学习了专业课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安排到工厂进行了生产实习，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专业知识，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9届和1970届的3401名学生集中学习了主要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

西安交通大学在当时极端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奇迹般的复课十个月，在全国高校中绝无仅有。

2、校内斗批改

在复课的同时，交大革委会领导了这一阶段的校内斗批改。

1967年3月和1967年9月、11月中央首长接见交大代表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多次说："彭康这个人我晓得，什么时候打倒他，都不会犯错误。"还对李世英说："要深入批判走资派。警惕黑手，警惕工人、学生中的坏人，李世英，我不相信你们交大没有反革命……"。康生的这些言论，对交大的校内斗批改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1月份开始，交大各级组织多次批斗彭康和原交大领导干部林星、陈大燮、张鸿、程润田、庄礼庭、任梦林、邹理生、王龙泗、陈树楠、校医院院长沈伯参等，程润田的"假党员"问题被追查，凌雨轩遭到多次批判。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钟兆琳教授、周惠久教授、赵富鑫教授等也都被当成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

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

12月30日，交大"革委会召开'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宣布对彭、林、凌等32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15人系革委会讨论新错定

为敌我矛盾的，在校内批斗，监督劳动改造。”【参见《西安交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85】

1968年1月18日，交大校革委会召开会议，提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高潮。

3月13日，交大革委会讨论批准了红卫兵总部关于冻结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在银行存款的报告。

革委会派邵乐冲等四人去上海学习抓整党、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的经验。

早在1966年9月份，交大文革总会组织的彭康专案组已经调查清楚原有揭发材料不实，不能确定彭康为叛徒。但是，“清队”开始后，在康生讲话的影响和外界的压力之下，“3月22日在校革委会和有关专案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彭、林、凌的定性材料，把彭康校长定为‘大叛徒’、交大党内头号‘走资派’”。【详见《西安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

3月26日，武登才主持召开交大全校党员大会，总结前段整党工作并提出下阶段整党的安排意见。

3月25–27日，交大革委会扩大会议听取了邵乐冲等人的汇报，决定由武登才、沈荣水、叶雄波、王春杰、朱奎林五人抓阶级斗争。

3月27日，交大召开红卫兵动员大会，邵乐冲介绍了赴上海学习的情况。

3月28日，发生了彭康校长被游斗致死事件，详情在后文中另有叙述。

3月29日，王春杰在校革委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凡需在全校或全系批斗的，要经过校革委会批准，本单位批斗的由专业委员会批准，性质严重需要处理的经学校批准。

4月16日，校革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狠抓校内阶级斗争。

5 月 12 日，按交大革委会布置，交大红卫兵独立营的红卫兵“支左部队”分别进驻到基础部、教务部所属科室，抓阶级斗争。

5 月 17 日，在交大校革委会和解放军西安警备区的支持下，交大“红卫兵部队”正式成立，会上宣读了红卫兵部队宣言，主要任务是在解放军西安警备区领导下，对校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5 月 20 日，交大召开全校大会，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治、陈为习。校革委会宣布开除王治、陈为习学籍并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决定。专政机关当场逮捕了王治，拘留了陈为习。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但是，交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学生中的 1966 届已经毕业离校，1967 届即将毕业，1968 届正在外生产实习，1969 届、1970 届学生正在集中精力学习专业基础课程，对政治运动已感厌倦，所以对“清理阶级队伍”已没有当初的热情，革委会只是当作任务完成而已。

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起波澜，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八、彭康校长之死

彭康校长之死，是当年交大人永远的心中之痛。

1966 年 6 月 17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彭康、林星、凌雨轩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并对西安交通大学党委进行改组”。自此后，彭康校长一直处于靠边站、被批斗和被监管的状态。

1966年7月6日，省委交大工作团团长严克伦在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彭康为叛徒。

1967年2至3月及1967年9月至11月，周恩来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校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代表时，康生先后两次对交大代表说彭康可以随时“打倒”。

在此种情况下，虽然校文革总会和校革委会负责人根据有关材料并不认为彭康是叛徒，但又不能向全校宣布，不得不违心地继续把彭康作为叛徒来批斗。尽管如此，校文革总会和校革委会还是尽可能采取措施对彭康予以保护。

1966年8月20日，交大文革总会成立，在9月绝食风波期间，即从电机系工企42等班级中选派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同学进驻彭康家，文革总会还专门安排他们不参加绝食，对彭康昼夜严加保护，就连彭康夫人给彭康送饭也必须亲口尝试。

1967年7月，校革委会成立后，依然对彭康的人身安全作了专门的安排及布置。67年10月校革委会授命常委邓正德负责彭康的监管工作，从电制32班中抽调可靠的同学组成监管组入住彭康家里，负责彭康的安全。

在接受群众批判的年月里，彭康校长写下了《劳改周记》和《关于迁校问题的回忆》，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往事和最后的心路历程。

然而百密一疏，令人痛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

1968年3月28日早晨，抗大战校工企排三十多人在负责人赵传平等人的带领下经红卫兵总部批准，将彭康押到图书馆前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请罪后，开始在校内游斗，路程约有6华里，历时40多分钟。虽然游斗过程中没有殴打虐待现象，也没有带高帽，胸前也没有挂任何东西，但当时彭康年近七旬，身患多种疾病，在游斗过程中情绪紧张，劳累过度，引起病情恶化，

虽经校医院医生抢救，并派车送往社会医院，但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在敌人牢房里坚贞不屈，坚持革命气节，对党和交通大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游斗致死了。

彭康校长的不幸离世是交大的重大损失，这一方面说明在 1968 年初，极左思潮在交大少数师生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交大革委会在监管彭康这件事上存在重大过失，负有监管不力之责，校监管组严重失职，未能制止长距离的游斗和及时组织抢救，致使悲剧发生，当事人要汲取这一深刻教训。

事件发生后，校革委会一方面“亡羊补牢”，严格了批斗的审批权；另一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调查材料与结论均已存档封存。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到当年的调查结果。经过编者多方努力，在热心校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终于联系到部分当事人和目击者，基本上还原了事件真相，总算对广大校友有所交代，也聊以告慰彭康校长的在天之灵。

九、工宣队领导

1968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 [68]135 号）。

8 月 29 日，以陕西国棉四厂、秦岭公司、西北第一印染厂等八家单位组成的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交大。工宣队中有一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派出的军队干部，亦称为“军宣队”。下午 3 点，在大操场召开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仪式，校革委会主任李世英致欢迎辞，工宣队代表李克荣讲话。

9 月 11 日，西安交通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李克荣，副组长詹昌年（主管专案），王志学、王俊卿（以上均为工宣队员），张仁杰（军宣队负责人），李世英（校革委会主任）。各系也相应成立了以工宣队为主

体的领导小组。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接管了学校的所有档案材料，掌管了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

1、工宣队领导的政治运动

工宣队进校后，先后领导了“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抓三破”（抓现行，破反动标语、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案）、“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整党建党”、“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

工宣队员多数是原单位群众组织的骨干，他们认为交大存在着以彭康为首的黑线，对运动中的问题要深挖幕后黑手，特别是原来属于工联一派的工宣队员在领导运动时带有明显的派性，他们抱着对交大的偏见，以极端的方式开展运动，致使很多师生员工蒙受不白之冤。

工宣队动员全校师生掀起大批判高潮，钟兆琳、周惠久、赵富鑫、屠善洁等许多老教授再次遭到批斗，众多原校、系领导干部、骨干教师也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自“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工宣队暗中收集李世英等人的黑材料，追查“八五”静坐、“九二武斗”的所谓“黑手”，追查所谓“整康生黑材料”假案，很多教师受到牵连，许多学生的毕业分配也受到影响。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抓三破”过程中，工宣队领导的 1968 年 9 月至 1969 年 2 月期间，全校立案 445 人，致死 11 人，其中有教师王鉴淑、陆谷宇、汪国樑、王振国、沈宗炎、沈家本等 6 人，制造反革命集团假案 3 个，破获所谓反标 34 起，送司法机关逮捕 9 人。应用力学教研室教师唐照千被捕后无辜坐牢四年余，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平反。

1970 年的“一打三反”开始后，工宣队继续采用极端的方式开展运动，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1971 年 2 月，工宣队以清查“五一六”为名，残酷

迫害交大师生将近一年半之久，后文将有较详细的叙述。

2、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

1969 年 3 月 7 日，交大派出第一支教改小分队，截至 7 月份，共派出 128 个教改小分队，下厂 3048 人次，其中教师 977 人，学生 2071 人，分别深入到近百个工厂、农村、公社水电站等进行教改实践，在工厂参加劳动和技术革新，到农村搞调查研究，举办了二十多期培训工人、农民的训练班。

电制 69 届、70 届部分班级成立了“五七战校”，与教研室老师们一起，以原电机教研室实习工厂为基地，开展电机制造的专业学习，创办了电机厂，制作出交流异步电动机。

6 月 5 日，交大遵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关于“学校办工厂”的指示，建成校办“五七”机电厂。该厂由原来的“五七厂”和各系（部）修配组、实验室调整合并而成，共 400 多人。

8 月 7 至 9 日，交大召开教改小分队第三次经验交流会，交流教改经验。

9 月 13 日，经上级批准，西安交通大学“七二一”电机试验班招生。实验班从优秀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并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厂技术人员中选聘兼职教员。学习年限暂定 2 年，招生名额为 60 名。

9 月 23 日，校工宣队和革委会根据省教育革命座谈会精神，组织全校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下农村人员为 30%，下工厂接受“再教育”40%-45%，留校人员为 25%-30%。

9 月份，“整党建党”工作结束，全校 868 名党员百分之九十恢复了组织生活，另有 12 个新的党支部建立。科研工作开始恢复，学校确定 9 个研究课题，大多为军工项目，投入人力 325 人。

11 月 12 日至 14 日，交大召开第四次教育革命探索经验交流会。

11 月下旬，交大赴汉中地区留坝、略阳、宁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2000 多名师生经过 50 多天劳动返校。

12 月 16 日，交大工宣队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形成《关于贯彻执行省革委会〈认真作好大中城市人员、物资疏散工作的紧急通知〉的几点意见（草案）》，草案决定全校应在 12 月底基本疏散完结。

12 月 22 至 26 日，交大两千多户教职工疏散到岐山、凤翔农村。

1970 年初，革委会组织全校教职工按照“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修建砖窑，挖筑防空洞，数千人参加。

1970 年 5 月 5 日，校五七工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全校奋战整个夏天，完成省革委会下达的 2300 台水泵生产任务。

3、告别母校

随着时光流逝，学生们毕业的日子相继来到。

1967 年 9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66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交大 1966 届毕业生从 9 月起开始进行分配。

1968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交大 1967 届毕业生于 8 月 25 日开始派遣。

1968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68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12 月 3 日，交大 1968 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开始，12 月底，68 届毕业生陆续离校。

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69、1970、1971 年度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自 7 月起，1969、1970 届毕业生陆续离校。

至此，交大文革前招收的大学生基本分配完毕，同学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母校。

十、审查与迫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李世英为代表的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和后来成立的革委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旗帜鲜明地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曾经对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在 1967 年 8 月，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原本是为了促使“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努力，最后却错误地发展成了针对支左委员会的“八五”静坐。

1967 年 9 月 18 日和 11 月 2 日周总理和中央首长接见后，交大革委会认识到了己方的错误，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支左委员会胡炜等人不依不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对交大师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审查与政治迫害，下面仅举数例，以资管窥。

1、兴平 302 库事件

在陕西省兴平县有一个 302 国防仓库，储备有大量武器装备。

1967 年 9 月 4 日凌晨，李世英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吴斌打来的电话说：据报告，陕西兴平发生“农造司”抢 302 国防库，总理委托你去劝说解决问题。李世英迅速回到交大召开校革委会紧急会议，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后，随即与革委会委员李印生和付登华等十一人赶赴兴平了解情况，落实总理指示。

李世英一行人赶到兴平后，立即向守卫 302 国防仓库的驻军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驻军明确告知：根本没有发生“农造司”抢劫 302 国防仓库问题。李世英又通过驻军首长见到兴平“农造司”负责人，讲明了来兴平的原因和目的，兴平“农造司”负责人也表示根本没有“抢 302 国防库”一事，并对别有用心之人的栽赃陷害感到非常气愤，同时还说明兴平“农造司”和西安的“农总司”没有任何关系。为了证实 302 库的安全状态，302 部队首

长带领李世英一行人进入地库查看了存放完好的各种武器装备。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是有人向周总理谎报军情，在栽赃兴平“农造司”的同时，还把兴平“农造司”和西安的“农总司”混为一谈，借机陷害交大一派群众。

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李世英等人把基本情况作了汇总，向总理联络员作了尽职汇报。为了慎重起见，留下李印生等几个同志在兴平继续观察，李世英和付登华于 9 月 6 日晚上回到了学校。回校以后，他们又写了书面材料，寄到周总理办公室，说清楚了这是一桩无中生有的谎报军情事件。

事情到此本应该结束了。不料数十年后，胡炜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9 月初，东派（编者注：指交大、工总司派）要抢咸阳 302 国库的武器，总理深夜来电话告我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制止对方抢夺国库的武器。又由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直接给交大头头李世英打电话，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诬称当年交大、工总司、农总司等所谓的“东派要抢咸阳 302 国库的武器”，而且是李世英派出了“要抢武器的群众”，总理“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

胡炜为何在几十年后仍然要把这无中生有的“抢 302 库”的罪名栽到交大头上，还要肆意篡改周总理的指示，往周总理身上抹黑？使人不得不怀疑当初有人谎报军情、欺骗周总理和党中央就是为了制造事端，置李世英和交大于死地，因为抢劫国防仓库无论何时都是“杀无赦”的罪名。

2、汤峪学习班与陕西省第一大案

1968 年 12 月至 1969 年 6 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汤峪陕西省第一干部疗养院举办了“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汤峪学习班）。交大参加汤峪学习班的有校革委会成员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叶雄波、张国强，李印生、校红卫兵总部司令兼西安

地区红卫兵副司令黄胜辉以及当时有影响的战斗队如 193 战斗队、驚回首战斗队、三六专案组、817 调查组、校三结合办公室等组织的成员共 29 人，是参加此学习班人数最多的单位。

学习班从 1968 年 12 月 28 日开始，1969 年元月 2 日举行开班典礼，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21 军军长胡炜出席了典礼仪式。主持人强调这次学习班主要就是摆敌情，提线索，查事件，挖幕后，揪出黑手，剷除黑线，挖出黑根。通过学习，两派消除分歧，团结一致，达到巩固革命大联合，推动全省斗批改向前发展。



1969 年西安交大参加汤峪学习班同仁合影于交大

后排左起：叶雄波，张国强，陈沾纬，沈荣水，苏建农，付登华，李金忠，许静远（许刚），杜洪江，岳佩麟，朱泽一；

中间左起：戴慕蓉，？？？，张德柱，李世英，冯伟年，蒋正华，梁德群；

前排左起：陈绍魁，武登才，沈元秋，肖国信，景存斌，李印生，孙国樑，阎保定。

然而，在这些口号之下，学习班却大相径庭。首先，学习班名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举办，实际上完全由21军操控，军宣队全部是21军的干部战士，包涤处长坐镇，工宣队全部是宝鸡虢镇某国防厂的工联派群众组织骨干，一开始就对交大学员横眉冷对，连食堂的伙食也由21军后勤干部管理，学习班的倾向性可想而知。

第一阶段为学习阶段，结合学习查找极左思潮在西安的表现，共15天。第二阶段为揭摆问题，动员大家写大字报揭发各自头头的问题，找出操纵西安两派的黑手。

工、军宣队认为操纵交大的黑手就在西北局，这次学习班的目的就是找证据。他们针对交大学员搞人人过关，把他们认为的交大重点学员单独隔离，不揭发不让参加集体活动，还在大会上点名施压。他们打压交大学员的杀手锏是所谓的“整理康生黑材料”一号大案。

1967年秋季，西安地区一派群众组织调查霍士廉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的情况时，涉及到康生。胡炜等人就捕风捉影，立案追查，这就是所谓“整理康生黑材料”案（即一号案）。

在胡炜的授意下，学习班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目的是为了‘抓大头’、‘揪幕后’，整老干部，同时，还企图借此整一派群众，向康生表忠心。”【详见《中共陕西省委陕发〔1979〕175号文件》】

汤峪学习班于1969年6月15日结束，持续将近半年。

1971年清查“五一六”期间，省革委专案组又把“整理康生黑材料”当作主要问题，继续追查。

在这一案件的追查过程中，胡炜作动员，听汇报，亲自部署，仅69年1月到6月就开会17次。1972年7、9月，专案组报告对此案“倾向于否定”，追查工作才不得不停下来，但仍然留了个尾巴。

中共陕西省委陕发〔1979〕175号文件载："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胡炜等人利用他们把持的权力，以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恶劣手段，制造了一起'整理康生黑材料'假案。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追查了四年，涉及范围有原西北局、省、西安市三级四十多个单位，迫害和株连干部、群众一百四十人……""他们不顾党纪国法，随意侵犯人权，任意抄家、隔离审查，甚至制造假笔迹、假材料，栽赃陷害，搞得有的同志家破人亡。……追查过程中，他们采取先定罪名，逼取口供，而后扩大范围，指明问供，猎获'战果'。刑法之多，无奇不有，什么车轮战、捆、绑、吊、打、上手铐、上背铐、老虎凳，用电线扭成鞭子毒打等等……""大批干部、群众、家属、子女，横遭揪斗、抄家、毒打，造成了严重后果。"

交大的顾洹老师于1968年11月被陕西省革委会军管会以调查问讯的名义拘捕，直到1976年2月才被释放，非法关押七年零三个月，竟然没有任何手续。被关押期间，经常遭受刑讯逼供，要他交待"整理康生黑材料"和李世英等人的问题，受尽了折磨。

据中共陕西省委陕发〔1979〕175号文件记载，在这一假案中，遭受到迫害和列入黑名单的交大人员有：顾洹、戴慕荣（蓉）、陈铁民、崔洪农、苏建农、冯伟年、赵英（瑛）、马杰、刘梦林、武登才、吴家寿、邓建忠、沈荣水、顾雪芹（琴）、杨克俭（剑）、孙少华、顾明芳、周道、朱初扬、阎保定、周俊卿、李公正（功振）、张发勇、梁德群、孟繁森、周鸣（明）泉、蔡元基、张培安、贺湘（相）、黄善康、段密芝、傅登华、李兆昆（锟）等三十多人。（编者注：圆括号中的内容是作者核实的用字。）

3、"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开始。3月31日交大召开全体党员大

会，军宣队负责人戴之炎在报告中说：交大“不仅解放前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在解放后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交大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隐藏了一个很深的特务集团”，“交大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潜伏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老反革命分子”等。“敌人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又出现了新的反革命分子。通敌叛国者有之，杀人行凶者有之，反攻倒算者有之，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者有之。”号召党员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迎接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把交大所有的教职员工和曾经参加过文化革命的学生都当成是运动对象，怀疑一切，肆意迫害。

1970 年 4 月初，“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张仁杰调来大批解放军和工宣队，把一千五百多名教职工集中起来举办所谓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学习班，“他们颠倒敌我，侵犯人权，限制人身自由，楼楼设岗哨，画地为牢，连出楼及散步也不能越过划定的界限。他们采用高压手段，搞什么‘大检举、大揭发’，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仅这一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就有三十五人，其中不少是冤案、错案、假案；教职工及家属发生自杀事件九起，……。被迫自杀的同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同时在反动的‘两个估计’下，对广大教师队伍，进行打击。在当时摸底中要整掉的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个别系部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尤其是对教授、副教授，都被说成是‘特嫌’，地主，反动军官，反动权威等，都不能用了，全校八十二位教授、副教授，要整掉的就有四十五人。”【参见原交大人事处朱钰鹏：《彻底批判胡炜插手我校的严重罪行》，《西安交大》校刊第 23 期，1978 年 11 月 6 日）】他们用专政手段非法拘捕饶启昌、毛关民等四人，精神病患者许志中被迫害致死。在学习班举办前校革委会副主任杨文迫于形势而自杀，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尚有陈子晴、王敏秀等 5

人。【参见《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情况》第二稿，1985】

4、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陕西省革委会政工组设立了“第三办公室”，主管清查“五一六”业务。5月，交大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楼绍文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和以军宣队负责人李剑秋任主任的第三办公室，还成立了朱学忠等12人组成的李世英学习班调查组。

当时，西安的大专院校二十余所，只有交大举办了所谓的清查“五一六”学习班。胡炜等人利用办“学习班”的名义，再次迫害李世英等原交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进而全面打击交大师生员工。

首先，他们派出以交大工宣队员为主的调查人员分赴全国各地收集李世英等人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罪证。调查人员找到已经毕业、以往和李世英等人共过事或仅仅在工作上有过联系的同学，要他们揭发李世英等人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罪行”，还说什么“李世英有‘五一六’思想’就是‘五一六分子’！”诱导逼迫，态度蛮横，往往遭到同学们的严词拒绝。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就对这些同学进行报复，到这些同学所在单位告黑状，说这些同学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许多同学因此在单位受到审查和迫害，正常的工作、晋级、升职都受到很大影响。

接着，将交大原“大辩论串连会”会长、曾任八五指挥部秘书的付登华“接”到交大隔离审查，诬称付登华是“未填表的‘五一六分子’”，还派了3个人昼夜监控，以高压手段逼迫付登华揭发交待李世英的“五一六”罪

行。审查从 1971 年 9 月 15 日一直持续到 1972 年 8 月 2 日，时间长达 320 天，给付登华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1971 年 11 月，他们又将原交大革委会副主任沈荣水、常委戴慕蓉、原交大革委会驻京联络处负责人贺相等人“护送”回到交大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不许外出，不许和熟人打招呼。每个被审查者都配有十几人的“帮助小组”，强迫他们交待并揭发李世英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罪行”，还在 4O2 大会议室组织大型批斗会，时间长达一年。

最后，1972 年元月 23 日，调回重点对象李世英、武登才隔离审查，时间将近一年，但最终一无所获。

当时的交大党委和工宣队把李世英等人当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立案审查，遭到了交大教职员工的强烈抵制，为此，他们还专门搞了两个多月的所谓“转弯子”学习。在李世英等人隔离审查过程中，正直、善良的交大教职员工们，用各种方式帮助、安慰和鼓励他们，使得他们有勇气度过长达将近一年的艰难岁月，老师和员工们的行为令人敬佩。

最终，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对李世英的审查结论为：“李世英同志在 1967 年 8、9 月问题是属于革命小将在前进上的认识性错误，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敌人无关。”

如此结论，还算客观，但一句轻松的“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敌人无关”，耗费了李世英等人将近一年的青春岁月。“五一六”的清查虽然结束了，但它引起的严重后果还在持续发酵，一份份“黑材料”塞到他们的档案里，“不能出国，不能重用”，压得他们一生喘不过气来。长达近一年的审查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年代，可想而知。李世英等人回到工作单位后，迎接他们的依然是无休无止的审查和交待，一有风吹草动，莫须有的罪名就会从天而降。受到牵连的还有一大批已经毕业离校的交大毕业生，工宣队极不负责任

地向这些同学的工作单位寄去未经落实的“黑材料”，导致这些同学长期被当成“反革命”嫌疑而打入另册。坚持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的李世英于1978年12月8日被西安市公安局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罪名拘捕，直到1981年6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予起诉”后获释，坐牢两年半。

十一、丹心照日月，功过后人评

五十二年前，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的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与考验。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贡献，也有失误，唯一没有的是私心杂念和利益追求。

交大图书馆前的两尊塑像能够作证，樱花道旁的万朵樱花可以诉说，当年的交大人曾经为了信仰而努力奋斗，也曾经勇敢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了保护母校，他们舍生忘死，他们成功的复课为全国高校树立了榜样。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在西迁精神的鼓舞下，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这里面也有他们的贡献。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经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无数次的审查与迫害，甚至在文革结束后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依旧初心不改，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没有辜负母校的殷切期望；还有许多同学毕业分配到极其艰苦的地方，但他们始终胸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情壮志，任劳任怨，发奋图强，扎根边疆，无怨无悔，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世人肃然起敬，所有的交大人都为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辉煌业绩感到骄傲和自豪。

丹心照日月，功过后人评。

我们今天真实再现这一段历史，只是希望人们了解当年交大人的信仰与追求、经历与挫折、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为母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致谢

本《纵述》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文集编辑组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许多热心校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还参考了一些书籍、报刊和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文章，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 年 12 月 6 日



作者简介

阎保定，男，1946 年 4 月 1 日生，1968 年 12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应用物理专业，河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中国高等学校电工学研究会荣誉理事。



作者简介

陈沾纬，男，1945 年 11 月出生于江西修水，1969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金属学热处理工艺及设备专业（金相 42 班）。先后就职于江西省修水柴油机厂、修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工程师。2006 年元月退休。

2000 年退居二线后，应聘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咨询培训工作。退休后，受聘于 TUV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信标技术培训中心从事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工作。

往事的回憶

■/李世英


李世英（1945–2017）

【编者按】李世英，河南鄢陵人，1945 年 5 月生，1964 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 810 专业。1965 年 12 月 9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 年 6 月，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中，李世英被陕西省委工作团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于 6 月 9 日，写下了三封感人至深的遗书（参见附文一）被迫自杀，后被救活。

1966 年 8 月 20 日，交大师生员工采用巴黎公社原则的方法选举李世英为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 年 4 月 23 日，毛主席在一份批示中，称其为"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1967 年 7 月 1 日，中央文革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李世英任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 年 4 月 30 日，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李世英被任命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曾兼任咸阳地区党委副书记，咸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5 年 1 月，李世英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8 年 12 月 8 日，李世英以所谓“打砸抢首恶分子”被捕入狱。

1981 年 6 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世英“免于起诉”，释放出狱。

2005 年 5 月，李世英从咸阳市运输公司退休。

2017 年 3 月 27 日，李世英因病去世，享年 72 岁。

此文系编者根据李世英生前给部分校友的若干封邮件组合编辑而成，总题目为编者所加，各部分标题大多是原有。编者对原邮件文稿内容略有删节；个别地方的顺序作了调整；修订并改正了原邮件中少量词语的差错；文中各照片均为编者所添加。由于原稿尚是砌块，未正式成文，编者已完整的按作者的原意对其做了修订和少量引文的删除,因李世英已去世,未能经本人认可。因此可能造成的某些疏忽和遗漏，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说明之一

我现在开始写一些往事的回忆。由于搜索资料比较困难，所以，先就一部分一部分写出来，这些部分，就暂叫做砌块吧，算是一些建筑材料，最后再把它砌筑在一起。

请大家多提意见，补充材料，纠正我回忆中的错误。

为了方便识别，删除的部分请用红颜色；增加的内容请用黄颜色；修改的部分请用绿颜色，纠正错别字请用蓝颜色。关于颜色的用法，在 word 中比较简单，不会用的可以请教一下别人。占用大家的时间，在此先表示感谢。

另外，有什么意见、想法、建议等，请给我发邮件。

李世英　2013.11.17

说明之二

有的校友收到“砌块”后，给我打电话，发邮件，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提供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生动、有趣的一手资料。有的同学提出，感觉这些“砌块”不连贯，希望知道总体安排。

目前发的东西，只是以后的建筑材料，我是根据资料准备的情况和我回忆的情况，感到可以写的就先写，所以时间上不按顺序。最终，我想还是按照时间顺序“组装”比较好。当前，各位还得耐着性子，让我一块一块地“搬砖头”。

至于体例和形式也没有最后确定，走着看吧，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有些问题处理起来有难处，比如，人名的出现，有的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的人可能不希望出现自己的名字，是尊重个人意见还是依据客观？如此等等。

本来不应该给大家毛坯看，因为一些同学多次催促；而且大家都是古稀上下的人了，早点发，趁着大家眼睛还能看，脑子还清醒，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西安文革。大家也有一个话题，各自讲讲，还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的！

另外，细心的人可能看出，我没有写到“李世英是个蛮子”，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问了不少人，都无法取得确切可靠的证据，说法也很不一致。

2013 年 6 月 7 日上午，我给胡炜通了电话，内容如下：

李：我还想问你一个事，我们搞了“八五”静坐以后，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我，原来说是“李世英是个蛮子”

胡：是“八五”静坐以前，不是“八五”静坐以后。

李：“八五”静坐以前？

胡：不是“八五”静坐以后。具体讲话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但是毛主席

的话，我记得有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我也说不清楚。上文、下文都不知道。

李：他那个原话你还能记清吧？

胡：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只记得“李世英是个蛮子”。

李：后边还有说是“不讲道理”，“不讲政策”？

胡：别的上文、下文都不知道。

李：传说有几个版本，我也弄不清。说是“不讲道理”，“不讲政策”。

胡：“不讲道理”“不讲政策”我都没有听见过，我就听见过“李世英是个蛮子”。

胡：老人家不在了，当事人也可能不在了，历史档案有没有也不知道，无从查起呀。

李：你原来也是他们口头传达的吧。

胡：这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搞清楚很好，搞不清楚关系也不太大，是吧。

李：不过对我很重要，因为是毛主席的指示呀。

关于“李世英是个蛮子”这个事情，这是目前最有权威的说法。借此机会，说明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李世英　2013.11.20

【编者注】：胡炜，文革时任21军军长，陕西省支左委员会负责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

我在 1966 年 8 月

1966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后补书记刘刚让工作团的人带着我到他在交大的办公室，我就跟着工作团的人到了刘刚的办公室，谈话时是我们两个人。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然后说：“我现在代表工作团正式通知你，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你不是反革命。听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眼泪控制不住，喷涌而出。为了不是反革命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字，我艰难地等待了近两个月，还几乎丢掉生命！我说：“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刘刚看我情绪激动，就说：“你现在先回去吧，先不要告诉别人。”我点点头，走出刘刚的办公室，还是由工作团的人带着我回到班上。走到大操场门口，就是在这里，我看到过王永婷被抬着跑向医务所的惨状。我不由地想对她说，王永婷，你太着急了，你怎么不再坚持一下呢？（王永婷受工作团迫害，于 7 月 9 日跳楼身亡－编者注。）

与其说我为自己被平反而高兴，到此时已经变成了对王永婷之死的遗憾和痛惜，心情非常沉重。

回到班里，我什么也没有说。可能工作团的人慢慢地给同学们作了工作，逐渐，同学们开始和我说话了。我当然很希望和大家说说话。很快，我们又像以前一样，关系融洽起来。

听他们说西工大、西军电（指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西北大学大字报很多，北京的消息比较多。他们说了一些消息，我却一点也不知道，真像天外来客一样。我现在刚被“解放”，什么都不知道，必须“恶补”一下，好好地充充电才行。于是，我每天吃完早饭，带上馒头咸菜，到西工大、西军电、西北大学去看大字报，的确收获很大。后来，也到冶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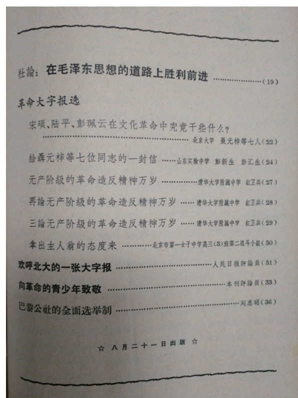
院、陕西师大去了几次。除了看消息，也看他们学校不同的意见，对他们几个学校的内部的派别和观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的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个是谭立夫的血统论。

（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二三论）和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刊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





社論：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19）
革命大字报选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北京大学 聂元梓等七人（22）
给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一封信 ……山东实验中学 彭新生 彭汇生（24）
无产阶級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27）
再論无产阶級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28）
三論无产阶級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29）
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3）班第二战斗小組（30）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評論員（31）
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本刊評論員（33）
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 ……刘恩明（36）

☆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封面与目录

当时还传达过毛主席 1966 年 8 月 1 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全文（来自网络——编者注）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篇文章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

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除了一些消息类的大字报以外，在理论性的大字报中，我特别喜欢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三篇文章，这里面不仅充满了革命精神和革命激情，而且充满了对于革命事业的正义性的自信。读了以后深受感染，甚至感到对我来说是振聋发聩。毛主席肯定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那是说她们的大字报的斗争方向是正确的；而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则深入浅出地说明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和这一场文化革命斗争的目的和意义。原来自己以为明白了这次文化革命，其实并没有弄清楚，思想还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还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现在觉得豁然开朗，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特别是毛主席给他们的回信中强调的“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也是自己以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清华附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毛主席给他们的回信，深

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自己在以后的文革活动中一直注意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另外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谭立夫的血统论

这个问题对于文化革命的影响极大，而且非常深远，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被批判，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一直作为特权阶级的潜意识顽强地对抗着革命力量，并且在特权阶级压倒了革命力量，重新取得整个社会的统治权以后，实际上把血统论作为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哲学基础。文化革命的失败和血统论的胜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后面我将专门记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三）8 月 3 日，晚 7：30–12：00，在西北体育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大、中、小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这个大会我参加了，是工作组的人通知我参加的。路上，有的同学看到我参加这个会，还感到惊讶，悄悄地议论“李世英怎么来了？”我确实是得到工作组的通知才去的。而这时，其他一些“六六”造反者还不能参加这次大会。

（四）8 月 8 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自从 8 月 5 日省委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在 7 月 8 日宣布成立的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也随之瘫痪。被打成反革命的交大数百名学生在《十六条》公布后，也被全部平反。

此时，交大校园内曾短暂的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各种思潮泛滥，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兵团组织和战斗队组织。随即出现了抓校党委成员游街，给他们戴高帽子。交大 15000 余名师生员工都期盼着能早日结束这混乱的局面。然而，交大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8 月 20 日，民主新选举产生的文革总会成立后，这些过激行动便被及时制止了。

（五）8 月 13 日晚上，交大在大操场上召开了“万人辩论会”，记不起来组织者是谁。大会先是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的发表，反复播放东方红，还组织人扭秧歌，放公告录音等，到 9 点才由严克伦检讨。师生们不满意他的检讨，把他轰了下去。后边是王林，肖纯的讲话。大约 12 点半才开始学生发言。我记不清楚当天的情况，但是，我们一个校友记述那天晚上我的发言。

“初识李世英是在 8 月 13 日交大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经历过生死劫的以及学生斗学生之痛的李世英，跳上主席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第一，他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第二，他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特别是出身好的学生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反对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谬论；第三，全校要一致对上，‘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提出要通过深挖工作团的问题，深挖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里的黑根黑线。

李世英的讲演受到了全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会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以上引自铸造 52 的校友的回忆）

会上肯定还有其他同学的发言，大家的基本观点大体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从“反对工作团入手，深挖陕西省委、西北局的黑根黑线”。

（六）8 月中旬，因学生宣传《十六条》的精神，以及张贴“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使得省委、西北局的老爷们非常不满，于是，组织和煽动一些干部和工人围攻革命师生。由于许多师生在省委门前被省委组织的干部、工人围攻、殴打的问题，交大、西工大师生及其他各校师生自发地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省委、西北局出面制止围攻殴打革命师生，承认错误并且向广大师生道歉。其他院校也闻风而动，前来支援。当时陕西省委的位置在建国路。参加静坐的人很多，队伍

一直排到和平门。那时出面组织队伍，代表交大与省委交涉的可能还是董树梧为首的校文革委员会，具体是谁来了静坐现场我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是跟我们班的同学一起静坐的，地点就在和平门里，没有进入核心地段建国路。在静坐期间，8 月 18 日那天，大街上的喇叭广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讲话，其中讲到“特别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本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的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组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种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时我们不清楚。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亲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个东西以后，就知道这里边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开始纠正这个错误及其他的错误。”

当时我以为是刘澜涛在广播站讲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他 8 月 18 日凌晨在省委门前讲的话。我和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在讲话现场，一是半夜，我们可能回学校了；二是我们静坐的地方距离省委门前比较远。第二天，反复播放了刘澜涛的讲话。总的来说，刘澜涛这次讲话调子比较高，给大家的印象觉得还可以。可能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也觉得满意，加上刘澜涛宣布当天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要广大革命师生顾全大局结束静坐。于是，这次静坐就结束了，我们班的同学也就跟着学校的大部队回到学校。

在这次静坐斗争中，我没有参与任何组织和领导工作，只是作为一个普

通的静坐者，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束。这次静坐示威从 8 月 16 日开始，到 8 月 18 日结束。

（七）8 月 20 日早晨，省委匆忙通知各校，要召开五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交大 7000–8000 师生参加游行时发生学生被围打事件。

这次大会我没有参加，应该是因为新当选的文革总会委员开会。

（八）交大文革总会（新）的成立

1. 交大文革总会（新）的成立

8 月 20 日上午，新当选的文革总会委员开会。

自从 1966 年 8 月 5 日省委驻交大工作团撤销以后，工作团一手组建成立的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也基本瘫痪，但部分委员仍然坚持工作，虽然被动，是被群众推着走的。

当时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是学校武装部的部长董树梧，此人是个老革命，人很正派，文化程度较低，能力差一些，对党中央文化革命的意图可能没有理解，工作团在时，他可以按照工作团的指示工作，而工作团撤出了，他就非常被动，只能在群众的推动下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他不搞阴谋诡计，没有私心权欲。

8 月 16 日到 8 月 18 日静坐以后，回到学校，师生们群情激奋，学校贴满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的软弱无能表示强烈不满，强烈要求改选校文革委员会（我并没有写这方面的大字报，因为去别的学校看大字报了）。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顺应民意，立即主持了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

这次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是很难得的真正的海选——从提名到投票都是如此。可能刚好处于各个方面的权利真空时段：彭康及其学校党委已经被打翻；严克伦的工作团已经撤出；这两个强力集团都没有办法插手和控制选

举。另一方面，我觉得原来校文革委员会的成员个人品质还是好的，特别是董树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交大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干净、透明、公正。包括我本人在内，没有发现任何竞选拉票的行为。

学校的各个系、部，大体按照人数，分配校文革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然后各系、部自己组织提名选举出各自的委员，集中到学校，成为学校文革委员会委员。

这次选举，在冲击校党委和反对工作团的“六六事件”中的活跃人物，多数被选为委员。也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的委员是原校文革委员会的成员，这次又被选为委员。

可能因为工作团时搞“查上当，放包袱”造成的影响，这次选举中，新入选的委员得票率不一定高，比如我，在系里被推选为文革总会委员，并不是压倒性多数，但是还是当选了。

新选出的委员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于 8 月 20 日上午在老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仍然是老文革委员会的人，记得是段会林、倪德辉召集和主持的，先是选举文革委员会常委，大家酝酿一会，就提名确定了常委人选，我被推选为常委之一。然后新选出的常委们一起开会，推选主任、副主任（当时称为“主席”“副主席”，后来才改为“主任”、“副主任”）。我又被推选为“副主任”之一，其他副主任还有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接着推选主任，大家都静下来考虑了少许时间，开始提名。记得是戴慕蓉和郑叔良提出让我当主任，我极力推辞，说我是低年级学生，没有经验，不能胜任。但是别的人都说，不要紧，又不是你一个人干，大家都帮助你。大家异口同声，全都同意我干，而且又没有提名别人，我推也没有地方推。后来我说，那好吧，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就接受吧，靠大家支持帮助，大家一起搞好交大的文化革命。

这时，段会林就说，好了，我的使命完成了，现在该李世英主持会议了。

我主持第一次会议也很简单，主要是副主任、常委、委员的分工。因为大家相互间基本上都不认识，各人适合什么工作也不了解，所以就是按人头点名分工，大家也没有不同意见。接着，我们就一起到行政楼，查看各个办公室，按照分工，各办公室主任召集自己部门的会议，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商讨部门的工作如何做好。等等。各个部门原有的工作人员基本不变，就是换了负责人。段会林是老文革委员会的这次又当选的，我们分配他与其他人一起主管办公室，搞得很不错。

我们还想再扩大一下代表面，虽然这次没有入选，我们可以讨论增补进入新的文革委员会。比如，老文革委员会主席董树梧，找他谈了以后，他不愿意再出来，说是年龄大，思想跟不上，也可能还有点不好意思。还有原来的学生会副主席，女同学唐素。她是前几天刚与一些人搞了一个文革筹委会，而且，与我们思想差距很大，也不愿意接受邀请。那就不能勉强了。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我们这个文革委员会成员的政治面貌完全不是社会上胡说的那种“痞子”班子，乌合之众，我，武登才，沈荣水，三个人都是中共预备党员，陈柏荣是中共党员。在常委中，党员和预备党员是绝对多数，在全体委员中，也能占半数。

我们新的领导班子进了行政楼，就是这座行政楼，我与我们班的同学和其他系的一些同学 6 月 6 日冲到学校广播台，要求广播我们的大字报，与广播台的人员激烈争辩，即所谓的“大闹广播台”；然后在广播台旁边的 402 大教室，质问工作团长严克伦，和严克伦辩论工作团的是与非，与严克伦“拼刺刀”，即所谓“围攻工作团长严克伦”；又是在这里，7 月 30 日，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仍然由工作团员押送），对我

说——经过审查，现在向你宣布，你不是反革命……而现在，我又走进这座行政楼，是要在这里领导全校师生员工，搞好全校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感慨，但是，没有时间去感慨，一大堆事情还都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事，如同陷在五里雾中。内政、外事必须有个基本的方针，学校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情况也要有一个对应处理的意见。

（1）学校文革委员会的称呼要不要改变？因为外地，像是北京，都不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回答是，不改称呼，因为这个称呼符合《十六条》的规定，我们这是老瓶装新酒，改变了性质，不影响我们干革命；

（2）立即组织各系部的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接着进行各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的改选，尽快把从学校到班级的组织体系健全起来；

（3）工作团撤走以后，学校里自发地成立的战斗队、兵团等等组织如何处理，要不要解散？与系、部、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应该由各战斗队、兵团等自己考虑决定，可以继续保留，单独活动，但是与系、部、专业、班级的文革组织说明情况，搞好关系。

（4）如何处理好严克伦工作团时期挨整的人群和受工作团的蒙蔽和指使参与了整群众的人群的关系，这是学校内部的大事，校内有的班级已经出现这两部分人的冲突和对立，若不尽快解决，必然造成校内的大分裂，进而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

（5）对于学校里面已经出现的批斗教师、右派等等行动，不能指责，但是要逐渐引导，纳入学校的通盘考虑之中；

（6）学校之间的革命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必要时集体行动，尽快在全市、全省形成统一的力量；

……

当然，这些问题在这次改选之前我都考虑过，自己也有一些初步的答

案。从我被“解放”以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到西工大、西大、西电等别的学校去看大字报，一边看，一边想，一些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交大的这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决定交大文化革命今后的方向和路线。

交大师生 6 月 2 日要求省委、西北局派工作组来交大主持交大的文化革命，这可能是全国第一家；工作团虽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但是它同时也摧毁了彭康的校党委的组织体系，使其完全瘫痪，失去了镇压革命派的能力。基本上与“六六事件”同时或者稍晚一些，彭康校党委体系便完全瘫痪，这可能也是全国第一家。

6 月 5 日晚间开始，于 6 月 6 日达到高潮的全校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多点群发、排山倒海式的反对和驱赶工作组，并且把烈火直接烧到省委、西北局，这从时间、规模、方法、气势和运动发展的速度及深度各方面都是全国第一家。

8 月 20 日，由工作团组建的校文革主持，通过全校师生公平的海选，新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诞生。整个过程出奇平静，没有争吵，没有打斗，像流水一样顺畅，像丝绸一样光滑。这样的案例可能在全国没有第二个。联想交大 6.2、6.6 时雄狮、猛虎一样的表现，此时又像一群绵羊一样静悄悄。原因是什么？作为事中人之一，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却找不出答案。也许这就是交大本源性的性格特征——轻个人，少私心，明是非，顾大局，识大体。

在出奇平静的气氛中，非常顺畅地产生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件事，却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学校的整体的政权交接，也就是整个学校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正是 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风暴所提出的夺权的任务。作为学校的领导权，我们在 1966 年 8 月 20 日就完成了。到一月风暴时，学校的大权，我们已经夺无可夺了。这样早

的夺取整个学校的领导权，尤其是这样静悄悄地夺取整个学校的领导权，这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

还有，我校新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低调、节约到了极点——没有开庆祝大会，没有锣鼓喧天，没有鞭炮齐鸣，我记得连大红纸的告示也没有，同样是静悄悄地就直接投入了工作。

事后回忆，我也感到有些迷惑，新入选的校文革委员会的委员们，我一个也不认识，而就是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委员们，一致选我做了文革总会主任。

交大师生对自己单位的评价，用的最多的词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说到自己班级，常常说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说到我们学校，大家更是异口同声说是“打不烂的一盘散沙”。的确，交大师生平时是比较独立，自由，讲求自己的个性，而在面临学校共同的问题上，又是那样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为什么？答案应该就在平时的“一盘散沙”上，“一盘散沙”的松散状态下，能够相互探讨、磨砺，各种意见、观点相互切磋、扬弃，便于形成统一认识。“一盘散沙”的气氛是难得的，是大家喜欢的，是值得大家共同珍惜和维护的，所以，为了保持“一盘散沙”，而成就了“打不烂的一盘散沙”。可以这样理解吧？

（九）陶铸两次接见外地包括交大学生的学生代表，他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一场及时雨，对西安革命群众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的作用。

例如：

问：“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对不对？

答：是错误的，只能提“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问：大字报贴到街上就算反革命吗？

答：不算，大字报可以贴在街上，也可以在街上辩论。你们可以上街游行、宣传、辩论，把大字报贴在街上是革命的，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可以的，也可以贴标语在街上。《十六条》已经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农民打学生不对，工人农民可以支援，不要打人。

西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陶铸：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这些问题正是当时西安斗争的焦点问题，陶铸鲜明的态度，直率的言辞，给于省委、西北局当头一棒，使受他们蒙蔽的、保卫省委、西北局的群众受到很大教育。

我那时没有去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接见。我们学校去北京参加接见的同学是有功劳的。这些同学是谁，没有找到记录。

（十）新的文革总会成立后做的一些工作

1. 在老图书馆筹备了一个展览会。将 8 月 14 至 8 月 20 日期间，省委、西北局组织干部、工人围攻、殴打革命学生的照片和被打坏的毛主席像、标语牌等证物搜集在一起，进行展览，还组织一个讲解员团队。有多同学上街

宣传交大的展览，让大家来参观。许许多多的人到交大来看展览，看了展览以后，很多人都变成了“交大派”，回到单位以后成为造反派。

2.8 月 23 日，我们通知了西工大、冶金学院、西军电、陕师大、西北大学等与我们观点一致的造反派的负责人到交大图书馆开会。会议由我主持，我说明了会议意图，希望我们各个学校能够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共同行动，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然后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机构。最后确定名称为“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并且推举交大作为主席单位，由交大的代表主持“统一行动指挥部”会议。

这个会是下午开的，时间不长。就这样，“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行动指挥部”成立了。很简单，没有一个字的章程、条例，从它的诞生到最后消失。可能连名称有的人也没有记准，有时在各个学校的标语、文件上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但是，它的简称——“统指”则是没有人弄错。

3. 处理李广仁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在省委门前，我们许多同学被围斗殴打，后来就把那些打人者扭送到派出所。这样，他们就诬蔑我们同学抓了人，打了人，企图把水搅浑。在静坐时，又让一些打人嫌疑者在静坐队伍中通过，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李广仁又态度顽劣，不知是谁，把他带回了交大。这下省委、西北局就有了借口，大肆宣传我们抓了人，打了人，扣了人。而且省委、西北局还给李广仁布置任务，让他赖在交大，住下不走了，以便给交大栽赃。这个李广仁真是个死皮赖脸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有限制他的活动，他说是我们把他扣留在交大；他吃饭喝水我们有同学照顾他，还给他拿来西瓜，但是他说我们不给他吃饭喝水……反正要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交大。8 月 17 日，晚 7 点半左右，我们还在省委门前静坐，在建国路北口，和平门及和平路副食商店处突然冒出了几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发表了广播讲话，说是：1．两个口号是错误的。2．打人不对，抓人更不对。交大抓了人，特别是抓了李广仁同志……

8月21日晚上，省委在人民大厦召开了各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红卫兵和居民代表会议。霍士廉、肖纯在会上讲了话，说会议的中心目的是要制止打人，为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恢复名誉，以便加强团结。实际上恰恰相反，霍士廉当众造谣，并挑动保皇红卫兵与交大、西工大、冶院等校代表激烈争执，说什么："反革命打人不过瘾，要杀人。抓了李广仁（指交大）还不行，抓几个省委书记、西北局书记，他们会更高兴。我们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敌人千方百计在搞破坏，他会以很革命、很左的面貌出现。革命的工农兵、干部、学生起来斗争他。"

所以，小小的李广仁，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陕西省委、西北局反复利用，企图破坏西安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事件发生在我当文革总会主任之前，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我们必须处理这个事。我们文革总会讨论这个事情，肯定了几点，（1）. 李广仁是个马前卒，不是我们斗争的重点，我们不能让他引导偏离大方向；（2）. 李广仁很赖皮，很会撒谎造谣，我们要同学们不要失去耐性，不要有过激行为，如果那样，就上了他们的当；（3）. 我们要揭露陕西省委、西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的阴谋诡计，另外揭露李广仁的无赖行为；（4）. 外面来交大参观的人，如果对李广仁感兴趣，可以请他们看看李广仁的真实情况。

学校里很快出现许多大字报，揭露李广仁的无耻谎言和无赖行为，我记得有一副漫画——李广仁在控诉交大不给他吃饭喝水，但是，他的背后却是许多饭菜，西瓜，还有大量的西瓜皮。对他不批不斗，但讽刺挖苦，这样，李广仁脸皮再厚也呆不下去了，最后悄悄地溜走了。陕西省委、西北局这门重炮，终于成了哑炮。

4. 皮椅子事件。大约 8 月 24、25 日吧，一些同学来到行政楼，检查文革总会的办公情况，有的人提出，你们这样不行，屁股底下坐的还是皮椅子，这样能不变修吗？所以，要求把皮椅子全部收起来，换成普通的凳子。这些同学也动手把一些皮椅子搜集到一起，但是，放到哪里，他们也没有找到地方，于是就摆在那里了。后来办公室的同志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在学生宿舍，坐的就是木凳子，也没有影响我们思考问题。最后还是封存了许多皮椅子，只是在椅子不够的办公室保留了部分皮椅子。

5. 保护图书馆前面的学生塑像。大家都知道，老图书馆前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的塑像，而这两个塑像当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搞得我们不得不在文革总会专题讨论。

起因是我们学校一些同学，尤其后来又来了一批北京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两个学生塑像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样板，是白专道路的苗子，要坚决砸掉，有人向上面泼了墨水，有人拿着榔头、砖头砸塑像，但是因为塑像比较结实，没有砸动。北京的学生还扬言，明天拿工具来再砸。马上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文革总会，又告诉了我。

如何处理，我觉得需要大家商议，所以，通知文革总会委员开会，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塑像问题。

首先，塑像有没有问题？我和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塑像塑得很好，充满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对同学们有激励鼓舞作用，应该保留。可是，怎么保留？北京的学生往往是钦差大臣的做派，明天北京学生来砸，我们去制止，很容易发生冲突，影响不好。为这个事情发起辩论，又是小题大做，转移大方向。正在苦于无计可施时，后勤的工人委员，是朱奎林还是徐文明，提出一个办法，用三合板把塑像包起来，刷上油漆，外面写上文革标语、毛主席语录。他们来了，看不到塑像，也就熄火了。就是他们知道塑像包在立

柱里面，外面是文革标语、毛主席语录，他们也不敢砸。听到这个建议，大家都鼓掌叫好。马上落实，让五七工厂的工人来做，连夜搞好。

第二天早上，那两个“惹事”的塑像不见了，两个崭新的宣传立柱树立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立柱里面的两个塑像文革结束时才被“解放”出来。

6.1966 年 8 月 24 日当天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8 月 25 日）凌晨一点，与西安各大、中学和外地来西安革命串连的共 7 万多名革命师生员工，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

7.1966 年 8 月 26 日，组织部分师生与兄弟院校一起声讨《陕西日报》侮辱伟大革命领袖毛主席的斗争。

8. 冷静对待彭会谋《我的检讨》事件。8 月下旬，省委，西北局为了挽救越来越不利的形势，命令《陕西日报》开足马力，大量印发“揭露”交大、西工大、冶院等院校“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滔天罪行之类的传单。

8 月 30 日，省女中转抄交大机制 22 班《为贫农》战斗队“牛鬼蛇神”彭会谋写的《我的检讨》，特别引人关注。这份传单散发到大街小巷，影响很大。虽然事情不大，但是严重地影响了交大的声誉。交大的师生看了，都觉得像吃了一个苍蝇一样恶心。所以，一些人就想要把这个彭会谋揪出来，好好批斗一番，解解气。我们做了一些说服工作，让同学们不要去追查，不要去揪斗，淡化处理。交大一万多师生，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才是万分之一，他又不能代表交大全体，也不能代表交大文革总会，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把彭会谋当作批斗对象，那么省委、西北局刚好可以看热闹，他们巴不得我们搞群众斗群众。

省委、西北局满心希望我们把矛头指向彭会谋——一个学生，我们没有上当，没有理会他们那一套。以致于我直到毕业，也没有见到过，或者见了也不认识这个彭会谋。

二

声援战友同仇敌忾　万人绝食震惊古城
西北局省委软磨硬抗　周总理亲自解决温暖人心

1966 年 9 月 6 日大清早，我刚刚起床，正准备去吃早饭，西安工业学院（以下简称西工院）的几个造反派战友找到我，说他们学校党委书记郭蕴一直顽固地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现在造反队被保守派包围起来，学校食堂也宣布不给他们吃饭。他们万分气愤，宣布绝食抗争。希望我们支援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问：你们已经宣布绝食了吗？他们说，已经宣布了。我说，好吧，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我们马上召开文革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支持你们的行动。

事情已经火烧眉毛，我立即让办公室发出通知，让全体文革委员会委员到行政楼开会。

我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吃饭了，一面就在会议室里等着开会，一面也思考着自己的意见。

会议开始后，我向大家介绍了西安工学院战友们的危机状况，让大家研究一下我们如何支援他们。

刚开头还有各种意见，例如，我们马上送一车馒头稀饭去，但是立即被否定——人家已经宣布绝食了，你给人家送馒头稀饭，不是破坏人家的斗争吗。我们分析，现象在西工院，根子还是在省委，只有给省委施加压力，才能解决好基层问题。

最后，经过讨论，做出决定，我们全校出动，到省委门前静坐绝食，要求解决西工院的问题。具体的要求是，一，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

革命行动；二，要求省委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同时通知西安各个院校——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告知我们学校的行动，提供他们参考——因为来不及开会研究，只能这样处理。

这一天，距离我们学校新的文革委员会建立刚刚半个月，而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成立才十三天。

学校广播台很快就广播通知，宣布从现在开始进行绝食斗争，坚决支援西工院的革命战友。学校各系组织队伍，到学校北门口集合。

全校立即行动起来，队伍很快就集合好了。然后我们就带队向省委门前进发。全校九千多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国际歌，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省委门前大街——建国路，先是高呼口号，喊累了，就席地而坐，唱革命歌曲，唱累了，打扑克的打扑克，聊天的聊天，等着陕西省委和西北局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

当时省委门口的马路并不宽，我们学校师生一到，马路也就被占满了，大家陆续就位。

我们的人一来，省委里面的人很快就跑光了。其他各个院校的队伍，如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电信工程学院（他们原来属于军事院校，后来军委决定他们不再属于部队编制，但是他们仍然自称“西军电”，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等院校也陆陆续续来参加这次绝食斗争。参加绝食的师生占满了建国路、和平路，各个学校的师生整齐列坐，红旗飘展，歌声起伏。据统计，参加绝食的师生有五万之众，真可谓气势恢弘。

我们各院校的负责人也陆续聚到一起。省委的人跑光了，我们“办公”的地方大大的有，于是，把大楼靠近大门的一间办公室作为我们的办公室。

别的院校的负责人向我询问详情，我刚好也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介绍了西工院的斗争情况，因为事发突然，来不及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计划。大家

都表示坚决支持西工院的斗争，同意这次行动。随后我们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推举我作为总指挥，我当然无法推辞。再下来就是安排一些具体问题，如，各院校队伍的位置；如果有老弱病的师生，动员他们不要参加绝食；调整身强力壮的同学到队伍的外圈——防止保守派的冲击和捣乱；各单位组织好后勤工作，如给师生们送开水，准备好救护车、医护人员等等。大家分头安排布置检查，一会再来集合。

很快，我们学校食堂送来了几大桶盐开水，交大医院的救护车也开来了。为了搞好战地宣传，我们装备了高音喇叭——“九头鸟”宣传车，随着大队一起到达现场，校广播台的女播音员王国瑞不停地广播，给大家鼓舞士气。

一会，我们各单位的头又回到办公室，就是临时指挥部。这时候，指挥部里热闹起来，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北京串连的大学生，有北师大的，北京钢铁学院的，还有别的院校的。我原来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那么灵通。他们一副北京学生的气派——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而且信心百倍，胸有成竹的样子。

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当时就想，搞大型的斗争，我是第一次，就像《刘三姐》里唱的“我是嫩鸟才学唱，绒毛鸭子初下河”，北京学生毕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由北京学生来指挥这次行动，我们各个院校按照他们的策划具体配合。西安各院校的头头都同意我的建议，而那几个北京学生稍微推辞了一下，也就答应下来。我和西安院校的几个负责人都觉得轻松不少。于是我们和北京学生就“合署办公”了。

省委领导一个都不出来，我们也不能坐等，从中午以后，我们各院校都派人出去找省委领导，特别是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因为他说话“管用”。但是省委领导却集体消失，好像都钻进地缝似的，一个都找不到。

随着时间的消失，我们心里越来越着急。

天气好像也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和我们作对，天上几乎没有云彩，骄阳似火，对在马路上露天静坐绝食的师生们是极大的威胁。

第一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度过，虽然饥饿难耐，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太难受。

第二天中午，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省委领导，而我们的战地广播站开始陆续广播一些同学因为饥饿，加上太阳的烘烤，昏过去的消息。这种消息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如果能够传到省委领导耳朵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逼迫他们早一点出来接见我们，解决问题；同时这也是给我们自己施加压力，这里是几万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不断有一些送饭车出现在绝食现场，估计是省委指示一些饭馆、食堂给绝食师生送来吃的、喝的，其中还有一车一车的大肉包子，满大街弥漫着的肉包子的诱人香味，引诱着饥肠辘辘的师生们。而交大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着：“革命的同学们，大肉包子是省委黑帮送来的糖衣炮弹，他们是要破坏我们的绝食斗争，我们决不能上当！谁也不能吃，谁吃谁就是叛徒！”其实，即使没有广播员的提醒，广大的师生们也绝不会去吃他们的包子。大家来到现场，本来就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吃与不吃，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分界线；忍受饥饿，成为对一个人革命意志的考验。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现场绝大多数的师生们的共同信念。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是：那些北京学生在第二天中午以后，逐步减少，最终彻底“消失”。当我确信他们不会再出现时，我就与西安各院校的头头一起开会，我说，我们本来希望北京学生来领导这次行动，但是现在看来靠不住，他们都躲开了。我们的革命还是要我们自己干，靠别人不行，大家挑起担子来，大家意见怎样？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而且依然让我担任总指挥。

这时候是危难时机，我只有领命，顾不得是“欣然”还是不“欣然”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一个是组织管理好各自的队伍，不要出问题；再一方面大家都派出人员，到一切可能找到省委领导的地方去，同时给在那里遇到的人都强调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饿昏许多师生，省委再不出面会出人命的。

下午，我们学校来人给我报告说，后勤的炊事员、医护人员都提出他们也要参加绝食，说是学校的师生不吃饭，他们要与绝食人员同甘苦，共患难。我一听马上就急了，我说，不行，不允许他们参加绝食，他们的任务很重，要保证淡盐水的供应，要保证身体不好的同学的救护，而且，等到绝食结束时，他们还要保证大家吃饭、喝水等等。不准他们绝食。来人告诉我，已经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但是他们态度也很坚决。我说，还是不行。再做工作。他就回学校做工作去了。

这个事情非常让我感动，后勤部门的人员，除了医护人员外，一般文化程度低，在大学里算是“洼地”，但是，他们富于同情心，讲义气，重情义，很多事情非常感人。他们这次支持师生绝食的行动使很多师生重新认识了原先不太关注的后勤人员，也使得我们学校内部更加团结。

大差市的民情是西安人心向背的晴雨表，这里的群众虽然文化不一定高，但正如古话所说“礼失觅诸野”，他们常常无所畏惧地表达他们的直感。我们绝食现场就在建国路、和平路一带，离大差市很近，西安人民听说学生绝食，奔走相告，纷纷上街观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带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许多市民非常同情学生，带着食品和水来到这里劝说学生用餐，当然，他们都是一片好心。同学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解释和宣传。

另一方面，那些保守势力也没有袖手旁观，一些人跑到现场叫骂，有的喊口号“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有的散发反对造反派的传单，有的四处散布“绝食是假的，很多人偷偷吃东西”……还有的说：“向省委绝食是反动的，饿

死活该。”但是他们也是胆小鬼，不敢靠近绝食队伍，只敢在较远处捣鬼。

最重要的是，这天下午“找到”了省委书记章泽，不知道是不是省委研究决定让他出面“探探路”，摸摸我们的“底”，因而故意被我们“找到”的。反正他与我们同学一起到了绝食现场，和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们见面座谈。我们向他介绍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声明我们完全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好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也强调了我们的两点要求：一，承认西工院和我们的绝食行动是革命行动；二，要求省委罢掉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章泽是一个比较沉稳的老干部，说话不紧不慢，也很少提高声调，所以不容易产生争吵的僵局。这也许是省委派他出面的原因。

章泽听取了我们的说明后，极力劝说我们先吃饭，不要把身体搞坏了；至于我们所提到要求，他说，这个问题他个人不能答复，要省委决定，但是省委会非常重视大家都意见，我们会很快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满意他的说法，我们的要求是刀下见菜——必须在绝食现场答复我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既然他说他不能答复问题，我们就要求他转告省委一把手霍士廉，要求他立即出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强烈谴责省委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和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革命师生的生命麻木不仁，不管群众的死活，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学昏倒了，以后出现任何问题，都只能由省委负全部责任。

章泽满口答应，然后就走了。我们并没有扣留他，对他还是非常客气的。

其实，后来我常想，我们的要求的第一条，让省委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好像是个悖论——你既然造省委的反，说明省委是不革命的，让不革命的省委承认我们的革命性，不是有点古怪、说不通吗？不过，那时候这是传统的做法，一方面喊“打倒 XXX”，一方面还要让 XXX 承认他们是革命的。

章泽走了。我们又是多路人马寻找省委领导，尤其是第一书记霍士廉，必须找到他。

绝食进入第三天，绝食现场上，同学们都是一副疲惫的样子，聊天和打扑克的人基本没有了，大部分师生相互依靠着闭目养神，其实是饿得没有气力了。只有学校的各级领导坚持巡视检查自己的部属的情况，还有那“九头鸟”依然慷慨激昂威风不减，不断地向省委领导喊话，不断地“强烈要求……”。我知道，他们是轮换着拼着最后的气力。

指挥部里也开始焦躁不安，饥饿和各种情绪混和在一起。

大约每个人至少会有一次或者多次在心里默诵着中国传统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我比别人更“吃亏”——先一天晚上有事，我去食堂晚了，没有吃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就宣布绝食，也就吃不成了。主要因为心里压着千斤重担，没有时间去想肚子。

“九头鸟”更加频繁地宣布“我们又一个革命同志昏倒了，这一切都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造成的！陕西省委要负全部责任！”各个学校的救护车来回奔跑。可能省委也怕饿死了学生下不了台，急调西安市几家医院的救护车来帮助救治饿晕的学生。虽然省委的头们不出来，但他们还是在暗处观察着绝食的情况。

广播中更加频繁地播放《长征组歌》中的“红军想念毛泽东”——这是我们播放很多遍也经常唱响的歌曲——只要是我们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感到孤立无助的时候，我们都会呼唤党中央、毛主席，都会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倒是像基督徒祈祷上帝。党中央、毛主席也就是我们的上帝。

参加静坐绝食的有几万人，每个人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

必须思考“万一……”，我必须保全全体师生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又必须取得斗争的胜利，这个交汇点、结合点在哪里？如果今天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明天是第四天，会不会有个别身体羸弱的同学坚持不下来了呢？

在四处寻找省委领导的同时，我们也派人给党中央拍电报、打电话，希望中央了解我们的情况，敦促陕西省委火速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回应。

9月8日下午，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并说他要来绝食现场，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心情也平静一些。

傍晚时候，霍士廉才来到现场。我心里想，这个人要来还不早一点来，还要让几万人多饿一些时间，太差劲。我们把他让进指挥部的办公室（实际上这本来就是省委的办公室，我们是“借花献佛”了），先是向他说明了这三天的情况，我们的要求；他则说西工院的情况不知道，不了解，表示一定尽快调查清楚，认真处理。这与我们的要求当然有很大差距，我们表示不满意。他还是反复说服我们结束绝食，不要再拖下去，不要出了问题。

我知道，我们所担心的，其实他更担心，真的死了学生、出了人命，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虽然担心同一件事情，但是解决的方法完全相反——他希望我们立即结束绝食，此后再解决问题；我们的想法是，省委必须先答应我们的条件，然后才能结束绝食。这是一场拉锯战、心理战。我们坚持，不解决问题，不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决不撤退，而且，无论出了什么问题，都是省委的错误造成的，都要省委负全部责任。他也不反驳，可以看出他心里也很紧张，害怕激怒我们，僵持起来，问题更难解决。

后来我们建议他到外边见见群众，亲自给大家做工作。他显得很勉强，有些犹豫。我们说，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群众，相信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他这才勉强走向省委门口。我们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一个简易的主

席台，就是两边贴了几条标语，中间放了一张桌子，还有麦克风，喇叭，而且与外边的广播连接好了，使绝食现场的大部分师生都可以听到。

几个学校的头头让我主持会议，我稍微推辞一下就答应了——都是饿了几天的人了——现在主持会议是一件重体力活。

我先让大家安静，随后向大家宣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到绝食现场，请他给大家讲话。

霍士廉又把他的那些话说了一遍。很显然，他的讲话得不到大家的响应，人群中响起一片不满的声音。

接着，我就讲了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静坐绝食，就是因为省委西北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攻、打击、迫害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扶植和鼓励受蒙蔽的保守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西工院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向霍士廉书记提出两点要求，省委必须给我们完满的答复，否则，我们就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一，省委必须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第二，省委必须宣布罢西工院党委书记郭蕴的官！

饿了三天，肚子里空空如也，感觉呼吸都费力，但在这个场合，我还必须表现出造反派的昂扬斗志，在声音的力度要压过他，在气势要压过他。所以，在上台之前，我把腰带束得紧紧的，可以说是拿出吃奶的力气，每一句话都是喊出来的。

我与霍士廉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拼刺刀”，上一次是在交大的 402 大教室，与另外一个省委书记、省委派到交大的工作团长严克伦“拼刺刀”。霍士廉不是伶牙俐齿的辩手，也不善于变通。但是，就是他的那几句车轱辘话，对于希望速战速决的我们来说，反倒非常难以对付。

我追问，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正确的、革命的？

他说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一定会进行调查，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他就是回避正面回答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正确的、革命的？但是我也不依不饶，抓住不放，说，你必须肯定答复，我们的行动的是革命的，否则，我们决不结束战斗。

反复若干次的追问以后，也许他也害怕绝食继续拖下去无法控制，所以勉强地含糊地同意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我马上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宣布：霍士廉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霍士廉就在当面，他不反驳也就是认可我的宣布。

接着，我提出，我们要求省委立即罢掉郭蕴的官，霍书记必须给我们明确答复。但是霍士廉说，他不了解情况，答应马上去调查。

我说，郭蕴为了保自己，组织保守群众围攻革命派，并且不给他们吃饭，要饿死他们。这样的官不应该罢掉吗？省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支持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省委必须表态！

霍士廉还是说他们回去调查清楚，严肃处理。

……车轱辘就这样转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也在想，按照组织原则，他是不能没有经过省委研究，自己当场宣布罢掉郭蕴的官。而且霍士廉又不会说圆滑的话。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说你们现在回去研究，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的答复。但是，这是不行的，这里是饿了三天的几万人！任何拖延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站在主席台上，又不能暂时休会与其他几个学校的头商议，我只好独自决定，在“立即罢官”的要求上做一点变通。

我说，调查，是可以的，什么时候调查？必须立即调查。

霍士廉同意立即调查。

我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情况属实，郭蕴应该不应该罢官？

霍士廉最后终于牙膏挤出来了：应该罢官。

我重新追问霍士廉：省委立即组织调查，情况属实立即罢掉郭蕴的官。对不对？明确答复。

霍士廉终于承认是的。

我这时大声宣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答复了我们的两个条件，第一，承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第二，省委马上派人调查西工院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罪行，情况属实，立即罢掉郭蕴的官。我们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代表指挥部宣布，我们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现在，各单位整理好队伍，安全撤离现场。

这时，大约是夜里 11，还是 12 点了。据说，这么晚了，还有一些保皇派的在马路两边，在那里叫骂、吐口水，扔东西，进行捣乱。不过，各单位都排好队伍，没有理会那些家伙，安全回到了学校。

我们指挥部的工作结束了，各单位的头也分头走了，有的跟着队伍回去了，也有在指挥部又留了一会儿的。

我还在指挥部等着各单位的队伍完全撤离，看看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学校距离绝食现场最近，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师生们全部平安回校，后勤的工人们准备好了馒头、稀饭、菜。我说，让大家先喝稀饭，不要吃多，明天还可以吃嘛，免得吃的太猛，把人吃坏了。因为我听我妈说过，在解放前河南遭灾的时候，饿死了很多人，后来麦子快熟时候，割下麦子吃，吃多撑死了一些人。

同学们吃饭了，我也要开吃了。这时一个同学给我说，还有一些同学不吃饭，要继续绝食，因为他们认为斗争没有完全胜利。

我问有多少人，哪些学校的？他说有二三十个同学，交大的、冶金学院的、西工大的，还有什么学校的。怎么办？

这个情况我没有想到，怎么办呢？按我的性格，我如果不在指挥部，有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继续绝食。去劝他们进食，绝对没有效果。我亲自宣布了绝食胜利结束，同学们都撤了，我不能自己又在这里继续绝食，否则，就是欺骗了大家。我想了一下，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吃饭吧。

省委大约也时刻准备着食物，我们一宣布绝食结束，他们马上就送东西来了，有小米稀饭，馒头，烧饼，大西瓜，还有几样菜。我这时感到全身散了架一样，再走回交大吃饭，实在太痛苦了，就在这里吃吧。我吃了一些西瓜，吃了几个烧饼，还有别的什么，反正塞满了一肚子。然后，我和最后留在现场的两个同学一起走回学校，其实，这两个同学是害怕我一个人不安全，留下陪我回学校的。那二、三十位还在绝食的同学仍然留在那里。

回到学校，脸不洗，牙不刷，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别的没有什么，但是胸部很疼，我想可能是因为与霍士廉“拼刺刀”累坏了，明天就会好的。谁知道一直痛了一个星期，我真的以为肺部是不是挣得裂开了，又懒得去看医生，后来自己好了。

那些同学在省委绝食，继续抗争，有交大的、冶金学院的、西工大的，后来说是 36 个人。

第二天事情出现了转机，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事件终于惊动了北京，惊动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亲自派来了飞机，接交大绝食代表团一行 30 多人到北京。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仔细地询问了静坐绝食的原因，然后作出了几点指示，大致内容是：“第一，你们的革命热情值得肯定，出发点是好的；第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新中国，搞这种大规模的静坐绝食，这种方式不好，你们对省委有意见，有要求，可以到北京找我反映嘛！第三，我一会儿给西北局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他出来见你们绝食的同学。以前战争年代敌人都不怕，现在革命学生又不是敌人，有什么可怕的；第

四，你们要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饱了饭才能搞文化大革命嘛！”

然后，周总理请代表团的同学吃饭，吃的菜是白菜炒豆腐，主食是一般的米饭。周总理吃完以后，用开水把菜碗涮了涮，然后把开水当作汤喝下，感动得同学们热泪盈眶。不久，在北京的同学打电话回交大，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交大等各个院校宣传车就上街广播周总理的指示，又印发了许多传单，四处散发。

因为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参加北京周总理的接见，上边的情况是后来我听说的。

所以，省委门前的静坐绝食，大家通常说是“969”绝食斗争，从 9 月 6 日到 9 月 9 日，共四天，这是就整个绝食斗争而言。其中分了两个阶段，第一段，几万人的大部队是 9 月 8 日夜里结束的；还有 30 来个学生继续绝食到 9 月 9 日周总理接见。

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参加北京周总理的接见，也没有机会和周总理一起合影留念。我的看法是，我和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背负着几万人的生命安全，可能出现的问题太多了，不得不见好就收；后面留下来继续绝食的同学也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和西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意志。

这次静坐绝食的意义是：

一、首先是展示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因为这次斗争的目的，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是为着声援西工院的造反派的斗争。

二、展示了西安造反派不可征服的斗争意志和雄壮的力量，使得省委、西北局产生了真正的恐惧，也使得它们组织保皇派的企图难以为继。过去它们组织保守派的行动，都是靠的“物质奖励”——比如保守派行动以后，常常有吃喝款待，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为“刘澜涛的麻花兵”。用这种“兵”

来对付敢于饿着肚子闹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像是以卵击石，保皇派一看就怯场。

三、不久前才成立的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第一次展开统一行动，各个学校不再是分割的、孤立的，而是成了一个整体，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力量。

四、周总理接见绝食代表的消息，传遍西安、陕西，鼓舞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意志，使造反的烈火越烧越旺，而很多人清楚地看到党中央的意图和方向，使西安人民、陕西人民进一步看清党中央支持什么、支持谁，使得许多原来受蒙蔽的群众进一步清醒和觉悟，促进了保守派队伍的分化和瓦解，群众潮水般的投向革命派的阵营。

五、我们也从北京学生的中途退出中吸取了教训——自己的革命一定要自己来干，不能指望别人；陕西、西安的事情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做好。所以对于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说法和做法，都通过自己的头脑进行分析，减少因盲信、盲从给革命运动带来的损失。

六、这次斗争，促使西工院的问题很快解决，保守派迅速瓦解，革命派很快控制了大局。

七、这次静坐绝食斗争，迫使霍士廉在 9 天后（1966 年 9 月 17 日）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中说：“许多问题常常是群众逼上门来，才被迫解决。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三

冒险赴兴平执行总理指令　调研证实原是谎报军情
原以为此事早已清楚清白　又岂知至此时仍需辩诬

1967 年 9 月 4 日凌晨，我在西安人民大厦，还没有睡觉，正在听取西郊回来的人员的报告情况，了解市内的动态，有人通知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来电话，让我接电话。我吃了一惊，有什么大事吗？我满脑子都是武斗的后事处理和万一对方大举进攻时，应当如何应对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是总理联络员吴斌，我们之前见过面，相互认识的。他很严肃地在电话中讲，据报告，陕西兴平发生“农造司”抢夺“302”国防库中的武器，驻陕部队已经得到通知。总理委托你协助解决问题。吴斌最后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转告李世英：“党信任你，委托你去！你一定要坚持党性的原则。”

接完电话，我们当时在人民大厦的交大同学议论一下，当即猜想：总理可能认为兴平“农造司”与西安“农总司”一样是交大派，因此要李世英去做工作。现在仍然处于浓烈的武斗的氛围之中，现在立即去兴平，西安这一摊子怎么办？不过，面对周总理的委托，我们没有迟疑，无论以后会有什么事，一切放下，立即赴兴平执行总理命令，不能辜负总理的希望。

此前，交大同学付登华刚给我传达了周总理秘书郄贤荣打来的电话，内容一样。可能是周总理不放心，再次让吴斌直接给我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由此可见周总理的严重关切和此事的紧迫性。

我马上给在学校值班的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总理指示，并通知一早召开革委会紧急会议。天刚明我们即赶回学校，在广播台召开了校革委会紧急会议。当传达周总理嘱托后，委员们深感事情重大，一致表示要坚决执行周总理指示，决定让我放下一切工作，立即带革委会委员李印生以及付登华等十人到

兴平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我走后，由校革委会二把手武登才负责全盘工作。会上，一些同志也特别强调注意安全，因为去兴平必须通过对立派的控制区，而且对立派还有一个重要负责人李洪明正在交大被看管。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我的身上做些文章，必须认真细致对待考虑。

我说具体的安全问题由去兴平的同志详尽考虑，会上就不具体讨论了，我把我走后的革委会的工作交待给武登才总负责。然后，我们去兴平的一行人马上开会讨论具体问题。首先强调我们必须按照总理的指示，坚持党性原则，如果确实是我们一派观点的组织要抢 302 库，我们坚决制止，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必须落实总理的嘱托。

接着研究讨论如何安全地到达兴平的问题，去兴平要经过西郊，西郊是对立派的控制区、大本营，这是首要困难。另外，对方的消息也很灵通，他们肯定知道了总理的指示，也知道我一定会去兴平，必然会针对我采取一些手段，无法估计他们会怎么做。

我提出的想法是：

（1）先与几家部队联系，如果能跟他们一起去，那么安全就得到保证；

（2）硬闯，有总理指示在，他们难道会一点不顾大局？

（3）仔细筹划，出其不意，让对方的埋伏计划落空。

我首先打电话给几家部队，21 军，兰空，总后，他们都回答部队已经出发了——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没有办法和部队一起去兴平了。想想也对，部队肯定行动迅速，已经出发应该是事实；再一方面，我本身是受怀疑的一方，他们和我一起去，从工作角度说也不合适。

一条路被堵死了。如果采用硬闯的办法呢？经过一番分析，大家一致否定了这个方案，觉得，我们自己安危事小，影响总理指示的执行事大，我们没有权利去冒险。

然后着重讨论第三个方案，特别注重细节，不能出差错，否则前功尽弃。最后决定，因为我的知名度高，认识我的人多，所以要简单地化妆一下——不穿平常经常穿的衣服；借了一顶鸭舌帽戴上；眼镜路上不带。另外，估计对方认为我坐汽车去兴平的可能性大，那么，我们坐火车去，铁路系统是我们一派占压倒优势，万一有事，不至于“虎落平阳”；再有，不从西安站上车，从西安东站上车。

一切细节商定以后，马上出发。一路顺风，没有出现一点问题，当天上午平安赶到兴平。

到了兴平，我们立即开展工作，着手调查。我们先到驻守302库的部队，我向指战员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指战员们先是吃惊，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302库根本没有发生过“农造司”抢劫问题！随后，指战员们纷纷气愤地说：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得到不实的报告呢？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欺骗总理，企图赶走多年来和他们并肩联防的武装基干民兵，然后趁机抢302武器库里的武器！

我们听到他们的话，感到肩上的压力轻松了很多，但是同时又感到问题比原先想的更加复杂，工作显得更加棘手。

我们提出希望见一见这次事件的“主角”——“农造司”的负责人，通过302部队首长请来“农造司”和武装基干民兵负责人，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与西安“农总司”没有组织联系，不过知道交大观点，支持和拥护交大，对我们很客气，但是他们与交大也没有组织联系。这些人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朴实诚恳，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深情溢于言表。从直感上来说，要说他们策划抢夺302库，让人难以相信。

我们讲明了这次来兴平的原因和目的。他们听传达总理指示以后，首先表示完全理解总理的指示精神，一定尽一切努力协助解放军保卫302库，让

总理和中央放心。同时他们也对有人给他们栽赃陷害非常气愤，他们说，最近西安不少人来兴平活动，频频进入21军驻秦岭公司支左部队，宣传“农造司”等组织是“保皇派”，鼓吹“军民联防，文攻武卫”，搅得兴平“打、砸、抢”越来越凶，城乡人心惶惶。他们说，如今诬蔑我们抢302库，欺骗党中央，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农村武装基干民兵与302部队“军民联防”已经多年。但是，我们从没有越过职责进入过库房，谎报情况的人是想以他们的“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取代我们，从而抢夺302库里的援越武器。

他们请我们转告周总理：“我们兴平‘农造司’过去没有抢302库，保证今后也不会抢302库，请总理放心。我们的武装基干民兵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与302部队指战员加强联防，誓死保证302库的安全！”

我们肯定了他们的正确态度，希望他们言行一致，一定要保证302库的安全。郑重承诺：我一定如实把他们的态度向周总理汇报。

为了说明302库目前的安全状态，302部队首长带领我们进地库看了存放的大量的各式武器，这使我们深感震惊：这些武器如果流入社会，那将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使多少无辜的人死于武斗啊！我们更加理解总理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那么重视，态度那么严厉。

在我们来兴平前不久，兴平两派发生了一次武斗，“农造司”的人说是对方主动进攻，而且还打伤了“农造司”的人，现在还有一些伤员在302部队医院治疗。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提出去医院看看伤员，他们就带我们到医院，我们看到有六七个伤员，有的是腹部受伤，有的是胳膊，腿部受伤，基本都是枪伤。我们没作评论不能说什么别的，只请能说让他们好好养伤。

我们到达兴平的当天下午，兴平街上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302部队为防止仓库被骚扰，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我当即提出要一起到现场去。302部

队首长认为危险大，为了我的安全，不同意我去。

我坚持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委托我们来这里，我们应该向他反映第一手情况。如果被打死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牺牲，死得其所。"

看到我态度坚决，而且理由充分，首长最后同意我去。但是，他们是开一辆军用吉普，只能坐四个人，他们去两个人，一方面搞调查，一方面也是保护我们，这样，我们只能去两个人，除了我，再加一个人陪我去。付登华报名，要求一起去，别的人也不好争，就定了付登华同去。

302 部队一名参谋和一名战士，带我俩坐吉普车到了武斗现场，时间已经接近傍晚，大街上没有什么人。武斗已经停了，没有见到死人。正走着，忽然一声巨响，是什么东西打到我们汽车上。大家都大吃一惊。参谋对司机说，别停，往前开。拐到街边，停下车，看看车上也没有窟窿，参谋说，不是枪，是弹弓打的。参谋说，这种弹弓很厉害，打着人非死即伤。

我们提出设法与"农造司"的对立派见面，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必须听取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兴平我们两眼一抹黑，还是委托 302 部队的同志帮我们联系。

在 302 部队参谋的带领下，到了与"农造司"对峙一方的兴平中学。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农造司"那边过来，便不由分说，把我和付登华包围起来了。吵闹之中，他们把围攻的重点放在了陪我去的付登华同学身上，推来推去，口水横飞，根本不听他讲什么，把他整得满头大汗。他们可能认为他是头头，我是随员吧。中间有两个年龄大一些的人，我问，你们两个也是兴平中学的？那两个人支支吾吾，但是，别的人说：他们是西工大的，是来支持我们的。

这样乱哄哄没有办法说话。这时，付登华同学忽然大声说："我们受周总理委托来兴平解决 302 库问题。同学们想干什么？"趁中学生们一愣神，

他宣布："现在请李世英传达周总理指示！两位西安来的红卫兵也请安静！"

听到"周总理"三个字，果然使得大家安静下来。再说，我的名字当时也是非常响亮的，不管观点是否相同，总还会给与相当的尊重。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时人们都静下来听我讲话了。

我首先传达总理的指示精神，围绕着302库的安全的中心说，两派观点有分歧，可以讨论，辩论，但是不应该采用武斗的办法解决，不能把群众的宝贵生命当儿戏。302库的安全是党中央关心的大事，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的大事，听到302库有危险，凌晨3点多钟打来电话，要求我马上来兴平协助处理302库的问题。周总理日理万机，凌晨3点多钟还没有睡觉，还在为兴平302库的事情操心着急，作为兴平的两派都应该感到问心有愧。两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到底是不是造反派，要用行动证明，真正的造反派应该想中央所想，急中央所急。眼前302库的安全就是对两派的考验，谁打302库的坏主意谁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谁不全力以赴保卫302库的安全，谁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配做造反派，也绝对没有好下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在场的那些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最后纷纷表示一定尽全力保证302库的安全，保证不冲击302库，不做不利于302库安全的事。

为了使他们更加铁心，我索性拿出"钦差大臣"的架势说，你们的态度很好，很正确，这一点我们会向周总理报告。

后来，他们又提出这次武斗是对方挑起的等等。我说，我们不是裁判员，可以做调查，了解真实的情况，向总理汇报。我们已经听取了农造司方面的说法，也看了他们的伤员。

他们说我们也有伤员。我说，那也请你们带我去看伤员，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他们口头应诺，但是直到我们走，也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的伤员。

最后，我针对西工大红卫兵有所指地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煽动分裂，也不会鼓动大家搞武斗！我们到基层来要多做促进团结的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增加仇恨。"

302部队参谋见时间差不多了，催着我们走。

我们与他们告辞离开，走时候的气氛和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他们显得客气的多了。

出门上车离开了兴平中学。302部队参谋说，他见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安全问题。我很感动地表示谢谢。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到秦岭公司向工人和支左的21军指战员传达周总理指示，希望群众组织和部队一起保证302库的安全，让周总理放心。遗憾的是，21军支左的那位营教导员我们始终没有见到。

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把基本情况作了汇总，大家认真讨论以后，拟了一个简单的汇报提纲。我与总理联络员联系以后，向总理作了尽职汇报。为了在兴平继续观察这里的动态，留下李印生等几个同志在兴平再呆几天。我和付登华9月6日晚上回到了学校。回校以后，我们又写了书面材料，寄到周总理办公室。材料中我们直言不讳说，所谓兴平"农造司"抢302库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是我们还是给两派群众做了一些工作，以保证302库的安全。

还应该说明，这次事件中，除了兴平农造司受到诬告，302驻守部队也受到牵连，也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来的委屈。

按照胡军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是1967年9月4日，胡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就向徐保俭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缩手缩脚了。部队一

到该武器库，徐保俭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造反派发出警告：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

可以知道302驻守部队无端被“接管”——对于部队来说等于被缴枪，等于被解除武装。对于该部队的指战员来说，怎么能不感到屈辱？

兴平之行圆满结束。事后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说明：

1. 去兴平我采用化妆，坐火车的方法是正确的。后来大联合以后，对方的一个头头说，他们得知周总理的指示，也知道我一定会去兴平，推测我会坐汽车去，在路上布置了埋伏，准备抓我，也不是要加害于我，主要是想用我交换李洪明。我说，我就害怕你们会有埋伏，所以坐火车去的。他笑着说，这个没有想到，没有抓住你。当然，即使我被他们抓住，不一定会有生命之虞，但是肯定会耗费时间，影响我们执行总理指示。

2. 关于“农造司”抢302库的假情报是由什么人，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这个假情报通过什么人，什么渠道上报到国务院，又惊动了周总理的？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进一步调查，所以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所幸此事没有落案，如果这个“赃”真的栽到“农造司”头上，这可是“反革命”大案呀，会遭到武力镇压的。我心中一直为他们躲过这一场大灾难而庆幸。

不得不作的辩诬。我们当时去兴平时候，一直为兴平“农造司”操心，也为他们被诬陷而不平。岂知此事过去若干年后，我们不得不为交大自己辩诬了。

这个事情在胡炜军长的回忆录里这样陈述：

“9月初，东派（交大派）要抢咸阳302国库的武器，总理深夜来电话

告我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制止对方抢夺国库的武器。又由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直接给交大头头李世英打电话，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

按照这个说法，“东派要抢咸阳 302 国库的武器”，那还不止是兴平“农造司”的事，变成了“东派”的事，那就包括交大、工总司、农总司等等的事，这就比那个时候所说的情况严重得多！

而且说“责成李立即到咸阳把要抢武器的群众撤回。”这意思是说：

1. 李世英派出了“要抢武器的群众”；

2. 总理要我去咸阳“撤回”“要抢武器的群众”，就是说我派出的“要抢武器的群众”已经出发，没有到兴平，至少也已经在路上了！

总理给我的电话不是这样说的。若干年后，不可理解胡炜有什么必要篡改总理的指示呢？

这样的记述是不是不符合事实？ 21 军当时也派了部队去兴平，有没有查清我派了什么人去抢 302 仓库的武器？有没有见到我派出的“要抢武器的群众”？如果有，你们有没有抓到？如果没有“要抢武器的群众”，那让我们“撤回”什么？

后来在网上看到《海事大观》2006 年第 2 期，一篇由记者耿耿写的“‘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这篇对胡炜的采访，胡军长对记者说：

1967 年 9 月 4 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

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军长还给记者说：“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在这里，胡军长说是周总理给他说的“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这里说的“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当然是我了，等于点了我的名，我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这也不由使人想到，如果是周总理说的，那么是谁给周总理报告的虚假情报？如果不是胡炜、黄经耀给周总理报告，那么，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不报告，那么多部队驻扎陕西，干什么吃的？不是严重的失职吗？此事有没有向周总理作检查？

如果说周总理指示的当时，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这样说可以理解，事过若干年后，仍然这样说，仍然硬要把这无中生有的“抢武器”的罪名栽到我们头上，这就太不公道，也太不地道了。

当时我们不知道，也不敢怀疑是谁，为什么造了这个谣言，撒了个弥天大谎，谎报军情，欺骗周总理和党中央。而胡军长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说法，使人不得不怀疑……而且，当时胡军长主持陕西大政，可以直接上报总理，又很受总理信任……

是否可以这样推理：支左委员会给中央和周总理报告说“东派要抢咸阳302国库的武器”，总理感到事态严重，所以给我打来电话，但是并没有完全采用支左委员会的说法？如果不是胡炜和支左委员会向周总理汇报的情况，那么在情况完全明了以后，为何非要坚持那些虚妄的说法？

我不得不再次说明，事实是在此事之前，我还不知道那里有个302武器

库，我本人根本没有想过去抢那个武器库，我也没有听说过“东派”的谁想要抢那个武器库。整个“东派”也没有一个人去那里抢那个武器库。当然我就更不可能派人去抢 302 武器库。

何况，如果我派人去“抢武器”，而且是 302 武器库，这样重大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支左委员会为什么从来没有为此批判过我？给我、交大、工总司等办了若干次学习班，有隔离的，也有不隔离的，怎么从来也没有提起过此事？还有我经历 30 万人大会被逮捕，两年半的铁窗生涯，这期间都没有一字半句提及我参与抢兴平 302 武器库的事，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回忆录里郑重记载，又给记者那样违背事实地述说，想要用写史的方法，让我们把这个“莫须有”罪名，把这个黑锅永远永远背下去呢？

本来确实不想说这些话，可是，不说又感到太委屈，况且涉及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算了，就算是留个悬疑吧。反正，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用舌头是改变不了的。

四

风云突变返校隔离十个月　毫无名堂竟是抓 5·16
本欲结婚计划全部打乱　不能严肃不妨游戏人生

（一）

结婚，在古今中外都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在中国古代，所谓人生的两件最大的幸事，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面一句是指做官，名利双收；前边一句就是指婚姻大事。

中国人对于婚姻素来比外国人严肃认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人们对于婚姻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终身可能只结一次婚。所以，那时，人们那时把结婚说成是终身大事。

既然“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相提并论，当然是一件大大的喜庆事。虽然那个时候物资供应不太丰富，不像现在这样豪华铺张，但是婚礼还是要办，糖，瓜子总是要散的，也照样要请客吃饭，办得热热闹闹的。

但是，我的这个终身大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特定的条件下，却成了一桩艰难的婚礼——苦涩混合着甜蜜。

我和未婚妻多次商量，原来计划 1972 年春节结婚。那时我们两都在宝鸡 48 号信箱（一个国防厂）当工人，也已经向工人师傅们和亲友们发布了信息，并且向班组，车间和厂里请了结婚假，也都准了假。可谓万事具备，只等出发了。

我们相亲相爱，两情相悦，是在大学快要毕业时确定的关系，后来我们分配工作时也分到同一个工厂。她家里是老工人出身，我们家也是工人家庭，家里都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毕业以后还不能马上结婚，必须先工作两三年，积累一点资金，以应付结婚购物，请客之用。那时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

原计划是先到我家，举行婚礼，再到我爱人家——上海探亲，回来后请厂里的领导、同事、师傅和工友们吃饭，散发喜糖。因为当时供应紧张，好一些的糖果要我爱人家在上海买。其实我们两家亲友早就忙活起来了，各种东西早就在准备了。我家和她家都为我们准备了棉被，衣服什么的。

我们内心充满着喜悦，一边上着班，一边准备东西，等待着出发的日子，等待那个盼望已久，酝酿已久，准备已久的神圣日子。

1972 年元月 23 日，离春节只有二十来天了。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等待那个大喜的日子时，一件出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我

被叫到工厂办公室，厂领导告诉我，西安交大来人了，让我回学校参加学习班。交大来的人也在场，其中有的交大老师我也认识。然后交大来的人严肃地通知我，按照省里的指示，你必须回学校参加运动，参加学习班。我问是什么内容的学习班？他们说，到了学校就会告诉你。我问什么时候走？他们说：现在就走。我问什么时候能结束？他们说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问题弄清楚了就会结束的。

这个回答使我如坠五里雾中。我一门心思在考虑结婚的事，现在竟然要把一切全部推翻，而且没有任何时间表。虽然我经历过许多这类事情，但是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仍然觉得不好处理。别的先别说，只是如何对厂里的同学（我们交大与我一起到厂的就有五十多人）和厂里的师傅们解释，如何给双方家里的亲友们说明，就是个大问题。而且结婚的东西都买好了，不知道要放到什么时候，有些东西，像食品，是不能久存的。那些都是亲友们省下或者向别人周转来的，以后重新凑集并不容易。

基于这个原因，我当时就提出，运动是大事，当然要服从全局；但是，我结婚的事虽然是个人的事，但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也是人生大事，而且两个家庭，还牵涉到很多人，所以事情也不算小，也应该按照毛主席说的“弹钢琴”，统筹解决好。我提出建议，学习班推迟办，等我结婚回来再办，并且把自己的理由说了一遍。但是，他们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且，要求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跟他们一起走。

没有办法，我只好通知我的未婚妻郭根英，告诉她这个情况。她也被这个突然的变局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默默地为我拾掇东西，无可奈何地目送我离开。

我心里想着，交大来的人也做不了主，不如先跟他们走，到了交大，看看哪里有决定权，然后再说吧。

交大来的汽车是一辆大屁股吉普车。冒着大雪上路，视线不好，路又滑，本来应该开得慢些，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赶路，反倒开得比较快。到了蔡家坡，正在下一个漫长的大坡，车子突然失去控制。司机手忙脚乱地好不容易才把汽车停在半坡上，把车上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我们下车一看，好悬啊！汽车已经横着停在半坡上，车头向着大坡旁边的深沟，离沟沿只有一米多。这的确是万幸，因为冲力稍微再大一点，我们不是顺着大坡滚下去，就是一头栽到深沟里去。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学习班就办不成了。

大家上车以后，我开玩笑说，咱们还是慢一点，别弄得学习班办不成了。

谁知道不久又出了一次险情。那是在一段平路上，本来应该安全吧，但是，司机车开得快，对面迎头来了一辆大卡车，也开得飞快，双方都没有提前减速，大卡车占的路面又宽，我们的车只好猛地向边上躲闪，几乎要窜到路边的排水沟了。司机又快速地回顺方向盘，车子因为惯性向外侧滑，我觉得我们的车的一只后轮都已经滑到路边的排水沟而悬空了，车上所有的人又是大惊失色。最后，终于平安地返回到公路上，大家才算放下心来。否则，起码要车毁人伤。

经过这惊心动魄的近 200 公里的历程，下午，我们到了交大。地方早就给我安排好了，在西二楼的一层，一个教研室那么大的地方整个腾空了，全是为我服务的。我到了以后，就向我宣布了意图和纪律。把我弄回来是要给我办学习班——实际是搞专案，要清查“5·16”。纪律是严格的，不经过专案组的同意，不能走出这个教研室的大门；出了这个大门，包括去食堂吃饭等等，都必须有专案组的人员陪同（监视）；如果路上碰到熟人，也不许打招呼。等等。

刚刚经过了生死之旅，又听到这些安排，我憋了一肚子火。抓“5·16”

抓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莫名其妙。你可以有许多借口来审查我，批判我，但是，以这个名义隔离审查我，的确没有想到。

我所知道的“5·16”，那是1966年8月份的事，那是一些中央干部的子女，组成的反动组织，例如，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等，干了很多坏事，抓人、打人、抄家，据说还打死了几千人。这就激起社会严重的不满，后来被抓了200多人，最后还是毛主席开恩，让把他们都放了。这个已经是过去几年的事了，怎么现在忽然想起来“5·16”，而且现在正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却让我们在这里抓什么“5·16”，实在想不明白。

当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学习班召开了全体会议，其实，中心只有我一个。学习班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严肃地提出了学习班的要求，也要求我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审查等等。最后让我表态。我一肚子的不高兴，慷慨激昂地发言20多分钟，中间还出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大故障——也许因为情绪激动，加上休息不好，我讲话中途，忽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所幸我是坐在椅子上，而且时间短暂，我又清醒过来。别人可能都没有觉察到，以为是正常的停顿。我又接着讲话，直到散会。

随后几天，在食堂吃饭时，又陆续看到了我们原学校革委会的几个负责同志，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他们早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了，这次也都被抓回来办学习班，也像我一样，是隔离性质的，因为他们后面也跟着监视的人。当然，我们之间不能说话，只能相互点头致意，互相给个笑脸，算是打个招呼。

见到他们，一方面觉得不平，一方面也觉得高兴——因为我们多年不见，这次能把我们公款召回来见面，省得我们自己掏腰包，也算一个收获吧。

这样，我更感到这次审查的来头不小，动静很大。如此兴师动众，更预感到这个学习班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时间很可能会拖得很长。道理很简单——动静很大，说明决策者的期望值很大，不能获得预期的“成果”，那是很难结束的，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成果”是什么。

其实，对隔离审查，我虽然不理解，很反感，但并不太在意，因为，一方面，我经历过的这种事情已有多次，有一定的“适应性”了；另外，我自己知道自己没什么问题，早晚会还我清白，能够经得起这次审查。

可是一看这个架势，这次的审查不是短期能结束的，原来安排的结婚问题实在无法处理，拖延婚期，牵涉的人太多，我又被圈在这里，没办法作工作。思来想去，只有设法按期举行婚礼，哪怕是简单的，这样，至少可以安抚双方的亲友，我思想上也减少许多压力。

不过，这个愿望要实现，可能性微乎其微。要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年代，一个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人，要在隔离审查期间结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也是被审查者的态度问题。

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我认为比较好的结果，我必须极力争取。

从第二天起，我就一门心思考虑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过了几天，我下了决心，就正式向学习班的负责人提出我必须在春节结婚的要求。他们当然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这是我提前就预料到的。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提出了要求，只能不断地，反复地继续提出要求，并且反复申明我的理由。他们当然也是反复拒绝，并且要求我改变态度。

本来，对于政治运动的事，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可是，这次学习班，使我无法严肃认真，第一，这次办学习班的目的我已经看清楚了，其实就是

要抓 5·16 分子，要么把我搞成 5·16 分子，要么通过我的手，揭发（或者诬陷）别人，把别人弄成 5·16 分子。我对于我自己当然了解，我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从未动摇，我不可能是 5·16 分子；别人呢？对于我们校革委会和各系革委会的成员，以及我所熟悉的学校的一些活跃分子，按照我的了解，他们都不可能是 5·16 分子。虽然最终结果我能预测出来，但是这个过程还必须走完，时间也非要耗费不可。既然如此，这次学习班本身就是很不慎重，很不严肃的决定，简直就是一场游戏。

既然不能严肃认真，那我也就“游戏人生”吧。

我每天首先一件事就是要求结婚，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安抚了两家的家属和亲友，使我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地思考和回忆问题，提高学习班的效率，否则，我现在人在学习班，心却在学习班外面，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头昏脑胀，什么问题也想不起来。

这样反反复复，学习班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答应向学校领导汇报，请示，看学校怎么答复。过了两天，学校的答复下来了，说办学习班是是很严肃的政治事件，在这期间应该专心致志，把结婚的事还是推迟到学习班结束以后再说。

我听了以后，非常失望。我不甘心我的要求被这样轻易否决。我就仍然不断地要求，请求。我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无法专心致志，一心想着外面的双方年迈的双亲和其它的亲友，想着他们正在为此事忧心忡忡，本来的喜庆之事，却意想不到地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悲伤和惆怅；再设想我爱人，全厂上下都知道我们结婚的事，在宝鸡的还有很多同学和熟人，他们也都知道，现在突然又结不成了，我被隔离审查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在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可我既无法解释和说明，又无法分担这些压力和哀愁。所以，我无法按照学习班的要求去做，既不能专心学习文件，又不能思考和回忆问题。

于是，我就对学习班采取消极的、软磨硬抗的态度。每次在他们“陪”着我吃完饭后，在床上一躺，或者看书，或者睡觉。他们批评我，我也不管，就说是睡不好觉，没精神。

过了几天，学习班的负责人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学习班肯定也办不好。我的专案组的人多数是交大的老师，对我比较熟悉和了解，而且或许还抱有同情之心，可能他们也在向学校领导汇报说了好话。

后来有一天，他们说，学校领导要见我。于是，他们“陪”着我，去见学校的某位领导。这时候早已经是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了。

我们去见的这位领导是我还在学校时就认识的，算是“共过事”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当然不是当年，完全变了。不过，这位领导态度倒是很客气，说，你恐怕也知道，你的事情，我们学校无权作主，你所提的要求，我们也无权处理，无法批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地把学习班办好。学习班结束了，再考虑结婚的事情。我说，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明白，你们不能批准我的请求我也理解。可是事实上如果不先处理好结婚的事，对于办好学习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核心人物，首先我无法静下心来，无法专心地回忆和思考问题，别人又无法代替我，那么，这个学习班能办好吗？我希望你们能向省上反映我的请求，使得学习班和结婚两不误。其实它们本质上也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一致的，相互促进的。作为我本人，理解你们的难处，我也不要求你们非要批准我的请求，只希望你们能答应我，如果我给省上领导写信，请你们能够代转。他说，这个我们可以作到。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

回到学习班，我的思想就更不能平静了，现在皮球交到我的手里，实际上是我把皮球抢到了我的手里，成功和失败也都取决于我怎样作。我现在只能用写信这个唯一的方法向省上的领导请求批准我的结婚请求。可是，信写

给谁，却成了问题的关键，写信的对象正确，就还有成功的希望；写信的对象选错了，那就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

按说，虽然我当时身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与省上的许多领导，首长都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此之时，我却感到那样孤立无助，求援无门。那时候，政治比天大，平时与省上的那些领导在一起，说说笑笑，关系也算融洽。而到了这个时候，我在隔离审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谁能理解我此时的处境和心情？有谁还能对我抱有同情之心？有谁敢为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人说话？有谁敢于作主批准我的在隔离状态下的结婚请求——在那个年代这肯定被当作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无理要求？搞得不好，还会认为我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态度不好，对抗运动，那就对我更不利了。



左起：罗燕军（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李洪明、李瑞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世英、吴桂贤（原国务院副总理）、姚连蔚、霍士廉、张虎（省革委会办事人员）。

反复思量，我圈定一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21军的胡军长。他当时也是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支左委员会副主任。虽然都是副职，但是他却是省上大事决策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是“一言九鼎”。我们学校因为“八五”

静坐与21军有过节，有隔阂，但是，对于胡军长本人，我一直是比较佩服的。我认为他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通情达理，敢作敢当，而且，他在省上又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如果他能够理解我的处境和心情，愿意在省上为我说话，那我的结婚请求就很可能会被批准。如果他不为我说话，省上那么多领导，却也无人可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自己去化解自己的酸楚和烦恼了。

想好以后，我就开始给胡军长写信。信里既恳切地表述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也难免带有一些牢骚和情绪，我把我结婚的理由重新阐述一番——我们决定结婚在先，学习班通知在后，舆论早就出去了，亲友们也早就在策划安排了。况且我是省革委会群众代表中最后一个结婚的，而且，从晚婚的角度说，我们也堪称榜样，我已经实足27岁，我爱人比我还大半岁，早已超过晚婚的标准。希望这最后一个结婚的人能够顺利一些。我又讲了我们双方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家里都不富裕，好不容易买来结婚的东西，却用不上，造成浪费，既增加了两家的经济负担，也对国家不利。最后，我恳请胡军长能在百忙之中，关心一下我的婚事。如果我的要求能够被批准，我会很严格地遵守学习班的纪律，保证呆在家里不随便外出；不与别人搞串连；婚礼上除了自己的直接亲友和老邻居外，不邀请其它外人参加。婚假结束，保证按时回到学习班，决不拖延。信写好后，我封好信封，在信皮上写上“胡军长亲收”，交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然后就静等信息。

我根本无法预测会有什么答复，更不敢认为一定能成功。只是抱着困兽犹斗的心理，不管结果如何，按照我的性格，必须去作自己最后的努力。

眼看年关将近，我心里更是焦急万分。就在过年的前两天，学习班的管理人员通知我到学校办公室去。我跟着他们去了。学校领导告诉我，我的要求，省上领导已经批准了，同意你的结婚请求。学校的具体安排是给你10天

婚假，从离开学习班算起。希望你能遵守学习班纪律。

我当时高兴极了。本来几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情，竟然能够梦想成真！我心里暗暗感谢胡军长，也更加敬佩胡军长。

我向学校的领导表明说，我会履行自己的诺言，一定遵守纪律，保证不与别人串连；一般情况下不外出；婚礼也只有少数亲友邻居参加，不再邀请别人；保证准时返回学习班。

于是，我本来一年前就决定了的婚礼，经过了这么迂回曲折艰难努力，终于能够如期举行。虽然它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婚礼，没有长长的迎亲车队，我爱人是自己坐火车从宝鸡赶回来的；没有到外面的饭店吃饭（那时也还不流行在外面的饭店吃饭），就在我家里摆了两张饭桌，又借我们邻居家的地方，摆了两张饭桌，后来，邻居们来得多了，坐不下，就又加了一桌。幸好我爱人的大弟弟在宁夏服兵役，为参加我们的婚礼，安排春节回上海探亲，刚好作为“娘家人”参加婚礼。

我也遵守诺言，除了送内弟上火车外，整整 10 天，我也没有出过门。我们当然叮咛内弟，回去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办学习班是正常的事情，不必担心，等我的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们再到上海去看望老人。

10 天期满，我就如期返回学习班。我爱人也一个人自己回厂去上班。

现在，离我们结婚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家，我们有了孙子和外孙女，这一切，都起源于那场来之不易，简朴得近于寒酸，喜庆参杂着惆怅的婚礼。而没有参加婚礼，但却是这场婚礼能举行的促成者，就是胡军长。像忘不了我的婚礼一样，我也对于胡军长永怀着敬意和谢意。

（二）

送走我爱人，我又回到学习班，向学习班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婚假期间的做

法，强调了自己完全按照承诺，一点也没有违背。学习班领导也没有表示不满意。

可是，即使我认真起来，又怎么样呢？我自我揭发什么？揭发别人什么？

什么都没有。这个学习班注定是只能开花，不能结果。如果以“成果”而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好的评价，直到学习班不得不结束之时。

这场按照正剧编排的，几个重量级演员（我们学校革委会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出演的大戏，也注定只能当作喜剧和闹剧来演。

那就轻松一点吧，自由一点吧。虽然我并不喜欢，但也只好游戏人生了。

通常，只有吃饭时才能到外边去。我们办学习班的地方是教学楼西二楼一楼金相教研室，吃饭是在学校的学生食堂，这要从北到南穿越整个学校。学校的教职工不可能短时间大换血，很多人都是认识的。学习班有交代：尽量不要与别人打招呼。开始时，走在路上，我尽量低着头，避免和别人打招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害怕牵连和影响别人。后来，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索性昂首阔步地走路，路上和在饭堂排队的时间，我还用筷子敲着碗，后来，我的“跟班”让我不要敲碗，说是影响不好，那就不敲吧。碰到熟人，一般我是采取与对方对等的做法——你对我点点头，我也对你点点头；你对我打招呼，我也应承一下。因为，大家都是经过了运动的，都会考虑自己愿意采用的态度和方法。

学习班刚开头是学习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讨论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

当时我感到有些滑稽，林彪的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中说：“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

羊”，你现在这样给我们办“学习班”，隔离起来，抓 5·16，不是刚好应了林彪一伙的说法吗，不是变成了给林彪一伙提供炮弹吗？

我也想，为什么把交大的主要头头都控制起来，是不是害怕我们揭发他们的问题？想想也没有什么道理——林彪一伙主要是军队的，我们跟军队没有什么联系，不会了解多少“深层机密”，他们自己也应该知道，又何必害怕我们揭发什么？

隔离起来，抓“5·16”，又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什么关联？林彪一伙才没有心思组织“5·16”呢。

总之，这个办班决定搞不清什么目的，就走着看吧。

这样过了几天，我觉得有点太无聊，所以提出来，我想锻炼身体，要不然整天头昏脑胀，不利于学习班，而且，时间长了，身体搞坏，将来怎么为党和人民工作，我提出要求每天到大操场跑步。学习班研究不同意，害怕在外面影响太大，只能在室内锻炼。我说，也行，给我找拉力器和哑铃吧。他们给我找来拉力器和哑铃，我没事就锻炼锻炼。

学习班原来说要抓“5·16”，看样子进展不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跟我们毫无关联，既没有组织联系，又没有思想基础。而且，如果说西安曾经有过“5·16”极左思潮和组织，也只能与西安的红恐队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开头就是反对红恐队的，这一点证据确凿。所以，把我们往“5·16”集团上扯，那根本是豆腐渣贴对子——不粘连。

后来，学习班的中心就转移到“八五”静坐上面。这到底是原来学习班的真实意图，还是中心不得不转变，这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后面学习班的重点和中心就从“5·16”的问题变成了“八五”静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以前搞了多次，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对于这方面的错误，我们也反复检查了 N 次，并且也承受了因此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于“八五”静坐，胡军长说过“交大一派害怕我会报一箭之仇，不会的，你们要相信我不会那样做。”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完全相信胡军长的为人。何况，从“八五”静坐的 1967 年，到现在的 1972 年，5 年过去，就算是胡军长要报“一箭之仇”，这支箭也射得太远了吧？

但是，既然到了人家的地方，那就只能按照人家的意见办，“八五”静坐就“八五”静坐吧，反正是陈谷子、烂套子，搞不出什么名堂，难道还会有什么新东西吗？我基本上能够预测到学习班的结果了。

（三）

很快，五一节要到了，学校的老师们都要放假。

我呢？让老师们“陪”着我过五一？我想，还是再“突破”一下吧——我向学习班提出，让郭根英来学校探亲——我讲了我的道理，我结婚 10 天假，连个蜜月都没有。全国都放假，我们也应该享受一下这个权利；我爱人来了，我的安全有保证，你们也可以放心休假。这样大家都好。

开头，学习班领导有些犹豫，我后来又给他们说，你们想一想，我结婚省上领导都能批 10 天假，那还是在社会上；五一节，两三天，又是在交大校园里，在学习班，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他们找学校领导请示，还真的批准了。我马上给郭根英打电话，给她说明了情况，她就带着一些吃的，到交大“探亲”来了。

隔离学习班里“探亲”，这恐怕也是难得的待遇吧。

这个五一节，我和郭根英“占据”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面积——一个教研室的一大片房子。

“探亲”结束，郭根英回厂去了，我仍然在学习班“学习”。

（四）

这个学习班注定要虎头蛇尾，因为上边说的原因。到8月初，学习班已经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然后就是等着做结论，可能是要经过省上批，所以就等待。

到8月1日，拥军的时候，省上通知我参加拥军座谈会，这说明我被“解放”了。此前，省上的会议是不通知我的。在省军区，军区领导招待我们吃饭，上的一个菜是香酥鸡，我拿了两只鸡爪子啃，刚好省军区的谷风鸣政委过来敬酒，看到我在吃鸡爪子，就笑着说，有好好的鸡肉，你干吗老啃鸡爪子？我说，咱这是黑爪牙嘛，所以就啃鸡爪子。他听了哈哈大笑。其实说明，我对这次隔离审查心里还有怨气。

不过，交大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做事有始有终。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因为我们都是别的单位的人了，回去要向单位交代的，如果没有一个结论，那我们回去算什么。交大也答应给我们做结论，后来，他们果然也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结论，让我们回去好向单位交代。

我在若干年后，才搞清楚，这次抓“5·16”是全省的部署，省政工组有个第三办公室，是专门主管这个业务的。下面的各单位也组成第三办公室，上下对口。比如，交大就组成了第三办公室，与上级的第三办公室对口。

关于交大的第三办公室以及给我的结论，抄录如下：

陕西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批复）

陕革教发（71）90号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报告悉，经研究同意由楼绍文、桑永海、刘若曾三同志组成你校清“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楼绍文为组长。

同意由李剑秋、张正、曹润有、陈志宏、杨忠义、郭守义、姜亚一、牛振东、王文景九同志组成第三办公室，李剑秋同志任主任。

陕省革教育局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

抄报省政工组第三办公室

李世英学习班调查组人员：负责人：朱学忠、宋余九　成员：宋余九、顾海澄、庞炳祥、杨泉妹、盛海华、彭勋等12人。

毛主席语录

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关于调回李世英、武登才的请示报告

省委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省革委会政工组三办、省教育局三办：

自我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广大革命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狠批“五·一六”罪行，揭发了李世英（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校文革主任、校革委会主任，现分配在陕西宝鸡765厂）和武登才（省革委会委员、原校文革第一副主任校革委员第一副主任，现分配在陕西省略阳钢厂工作）等人大量问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我校和西安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某些重大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和组织者，是有错误和罪行的。

目前我校批清运动已深入到重点事件，重点人的揭发批判和审查阶段。

许多重大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慕蓉等人早已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现在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彻底查清我校和西安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及李、武俩人的问题，把“批清运动进行到底，我校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经学校党委研究同意，将李世英、武登才调回学校办学习班，接受审查、交待揭发问题。

妥否，请批示。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

省政工组：

现将李世英同志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的情况报告如下：

1971 年我校开展批清运动，为了查清李世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经校党委讨论，报请上级批准，于 1972 年元月 23 日将李世英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经过内查外调，现问题已基本查清，学习班已于 11 月 10 日结束。

主要问题是：在 1967 年 8、9 月间，李世英同志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用发“造反声明”和静坐的方式错误地对待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造成了长达四十三天的“八·五”静坐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李世英当时担任了“八·五”造反指挥部的政委，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认为，李世英同志在 1967 年 8、9 月问题是属于革命小将在前进上的认识性错误，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敌人无关。

李世英同志已于 1972 年 11 月 20 日回原单位工作。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1973 年 1 月 5 日

西安交大（73）交发字第20号

省委三办：

现将李世英同志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的情况报告如下：

1971年我校开展批清运动，为了查清李世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经校党委讨论，报请上级批准，于1972年元月23日将李世英从工厂调回学校办学习班。经过内查外调，现主要问题已基本查清，学习班习已于去年11月10日结束。

经查：主要问题是：

1、1967年8月5日晚十点多钟，交大大批人员到达玉祥门支左委员会接待站。8月6日凌晨一点多钟，李世英赶到接待站。李世英与付登华主持召开在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行动和发表造反声明的问题。李世英在会上介绍了交大采取“八五”造反行动的原因。会议研究、修改、制订了一个“八五”造反声明。李世英同意将声明送交大付印。会议还决定将队伍转移到建国路支左委员会接待站。1967年8月6日下午，在原省委“红总”的小院，由李世英马希圣主持，召开了交大与诸总司的头头会议。会上成立了“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五“造反总指挥部”，李世英被推选为政委，马希圣为司令。从此，有几十万群众参加所谓“八·五”静坐，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持续长达43天，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

2、1967年8月7日上午，马希圣、李世英、武登才等商量，要找支左委员会首长解决问题。马希圣提出拉队伍到21军军部，李世英同意派交大队伍去21军军部，武登才具体组织了队伍。当天下午，交大队伍到达21军军部门口后，有一百多人翻墙爬门，冲入院内，造成了在军部门院内长期静坐的后果，严重影响了部队工作的开展。

3、中央“八·一〇”明码电报和“关于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下达后，李世英继续坚持错误的“八·五”静坐。在交大革委会和群众会议上，李世英

先后说过："我们中央对胡、黄两位首长的肯定，我们的斗争就更加充满信心……""我们再次重申五项要求……我们重申支左委员会必须迅速答应，否则我们的斗争绝不停止。""要看拥军的实质……两家的关系搞得好，搞得不好的关键在于他们，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他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斗争，达到五项要求就是拥军，他们答复五项要求就是爱民。"

4、1967 年 8 月（**编者注：此处应是 9 月，疑似西安交大（73）交发字第 20 号原文的疏忽**）上旬总理联络员几次来电要李世英等人去京，李世英在去京前于 9 月 10 日、13 日、16 日三次写信给"八·五造反者"信中说："支左委员会某些负责人已经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险边缘。""支左委员会的一些老爷们拒不回答我们的五项要求，一拖再拖，他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对革命群众对西安文化大革命犯了越来越多的罪行。"继续错误地对待支左委员会。

5、1967 年 8 月 19 日晚，"八·五"总指挥部在交大图书馆二楼，召开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外地驻西安的记者、外地的群众组织代表等二百多人。马希圣主持会议，李世英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李介绍了"八·五"造反经过及所谓支左委员会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李说："在'八·五'造反问题上，我们认为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革命群众，而不是八一三三首长，特别要指出在八一三三，他们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甚至是危险的。""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地斗争下去……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但决心和信心是一贯的，坚决斗争到底！"李世英想通过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取得外界的支持，并向支左委员会施加舆论压力。

6、1967 年 8 月 23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讨论"八·五"造反如何办。会议前已有人向李世英提出绝食的建议,会上当有人提出绝食时,李世英就说:"搞多少人？是否八一三三搞 20 人，袁政委家搞一些。"8 月 23 日晚在交大召开的"'八·五'总指挥部会议上，李世英也提出绝食问题，说："开一

个大会，以抗旱、去铜川支援煤矿等名义把人抽回去，然而重坚持五条要求，要求支左委员会解决，在建国路留20人，二十一军留xx人，军区袁政委家去30人，限定时间回答我们要求，不然就绝食。”会议并未作出绝食的决定，故没有行动。

李世英同志在1967年8、9月间，制定“八·五”造反声明，亲自主持成立“八·五”造反总指挥部，并任政委，采取以静坐方式对待支左委员会，已虽经中央首长多次劝阻、教育，但仍坚持要静坐下去，使静坐持续长达43天，影响很坏。李对“八·五”静坐，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但是李世英同志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所致，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未发现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阶级敌人有联系。

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认为：李世英同志在1967年8、9月间的问题是属于革命小将在前进中的认识性错误。

李世英同志已于1972年11月20日回宝鸡工厂工作。

中共西安交通大学委员会

1973年3月16日

抄送：省委政工组、三办、组织组

（五）

学习班快要结束时，我们这些“班员”解除看管了，可以聚在一起了，我才知道，戴慕蓉夫妇二人都被“调回”学校了，她爱人贺相家在北京，曾经是我校驻京办事处的，可能以为我们通过他与北京“5·16”有联系；还有付登华，他被叫回来最早，比我们还早两个月，可能是为了从他那里打开突破口吧。

这个学习班一直持续了10个月，到11月份才正式结束。学习班结束后，我才与我爱人一起到上海探亲。在上海也没有办酒席，只是把我们带去

的苹果，核桃，红枣，喜糖等给邻居们散发了。

到了上海，见到了岳父、岳母和郭根英的兄弟姊妹，他们对我这个刚刚解除隔离的人并不怀疑、冷漠，很热情，很尊重。我这时知道，我岳父，一个老工人，解放后在扫盲时才认得一些字，拿着我们写回去的安慰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猜透了我们信背后的无奈，常常忍不住老泪纵横，这是岳母悄悄告诉我们的。这个形象常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引得人鼻子发酸。

不管怎样，人生的这个坎儿算是迈过去了，那就先高兴吧。

沈荣水、戴慕蓉都是上海人，我们刚好在上海还可以见几面。

后来回到厂里，才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在学习班期间还是保密的）。

（六）

胡军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们陕西没有抓“5·16”。应该说基本属实。不是一点没有抓，也抓了一点，比如我们交大的这些人。但是，别的学校好像没有抓；社会上的情况不了解，但至少没有听到什么声响和反映。而别的一些省份，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抓“5·16”，大批、大斗、大逮捕，成千上万地、大规模地、残酷地迫害造反派。陕西省并没有这样做，这一点，现在看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运动中，只是我们几个受一点委屈，那就是小意思了。

五

世事变换儿女苦　锒铛入狱幻想灭
隔离十月近尾声　风刀霜剑踵接踵

在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面

对面批判，在省的大会、地区的大会接受批判，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1977年春节以后，就让我到农村去蹲点，带领一个几十个人工作队，到一个公社，实际上是背靠背审查。结束以后，又接着办隔离学习班，一办就是将近一年。

我的隔离审查将近10个月了，看样子进入了尾声。材料也写了不少，审查的主管好像也提不出更多问题了，我也整天闲的没事。看管我的工人师傅也悄悄地给我说，快要结束了。我也是这样估计的，只不过有一件事，像一个阴影老是在我心头游荡——在此之前有两个省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一个是工人，宝鸡的单英杰，一个是学生，杨梦云）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据说他们在四人帮被抓以后表示不满，并且声言要上山打游击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与他们不同，还是保留了一点希望；但是，运动搞起来就会出现各种偏差，“萝卜快了不洗泥”，“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管胡萝卜白萝卜一起拔”等等，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对前景也不能过于乐观，还是多考虑一些曲折，避免后来大大的失望比较好。

就在认为学习班快要结束时，学习班又给我提出“九·二”武斗时，是谁派刘安全（工总司常委）带队去西郊解围的。这个问题其实原来很清楚，刘安全后来被对方抓住，自己交代了全部过程，而且在对方的小报上刊登出来大量散发。现在又问我这事，可能他的日子也很难过。我对他是同情的，他被对方抓了以后，肯定吃了不少苦，后来工总司内部有矛盾，说他是“软骨头”“叛徒”。我们到北京解决西安问题，在等待中央接见时，他自己来到北京，找到我，说想作为代表参加接见，这个事情我们交大的人定不了，要工总司的人来定。他说工总司的人不见他，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解决，就劝说他回去。他说吃饭没钱了，我马上找戴慕蓉借了10元钱（我那时是学生，没有收入）给了他。戴慕蓉知道了我借钱是为这事，就不

让我还了，我这就变成了“借花献佛”了。

这事现在再提起来，已经过去了 11 年，想起刘安全在北京的落魄，就想算了吧，就说是我派他去的吧，给他减轻一些压力。我就这样写了材料，交上去了。——这是作了一个假证。为了对刘安全的恻隐之心。

这以后，学习班气氛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少。

（后来，有人说，你被抓是因为你说刘安全是你派到西郊的，刚好让人家找到一个借口。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会给我加点分，不过，就是没有这事，我仍然逃不掉，他们目的是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去的。）

因为近一段时间审查方和被审查方的我都没有什么事，所以看管人员晚上就陪我一起去看电视。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大家家里都还没有电视，在地委的大办公室配有一台电视机，很多人晚上都来到这里看电视，房子里挤得满满的。

那是 1977 年 12 月 8 日晚上，大约有 9 点多钟，我正在那里看电视，什么内容记不得了。这时，地区政法办的一个人，这人我认识，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出来一下，有点事。我想也没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就随着他出去。一出门，我立刻就感到情况异常，因为走廊的两边站着两排人，每隔四五步就是一个人，背靠墙，面向走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知道这样排场的布置肯定是为我准备的。我随着那个人从这个夹道中走过，出了办公楼，走进东边的办公楼——是政法办和公安局的办公楼，被带进刚进楼门的第一间办公室——这个位置选得不错，可以缩短运动的距离。

走进房子，我就明白是要干什么了——不大的房子里，有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还有几个地区公安局的干部。

站定以后，正式开戏。一个人高声问我：你是李世英吗？我说：是。

他又大声说：李世英，根据什么什么的决定，现在对你正式采取拘留措施，说完，就拿出手铐。我知道是给我戴的，所以就主动伸出双手——配合人家的工作嘛。然后他拿出拘留证让我签字。戴着手铐签字，这还是我一生的首次。到写日期时，我问，今天几号？他们告诉我是8号，于是我又写上日期。我真的不知道那天的日期，因为在隔离中，日期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就要带着我出去。我说，不让我给我爱人打个招呼。他们说，不用了，会给她通知的。我又问，我的被褥，洗漱用具什么不拿吗？他们说，不用拿，那边都有。

于是我跟着他们上了车，两边是持枪的战士。

整个过程很平静，对他们来说也很顺利，所以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搞那么大的气势，简直把我想象成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

汽车开出地委院子后，我也没有关心车往哪儿开，因为关心也没有用，而且外边很黑，看不清。还有，那时的吉普车窗户很小，两边的战士一挡，没法看到外部。

我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要尽快想明白我目前的处境和应对措施，所以一路上我的脑子在高度紧张地运转着。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刚开头我觉得像是以往的审查一样，严厉地批判，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反复审查，错误弄清楚了，也就结束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像是那么回事。首先，对“四人帮”采取逮捕的干法，就使我吃惊不小，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但是心存疑虑。在我党的历史上，按照路线斗争的惯例，从来不采用逮捕的形式，而这次可以说是采用了最高级别的做法。这是树立了运动的样板，还是特例？我的被捕，说明了抓捕“四人帮”不是特例，而是各地各部门样板和标准。毛主席过去处理国内矛盾时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批判从严，处

理从宽”的政策恐怕不会被执行了，代之以疯狂的报复为主基调的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方针。这样，我们这些人不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问题，而是要把生命本身别在裤腰上的问题了。

正在想着，车子进了一个院子，晚上也看不清什么，我被带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房子，把我交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别人管他叫“所长”）。他旁边可能还有两个人吧，记不清了。我站在所长对面，所长又核实了一次我的姓名什么的，然后给我讲几个不准的监规，例如不准交流案情；不准交朋结友；不准违反禁令；不准打架斗殴等等。

然后开始搜查随身物品，手表、少量的人民币、钢笔、笔记本、纸片——所有的东西全部上缴，说是替我保存。大冬天，等我把衣服（外边穿着棉袄，里边一层又一层的，包括裤子）的口袋全部掏了一遍以后，他又亲自在我的衣服，裤子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捏了捏，掏了掏，很是认真。

最后，他确认没有什么东西以后，让我把裤带解下来，这个我有点不情愿，说，能不能不解裤带？要不然浑身没有力气。他说，这是这里的规定，必须遵守。我只好把裤带解下来，交出去。后来知道这是安全措施——害怕犯人自杀，的确，别小看裤带，它既可以用来自杀，还可以用来杀人。至于我的留下裤带的理由，实在是可笑，监狱里就是要让你没有力气，才不容易反抗和逃跑。

这些办完以后，他和另一个管理人员一起，带我到后院，借着灯光，可以看到一排房子，一看就知道是牢房。因为每个房子都没有窗户，而且是铁门，这就够了。那时候一般都不用铁门，都是木头门，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是厚厚的防盗门，又是粗粗的钢筋防盗网，和自己给自己造了个监狱一样。

那个管理人员打开一个牢房的门，正在睡觉的犯人们全都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一副迷惘的神色。所长说，今天晚上给你们这里加一个人，他的

被褥还没有来，你们谁被子大一些，与他合盖一个被子。犯人中一个人起来（第二天我知道他是这个号子的号长）指定了一个人，让他与我打通铺。那个人没有说什么，把被子揭开了一些。

所长对我说，你睡吧。然后就走了，牢房门也就锁了起来。用的是那种大铁锁，夜深人静，大铁锁撞击铁门的声音特别响，也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窝。我也不客气地钻进那人的被窝，仰面躺着，两边都是人，挤得无法翻身。

我要拿被褥和洗漱用具，公安局的人说“什么都有”，这就是他们说的那里什么都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了，现在，终于到了人家希望我来的地方。我明白，这个地方是好进不好出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那就不是我有罪没罪的问题，而是我必须有罪的问题，很难想象有什么奇迹出现。现在准备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吧，多长时间呢，起码 10 年吧。

如果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是有些自信的话，对当局心存信任和幻想的话，那么，这一切都被我被捕这一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我已经立即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思想也随机应变了。

我现在面对的现实是：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清查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政治的暴风骤雨，凡是在文化革命中有所表现的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头头，都被以各种形式压制，包括坐牢，判刑，隔离，撤职，批斗等等。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轨道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这些并不是那些当权者考虑的，他们只是享受报复的快乐。

这场清查运动将是长期的，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有枣没枣三杆子”，“有枣”说明你该挨，“没枣”你也是白挨——再说，哪有“没枣”——既然进来了，你就必须“有枣”。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抓了你，你就必须有罪。发明了“莫须有”

理论的秦桧有了现代传人。

过去运动的“与人为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和抗争之道了。

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持健康，保存体力，准备长期斗争。

在短暂的激烈的头脑风暴之后，心情完全恢复平静，而且出奇的平静，像是无风时明镜一样的湖面。

既然想也没用，那就保存体力，睡觉吧。你别说，也还真灵，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别的犯人吵醒的，起床声，洗漱声，撒尿声——声声入耳。我定睛一看，原来我睡在这里！我还以为是睡在隔离学习班！我什么都没有拿，所以那些工序就省去了，穿好外衣，像他们一样靠着墙坐着。

我这时才开始看看这个环境，房顶很高，比一般房子高得多，是不是害怕犯人会爬上去？房子很旧，我琢磨是不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房子里关了连我十个人，基本上人挨着人，睡的是一排地铺，下面可能铺的麦草，上面是芦苇席，各人把自己的被褥铺在上面。铺的对面有一米多宽的一条走道，通到墙角的马桶，大家就在这里小便，大便放风时候解决，但是有特殊情况，等不到放风时候，那也就只有在马桶上大便了。

一会儿，铁门上的小门开了，他们都知道规矩，都拿着饭碗打饭。我没有碗，号子头不错，他给人家说，我们这里昨晚又来了一个人，还没有碗筷。发饭的去给我拿来碗筷，我也打了饭，其实就是一大碗包谷糁子，还切进去一些萝卜，放了一些辣椒，辣椒是整个的，连辣椒把儿也没有摘。碗是过去吃羊肉泡的那种大粗瓷碗。我默默地吃着，很快就要吃完了，那些辣

椒，我琢磨着怎么利用，还是吃下去吧，想着我要长期坚持，任何一点养分都不能浪费，于是，连辣椒把儿也用力嚼碎，全部咽了下去，又把碗边的饭尽量刮干净。

号子头给我宣布了这里的规矩，不过语气还是和蔼的——新来的人靠近马桶睡，和前边来的那个人一起抬着马桶，倒马桶，洗马桶，等到再来新人，往前升级。如果一个星期还没有新人来，那就按照次序轮换。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像有的号子，一直让一两个人睡马桶边，倒马桶，并说一会儿放风，你就和某某一起倒马桶。

我说，好的。

果然，一会儿响起了开牢房门的叮叮咣咣的声音，各号子陆续放风。等我们的房门一开，我和另一个“号子”（这里对犯人的称呼）抬着马桶去洗。

我看到所长在不远处看着，他把我们的号子头叫过去，说，你们不能让人家（指我）老倒马桶。因为院子小，所以他们的谈话我能听到。

号子头辩解说，我们没有让一个人老抬马桶，我们是轮流的，最长只有一个星期。所长又对他强调了不能让一个人老倒马桶。

放风结束时，我走过所长面前时，他叫住我，问我们号子倒马桶的事，我如实说了我们是轮流的。他说，不是老让你倒马桶吧？我说，没有，我们号子还是公平的。他再没有说什么。

我深深地体会到所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他无力改变大局，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范围内表现他的一片好心。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人间地狱中，他的善意和关照温暖着我正在逐渐冰冷的心。后来我出狱后，很想去看看他，谢谢他，但是我的身份一直是黑的，又害怕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一直没有去见他，但是我内心的感谢一直永存。

上午，大家没有什么事，他们聊天我也插不上嘴，就想想自己的事。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想。我本来就不应该被抓到这里，我到这里，纯粹是政治需要。我的自我辩护词也可以脱口而出，不需要准备，只是也没有机会，或者说给不给我机会辩护的问题。

又开中午饭了，饭与早饭一样，我也像早上一样吃得干干净净。

下午还是没事，大家又是靠墙坐着，因为有墙做标尺，整整齐齐。我注意到他们好像一直看着我，想要和我说话。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憋不住了，就是昨天晚上和我一个被窝的那位，问我，新来的，报报大名吧，为什么进来的。

我犹豫着，没有说话。他又催促说，说说你的情况吧，人到这里了，大家也可以相互关照。

我说，昨天所长规定，不许互通姓名，不许交流案情。所以不说了。

那人说，管他呢，我们都是互通姓名，交流案情的。到了这里，要敢做敢当嘛，连这都不敢，胆子那么小？

号子头也说那个规定，大家都没有遵守，而且他们又各自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案情。

我想了一下，觉得如果僵持，反倒不好，以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长，必须把小环境搞好，就说：我叫李世英，因为文化革命的事进来的。

他们听了，愣了一会，问，李世英，是交大的李世英？

我说，是的，就是我。

他们更加惊讶，说，你怎么也进来了？

我苦笑着说，人家让我来，我也不能不来。

他们感叹了一番，说，真没想到，怎么把你也抓了。放心吧，到这里了，都是难友，相互关照，没人会欺负你。

我说，谢谢各位的好心。我不懂规矩，有什么不对请你们原谅。

他们都说，好说好说。

昨夜和我同被窝的那位又说，怪不得，我想着别人刚进来时，吃不下，睡不着，你昨晚睡得比我都死；别的人刚进来吃不下饭，我们还可以分一点饭吃吃，谁知道你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听到这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对不起。我刚进来，肚子里还有油水，我以后少吃点，给大家做点贡献吧。

大家都说不必要，我们还都可以。

我说，我是因为政治原因进来的，不知道时间会有多长，我想可能需要十年吧，所以，也许你们很多人出去了，我还在这里蹲着，所以我就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否则就顶不住。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昨晚和我一个被窝的那位是个复转军人，说了他的案情。他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咸阳国棉一厂的，后来她不愿意跟我了，我实在太生气了，就把她约到渭河滩和她谈，她还是不同意，我就把她打倒在地，从地上拔了一个木橛子，在她脖子上猛捅，脖子都快捅断了。

他说的很平静，我听得汗毛都竖了起来，这么个一野蛮，冷血，残忍，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我昨晚居然和他一个被窝里睡了一夜！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幸亏我还没来得及有什么事情上得罪他，我睡觉睡得死，整死我比整死那个女的还要容易得多！眼前浮现起那个女青年的冤魂和血淋淋的披头散发的形象，我心里非常痛恨这个家伙，可那家伙说起他的杀人经过却是那样轻松，我只想马上站起来，抽他两个耳光！但是，还是忍住了——这里不是我行侠仗义是地方，我自己的小命还拿在别人手里呢。

入狱第二天，我爱人终于通过我的专案组把我的被褥等生活用具送到监狱里了（她本人不能来），我可以不睡那个家伙的被窝——虽然按照监房规

矩我的铺位紧靠马桶。

在我自我介绍以后，过了约有一个小时，一个人悄悄偎过来，坐到我身边，先介绍了自己是某单位的头，也是因为文化革命进来的，说，你不认识我，但我们对你很了解，我点点头。他又轻轻地给我说，你干嘛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来？这里边情况也很复杂，我就没有报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和罪名。我听了感到挺有趣，问他是报的什么罪名？他说是“绺窃”。我听了几乎笑出来，怎么会给自己安个这样猥琐的罪名！

我解释说我喜欢直来直去，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害怕啥？

事实上，监狱里面虽然是大多数是有罪之人，但不一定没有一点正义感和同情心。我在直率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反倒得到他们的尊重和关照。时间长了以后会怎样，不知道，因为我只在咸阳监所呆了五天。

下午，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了，管理员叫那个杀人犯去提审。他回来时很兴奋，带回来一支香烟和几个烟屁股，号子里的人轮流抽了，解解馋。号子头问他提审的情况怎样，他说预审员跟他说，你的问题并不大，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清楚，罪就可以减轻了。预审员还请他抽烟。看他那样子，好像他的故意杀人罪还没有我的那个文革朋友的“绺窃”罪大。

人们相互交换了目光，好像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他又被叫出去提审时，大家就热烈议论起来，都说他是个没脑子的家伙，预审员说是他问题不严重，他自己也觉得他问题不严重了。人命关天，把人都杀了，案情还能轻到哪儿？

当他回来时，还是那么轻松自如的样子，把预审员如何对他好描述一番，好像只等着放他出狱了。大家没有什么事，也就半真半假地预祝他早日自由。我知道，这些人说的都不是真心话。我认为他必死无疑，否则天理不容，而且那时这一类故意杀人案，肯定要杀人偿命。不过，他愿意自我麻

醉，心情好一些也行，由他去吧。

可能是入狱第三天上午，我无意中摸到我棉衣的内里小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片刮胡子刀片，可能是我下乡蹲点时装在口袋里备用的，忘记了，还是新的。监所所长搜身时竟然没有发现！这在监狱中可是重大的事情——这锋利的刮胡子刀片，既可以伤人杀人，也可以用来自杀！

发现这个刀片以后，我向号子头报告。他是很有经验的，说，这可是很重要的事，要立即报告管理员，赶快上缴，不要出事。

全号子的人都在议论这个事。到我们要敲门呼唤狱警时，有人提出，晚一点上缴吧，让我们先刮刮胡子再上缴。我说，没有刀架，怎么刮呀？他们说可以。我问了号子头行不行，号子头说，可以。我就把刀片给他们，他们硬是用手捏着刀片，一个一个地刮了胡子。

然后我们高喊“报告！”，呼唤狱警，狱警过来，号子头给他说了情况，并把刀片交给他，让他转给管理员。

没过一会，牢门打开了，管理员让我出去，我跟着他走到所长办公室，所长正在那里等着。我一进去，他就急切地问，那个刀片是你上交的？

我说，是的，在棉衣内袋里发现的，可能是原来下乡时候装进去的，都把它忘了。

还有没有？——所长又问。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感到他紧张的心情。

我说，没有了。

检查检查，看看还有什么不应该带进去的东西。——所长又说。我说，没有了，我仔细检查过了。

所长可能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了，就对我说，如果再发现什么就及时报告。我说“行”。

他又问，他们没有欺负你。我说，没有，我们这个号子头人不错。

他点点头，就带着我回到牢房。

接下来的两天没有什么事，也没有提审过我。放风的时候，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倒马桶，洗马桶。

这里的伙食不敢恭维，可以说是很差，要么是包谷榛子和萝卜白菜一起煮，里面还有带把的辣椒；要么发两个馒头，给一碗菜，也是白水煮萝卜白菜，还有带把的辣椒，对着亮光看，碗里也看不到油花。不过，我还是一点不剩，吃得干干净净，包括辣椒把。我只是尽可能吸取营养，不管它味道如何，好吃不好吃。

“号子”们说，监狱里，会做猪食就会当厨师，此言真的不虚。不管怎样，我还是我的老主意，“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适者生存”，我必须成为一个“适者”，我必须生存下去。

押往西安拷问魂魄　打定主意慷慨就义
直到看到高墙电网　才知转场虚惊一场

我被关进咸阳监所五天后的早上，吃完早饭，所长提着手铐，打开牢房，叫我出来，并且让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拿上。牢房里的难友都很惊讶，说不出原因，虽然他们自以为“很有经验”了，如果是提审，不会让拿东西。他们帮我收拾东西。我给他们说，祝你们早一点走出这个地方。道了再见，就提着东西出了牢房门，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吉普车，两个持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旁边。所长让我到车跟前，把东西放在车上，然后给我戴上手铐，让我也上车，坐在后排中间，两个武警战士上车后把我夹在中间。还有一个管理人员坐在司机旁边。

所长什么都没有说，目送我们开车离开。短短几天，我觉得所长是个很好的人，已经尽力照顾我了，本来想给所长说点什么，可是没有机会，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所以，也就什么都没说。其实没有说什么反倒更好，至少对所长而言，让他更安全一些。

这次是白天（我被抓进来是夜里），车开到街上，我认出来了，原来这个监所就在咸阳市内的老街上。我在咸阳呆了几年，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监狱！

我坐在车上，还在想着我们到哪去，干什么。

经过人民路，西兰路，过了咸阳桥，又向东，那是去西安的方向。然后过沣东，沣西，三桥，这是去西安的路。去西安干什么呢，是不是上大会？如果上大会，西安当时有两个体育场，西安市体育场和西北体育场，应该是其中一个。可是上大会不需要带着行李来，为什么带行李？这也不好解释。车开到西安玉祥门，没有向市内开，而是向北拐了，—这不是去那两个体育场的路！

虽然我在车上端坐着，脸上没有任何紧张的表情，但是我的脑子里却是翻江倒海，迅速地思考着各种状况及如何应对。

在我被抓以后，我也就对形势的严峻有了新的认识，已经丢掉了一切幻想和希望。四人帮那样的大人物都可以抓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生命还不是像蚂蚁一样，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所以我就想，坐牢或许十年以上，如果能准许坐那么长时间监牢或许还是好事，也许形势需要，随时可能掉脑袋，反正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由着人家切。

车子的方向是向北！一直向前就是红庙坡！这个地方出名就是因为在刚解放时，是镇压反革命行刑的地方，就是枪毙人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想着，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了吧？我生命的终点到了，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死，没有什么可怕，我会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死也要死得像个人样，那

些我敬佩的烈士们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求面对侩子手的枪口，我还要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真理必胜！正义必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把一切都想好了，只等着最后的一声枪响。我表面上非常平静，那两个押解我的小战士可能既不能觉察，又不会想到我在想什么。

这时，汽车忽然向东拐了——不是去红庙坡？向东是市区的外围，人口比较稠密，不可能在这里杀人吧？突然，我看到高高的红砖墙，上边还有电网，岗楼，好像是个监狱，是的，再转过一个弯，就是大门。汽车开到大门边，与我们一起来的干事去办理相关手续。

这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到肚子里，原来是变换一下关押的地方！我这条小命暂时还是由我保存着，那当然好了，心里绷紧的那根弦一下子松了。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我的思想经历确实是真实的，我的生死考验确实是真实的。如果我准备的那种情况出现，我会毫无畏惧，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无愧于后人。

在别人毫无觉察，无声无息之中，我已经“英勇牺牲”了一次。

30 万人大会正式逮捕　心中无愧挺胸昂首
上会挨批还有“报酬”　辛苦所得宝贝馒头

在我转入西安监狱以后，刚开头管理很严，我们这些被抓的人都是单独关押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不久我们就被押上 30 万人大会，被宣布为“打砸抢首恶分子”，被正式逮捕。关押办案的方向当然要按照这个定性来做。具体的手段五花八门，诱供，逼供，干哄冒诈等等。

这座监狱总的布局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是监狱管理人员的工作区和住宿区，后院是监所区。后院又分为东院和西院，西院可能是原来的老房子，基本上是可以活动的犯人们的生活区，有澡堂，公厕，还有一块菜地，由劳动号子种菜，改善伙食。东院有五六排房子，每一排房子有十来间监室，各排房子都隔离开，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院。这里的监室相对现代一些，水泥地板，地面上放着木头床板。还有水龙头，兼做小便池。比我在咸阳呆过的那个监所的条件好多了。

在咸阳监所，我住的是十来个人挤在一起的号子，晚上睡觉都要错开，觉得太拥挤了。到这里，住单间，开头觉得不错，后来又觉得只有一个人也寂寞无聊。总之，在失去自由的监狱中，给你再好的条件，你也不会产生幸福感。好在我喜欢看书，只要有东西看，我就能排解孤独和烦闷的情绪。

那时，我被关押在第一排，就是第一个院子，而且还是第一间监房。

这时候，不给我们放风，只是给我们送吃喝。送饭的也是服刑的犯人，被称作“劳动号子”，这些都是罪行较轻的人，或者是快要释放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美差，工作比较轻，吃的也好一些。他们对我们不错，因为他们也是陕西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文化革命的事，所以对我们的名字也是有印象的吧。他们在给我们送饭时，也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我们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常委、副主任一锅端到这个监狱来了，而且，到后来，我也知道姚连蔚（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劳动号子”还告诉我关押我们的这个监狱，以前关押的最后一批犯人是国民党的县团以上的人员。前不久，他们被特赦全部释放，监狱就空下来了。说起来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监狱里再也没有一个国民党人了，这是显示共产党的政策宽大为怀。可是，这座监狱并没有空下来，而且，无法想象的是，接替他们的竟然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党赤胆忠心，把共产主义

事业当做生命的，随时准备为此赴汤蹈火，奉献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这又说明什么呢？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唏嘘慨叹不已。

别的人被抓的消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姚连蔚也被抓起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这个级别的人被抓说明了这次大逮捕的深度和广度，使人更加了解了这次运动的目的和意图。姚连蔚虽然后来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毕竟有造反派的案底，尽管不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也要彻底清除，可以想到，这次运动是要斩草除根，鸡犬不留。

大便问题的解决是每天由干事带着去一次公厕，一个一个的，互相不能碰面。

过了几天，省上要召开 30 万人抓捕大会（事先我们当然不知道），干事（监狱中对管理人员的称呼）一大清早来通知我今天有事情，让我做好准备，表现好一些。

一会儿，劳动号子来送饭，我以为像平常一样。但是他拿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告诉我，你今天要上大会，你可以多要一些吃的，要吃饱，还可以剩下一些以后吃，或者给别人。我说，还有这样的好事？那我就放开肚子好好吃一顿。我是相信健康首先是吃出来的，而且我是做好了“十年抗战”长期坐牢的打算的，所以，不能放弃任何补充营养的机会。吃了两大碗菜——还有一点肉呢，吃了六七个馒头。然后我给劳动号子说，还能不能要？再拿十个馒头。他说我去给你拿。果然又拿来十个馒头。我很高兴，这下我可以匀着吃几天了。我无法支援别的狱友，就给劳动号子说你们拿一些去吧。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够吃，你自己留着吧。

后来，我就被戴上手铐，由干事和武警战士们押着，用车送到西安最大的体育场——西北体育场。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可以说是庞大的难友队伍，是 14 个人吧——4 个省革委会的副主任，3 个省革委会常委，还有西安

市革委会常委、委员。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大家相互点点头，算是打打招呼，因为已经告诉我们不许相互交谈，还要守规矩嘛。

我们这些犯人在武警的指挥下进入体育场的中心地方，排成三排还是四排，相互拉开一定距离。职务在这里又起了一次作用——副主任一级的排在第一排，面向公众，背对主席台。播音员领着大家呼口号，呼的什么口号我也没有在意，费那心思干嘛？不过，我注意到跟着播音员喊口号声音并不大，对我没有什么震撼力，可能很多人并不愿意跟着喊口号吧。我想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站在这里的这些人，不管有多少错误或者罪过，不久前都是这些群众曾经鼎力支持过的，马上要把他们看成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开这样的公捕大会抓进大牢，这么大的思想弯子，转起来恐怕没有这么快。而且，刀虽然是架在被捕的人们头上，实际上也是对在场的群众的精神威胁，能够真正感到大快人心的人恐怕未必很多。

主席台上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就开始宣布一个个犯人的罪行，我们统一的总罪名是“打砸抢首恶分子”，各自有各自的具体“犯罪事实”，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向前五步走。我排在两个工人副主任之后，第三名。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挺起胸膛，目光平视，走了五个正步，会场里发出一阵低声的骚动。

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是挺胸抬头地站着。为什么？首先是我认为把文化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抓起来的做法是无耻的报复和诬陷，是全面否定文化革命，我不服气。当然，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有许多错误，包括文化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但是，我认为罪不至此，简直是窦娥冤的现代版。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群众，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所以没有理由低头。加上早饭吃得饱饱的，能量也很充足。

这个情况估计引起了主席台上的人的注意，因为把我们押上会场的小武警，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对我说，你把头低一些，有反映。我说，我



不能低头，否则我会昏倒，那就效果不好了。小武警也没有办法，退回去了。过了一会，他又过来，说，你把头低一些吧，我仍然说，我不能低头，否则我会昏倒。他有些为难，就说，那你就根据情况稍微低一点吧。我也无意使他为难，为了这个小武警，还是稍微把头低了一点，也只是一点点。

抓捕大会开完了，用一些大卡车分别把我们拉出会场，我和另一个省革委会的常委、西安红色造反司令部司令李洪明分到一辆卡车上，我们两个站在卡车车厢前边——这是那个时代游街示众的模式，但是，没有给我们挂牌子，只是戴着手铐。

卡车开到会场出口处，人们涌到出口处来看。我还是那样挺胸抬头，面带微笑。我还听到有人在说“人家一点不害怕”，“他还笑呢”。

卡车开到大街上以后，我同车的那位省革委会常委问跟车的干事：“咱们还往哪里去？走什么路线？”

干事回答“直接回监所。”

那位常委又问“直接回去？也不游游街？”好像还没有过瘾，希望游游街一样。他的话把我逗笑了。我们相互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笑。

回到监所，又是安静的终日幽禁的生活。

我找到了《陕西日报》1978年12月16日头版对这次公捕大



陕西日报

SHANXI RIBAO

1978年12月16日 星期六
农历戊午年十一月十七 第8393号

依法逮捕张培信马希圣等打砸抢首恶分子

陕西省革委会和西安市革委会召开批斗大会

李尔重、姜一、王林等同志参加大会，傅子和同志讲了话

本报讯 为了严肃社会主义法纪、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加速四个现代化扫除障碍，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于十二月十五日上午，联合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批斗打砸抢首恶分子大会，依法逮捕了打砸抢首恶分子张培信、马希圣、李世英、孙福林、李盛茂、李洪明、安文保、吴文杰、全聚凡、苗敬志、章谦、翁潭、李守先、韩平邑等十四名罪犯。

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省体育场，三十万群众参加了大会。上午九时，大会开始。当公安战士把打砸抢首恶分子张培信、马希圣等押进会场时，广大群众同仇敌忾，振臂高呼：“严厉打击打砸抢首恶分子！”“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为受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 彻底推倒「秦川机床厂清队经验」

中共宝鸡市委召开大会

省委书记李尔重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1978年12月16日陕西日报头版

会对报道，放在这里做个官方的注解吧。

报道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于12月15日上午，联合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批斗打砸抢首恶分子大会，依法逮捕了打砸抢首恶分子张培信、马希圣、李世英、孙福林、李盛茂、李洪明、安文保、吴文杰、权聚凡、苗敬志、章谦、翁谭、李守先、韩平邑等14名罪犯。

陕西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西安市委、市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李尔重、姜一、王林、傅子和、刘民立、郭允中、张毅忱、林茵如、张涛、王真、邵武轩、王明春、尚寅宾、卜克义、蒋锡白、冯元硕、亢思逊、阎明、刘蓟、肖华，以及省市政协和省市各部门、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西安市革委会副主任魏明中主持，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傅子和讲了话。

……

打砸抢首恶分子李世英，原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咸阳地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李犯大搞打砸抢，极力贩卖江青“文攻武卫”的反革命口号，积极策划、组织武斗，提出了“巩固东郊，保卫市区、北郊，守住交大，东退渭南或南山”的武斗策略，亲自去丰峪口查看地形，到东方机械厂检查武斗准备情况，从部队拿回步话机和望远镜，多次在交大召开会议，研究武斗问题。1967年“九·二”武斗中，李犯亲自研究了“声东击西”的武斗方案，决定了前线指挥，同意派刘安全带领人员去西郊参加武斗，他亲自带人接应。他策划搞尸体展览，激发武斗情绪，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1967年元月，李犯策划并组织抢某地战备档案两千多份，至今尚有绝密材料下落不明。批林批孔中，他另搞一套，大批《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向省委发难。他极力贩卖王洪文放虎归山的黑讲话。1967年7月，公开向省委提出“要当咸阳地区一把手”，妄图篡党夺权。

押回咸阳再“捕”一次　挺胸昂首形象依旧
宣布年龄满场惊讶　谢意永铭善良咸阳

此后的第三天吧，我的“生意”又来了。在被捕前除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外，兼任咸阳地区党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在省上召开了公捕大会以后，咸阳地区当然要如法炮制，召开公捕大会，把地区的群众组织头头抓起来。我虽然已经在西安被公捕，但是还要赶场去咸阳的公捕大会“陪绑一下”，并且肃清一下我的“影响”和“流毒”。

当天一早，干事通知我今天有事。我就知道要干什么了。也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党叫干啥就干啥嘛。

到劳动号子送饭时候，我又趁机“索取”了一批馒头，两大碗菜，美美地饱餐一顿，备足后面几天的干粮，然后就戴上手铐，坐上吉普车，在武警的押送下，奔咸阳而去。

西安到咸阳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遍，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是如此这般刑具在身，被武警押送到咸阳。我在此工作了 4 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此番去“过堂”，内心的感慨，无语言表，有一点林冲刺配的感觉，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路上车开得比较快，到了咸阳，拐到体育场，这是我熟悉的地方。那里公捕大会会场已经一切就绪，人坐满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也都就坐了。等我一到，大会主持人就宣布公捕大会开始，我和咸阳地区的那些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被押上会场。

在西安的公捕大会上，我只能屈居老三——前边两个是作为工人代表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要排在我这个学生代表前边，而在咸阳我就是第一“花魁”了。被抓的那些人多数我认识，相处几

年，一起工作，谁能预想到我们又同时在这样的场合“亮相”。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人对于人生命运的无常变幻概括得精辟至极！

对视时我给他们轻轻点点头，笑了笑，他们也同样还我。我看他们表现得还比较镇定，没有什么惊骇恐惧的样子。

虽然我在西安已经被逮捕过了，不过，在咸阳我还没有被捕，所以要再逮捕一次。接着就是宣布一个个人的罪状，当然首先宣布我的，内容与西安大会上的一模一样，我似听非听，无须用心。可是，在宣布我的罪状时，与会群众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在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宣布到我的出生年月 1945 年 5 月，现年 33 岁（当时是 1978 年 12 月 16 日吧）时，全场轰然发出一声“呀——”的声音，这一声长长的叹息，不是轻蔑，不是仇恨，很显然是震惊，同情和惋惜，当然也是与会者们的无奈。如果说世事变迁，流水落花，沧海桑田，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脑海里淡去，而这一声“呀——”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铭记不忘。朴实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咸阳人，竟然在这样的公捕大会上，抑制不住而发出这样的声音，足以显示咸阳人令人肃然起敬的整体人品风貌。咸阳，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首都，也是中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后的第一个首都，2500 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秦始皇那种胸怀、霸气和大气，应该还保留一些吧。

其实，我在咸阳的几年，还是兢兢业业地干具体的实事的，也没有搞过什么派性，与当地的两派群众代表关系都相处得可以，也没有像宣布的“拉帮结派”。因为我做人的原则是：好好做事，正直做人，别人自然会尊重你，无须去搞那些歪门邪道，自轻自贱。至于文化革命中的那些错误，那都是在西安时的事情，与在咸阳无干。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曾经想过，将来出狱以后，好好地做

事，报答淳朴善良的咸阳人民。可是，我出狱以后一直被打入另册，直到退休，也没有什么转机，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为咸阳人做什么事，没有机会偿还他们这一声震撼心灵的那一声“呀——”。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甚是遗憾。

大会进行中，我站在“犯人”们的前排，依然是在西安西北体育场大会上的形象，挺胸抬头，双目平视，面带微笑，心情也静如止水。又像西安一样，引起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们的注意，于是，又是武警小战士走过来，轻轻地说，你把头低一点，影响不好。我还是说，不行，我低下头就头昏，昏倒就更不好了。他说，你稍微低一点就行。他过来说了两次，不为别人，为了这个为难而又态度诚恳的小战士，我还是把头调整了五度。

大会开完了，我又像来时那样被押送回西安。大约害怕出现意外，没有在咸阳停留。

我在咸阳的家近在咫尺，离会场只有 100 米，我思念的妻子，儿子，还有帮我带孩子的老岳父（我的女儿当时在上海，由我岳母帮着带），几乎就在我的身边，他们肯定也在强烈地思念着我。但是，我们不能相见。当你有自由时，你不会感觉到自由的宝贵和不可或缺，如同决定你的生命的空气和水，在平时你不会感到它们的宝贵，而在浩瀚的沙漠中，你才能真真实实地感觉到水就是生命，每一滴都比金银宝贵；同样，在缺氧窒息的环境中，在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你对每一口呼吸都会充满着渴望，你才能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空气与你的生命密不可分，空气就是生命。当你随时可以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是多么宝贵的享受，是多么重要的权利；而在你像我一样处在亲人们就在身边而不能看上一眼的时候；当你像我一样正在亲身体验什么是“咫尺天涯”时，你才能体会到自由，哪怕是一点点自由，是多么的宝贵，才能真正体会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

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是多么发人深省，宣示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道主义精神。随着坐牢时间的延续，我对自由的渴望也与日俱增，也越来越认识到，没有自由的人生不是人生，只是非人的生命存在，是行尸走肉，或者是僵尸。

热闹的事情结束了，又回到静寂的监室生活。

不久就开始“提审”，就是把我们由后院的监所区带到前院的管理人员工作区，通常是在一般的办公室提审。开头一段时间提审的频率和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理解是，他们必须把在公捕大会上宣布的我们的那些“罪行”落到实处，并且得到我们的认可和亲笔签字画押，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罪行”铁板钉钉，所谓“铁案如山”吧。

可是，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公捕大会上宣布的那些“罪行”，很多是虚妄不实之词，我们都不会轻易承认画押；再有对一些事件的定性是无限上纲，陷人于罪。

具体的经过没有什么意思，无非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办案的干事希望给我们多多落实一些“罪恶”，我们是要说明事实，驳斥那些指控捏造虚妄。

不提审的时候，就是自己看书学习。在外面时，有书没有时间看，现在倒是有时间了，那就补补课。有时干事布置写一写某个问题的材料，那就划拉上一两张纸交差。

过了一段时间，案情大约处于僵持状态，或许上方也有什么新的动静，对我们管理的不像前一段那么严厉了。而且让人高兴的是，还给我们放风了，就是定时给我们把牢门打开，让我们可以在小院里晒晒太阳。这对身体有好处，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了。

我是 1978 年 12 月 8 日被捕，1981 年 6 月被释放，坐牢两年半。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所做的决定是“免于起诉”。

六
狱中邻居委员长　解愁泄愤吼秦腔

刚到西安八处，我们这些被抓的人是分开关押的。开完公捕大会，那些搞预审的干事们就忙着如何给我们安置罪名。

送饭的时候，劳动号子告诉我姚连蔚被抓的消息；我问他们姚连蔚关在哪里，他说就关在我的那一排监房。我虽然知道姚连蔚就关押在我那一排监房，不是隔壁，就是错开一两个监房。但是我们见不到面，因为我们都不能出房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然是不许往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集中到一起，不再单独关押，而是集体学习，总结教训。后来干事竟然说我们不是被逮捕，而是"办学习班"！这引起大家的反弹，说，哪有在监狱里面办学习班的，外边就找不到一个地方？有的说，明明 30 万人大会上宣布的逮捕，现在又说不是逮捕，那还得再开 30 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下。干事们也不辩解，他们当然知道不能自圆其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再说什么。这时，姚连蔚依然单独关押，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再后来，大约 1981 年初，又把我们这些人分开，单独关押——看样子政策又紧了，非要给我们弄个什么帽子戴上，安个什么罪名判刑不可。干事们又忙活起来，频繁提审，而且态度强硬，声色俱厉。我当然也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所以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决不承认，所以每次提审都是一番争吵。

这次我仍然是关押在第一排，刚来时的老地方。劳动号子送饭时给我说，姚连蔚就关押在我的这一排，他还是老地方，没有动。

原来我对姚连蔚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省革委会讨论推荐他到中央的时候，我们这一派的人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是西派（即统指派）的基层组织的

头，我们认为这是省委加强西派力量，削弱我们一派力量的做法。

如果从基本资料来看，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他是陕西长安县人，1934 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上学上到初中，就开始务农，其间还做过几天的小贩。1951 年，他 17 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 年退伍，分到西安昆仑机械厂（军工厂）当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组长、政治指导员。1960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称号。那时候，工农兵的经历都是政治上可以得到高分的，他三者齐备，当然是很好的。

1967 年七八月份，西安的武斗逐渐升级，发生在西安东郊的两大派在胡家庙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其中较大的一次，据说姚连蔚参与指挥。虽然我们都背着武斗的嫌疑，但是没有人认为指挥武斗是个光荣的事情。

我们也提出姚连蔚参与大规模武斗的问题。省上的负责人曾经解释说，他只是基层的小头头，武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还有印象，关于他的介绍材料中介绍他在瓜菜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曾经写过打油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问题我也提了出来。我提出这个问题，倒不完全是为了我们一派的利益，而是这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对立。我恰恰是在那个困难时期开始了思想的突变，在那以前，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觉悟，也没有什么追求，但在苏联变修，给苏联还债的形势下，激发了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认为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无论如何，一定要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所以，我虽然那时候整天饥肠辘辘，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所以，我也就维护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赞同对它们的任何不满和攻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这些想法完全是自觉的，不是受什么压力而被迫的。我那时也不是共青团员，现在想来，我的觉悟应该够得上党员、团员，可惜

他们没有发现我。

但是，这一点疑问也被省上的负责人否定了，好像说是这是他一般性的认识问题，一时的糊涂，想不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终，我们的意见被否定，姚连蔚仍然被推荐为中共九大代表，不过我心中始终存在这么一个芥蒂。

1969 年 4 月 1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被推选为九大代表的姚连蔚，来到了北京，参加大会。后来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恐怕省上的负责人们也没有料到，在中共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陕后，当然还要为他落实基层的职务，这对群众代表当选中央委员的人来说，在当时是一个通例。于是，他成为省工代会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73 年 8 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

说实在话，他的“进步”之快，的确让人瞠目。如果别人认为我们也是火箭干部，但是我们的“进步”是拿命换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是经历了多次生命危机的。说个笑话，我们要算也只是“短程火箭”，他那可是“远程火箭”啊！

后来有一种解释，说是，当时，中共九大主席团圈定人选，发现陕西组的代表中，胡炜（第二十一军军长，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是河南人；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陕西“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湖北人；著名的赵梦桃小组的继承人，全国劳动模范吴桂贤也是河南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是陕北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只有姚连蔚是正儿八经的陕西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后，进中央委员会也就一路绿灯了。历史的一幕就是这样演出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考虑，为了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其实也无须知道那么多，相信和拥护中央的安排和决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北京召开。姚连蔚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最后，会议选举当时 89 岁的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

姚连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下子成了国家领导人，这更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此后，我与姚连蔚的接触不太多，见过几次，也都是礼貌性的招呼，没有深入的交谈过。不是还有什么芥蒂，而是地位相差太远，不便深谈。

然而，命运是那么捉弄人，我能有机会与他有进一步接触和相互理解，却是在这里——监狱中。这是后话。

开头，我与姚连蔚的放风时间是错开的，所以我们相互见不到面。放风前，已经给我们规定，不能到别的监室门口，当然不能犯规了。别说放风，就是打饭时我们也见不上——打好饭，我就得到监房里，干事把门锁好，然后再给下一个人打饭。

后来，政策又宽大了一些，也不一定是政策宽大了，也许因为提审阶段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的上级——那时好像有政法委了，省委主管书记就是原来派驻交大的工作团长——我在 1966 年 6 月 6 日上午在交大 402 大教室与他“拼过刺刀”的严克伦。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可以一起放风了。于是，我和姚连蔚就可以一起交谈了。

这一排监房并没有关满犯人，东头的监房有时也关一两个犯人，那都是

不能放风的。所以，放风时间，整个院子里实际就我和姚连蔚两个人。

虽然原来我们两个接触不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见面，我们仍然觉得非常高兴。长期不能见到熟人，突然能够见到一个熟人，那种感觉，无异于在大漠中发现一个甘泉。

我与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没有交集，所以干事们也不必担心我们串通案情，订立攻守同盟什么的。

他看起来很沉静自若，淡然从容，似乎坐牢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精神压力。按照我的标准，他表现不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未来还有什么憧憬，反正自从我被逮捕以后，我已经不对官方抱有任何幻想了。

不管怎样，我们聊起来谈笑风生，非常投缘，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他是作为工人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的，学历不高，原来以为他文化水平不高，实际经过接触交谈，我的印象改变了。不能只以数理化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要特别注重文艺修养、社会历练、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等等多个方面的能力才比较全面。他在后面的这些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能认为凡是工人代表就一定是“大老粗”，这是我和姚连蔚进一步接触以后很快就建立起来的新印象。

他是很爱学习的人，能背很多古诗，有些我也没有看过。比如，忘了什么人写的，后边两句是“日上三竿僧酣睡，看来当官不如闲”等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首诗，自然另有感悟。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所以我们东拉西扯，话题甚多。我们两个的知识还有互补性——我国外的文学作品读的多，特别是原苏联的；他中国古典读的多，包括野史。

我还发现，他是一个秦腔戏迷，甚至可以达到票友的水平，很多戏的全本唱词他都能背下来，使我佩服不已。于是，他成了我的秦腔老师。

我其实也是喜欢戏剧的，不过这种爱好被完全压缩了，只是在一定的条

件下会迸发一下。

第一次迸发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班上有一个豫剧戏迷，我们两个关系很好，一来二去，我也受了“传染”，而且发展速度很快，达到戏迷一级。我们两个约好晚上去看了几次豫剧。当时西安的豫剧团有两家，一家叫“狮吼”，一家叫“民众”吧。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成为戏院的常客。哪怕像我们买的是两毛钱的站票，也是太奢侈了。但是，那时候就是那么着迷，还曾经有两次，我们两个逃学去看戏。我还买了豫剧唱本的小册子，按照简谱学着唱。其实，倒没有想当演员的念头，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第二次就是文化革命中唱样板戏，这下改成京戏了。一方面有政治形势的原因，另外，我觉得唱词唱腔也都很优美，所以也很喜欢。有的样板戏中的不少唱段我都能完整地唱下来，尤其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记得有一次我与省京剧团一起去宝鸡拥军，我也即兴唱了一段少剑波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上厕所时，碰到同行的尚长荣——他现在京剧界的大腕了，他还称赞我唱得不错。

这次应该最有纪念意义的了——在高高的拉着电网的围墙之内，在武警战士的巡视监察之下，学唱秦腔。

事情是从我说到一个唱《周仁回府》挺有名的秦腔演员，下放到我们咸阳地区，我下县的时候还专门去看过他。但《周仁回府》的戏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真是问到兴奋点上了，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全部剧情，说原来全本戏名字是《忠义侠》，《周仁回府》是其中比较精彩的一场戏，后来全本戏也叫《周仁回府》了。然后哼唱里面的一些唱段——可以说，我不怀疑他能够把全本都唱下来，而且抑扬顿挫掌握得也很好。后来，谈到《火焰驹》、《三

滴血》，都是一样，他都能不打绊子地唱下来。

对于秦腔，外地人一般都不喜欢，主要是黑头，花脸一类角色扯着嗓子喊的缘故，所以，有的陕西人也把秦腔称作“挣破颡（sao）（头）”。其实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秦腔的女声非常婉转优美，男声也激越慷慨，雄浑苍劲。我对秦腔没有成见，还是喜欢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欣赏。

我听了他唱以后，挑了两段跟着他学，一段是《三滴血》中《路遇》贾莲香的唱段：

未开言来珠泪落，

叫声相公小哥哥。

周天佑：（夹白）你不要把我叫哥哥咧，我把你叫姐姐得成？

贾莲香：（唱）

空山寂静少人过，

虎豹豺狼常出没。

除过你来就是我，

二老爹娘无下落。

你不救我谁救我？

你若走脱我奈何？

常言说救人出水火，

（留板）胜似焚香念弥陀。

另一段是《周仁回府》第八场夜祭周仁的唱段：

周仁：

见嫂嫂直哭得悲哀伤痛

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

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

偏偏的奉承东卖主求荣

咕哝哝在严府贼把计定

眼睁睁我入了贼的牢笼

闷悠悠回家说明了情景

气昂昂贤德妻巧计顿生

急忙忙改行妆要把贼哄

哗啦啦鼓乐响贼把亲迎

恨绵绵暗藏着短刀一柄

弱怯怯无气力大功难成

痛煞煞莫奈何自已刎颈

血淋淋倒在地严贼胆惊

哭贤妻哭的我悲哀伤痛

盼哥哥大功成衣锦回京

姚连蔚小声教我，他不大声唱，不张扬。

我就不同，我学了以后，只管大声唱。贾莲香的唱段，比较委婉抒情，唱一唱可以调节一下人的心情；而周仁的唱段，唱了觉得特别解气，更是激情迸发，扯着嗓子大声唱。当然，作为被管制人员，我当然要考虑干事如果追问“严年”、“奉承东”是不是有所指，我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词，所以我才敢大声唱。这看来有些过虑了，人家压根就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排监室紧挨着管理人员的办公区，我唱戏的声音办公区的人肯定能够听到。我以为会引起干预，但是，干事并没有干涉我唱戏。在高墙上来回巡视的武警战士，开头是警惕地跑到我的监房前面看了看，看看没有什么危害，就是唱唱戏，也就没有干涉，于是，我就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吼秦腔的感觉，给我寂寥的狱中生活增加了一种调节的方式，也给我了一种干事和

警卫战士没法干预的喊冤和泄愤的方法。

我是 1978 年 12 月 8 日被捕的，1981 年 6 月释放的，坐牢两年半；姚连蔚是 1979 年 2 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被逮捕的（比我们这伙人晚两个月），1981 年 10 月 29 日释放的，坐牢两年 8 个月，比我多两个月。出狱时，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一样的，都是“免予起诉”。

我出狱时他还没有出狱，4 个月后他才出狱。听说本来要早一点放他出去，但是他坚决不出去，一定要让人家给他说明白为什么抓他，不说明白不出去。谁来给他说明白？又有谁能说明白？这一切本身就是知法犯法，疯狂报复，恣意妄为，他们哪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如果有，他们早就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了。我是希望公审的，但是审判者不愿意，可见审判者内心的空虚和胆怯，他们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名堂。

后来他之所以出了监狱，还是有关方面动员姚连蔚的家属来做工作，最后是他哥哥连拉带拽地把他搞出了监狱。

可能因为不给他安排工作，医疗费也不能报销的原因，听说他出狱后，“上山下乡”，甚至住在山上，拜道士为师，学习医术，就感到既意外又不意外，这也符合我对他的了解。后来，他又在长安老家，开了一个小诊所，治病救人，也算是寻找机会和位置，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贡献，为民众谋利益吧。当然严格地说，要找他的事，还可以抓他个“非法行医”，因为他至少手续不全。不过，已经把他弄成了一介平民，无职无权，没有什么威胁性了，也已经解了心头之恨，也就没有人去管他了。

姚连蔚做了两年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当了两年八个月囚徒。1984 年，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处分和我一样。

他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 1959 年四级工的月薪

58.86 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这个与我们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一样的。

出狱后，国内多次调整工资，当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 130 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 110 元，而姚仍是 58 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后来，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崇敬者每年都聚会一次，纪念毛主席的诞辰，歌颂毛主席的功德，只要通知到他，他都会从长安他的小诊所赶来参加，可以知道他对于毛主席崇敬和热爱依旧，这也使得他与这些人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大约 2011 年冬天，他骑电动车外出，胳膊受了风寒，开始有些麻痹，小诊所也无法料理了。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越来越糟。

有一次，说起他办诊所的事，我说你这是符合古代圣贤所说的“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他说，没有那么崇高的动机，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我之所以学医，首先是因为工厂不给我报销医药费，我只好自力更生了。既然学医了，就顺便办个诊所，也给乡亲们看看病。有钱的给点钱，没有钱的就算了，只要总体上包住药钱就行。

2012 年 8 月，我和夫人到广州带孙子，知道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走以前想去看看他，也想好好聊聊天，他还是我的秦腔老师呢！但是因为走得急，没有去，心想，回来再去看他吧。谁知道这竟然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是在广州得到他去世的消息的。2012 年 10 月 2 日，他平静地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10 月 4 日，开追悼会并火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难过。我遥在南国，没法回来给他送行，也感到十分遗憾。我曾经计划的“好好聊聊天”，如今阴阳两隔，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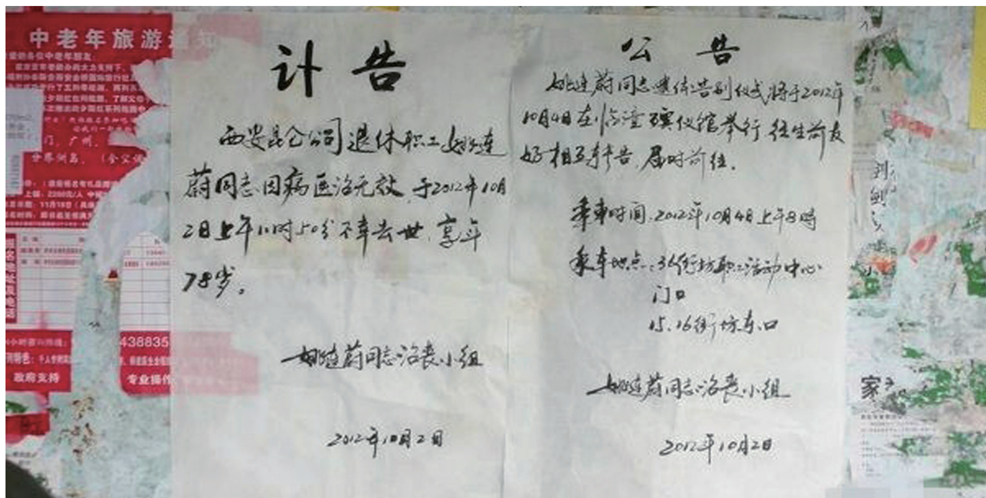
应该说，他至少是个对社会，对自己都认真负责的好公民。不能说他达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所称赞的那样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但是他至少是以此为目标和追求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至少可以对他说：祝好人一路平安！

官方对他的去世，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我一方面对此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我又对此感到欣慰——这正说明他没有与那些不齿于人的家伙们同流合污。

我在此写下这些文字，表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我再向他说一句：祝好人一路平安！

一张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落泊讣告

发表于 2012-12-18　茶坊微博



在这面斑驳杂乱的告示榜上，一则简陋的讣告恰如其分的显示了一个风云人物的落魄。文革时代，在身边出现了只有在远古传说中才有的大起大落的人物，也算见证了奇迹。而今，时过境迁，一纸简陋的“讣告”划上了传

奇人物的人生的句号。

姚连蔚，年轻时读书、种庄稼、做小买卖，1951 年参军，1955 年进入昆仑机械厂学车工，先后兼任车间政工员、政工组长、政治指导员。“文革”给了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世代贫农出身，历经工农兵学商的经历，中共党员、生产突击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身分，使姚连蔚成为所在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和西安东郊“工联派”的一名头头；1968 年，他出人意料地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 年，姚连蔚离厂出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兼党组书记，次年便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7 年 7 月 12 日，姚连蔚人生的轨迹逆转了；当天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应，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一年后，姚连蔚回到陕西继续受审查。1979 年 2 月，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月儿圆的那天，他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1981 年 10 月 29 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定姚连蔚触犯了刑法第一四三条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业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姚连蔚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 1959 年四级工的月薪 58.86 元。当时，中央对他和吴桂贤、李素文等人实行了一种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

七
我和彭康校长

2016 年 3 月 29 日

西安交大校长彭康的死，所有的师生员工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

情。而关于彭康在文革中的具体的情况，还没有见过比较系统地说法。我想就这个问题，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做一个说明。

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以前，彭康校长在我们大家心里就像神一样，广大师生对他不仅是尊敬，而且是非常崇拜。都知道他是老革命，他的行政级别很高，他的理论水平，也非常高，而且还传说，他在被捕的时候，为了不吐露党的机密，把舌头都咬断了。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有些吐字不清。当然，没有人去仔细的考究，但是我们都坚信不疑。

对我个人来说，彭康校长当时提出来的“三活跃”（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编者注），我是从心底里面拥护和支持的。因为，我本人就不愿意接受太多的管制和干涉，而且我觉得，这也符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的讲话以及 1964 年夏和毛远新谈话的精神。尤其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在二年级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在彭校长主持的纪念“1·29”运动的全校大会上，我与王永婷等几个人做了大会发言。这一切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当然也有学校和彭校长的领导的重大因素。我当然一直怀有感激之情。

按说像我这样的人，用当时的套话，应该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应当是保卫校党委的骨干分子。而这一切，在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台广播北大那张大字报以后，都发生了变化。

在北大的大字报广播之前的一段时间，通过批判“三家村”，批判文艺界的一些“毒草”，提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能让工农兵广大群众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等号召。作为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子弟，当然是旗帜鲜明地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实际上，自从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已经是激情澎湃，随时都准备爆发。自己的心里已经堆满了干柴，随时都可能点燃。北大的这一张大字报，就是点燃自己心中革命烈火的火柴。

我们工程物理系是保密系，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所以都是比较“红”的，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当时是预备党员，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所以我不只是有个人的思想影响，而且还有组织上的便利条件。北大大字报广播以后，我们班上立即组织讨论。对照北大的情况，发现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确实也有很多问题，也有捂盖子，冷冷清清，不温不火等等各种现象。于是我们也写了大字报，向学校党委提出质问，而且要求停课闹革命。一夜之间，学校里贴出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据说有万张之多，并且揭发出了很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生所不知道的。比如，学校党委布置在学生中间摸底，排左中右；还有彭康一些对抗毛主席思想的言论，大讲黑格尔小逻辑，不认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后来，又有一些人揭发出来，彭康有若干个舞伴而且关系暧昧，特别是后面一条，使得彭康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崩溃了，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很讲究的，尤其是男女关系，常常是打倒一个人的终极武器。

我尊重别人，敬仰别人，实际上，有一个前提，他首先必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他违背了这一个前提，我的尊重和敬仰就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当时对学校党委，已经失去了信任，对由彭康校长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也失去了信任。于是，我们就要求陕西省委、西北局派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这里要特别强调

一下，希望省委向交大派工作组，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后来，省委果然很快派来了工作组，以后又扩大成为工作团。但到了 6 月 6 号，又爆发了反对工作组的“六六事件”，我是反对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之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和管制。后来，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平了反，恢复了自由。

1966 年 8 月中旬，在工作团撤走以后，学校进行了文革委员会的改选，改组了工作团炮制的文革委员会，我当上了改组后的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还称为主席）。

在此之前，我只是 810—41 班的团支部书记，可以发表观点，可以写大字报，但是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我无权置喙。而现在不同了，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变成了我们文革总会的一个重要的事务。当然，前期的揭发批判，都是一样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步一步来。在我的思想中，关于老干部的问题，就像是胡适所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揭发批判，可以严格一些，但是最后结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彭康来说，并不容易。

第一，1966 年 7 月 6–8 日，工作团召开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工作团长严克伦在 7 月 6 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

第二，按照康生的说法，彭康就是叛徒，任何时候批判都没有错，而且几次在接见的时候，指责我们批判不力；

第三，工作团撤走时，留下了一批材料，包括彭康被捕后叛变的怀疑点；

第四，工作团在校期间，曾经对彭康做过定性处理。陕西日报曾经发表《西安交通大学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

康，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西安交大党委，撤消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彭康的一切职务，改组期间由省委交大工作团代行校党委职权》等新闻报道；

第五，有些同志回忆起，在批判彭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署名西北局干部，揭发彭康是叛徒，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这是不是故意把水搅浑，造成思想混乱，也值得深思。

特别是工作团长严克伦在 7 月 6 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一事，影响极为深远——严克伦是派驻西安交大的工作团团长，又是省委书记，是代表省委，西北局的。他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等于是组织正式结论。交大师生不可能知道彭康的历史细节，严克伦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就成为群众的思维定式，逐渐成为西安广大群众的固定认知。

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思潮和氛围中，对严克伦宣布的彭康同志为叛徒的结论怀疑或者否定，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卵击石。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谨慎面对而又要出于公心去解决的问题。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处理好彭康问题的定性，我们文革总会在专案组人员的配置上，选派高年级的学生，调干生，相对比较有经验，处理问题比较冷静稳妥的同志进入彭康专案组，王春杰，郑叔良把关。我记得，专案组的人还有史立民，张克安等人。我们不止一次开会，让专案组汇报彭康问题的调查情况。他们也如实地说明彭康的叛徒问题定不下来。主要的问题是彭康从苏州反省院是如何出来的问题。他出狱时，写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看着简单，实际很奥妙，如果去掉中间的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那么这样一句话，重点在后面，就是说拥护蒋委员长的前提是他抗日到底，如果蒋委员长不抗日到底，那就不一定拥护蒋委员长了；而如果中间有逗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就

容易发生歧义，可以理解为两件事，既拥护蒋委员长，也要抗日到底。如果写的是前边一句，那么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写的后面一句话，就是有逗号的这一句话，那么，问题就复杂了。

为了把这个事情搞得更加准确，我还专门亲自参加了一次提审彭康。为了不让他认出我来，我还戴了一个帽子，换了一副眼镜，假装是做记录的。我害怕他认出我来不方便，就让专案组的同学先问问他“认识不认识李世英”。彭康说不认识人，在广播里听到过名字。这我就放心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了，我问他出反省院时写了什么，彭康坚持说，他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问他“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中间有没有标点符号？他坚持说“没有”；另外，他也没有承认是共产党，而且一直使用的假名字，所以也没有给组织造成破坏。彭康是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中文在理解上的渠渠道道，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但是我们又没有理由否定他的说法。最好是能够查到当时的敌伪档案的原件，那就能铁板钉钉，但是在当时的敌伪档案中专案组查不到这个资料。

这期间为了更准确地审查彭康，也了解了彭康的生平。

彭康于民国五年（1916）毕业于萍乡中学。民国六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高中学业结束，直接升入该校大学部哲学系，毕业后获博士学位。

彭康在日本时就追求进步，曾与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沦为大汉奸）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他民国十六年（1927）回国，次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的时候。他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民国十九年（1930）2 月 15 日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峰 51 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 4 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

被捕，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 7 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彭康的入党，是在 1928 年。那时候正是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人最困难的形势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

后来，我在一个老干部那里看到在延安出版的毛主席的文章，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共产党对外也承认蒋介石是全民族的领袖；合作前国民党用青天白日旗，共产党用一颗红星的红旗。抗战开始后，大家认为一个中国不能用两面旗子，于是共产党临时把红星旗收起来。所以抗战八年中国只有一面旗子，就是青天白日旗。我们的八路军是国民党的番号，有七路军、八路军、九路军、十路军，八路军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只是国军的一部分，军饷和弹药都是国民政府发的，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毛泽东和八路军没有关系。尽管当时共产党事实上领导了八路军，但表面上不这么说，因为中国抗战只有一个系统，八路军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手下的一部分，它的全称叫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理论上最高指挥是蒋介石。所以彭康出狱也是当时形势发展的正常结果。我还把这些情况给有些革委会的同志说过。

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总体来说，没有证据给他定叛徒。

彭康叛徒问题定不了，这在我们文革总会的常委中间是公开的秘密，开彭康的批判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说法说。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有数，只是需要等待时机，对外还是保密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交大带来了大麻烦，几乎把交大压垮。事情是一次我不经意间把彭康不是叛徒的看法透露给了“统指”方，于是很快出现了反右倾，西边那些院校，动员了一切力量和手段，在全

市反我的右倾。这一下，那些反我右倾的人，好像得到了原子弹，印发大量的传单，广播车全部上街，西安满大街的大标语都是说的这个事。

消息传到我们学校，全校轰动，有的直接找到总会，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写大字报，要求我讲清楚。看到这个局面，我也大吃一惊，而文革总会中别的人也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立刻开会，紧急通报情况，商议对策。会上，我先回答大家的问题，说明这个事情的由来和过程。然后大家对我一阵猛轰，一致批评我不应该对外人说彭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学校内部都是保密的，怎么能够对外人讲这个事情呢。我承认自己这个事情做错了，特别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又把我们学校置于危险境地，我诚恳检讨。后来大家说先不说这些，先讨论怎么办吧，现在同学们思想也很混乱，外边又在对我们猛烈攻击。沉默了一会，有人提议，解铃还须系铃人，人家说是李世英说的，只有李世英出面否认，这才最有力量。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等着我表态。我沉思了一会说，我不能这么做，我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自己没有说？我不能撒这个谎。

会议一下子僵在那了。大家理解我，也知道我的牛脾气，让我出面否认我说过的话，办不到。但是形势紧迫，全校师生都在等待着答复。后来，我记得是戴慕蓉提议说，现在需要稳定人心，这个任务交给沈老总处理，怎么样？沈荣水想了一会，说好吧。大家一致同意。

沈荣水宣布在 402 召开大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没有露面，但是我们几个人在广播台那里听会，了解大家情绪。记得沈荣水说，西派的人说李世英说彭康不是叛徒，证明我们交大右倾。大家都知道，从北大大字报，到反工作组，静坐，绝食，李世英都是非常坚定的革命派，他会说这样的话吗？而且还是给他们说的。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明显的是他们造谣。他们那些人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沈荣水这么一讲，会场里沸腾了，掌

声雷动，大家都觉得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起来。散会后，我们学校立即大举反击，说西派是黔驴技穷，造谣污蔑……

解决了稳定人心，避免校内分裂，这才是第一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必须要有原子弹来对付他们的原子弹。也是我们交大命不该绝，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在刘澜涛的黑材料里面找到了西工大的头头陈启顺，杨梅生写给刘澜涛的效忠告密信，所谓“陈杨信件”。我们如获至宝，的确，这是我们的原子弹！在批判交大“右倾”以后，西工大成为西派的领头羊，而他们的头头居然和刘澜涛勾勾搭搭，投降叛变，你还有脸说交大右倾？我们的大字报、传单、广播车全部开动起来，这下就该他们忙活了。他们内部也吵吵嚷嚷，发表声明说“陈杨”是他们自己揭发出来的等等等等。

西工大前校文革会副主任陈启顺和文革会委员杨梅生秘密给刘澜涛写“黑信”，向刘澜涛“投降”，西工大学校师生非常气愤地骂他们俩是学生运动的“叛徒”，并把把陈启顺和杨梅生揪回学校进行斗争并游校示众。他们自己辩解都来不及，也没有心思来说彭康是不是叛徒了。

到这时，才算是化解了我一时不慎给交大造成的凶险处境。

1967 年 7 月 1 日，我们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我担任革委会主任，对于彭康问题如何定性和处理，仍然是我和校革委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彭康去世时，我在北京参加省革委会的筹备，不在西安。彭康去世的消息，还是胡炜先告诉我的。学校可能正在忙于处理彭康后事，还没有通知我。胡炜给我说，你们学校彭康死了。我大吃一惊，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胡炜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心里五味杂陈，半天说不出话来。从他那里回到自己房间，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情况，也就如同附件三中电制同学所述的过程。另外，把彭康送到医院，需要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他们告诉我，医

院的证明是 1. 彭康本身有多种疾病；2. 彭康死于肺气肿的窒息，还有一条什么，我没记住，最后一条是今后要注意政策。

当然，彭康年老多病，即使没有文革，也有可能因病去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毕竟彭康校长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在批斗的过程中去世的，这个责任只能落在我们身上。作为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情之一。每每想起都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总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是失败感。

经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再回头看看，我们在审查彭康问题的时候，在“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到底”这一句话上，费了那么大的功夫，那么认真，真是有点儿小题大做，完全是浪费时间。看看邓小平和胡耀邦处理所谓 61 个叛徒的事情，我们就有了新的感觉，他们出狱时，所发表的登报声明，和彭康的所写的哪一句话，两者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注意下面的内容，“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反共启事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院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周斌、张永璞、杨仲仁、董旭生、刘华甫、夏维勋、冯候斋、徐之荣

现名介绍：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杨仲仁（杨献珍）刘华甫（刘澜涛）徐子荣（徐子荣）周斌（周仲英）董旭生（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

如果连发表这样的反共声明的人，都可以不算叛徒，那么，按照这个标

准，还有什么人能算叛徒？彭康的问题，那就连怀疑的根据都没有。世上的事情变化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感到懊悔和疼惜，没有让彭康校长活到后来这个时候。

有时候也想，人算不如天算，对彭康校长，我们是一片诚心，希望能够给他一个客观的符合事实的结论，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而且为了“彭康不是叛徒”这一句话，交大文革总会当时差点陷入灭顶之灾，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最终却得到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只能说，百密一疏，一个蚁穴毁灭了整条大坝；一个细节的失误断送了之前的全部努力。

敬爱的彭校长，我向你汇报，作为当年你当党委书记时入党的一个党员，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入党时候的宣誓词，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我坚守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许许多多的人动物化的狂潮中，我没有被异化；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没有玷污你当校长时，我荣获的三好学生的声誉。亲爱的彭校长，用现在人的网络语言来说，你会给我点一个赞吗？

正值清明节前夕，我向敬爱的彭校长赔罪，鞠一个 90 度的深躬，并且祝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

八

我给了交大临委会特级大礼包

——交大临委会流星式兴灭记

2016 年 4 月 24 日

对于交大临委会，很多人都没有记忆，因为它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却记忆深刻，因为我亲自处理了交大临委会的事

情，对他们的成立，我还给他们送了特级大礼包。

根据我的回忆，大约在 1966 年 12 月，临委会写过一张大字报，说要成立，大字报贴在中心楼东面南北路上。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场玩笑，所以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的对待。我记得，只有少量的几张大字报，贴在他们大字报周围，基本上就是，讽刺挖苦，篇幅都短得很。

据了解，临委会的骨干成员就是几十个人，人员也比较杂，有工人、教师、原来学生会的干部、政治辅导员、工作团执政时的老文革总会的成员等。

据有的同学回忆，看到有一张大字报，是一个政治辅导员写的，说他为什么要参加临委会。没有任何反响，大家都懒得批驳。

关于如何对待交大临委会的成立，学校总会的态度是不干预，看它以后的发展再说。

但是，我想清闲却求之不得，他们找上门来了。作为他们的代表是校办工厂的一个工人，姓武，我原来就认得他。我没有想到他是代表筹办中的交大临委会找我谈判的。聊了几句以后，他开宗明义，说我们要成立交大临委会。我听了着实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表临委会出面来和我谈判，至少还是骨干吧。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就直说吧。他也不犹豫，说，我们需要办公房子。我说这个好办，你给后勤部门说一下，他们会按照规定给你们批办公用房的，如果不能解决，你再来找我。他说后勤部门不给他们房子。我说，不会吧，你们有多少成员，把名单报给他们，他们就会按照你们人员的多少批给你们办公用房。

我问他，你们有多少成员？他说 200 多人。我说，有这么多成员肯定会给你们批房子的。你把人员名单报给他们，如果不给你们房子，我去找他们说。

他停了一会，才说，他们名单上只有十几个人。我说，你不是说你们有200多人吗？那些人呢？他显得有些尴尬，说，别的人害怕，不敢登记名字。

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奇怪，有些同情地给他说，成立一个组织，宣传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我们学校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是很宽容的，你也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的。在我们学校这样的条件下，你们连名字都不敢暴露的那些人，你能指望他们对你们临委会忠心耿耿？好了，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是你们考虑的问题。根据你们人员的情况，只能批一间小办公室。

但是他不同意，说我们有200多人，我们要两个教室。我说，你这就让我为难了，我怎么给后勤部门的说呢？他却坚持要两间教室。

说实话，我当时心软了下来，原因有两个，其一，老武本人，是复员军人，他和校办工厂的一批人都是参加过西北沙漠的核爆的人员。我本人是学原子能的，知道他们为国家核爆做的贡献，当时的防护相对来说也比较差，他们复员以后还要定期体检，而且，有些人已经出现白血球减少，毛发脱落等症状。所以，我对他们这批人非常尊重和同情；其二，他说的他们的成员不敢暴露名字，使我心里受到冲击，我想，难道我们学校内言论自由的氛围还不够好，使得别人不敢说话？那就索性给他们更好的条件吧。再一方面，他们来找总会要房子，又不是抢占，至少还是尊重总会的，索性更加大度一些。于是我就说，好吧，就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两间教室。

本来我以为谈话可以结束了，站起来准备送他走。可是，他坐着没有动，又狮子大张口，提出来让我大吃一惊的，无法接受的要求，他提出要用学校的宣传车。这个要求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的宣传车是我们学校的“镇山之宝”，大马力的太拖拉柴油车上装有大功率的广播机，配有大功率的“九头鸟”喇叭，威力十分强大。这部宣传车开到对方

的宣传车跟前，只要一开机，对方的宣传车就像哑巴一样，只能开到别处。所以，这个宝贝只有总会使用，各系、各兵团都没有使用过。现在，能给他们使用吗？

我说，宣传车的事我不能答应，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他坚持他的要求，说，房子你都批了，你好事要做到底。

我犹豫了一阵，最后说，好吧，我破坏一下规矩，同意你们使用一天。

他听了非常高兴，说，好，那就这样。我说，话先说到前头，无论房子，还是宣传车，都是公物，损坏了要负责赔偿。

他说，这我知道，没问题。然后告了别，他高高兴兴的走了，留下我心事重重地反复问自己，我今天怎么了？怎么答应了临委会可以说是出格的要求？我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树立一个对立面。如果他们能够赢得群众，那就说明我们搞得不好，否则，给他这么好的条件，他们也成不了气候；如果他们能够赢得群众，你今天什么条件都不答应，最后，人家也能得到。

老武兴冲冲地走了，我的麻烦就来了。先是管房产的人员来找我，说，李老总，你给临委会批了两间教室？我说，是的。他说，这不符合规定。我说我知道，他们是按照特殊情况处理。他说，那以后别的战斗队，兵团怎么处理？我说，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件事是我的特批，下不为例。他显然不满意，但是，我已经批了，也只好无奈地执行。

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开宣传车的贾师傅来了，我们很熟，他说话也直爽，他劈头就问，李老总，你怎么批准临委会用宣传车？我说，我是批了。他说，他们算什么东西，还要用宣传车？我说清楚，你批的是车，不是批的人，我可不给他们开车，怎么能帮助他们宣传？我有我的自由吧？

他一下子把我说笑了，说，你当然有你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强迫你给他们开车。话说回来，即使总会用车，你贾师傅也可以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

点，我不给你们开车。他笑着说，李老总，你放心，总会用车，不管刮风下雨，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然后随便聊了一会天，他就告别走了。

我想着下一个来找我的应该是广播台的机务，广播员？可是等到吃饭时间也没有来。我估计临委会在贾师傅这里碰了钉子，正在想别的办法吧。

要知道，在当时，司机和机务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不像现在，人人都可以摸摸，按照临委会的人员结构，估计很难如愿，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后来听说他们在召开成立会议时，几个工人找他们辩论，他们处置失当，搞得会没有开好；宣传车也没有用上，因为他们没有司机和广播机务。房子倒是使用了，但是也没有使用多长时间，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成员不去。

关于我给临委会批了两间教室的事，很快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包括我们总会，也没有人说什么。只有飞鸣镝画了一副漫画，贴在大操场门口北边，但是矛头不是对着我，而是讽刺临委会多占房子，标题是“屁股大如鼠”，画的是一个老鼠，小小的头大大的屁股，占据了很大的办公室。

后来，临委会自动消亡，像是一个流星，一闪而灭。

我给临委会送超级大礼包是真实的，不是虚伪，不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他们无缘享受，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正如毛主席所说，要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如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坚信不疑，你就不会害怕别人说话，甚至鼓励别人说话，在别人的反对和诘问中使自己的思想和追求更加准确，更加明晰，也更加坚定。

附：郑叔良关于交大临委会的情况补充

西安交大临委会成员主要来自：交大少数复转军人，如校机械厂工人武

永泰；原交大党政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和政治辅导员，如保卫处科长齐涛，极少数学生，如学生会副主席唐素。李世英文中提到武XX，就是武永泰，我国第一批防化兵退伍军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由他们负责现场处理，因而多数受核辐射影响，白血球减少。文革前，陕西籍的这批防化兵约有五十人复员到交大工作。临委会中多数人员对原交大党委情感较深，不同意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的观点，因而要求成立临委会。

我当时任文革总会代组织部长，因工作关系，与当时同意临委会观点，或参加临委会的原交大党政部门工作人员有较多接触。他们成立临委会时曾来找过我，要求文革总会提供活动场所与必要的宣传用品。我告诉他们：按照宪法，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现在由文革总会掌权，应该提供一定的方便。但我无权答应，此事可找文革总会李世英主任，他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要求。

果然李世英批给了他们几间房间作为临委会的活动场所，我记得还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少数同学对文革总会这样处理有看法，认为应该像其他学校一样，对临委会采取“打、压”政策！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因而没有多久，西安交大临委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从而使西安交大真正成为一派统一，全国仅有，独树一帜的交老总！

九
我见证了王永婷自杀后送医时的惨象

——不忍目睹的历史定格

文化革命前，我和王永婷在学习生活上没有什么交集，互相并不认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5年年底，在纪念“12·9”运动的全校大会上，我们

两个分别做了大会发言。我的印象，她讲的是如何为大家服务，因为她是学校学生会的劳动生活部部长；我的发言内容是，为革命刻苦学习。彭康校长参加了大会。王永婷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诚恳，泼辣，朴实。之后，我们并没有什么联系。


王永婷

北大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在反对校党委和反对工作组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一点联系，只是偶尔在广播和大字报上，看到或者听到她的名字。

1966 年 6 月 9 日，我愤而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6 月 20 日，我出院回校，继续参加文化革命，也就是继续接受批判。

7 月 9 日上午，我们班在中心楼一个大教室开批判会。中午时，我们排队回去吃饭。队伍走到大操场门口，我们班的队伍忽然骚动起来，大家都扭头看着什么。我也跟着看，这一看，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这是多么凄惨的画面，一个女同学，被 4 个男同学拉着，小跑着奔向医务室。我认不出这是谁？队伍里有人说，王永婷，王永婷。听说她是跳楼自杀的，被送到医务室抢救。可是，既不是背着，也不是抬着，而是象五马分尸那样，两个人拉着胳膊，两个人拉着腿，几个人向后扯着，免得掉到地上。我记得她好像穿的灰色的衣服，头在前方，身子在后方，头发披散着，垂向地面。后来知道她没有被抢救过来。

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未来的精英，就这样踏上了黄泉之路，而且最后的情景，又是这样的凄惨。这个惨不忍睹的画面，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与那个热情，诚恳，泼辣，朴实的王永婷，竟然是这样的见了最后一面。俗话说，惺惺惜惺惺，可以想象，我心里边是多么的难过，作为从死神那里捡回一条命的我，我多么真诚

地希望她能被抢救过来。但是，没有……

后来，我还曾经在心里怨怪她，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或许我们都可以获得自由了。其实，这是我太想当然了。过后，我从他们班了解了她的个人经历和她所受迫害的情况，我才知道，有两个方面，我过去了解得很不够。第一，她比我了解的更加优秀；第二，他所受的迫害，远比我想的严重的多。

王永婷是个敢想、敢干、敢革命的同学。她一贯表现很好，初中和高中都是保送入学，曾受过多次表扬和奖励。特别是大学五年来，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政治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对同学关怀、诚恳帮助。在担任学生会劳动生活部副部长、部长工作时，任劳任怨，积极肯干，热心为同学服务。

6 月 1 日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她立即行动起来，并组织她班同学揭发校党委的问题。6 月 3 日晚，她写出了揭露动力系党总支副书记召开黑会的大字报。6 月 4 日晨，她写大字报揭穿校党委抛出凌雨轩是个大阴谋，6 月 5 日，她就贴出罢彭康的官、要求改组校党委的革命大字报，质问“你们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

同时，她积极地鼓励其他同志大胆揭发校党委的问题，并写出大字报，要求动力系教师把大字报从教研室搬出来，不要再上阶级敌人的当。

从 6 月 2 日到 5 日，王永婷同志共写出近 20 张革命的大字报。她的这些革命行动，完全表现出她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

由于工作团进校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同学革命，竭力扑灭熊熊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他们一系列的错误言行，使王永婷对工作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6 月 5 日晚，听了

严克伦“急刹车”的广播讲话后，怀疑就更大了。

6月6日凌晨，王永婷对一位同学说：“我对工作组有意见。我昨晚想了一个晚上，我把许多事实联想起来，越想越感到问题很大。“为什么严克伦对校党委的态度一天三变，调子越来越低？”，“为什么还要大家坐下来讨论是红线，还是黑线呢？”，严克伦说中央的问题管不了，为什么管不了？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人都管得了，心里没鬼怕啥？为什么严克伦一听到别人对自己提意见，就感到气愤？我看这种态度就有问题！

当另一位同学谈到这几年毛主席有时听不到真实的情况汇报时，王永婷哭了，气愤地说“走，我们到西北局去！”，“如果不行，就上北京去！”。王永婷连早饭也没吃，就带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和制冷专业的同学到西北局去了，并被推选为发言代表。

在西北局，王永婷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慷慨激昂，对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严厉的批判。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康诬蔑、攻击毛泽东思想，说：‘一个人爬竿，一个人在下面念语录，念了半天还是爬不上去。’；让我们学唯心主义，不学马列主义，喊‘唯心主义万岁！’。这样的人，严克伦还称他‘同志’，我们怎能受得住呢？我们是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不能再忍受了！不是我们扣字眼，实在是想不通啊！”这时，她很激动，边哭边说：“原来我对工作组寄予很大的希望，想他们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但几天来的事实使我看到他们并不是如此。他们把毛泽东思想扔在一边，只是说根据省委和西北局的指示如何如何，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不向我们传达呢？”因此，她完全同意组织赴京代表团，并说：“交大这么大的问题，中央不知道怎么能行？”

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在一连串铁的事实面前，被质问得目瞪口呆，狼狈

不堪，内心十分恐慌。于是，他们就依仗权势，下达黑指示，说什么：省委是革命的，省委工作组也是革命的。王永婷听了，气愤地站了起来，说：“说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我想不通……我对工作组就是有怀疑，说工作组是革命的还有些早，……”

以刘澜涛为首的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从此便把王永婷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她和她的战友们连根拔掉。于是，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降临交大了。

“六六”发生的当天，就被刘澜涛打成了“反革命事件”，王永婷同志和其他许多好同志也就成了“反革命急先锋”。

王永婷从西北局回校后，什么“打倒反党分子王永婷”，“打倒女妖精王永婷”、“痛打落水狗王永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压下来。当晚，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星火报前围攻她。工作组为了残酷打击王永婷，挑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造谣说她参加了6月5日晚吴镇东召开的6人秘密会议。诬蔑她在西北局“披头散发，口吐白沫，拍腿击桌，呼天唤地，疯狂至极，借骂彭康攻击工作组”等等，等等。

6月7日早上，我被工作组押着，带着高帽子，坐着喷气式在全校游街，回到宿舍，我已经决定自杀。6月9日中午我写完遗书，喝了安眠药，等着死神的来临。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她正在受难。她在电影广场遭到大规模的围斗，有人打她，还有人揪住头发，硬要她低头认罪。斗争后，又被拉到12宿舍119室，进行“展览”。工作组胁迫窗外许多受蒙蔽的同学高呼口号，骂自己的阶级兄妹；把石头、棍子从窗口扔进去，打自己的阶级兄妹；有人强迫她站好，强迫她低头，还逼着她把头从窗口伸出去，给大家像动物展览一样轮流观看……一个20来岁花季少女了，有谁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她那憔悴的面容，

凄惨的目光，谁能忍心多看一眼？当你回想起这场群众斗群众的惨景，谁不感到万箭穿心？这怎能不激起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比愤恨？

我自杀以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到 6 月 20 号，才回到学校。在我回校前，工作组做了群众工作，说李世英要回来，不要打他，批斗还要批斗，但要注意方法。其实，同学们都是有感情的，谁愿意那样做？还不是工作组逼的。所以我回校以后，再没有受到人身侮辱。

但是，王永婷所受的苦难，一直在继续，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工作团为了将王永婷彻底孤立，以便进一步打击，挑起更严重的群众斗群众，除在全校动员大造舆论，用大字报和广播大骂特骂、造谣生事外，还千方百计在本专业之间将王永婷搞垮、搞臭。

由于王永婷班上的同学对王永婷一向了解，对她恨不起来。工作团看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动员外面不明真相的同学用大字报围攻王永婷班上的同学，施加压力，要他们班上的同学对王永婷问题表态；另一方面，又利用同学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阶级斗争经验的缺乏和个别人头脑中的“私”字，提出“对王永婷是恨，还是同情是区别革命与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标志”，同情和支持王永婷的革命同志也遭迫害。他们就这样拉一批，打一批，分化瓦解。

7 月初，在外地实习的同学归来后，王永婷迎上前去，帮他们搬行李，但都被同学们拒绝了，因为她是“反革命”！无奈，她只好摇头而去。在高压政策的逼迫之下，同一个宿舍的女同学也不敢和她说话，有时刚刚开口，但一想到她是“反革命”，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有位同学，从 7 月 4 日回校直到王永婷自杀，只对她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你不要替我拿行李吧！”

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团，为了将造了他们的反的王永婷同学进一步置于死地而后快，使尽各种卑劣手段，要王永婷同学交代“六·六”

的所谓主谋、黑线，交待和彭康黑帮的关系，还硬逼迫她承认“对党和毛主席有着刻骨仇恨”。

王永婷同学对党和毛主席一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她怎能出卖自己的灵魂，去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呢？于是，工作团就搬出那套混账逻辑，说什么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六六”是反革命事件，所以你就是反革命分子。

他们还查三代，翻老底，想用“血统论”把王永婷打成“反党分子”。他们竭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她昔日对同学的热情关心，今天也成了虚情假意，别有用心；过去积极搞好工作，现在却成了“向上爬”的罪证，成了“阴谋”。她的一言一行，所有举动，现在都成为投向王永婷自己的匕首和炸弹，甚至当上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作的学习心得报告也成了放毒，听了报告的人，还必须赶快写大字报来消毒。谁如果认识王永婷而不表态，一顶顶大帽子就会压下来。王永婷作的有些好事，实在无法否定的，便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但是，不管工作团怎样对她施加压力，她都斩钉截铁地说：“要我承认对党和毛主席有刻骨仇恨，这比打我还疼！就是劳改 30 年，我也不承认！”正因为王永婷同志这样的坚强，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迫害也就接踵而来了。

王永婷同志整天被迫写交代材料，饭吃不下，觉睡不好，黑天白日地写呀，写呀，一张又一张，一份又一份，可总满足不了那般老爷们的要求。他们责骂她“死心塌地”、“顽固不化”，什么“金蝉脱壳”，什么“小骂大帮忙”，威胁她“再不交待，死路一条。”她被整的不知所措，在她临死前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大家说我刻骨仇恨党和毛主席，我自己感到……平时我还是不声不响地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要我交代，我自己又着急，又想不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6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她在宿舍里为此失声痛哭达 40 分钟之久。她边哭

边说：有人要把我一棍子打死，不让我革命，我感到委屈。还说："说我对党和毛主席有刻骨的仇恨，劳改 30 年我也不承认！"但是马上就有人说："你今年 20 多岁了，劳改 30 年还不承认，说明你是死心塌地、顽固到底！"

第二天，批判她的大字报就贴了出来，指责她以哭来搞"反革命的反扑！"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王永婷同志常常手拿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久久对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好像在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赶快派人来呀！"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折磨下，短短的一个月中，一个充满革命朝气和青春活力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面目憔悴，精神萎靡，神志恍惚，走路弯着腰，两眼常常发呆的木头人。她有时神态稍微安详一点，有人就说她"气焰嚣张"，简直弄的她左不是，右不是，坐不是，站也不是。

7 月 6 日上午，王永婷又去找动力系工作组长宋涛谈话。工作组非但不予接待，反而打电话要班上派人把她押回宿舍。当时在班上的工作组马上召集全专业的同学（30 余人），做了层层森严的布置，恶狠狠地要整王永婷的态度。工作组董 XX 赤膊上阵，会前添油加醋地把王永婷同志诽谤的一无是处。会上竟然无耻地对王永婷同志进行了的人格侮辱，说什么："一个女同学，脸皮怎么那样厚，人家组长还没起床，就往人家房间里跑。"并说王永婷不老实交代，无理纠缠领导，恶狠狠地说："她还想让她放包袱，她根本不是放包袱的问题，而是交代的问题。"

工作组布置好之后，便把王永婷带进来，让她坐在中间，处于大家的团团包围之中。在工作组的高压和蒙蔽下，会上大家都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志，说她"不老实交代"，"破坏运动"。最后，在工作组的授意下，勒令王永婷同志保证以后"不许乱跑，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平时行动必须向文革小组汇报，要受同宿舍女同学的管制。"有人还威胁她说，"再乱跑就戴高帽子游街"。

紧接着，7 月 7 日、8 日，工作组对实习队大搞罪恶的所谓“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运动，在外出实习三十个同学中，把八个同学打成“反革命”，无中生有地说王永婷和在上海、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实习的同学有反革命的“黑线”联系，王永婷是这些黑线的总根子。工作组还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强迫要她交出私人信件。

7 月 8 日晚，王永婷前脚刚踏进宿舍，后脚就有两个人紧跟而来，向王永婷同学追逼所谓黑信。王永婷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给了他们，他们一看不是“反动信件”，便气势汹汹的对她说：“你搞什么鬼，你要滑头！”王永婷同学此时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说：“我要什么滑头，没有嘛！”她没有办法，继续找信。突然发现一封信，她吓的一惊，连忙跑出门去，追上已走远的那两个人，交给了他们。这就是王永婷自杀前一天的晚上。

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住着 5 个“反革命”的 8 人女生宿舍依然通宵亮着电灯，王永婷怒视着布满全屋的大字报、对联、警告和通令，同时用渴望的目光端祥着每一个人，似乎有好多话要说，然而大家都什么也没有说。其他几个人依然一会儿躺在床上沉思，一忽儿又自己起来赶写检查，没有理会她，碰在一起的眼光又迅速离开了。她到处翻腾，找出本宿舍同学曾经给自己的信件退还给主人。除了门外值班人员踱来踱去外，屋里静悄悄的，大家象躲瘟疫似的，近在身旁却又相距万里地在这里共渡了这不眠之夜。我们的好同学王永婷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深情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慈祥面容，思想起伏，联想万端，期待着黎明。

第二天，7 月 9 日，也就是王永婷和我们永别这一天。工作组又搞出一个新花招——就在这天早上，某班贴出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专栏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对她作了低级下流的人格侮辱，说他们“臭味相投”等等。这些东西王永婷同学都看了，工作组竟然卑鄙无耻到这样地步！早上班里又开会揭

发实习队阶级斗争盖子，她又被牵扯进去了。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声“给王永婷提意见”，立即受到严厉训斥，说：对她不能提意见，对她只能是揭发，她是敌我矛盾。工作组鼓动一个人污蔑说，她的日记本上有她入党介绍人的一篇反动话，于是许多人齐声怒吼要她交代……

不过今天的王永婷表情不像昨天了。她今天虽然是照样吃力地拖着疲惫双腿，然而对于这种诬蔑，她卑视地摇摇头，用沉默表示了抗议。课间休息时，昨晚登门逼信的人又跟在后面高声叫骂：“把信交出来！”她愤怒地说：“信？已经撕了。”对方大怒：“毁脏灭证，要罪加一等！”

揭发会又开始了，王永婷坐在那儿显得特别不平常，她那发呆的双眼射出逼人的目光，依次端详着每个同学，好像在告别，那一双手在使劲地撕着碎纸。

同志们，她到底在想什么呢？她也许在想：工作组进校几十天来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呀！我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怎么会有刻骨仇恨呐！她也许在问着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保卫毛主席就要遭到围攻和迫害？为什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同窗五年的战友要互相残杀？

也许，年轻的王永婷正在与死神搏斗，而且，死神已经逐渐摧垮了她的生存意志……这惊心动魄的 30 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这血泪凝成的 32 份长达 162 页的交代材料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呀？在这众叛亲离、人妖颠倒的气氛中，不间断的批判斗争，卑鄙无耻的造谣污蔑，低级下流的抹黑侮辱，一直摧残着她的身心，她一直沉默地斗争着、忍受着……

可是，这些不断增加的大山一样的重压，终于超过了她的承受力，她再也没有力气忍受和承受了。她已经下了决心：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控诉她无法理解的罪恶现实！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证明自己的

清白和冤屈！她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热血来再一次宣示自己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

批判会议一结束，她就愤愤离开了那工作组主持的互相残杀的揭发会，一转身，她含着满腔的悲愤，义无反顾地从三层楼跳了下去，……鲜红的热血流在地上，洒在路上……几个同学送她到医务室抢救，可是，不是背着，也不是抬着，而是象五马分尸那样，两个人拉着胳膊，两个人拉着腿，几个人向后扯着，免得掉到地上。

这就是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在大操场门口，亲眼看到的那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这就是工作组制造的又一起惨无人道的血淋淋暴行！

王永婷的自杀以后，工作团的老爷们惊恐万状，怕得要死，慌忙地组织同学立即用拖把擦去血足迹，并且规定不准看人，不准看现场，不准将此事外传，谁传出去谁负责。就这样，同学们长时期不知王永婷同志的死活，不敢过问，不敢议论。工作团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罪行，开脱自己的罪责。但是，他们这是枉费心机，王永婷已经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的罪恶书写到历史的铁券上！当王永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企图从她身上榨取她最后的一点油水，工作团分三批到抢救现场，并对医生说："她是保皇派，她身上有许多重要材料，要尽力抢救。"

王永婷终于在 7 月 9 日下午 1 时 40 分，永远停止了呼吸。

王永婷惨死了，工作团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她的迫害为了逃脱罪责，硬把"反革命"的帽子牢牢地戴在王永婷的头上。他们立即在全系范围内布置讨论，预先定下调子，说"王永婷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继续连夜调动人马，整理王永婷的"反党材料"。一个工作组成员整不出王永婷的"反党材料"时，立刻被骂为"笨蛋"。这是整材料还是编造材料！

在王永婷死后，工作团的老爷们就说过："中国七八亿人口，少一个、

两个没关系”。工作组一个系领导恶毒骂道“她死了还给国家每月节约30几斤粮食”，“她死了比鸿毛还轻，狗日的，把她烧了，死了也要把帽子戴上。”听听这些诅咒，这些人还有一点人性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心肠何其毒也！

王永婷死了，她用鲜血和生命对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最强烈的控诉。

每每想起王永婷同学所遭受的残酷的批斗和侮辱，想起她怀着满腔的委屈和悲愤被迫死亡，我的眼睛里就涌满泪水。

我是不相信迷信的，可是偏偏让我在这种场合与王永婷见了最后一面，这个事情的偶然性太过离奇，使我一直不断地在思考，交大的人都知道，从学生食堂到医务室，按照小跑的速度，也就只需要一分多钟，如果我们班的批判会结束早一分多钟，或者，再晚一分多钟；如果王永婷跳楼的时间，早一分多钟，或者晚一分多钟，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不可能看到这么凄惨的情景。使人怀疑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作这个事情，使得时间赶得这么巧。如果说是偶然，这个事情的偶然性也太过离奇，让人不敢相信。所以我只能解释，也许这是她在冥冥之中对我的临终嘱托，希望我，将来为她年轻生命的逝去，讨得一个说法。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她有这个权利。我一直在心里边把这个事情当作我的一项义务，一直不敢忘记。我复印了她的照片，一直保存在我的移动硬盘里面。

每年，我都会有若干次想起她，不过我每一次，都只能遗憾的告诉她，王永婷，你还要再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我也不知道，这样每年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话，还要对她说多少年？多少遍……

现在，一个老干部在五七干校呆上几年，都可以大肆渲染受了非人的迫害。我也知道，王永婷所在系的工作组的那位领导，很快官复原职，以后还

被提拔；而被老干部的错误造成青年学生的死亡，这无辜的生命却没有办法申诉，无人理睬。这合理吗？这公平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乞丐，他们的生命没有贵贱，而在现实中，他们生命的价值，差别竟是那样的悬殊，这合理吗？这公平吗？

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不该逝去而终于逝去的生命，都会化作一朵永远不败的血红的雪莲花，无论是有意的，无意的雪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无论雪埋得多么深多么厚，总有一天，雪会化掉，人们总有一天会注意到，这一朵永远不败的血红的雪莲花……

王永婷，你还要再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我相信，我希望你也要有信心，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王永婷同学所遭受的残酷的批斗和侮辱的叙述引自王永婷同班同学。）

十
西安交大文革组织的称谓和演变

1966 年 6 月 3 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前，学校的文化革命由彭康为书记的交大党委领导。

1966 年 6 月 3 日省委工作组（后改为工作团）进驻，以彭康为书记的交大党委被停止活动，学校的文化革命由由省委工作团领导。

1966 年 7 月 6–8 日工作团召开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这就是第一届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团长严克伦在 7 月 6 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颠倒黑白，宣布彭康同志为叛徒。

1966 年 8 月 16 至 8 月 18 日陕西省委门前的静坐就是在校内广大师生

的呼吁和推动下，董树梧为首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参与组织和领导的。我那个时候是跟我们班的同学一起静坐，地点就在和平门里。我在东方红广播站的喇叭里听到刘澜涛传达他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也说到交大，说他们的看法和处理是错误的。说到我的时候，是说“比如，西安交大的李世英，是一个学生，他不是反革命嘛。”但是也没有说我是“革命的”。在这次静坐斗争中，我没有参与任何组织和领导工作，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静坐者，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束。

这次静坐以后，师生们群情激奋，学校贴满大字报，对校文革委员会的软弱无能表示强烈不满，强烈要求改选校文革委员会。校文革委员会接受群众意见，立即主持了校文革委员会的改选。

学校的各个系、部，大体按照人数，分配校文革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然后各系、部自己组织提名选举出各自的委员，集中到学校，成为学校文革委员会委员。这次选出来的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学校老图书馆召开，先是选举常委，然后由全体常委推举副主任，主任。

这次选举选出来学校文革领导机构是第二届学校文革领导机构，以我为主任，名称没有改动，还是称为“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名称比较规范，仍然沿用这个称谓，换酒未必非要换瓶子。

后来，交大学校文革组织的称谓“交大文革总会”是交大学校文革组织的称谓的简称之一：因为交大还有几个系和部，都要成立文革会，比如说，机械系，全称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相对于学校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为“机械系分会”，这样学校文革委员会就相对称为“总会”，即，“交大文革总会”。一些人写大字报还嫌长，又简写成“交大总会”，“交大总”，“交大（总）”。

“交老总”则先是外部单位（包括同观点和不同观点）对交大校革委

会的俗称（还是来源于交大自称的“交大总会”，“交大总”，“交大（总））”。以后交大的一些师生也有自称“交老总”的。时间长了，学校的师生把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姓氏后面加上“老总”作为亲切随意的称呼，如把我和武登才、沈荣水、陈柏荣称为李老总、武老总、沈老总、陈老总。

“狡老总”的说法是在双方发生分歧，出现“反右倾”之后，对方认为我们提出“反对打砸抢”的口号，是引导他们上当，为了跟我们对抗，他们就提出“打砸抢万岁”、“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口号，使他们犯了错误。所以把我们叫做“狡老总”，说我们交大“狡猾”，“两面三刀”等等。

北京和外地一些文革组织常常以 xx 兵团、战斗队形式出现，像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及后来的“井冈山公社”等等，但是，西安的学校一级的文革组织一开始就是以“临委会”、“筹委会”的名义出现，至于下属组织，则以战斗队、兵团的名义出现。

北京和西安的这个不同可能与交大的文革组织称谓有关，因为交大文革委员会成立比较早，大家也都认可，都称为“文化革命委员会”，只是加上了“临委会”、“筹委会”后缀。

1967 年 7 月 1 日，经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正式批准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員会》，校革委会是由学校文革总会主持，采用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自下而上的群众海选，一层层推选，直到学校革委会主任。

到 1968 年 8 月 29 日，工、军宣队进校后，名义上仍然由校革委会领导学校文化革命，其实是工、军宣队行使全面领导，校革委会主要是配合工、军宣队的工作，执行工、军宣队的决议。

随着校革委会中学生代表毕业离校，校革委会的成员越来越少。到 1970 年 8 月，最后一批学生代表毕业离校，只剩下教师代表，工人代表，干部代表，已经没有学生代表了。

1973 年 9 月 3 日工、军宣队撤离，由林茵如为书记的交大党委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

附文一：李世英的三封遗书

▲第一封《最后几句话（摘录）》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最后用“亲爱的”这个字眼，固然你们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毕竟是同学两年，一块生活，一块学习，在同一饭桌上说说笑笑，高谈阔论；尤其是在思想上，相互帮助，不断地取得了进步。现在要永远再也不能如此了，再也听不到鞠烽炽山南海北的谈论，再也听不到诸文君、方必福的二胡，再也看不到忠诚老实的大个子，再也听不到李群滔滔不绝的朗诵，再也……的确，这时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留恋！算了吧，决定了！

不过最后请同学们替我了解一些情况，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同学们给我调查清楚（1）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要反党？还是要保卫党？……（2）我布置文章是要煽动大家反党，拉同学下水吗？（3）一个人某一点犯了错误，是不是这个错误就必然贯穿到他的每一个行动里？是否他的过去就必须否定掉？入大学后，我是否工作卖力？是否积极要求进步？是否刻苦学习？是否通过忆苦思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是否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个人野心？这些的主流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吗？……

我的态度是镇静的，因为我心中无“鬼”，我敢向党面对面地回答：

“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但也感到非常委屈和冤枉，……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同学们早晚也能看得清楚。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的话谁也不信。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今天晚上，我是多么想和同学们多谈几句话，以后我永远也不能谈了啊！……

希望我班青年同学更加努力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赵景贤现在转变很大，过去我们关系不好，现在有初步的基础，可是却要永别了。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如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象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

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李世英　1966年6月8日晚12点半

▲第二封《终前碎语（摘录）》

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现在有什么人敢为我作证？有什么人能理解我的内心深处的苦痛？有什么人能够澄清事实？

……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



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至眼前，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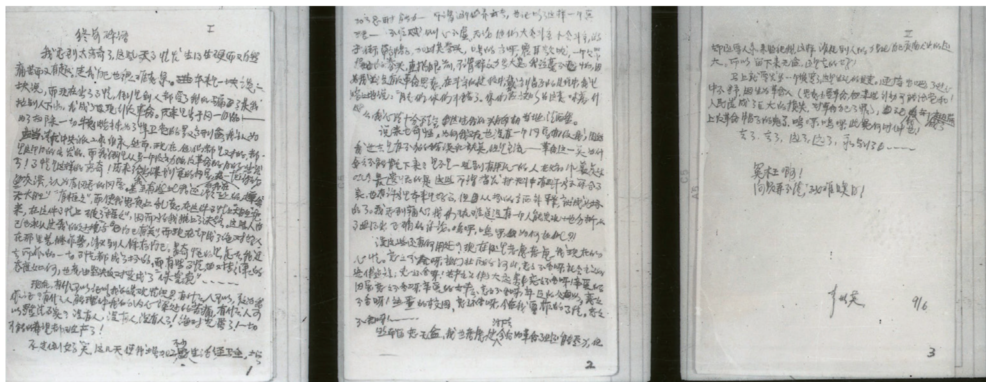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来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无益，还是去的好！

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为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

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

冤枉啊！问题弄不清，死难瞑目！

李世英　1966 年 6 月 9 日



▲第三封《给父母亲》

父母亲：你们好！请接受孩儿最后一声问候。

本想到家里去最后见见你们，无奈现在不行了！

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该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二十余年的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做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

望父母多辛苦，自力更生。

望父母勤教三个小妹，使他们更好的成长。

望父母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

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儿　莲枝 上

1966 年 6 月 9 日（注：莲枝是李世英的乳名）

附文二：在陕西毛诗会咸阳分会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2013 年 9 月 8 日

一、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对我和我全家恩深似海

我老家是河南的，解放前的河南苦难深重，水、旱、蝗、汤、匪，五灾翻滚，百姓无法生存。就像人们说的：河南人民多苦难，水旱蝗汤加匪患。

有人硬说那时好，黑白颠倒瞎扯淡。

冯小刚拍的电影《一九四二》比较真实地表现了那个苦难的时代，但是实际上那只是人们经历的苦难的万一。

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树皮、草根、棉絮、大雁屎都成了人们的食品。这里说的“水”指水灾，这个水灾不光是黄河的，还有黄河的支流，以及其他河流的，经常出现水灾；除了自然的，还有人为的，那就是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坝。“旱”，旱灾，那时水旱灾交替，人民苦不堪言。“蝗”，蝗灾，河南称“蚂蚱”。“汤”，指国民党在河南的军阀汤恩伯，曾经管制河南。“匪”，土匪，河南一些地方称“砸家”，经常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一些国民党军队，给养不足，军纪涣散，就靠抢老百姓的钱物过日子。老百姓也不敢问他们的部队番号，只能统称为“坏兵”。

说起蝗灾，人们无法想象它的可怕，听老人说，蝗虫飞过的时候，可谓“遮天蔽日”，还发出吓人的呼呼声。掉落的蝗虫满地都是，水井里、锅里、水缸里、屋子里……到处都是蝗虫和它们的尸体。水井里一股臭味，水也吃不成了。刚开头，人们把蝗虫放在锅里烘干，用来充饥，到后来谁也吃不下去了。那些蝗虫落在庄稼地里，只听见一阵“刷刷”声，等它们飞走的时候，地里的庄稼全部成了光杆……人们也在地头挖一些深沟，把蝗虫赶进去埋掉。但是，蝗虫太多了，很快挖的沟填满了，可蝗虫还多得是……蝗虫飞走了，它们给人们留下的只是半年的绝望。

我的外祖父家，并不是有钱人家，只能勉强度日，但是，也遭到土匪两次。把一切东西都抢光，我的外祖母苦苦恳求他们，才给留下了一床破棉被。

我的家乡的人会打铁的手艺，我外祖父带着几个人，推着一辆铁匠车子，到外地干活。那时的铁匠车子就是一辆独轮车，上边放的铁匠炉子和风

箱、工具、行李。风餐露宿，非常艰苦，在外面干了几个月的活，要回去了，看着当地的盐比较便宜，就把所得的工钱买成盐，想带回家。谁知走在路上，就被那些所谓的“坏兵”抢等一干二净，连铁匠车也被抢走。几个月的辛苦什么也没有落下，还赔了铁匠车子。

解放了，我到了陕西，我父亲是一个装卸工人，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我们姊妹四个都能上学，特别是我还上了大学，这在解放前无法想象的。在上大学期间，我不仅不需要家里负担，而且我还能“挣钱”——学校给我每月 15 块 5 的助学金，我用 13 块钱，有鱼有肉，吃得很好，剩余的两块钱，我还可以买文具，买书，买日用品。这只有在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上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李世英”的标语，戴着高帽子游街。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救了我的命，给我平了反。

我和我家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共同经历。他们都沐浴着毛主席的阳光雨露，他们都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由奴隶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水有源，树有根，穷苦人家爱党爱毛报恩人。

这不是文学的夸张，而是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当然，这也是我和我全家人心声。

二、尤其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在毛主席装着全世界人民利益，日理万机的脑海中，一直惦记着西安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而且还记得了我的名字。这是我终生的荣耀，也是对我的极大的促进。

1966年7月21日毛主席在《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说：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毛泽东 1966.07.21

毛主席又在1966年9月7日《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

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07

北京红卫兵领袖李东民回忆中说，1967 年，毛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

毛主席在 1967 年 2 月 14 日又就西安问题做了重要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对王明坤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毛泽东 1967 年 2 月 14 日）

1967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文件，

在文件中说到“李世英同学”地方，毛主席写了注释：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毛主席注

在我提出的建议“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面，毛主席写了批语：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毛主席注

在我提出“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

的建议后面，毛主席又写了批语：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毛主席注

能够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爱护，在他浩瀚的脑海留下记忆，这的确是千年难求的历史际遇和无上荣光，我怎能不把它永远铭刻在自己心中，怎能不把它珍藏着脑海深处，永志不忘！

三、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头号伟人，在世界的伟人榜中，他也是完全有资格名列前茅的。

他在哲学、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等等各方面都极大地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列宁以后最大的贡献；而且在文学艺术、军事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总结和提炼出自己独特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的最新成果。这些都成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文明和精神的共同财富。

有人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不再可悲？我们的民族如何彻底摆脱成为“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悲惨命运？这正是目前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危机和噩梦。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护、爱戴、崇仰我们永远的领袖、永远的导师毛泽东！

四、毛主席在建国后所建立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正是从西周三千多年来希望实现的大同世界的架构，当然这只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而这正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和全世界的社会形态，这才真正是全世界“普世”理论。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创建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官员不再是官僚，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军队不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而是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武装力量——所以可以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历史奇迹；你只要专心工作，住房、孩子上学、公费医疗、死后丧葬……总之，从生到死，不需要你多操心。

正是因为生活安定，生死无忧，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得到超乎寻常的提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很高，但是，拾金不昧蔚然成风，有些外宾丢了东西，不管在哪里丢的，很快就能够完璧归赵，使他们深深感动。拾金不昧，成为全国人民的习惯，甚至小孩子拾到一分钱，也主动地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人人学雷锋，人人当雷锋，成为一种国风。毛主席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两句诗非常贴切地表述了中国人民当时那种自豪、自信、自主、自由、自立、心情舒畅的精神风貌。实实在在地说，那时候中国的六亿人，可以说是人人都是传说中的道德模范尧舜。这些，都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和钦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现实，毛主席把占据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由封建统治阶级主宰的“小康社会”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把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同世界”之梦在中国大地上从空想变成现实，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创举，是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他给现在的、

未来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样板，这个光辉的样板必然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们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五、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大同世界初级阶段”的架构更加完善，更加巩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在完成了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攻和复辟，解决社会长治久安，人民永远当家做主的大问题，开拓全世界人民建造一个和平、平等、自由、和谐的理想的新世界的新的途径。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太高；这样一个伟大的理论，更会永远照亮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漫漫的前进道路。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就是毛主席给全世界人民规划的理想乐园的雄伟蓝图，我们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把它变成现实。

六、毛主席以 73 岁的高龄，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为了探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以惊人的魄力，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结了许多最先进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组建了以两个三结合（“军干群”，“老中青”）为基础的各级政权机构，更是其中理论和实践的极为重要的创新。

它的历史意义至少体现在人类社会的人民民主形式和制度的探索上，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总结的素材。

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干群”、“老中青”的结构中，“军干群”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尤其是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这是前无古人，史无

前例的，让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就可以身贴身、面对面的直接了解、监督各级权力机构的运作，并且参加管理；“老中青”既在年龄结构上代表了各个年龄段的群众，又为老同志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又为中青年干部学习和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最好的方法和组织形式。

全国各级“军干群”、“老中青”的结构的革命委员会，比以往的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更加接近了无产阶级政权最理想的政权结构形式——巴黎公社，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一个大飞跃。

另外，逐步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机关，三分之一在基层，三分之一学习。

这些措施，都是防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贪污腐败等等的极为有效的刚性措施。

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不胜枚举。

什么是最先进的思想？那就是毛泽东思想；什么社会形态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那就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建立的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将不仅在精神道德文明方面，而且也将在物质文明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人民尊敬和钦佩的民族，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的首善民族，使中国成为世界的首善之国，

总而言之，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伟人，是伟人中的伟人。与毛主席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人都只能是“一览众山小”，这就是毛主席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最新成果，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书、护身符，是中国人民和全

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这些，都已经被历史证实，而且还会被以后的历史反复证实。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是的，就是有一小撮披着所谓“文明”外衣的人，他们总是忤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对毛主席这个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大英雄，不仅不崇拜、不敬仰，对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文明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不拥戴、不学习、不实践，却极尽造谣、诬蔑、攻击、谩骂、贬损、诋毁之能事，他们的最终的罪恶目的就是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他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他们用什么做武器呢？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孔子在教育和伦理方面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孔子的社会理论是倒退的、反动的，支持奴隶制复辟的，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不准反抗，不准造反，麻痹人民，让他们安心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让统治阶级能够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统治。孔子那一套，历史上不是没有用过，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千多年时期里，是什么效果呢？两千多年来用孔子理论建立的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度过，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缓慢前进，只是一个个王朝在腥风血雨中建立，又一个个在遍地血污中崩塌，广大的人民群众饱受苦难，民不聊生。如果孔子理论真是建设理想社会的独门暗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王朝更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起义？为什么还会有辛亥革命？为什么还会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还会有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还会有孙中山、毛泽东？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从一诞生就是靠的血腥镇压，残酷剥削生长和发育起来的，就是靠吸吮广大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的。我们难道这么快就忘记了吗？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抗日战争等等等等，这些制造了我

们民族苦难的强盗，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些糊涂虫和别有用心的人的老师和榜样？社会实践也用大量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孔子的封建思想和嗜血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精神崩溃，道德沦丧，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丧葬，新的五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对立情绪加剧，整个社会成了一个高压锅，成了不定时的大炸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些，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清醒吗？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他们只能拿出孔子和资本主义来对抗和抵挡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进一步深入人心，说明他们已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新东西，拿不出新玩意，只能像屎壳郎扒粪那样，从历史的垃圾和尘土中寻找所谓“先进”的东西。可以预言，他们必然会无功而返，同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他们这些历史垃圾、阴霾雾瘴清除干净，重新澄清玉宇。

总之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毛泽东是中华民族至功至伟的大英雄，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实现大同之梦唯一的正确的理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通向悬崖和深渊的歪道邪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

只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富中国、强中国，其他的社会庸医开出的药方或者是毒药，或者是无效，这是已经被验证、还会被不断验证的历史的铁论。

因此我崇敬毛主席直到永远，我笃信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结束。

附文三、谭立夫的血统论

【编者按】题目为编者所加。

这个问题对于文化革命的影响极大，而且非常深远，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被批判，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一直作为特权阶级的潜意识顽强地对抗着革命力量，并且在特权阶级压倒了革命力量，重新取得整个社会的统治权以后，实际上把血统论作为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哲学基础。文化革命的失败和血统论的胜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所以，应该好好地了解它。

1. 关于血统论的提出者谭立夫

说谭立夫是血统论的提出者是不准确的。因为血统论的历史至少已经有 3000 多年，自从社会上出现了阶级，也就有了血统论；血统论正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稳定运行的合法性的宣示者。谭立夫只是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个有影响的宣传者和代言人而已。

中国社会的阶级社会历史很长，因此血统论思想基础深厚，无论是对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

谭立夫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汉族，1942 年生，湖南资兴人，中共党员，1966 年入党。1968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副“鬼见愁”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谭立夫立即贴出一份《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称赞这幅对联“好得很”，甚至把党的“重在表现”政策说成是“修正主义”。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的大辩论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系统的“血统论”论点，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家庭成分就决定了个人的立场和表现等。

这里必须说明，谭立夫的父亲是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

2. 谭立夫的大字报和讲话

从对联谈起

谭力夫（1966 年 8 月 12 日）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副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副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副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

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流向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转抄，贴在要道旁。一时间，谭立夫的风头压过了聂元梓。单是在福建，全省印了几十万份，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全省各地，有的单位还规定要学习讨论他的讲话。

各地红卫兵组织都把他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作为组织路线，只许“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加入红卫兵，并把斗争矛头指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大搞“打、砸、抢、抓、抄”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行为。但是，他们却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对造他们当权派老子反的造反派，极力反对和破坏，最典型的就是“8.24”血洗清华园事件。

3. 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的批判

这一口号 1966 年 7 月 29 日贴出，仅过两天，8 月 2 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就明确指出这是血统论；8 月 6 日，江青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10 月 9 日周恩来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 '左’实右”；10 月 24 日毛泽东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10 月 16 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 12 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

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的批判了谭力夫。

事隔不多久，1966 年 12 月 18 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我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比较准确深刻，一下子就抓住了本质——血统论。

而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谭立夫毕竟是一个学生，把矛头指向他就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虽然，血统论是特权阶级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当时并没有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出来宣传血统论，而谭立夫又没有资格作为特权阶级的代表。

4. 谭力夫出狱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 年 5 月 29 日，谭力夫被释放。

5. 谭力夫后事

谭力夫被释放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1969 年被分配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 年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听说在我入狱时，他是解放军某部的团长。

后来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原来他改名字了，叫谭斌。

重新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故宫博物院丢失几件文物，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网友们强烈要求追责的过程中，也同时暴露了谭立夫的隐身之处——故宫博物院。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笑话吧，竟然是盗窃犯向世人披露了一个很多人都希望知道的重大的秘密。

请看故宫博物院对他的介绍。

谭斌，汉族，1942 年生，湖南资兴人，中共党员，1966 年入党。1968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函授）。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 20 年，后奉调转业，调国务院直属单位从事经济、人事管理工作。1994 年 4 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1996 年 2 月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1996 年 7 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97 年 10 月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协助院长处理党务及其他工作。分管党委办公室、人事处、资料信息中心、经营管理处。

看了这个介绍，谁也不会联想到这个“谭斌”，就是当年那个“谭立夫”！

血统论的风靡一时，煽起所谓“红色恐怖”的风暴，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许许多多的血案，残害了无数生命，但是它的炮炙者和宣扬者，最终成为血统论的受益者，而批判和反对血统论的造反派，最终背上了这些血案的黑锅，无辜地为这些残忍的暴行顶包。

6. 我为什么反对血统论——谭立夫的对联

一看到谭立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讲话时候，马上就引起我的反感。按说，我的家庭出身又不是什么“黑五类”，许多人出身“红五类”的人，看到这个对联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异常。

我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我们学习过党的阶级路线和政策，那就是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这是正确的，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是我对血统论能够正确认识的原因之一。我对血统论的认识还有更早的、更深刻的感性认识。

一个是在语文书上学习过的“陈涉列传”，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陈胜、吴广用他们的果敢造反起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短短的历史之问，对于我，那是响彻云霄的巨雷，那是划破黑暗的历史长空的闪电，永远地、深刻地留在我的心中。“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无产阶级的回答是坚决否定；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血统论”却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定海神针一样的有力工具，始终无法撼动。到了新中国，在要摧毁一切反动文化的文化革命中，还会出现新版的血统论，只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维护自己特权的工具。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个老师——可能谁也想不到——是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

《流浪者》是印度现代电影人的一部力作，创作背景是印度现代社会在废除种姓制以后暗烙在人民身体的阶级印记。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过多次，一直到我出狱以后还买了碟片看，至少看过十几次，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我觉得它的主题、人物、音乐、歌曲、演技都十分出色。

片中主人公拉兹的母亲怀着身孕，在一个雨夜里被出身望族的丈夫踢到门外，只因腹内的孩子来历有些可疑（母亲曾在初孕时被一个名字叫扎卡的小偷劫持过）。母亲再三哭诉自己的清白，可是没有用，拉兹父亲家族不能容忍自己家族名声被人所辱。于是，拉兹和他母亲成了牺牲品。拉兹和母亲象狗一样被赶出家门，开始他们一生的苦难生活。拉兹和母亲住在贫民窟里相依为命，在学校里认识了美丽的同桌丽达，她不像别的同学一样瞧不起穷苦的拉兹，经常把自己的好东西拿给拉兹吃，她喜欢拉兹的聪明善良，两小

无猜的他们成了好朋友。这时拉兹还不知道，她的养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拉兹长大了，家庭的贫困使他不可避免地辍学。他被流氓头子扎卡收为弟子，教会他一身高超的偷盗本领，拉兹并不不知道，扎卡选中他，是为了对他的父亲实行报复。拉兹的父亲是个法官，曾经对扎卡判过重刑，作为法官，拉兹的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扎卡当年劫持拉兹的母亲只是这报复的第一步，他的目的是让法官的儿子变成象他一样的贼。他成功了，拉兹成了手段高超的贼。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拉兹和丽达再度相逢，拉兹偷了丽达的钱包，翻看钱物时才发现他和丽达儿时的合影。他装做见义勇为者，把钱包又还给丽达。这时的丽达，更加甜美可爱，并且已经是大学法律系学生，就要毕业了。拉兹对丽达表明身份，丽达看着眼前英俊的男人，想起儿时善良朴实的拉兹，心里掀起涟漪。

拉兹和丽达相爱了。当丽达在月光下唱起那首令人心醉的月亮之歌时，拉兹却在自己的家里犯下杀人重罪。强盗扎卡被警察追赶误闯到拉兹家中，拉兹的母亲认出这个人就是当年劫持过自己的扎卡，她怒不可遏地要去向警察告发，扎卡要杀掉拉兹的母亲，这时，拉兹从外面回来，看到扎卡威胁自己的母亲，一怒之下，杀死了恶魔扎卡。

法庭上拉兹的辩护律师是丽达，丽达为自己的爱人和正义在法庭上和自己的养父大法官唇枪舌剑，法官以一个出生在贫民窟里的人不会有高尚的人格为论点拒绝判拉兹自卫误杀。当大法官再次宣称“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时，拉兹的母亲来到法庭，拉兹母亲告诉大法官，拉兹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大法官心灵受到巨大撞击，全场哗然唏嘘一片。

最后的审判还没有降临，拉兹的父亲良心发现，来看望儿子。拉兹已经

不能说清自己会不会原谅父亲，丽达来告诉他，一辈子等着他，拉兹忍着对丽达的强烈感情告诉她不要再等待自己，因为他明白自己在这里要待上很长时间，甚至是一辈子。

影片说明了一个道理："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是错误的，法官的儿子可能成为贼，贼的儿子也可能成为法官，这是由孩子出生后生活和教育的综合结果，而与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贼还是法官无关，总之，血统论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工人的儿女永远做工，农民的子女永远种地，而那些特权阶级永远享受特权，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么，我和许多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连上学也是不必要的，上大学更是僭越违法的行动了。

人生而平等，不应该因为出身而被分成三六九等，如果我们现在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努力去做，而不是为可憎可恶的等级制度、血统论辩护，更不能成为可憎可恶的等级制度、血统论的卫士。

我特别担心的是，这些谬论的始作俑者是他们的爹妈，那些高官厚禄的大人物，因为血统论正是他们的护身符、护官符。血统论在政权结构方面希望达成的就是世袭制，就是把他们已经得到和以后得到的权势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如此。

我觉得当时中央首长对血统论的危害认识不足，批判不够有力，纠缠在一些字句上，修改修改。其实，血统论所暴露的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阶级立场、唯心主义反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不能把这样重大的问题搞成写对联的文字游戏。

我觉得这些高级干部子女肯定不会"自来红"，却很容易接受血统论，这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享受的特权的家庭环境决定的——人们的社会

存在决定他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个倒是永远如此。

当年因为没有大人物出来鼓吹血统论，只有谭立夫站出来宣扬，无法深入广泛地批判血统论。所以，当文化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彻底镇压以后，血统论立即成为特权阶级的思维定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成了或明或暗的社会层级规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血统论”应该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有趣的是，昔日组成的“联动”、“红色纠察队”的高干子女，如今要么是手握重权，居庙堂之高；要么是大公司的董事长、CEO，身家亿万；要么是定居欧美，成为寓居海外的高等华人：他们的家族仍然是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而且还要第二代、第三代……地延续下去。就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鼓吹者谭力夫，文革后仍然官运亨通。这一切，都只与他们的出身和家庭相关，而不管文化革命中他们的功过如何。

与此成为对照的是那些平民出身的人、黑五类的子女，文革后期他们基本上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回城后许多人只能当个小工人，其中不少人在40、50的年龄又遭遇下岗，不得不在路边摆摊谋生，其子女因家庭困难难以完成高等教育，最终的命运很可能是子承父业，在社会的下层艰难谋生；而那些平民出身的造反派，则成为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最后，在1976年以后，全部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钉死在社会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同样，不管文化革命中他们的功过如何。

难道这就是我们2000多年以后，对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历史之问的回答？时代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究竟是“拨乱反正”了，还是“拨正反乱”了？只是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要批判血统论，你所面临的，不再是大字报，辩论会，而是警察和监狱。

从这个角度考察文化革命发起的初衷以及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发人深

思的，从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对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血统论，到最后文化革命失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血统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且成为划分社会权利和利益的规则，不是很让人感叹吗？

附文四、母校，我爱你，永远爱你

810—41 李世英

老娘生我，10 月怀胎，

只有 10 个月，我就离开了母体。

可是，在你腹中，我度过了 6 年，

远远超过了老娘对我的抚育。

在你腹中，

我享受了那时最好的伙食，

还有最纯真，最深厚的师生情谊。

按照你的愿望，全面提升了我的德智体，

在这里，

我从幼稚走向成熟，

完成了投入社会的成人礼。

在这里，

我懂得了，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时刻准备着，为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强盛，挺枪跃马。昂首奋蹄

在这里，

你给了我满满的自信，坚韧不拔的毅力。

走出校门时，我们还在低吟着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雄浑诗句。

奋斗创业的激情在
我们心中奔腾不息，
风华正茂，英姿勃发，
决心要
直挂云帆济沧海，长风破浪千万里。

从你腹中离开时，
我们带走了，简单的行李，
和沉重的书籍，
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改变——
你的脐带之血，
已经和我们的血，混在了一起，
构成了我们基因中的染色体。
我们再也不能改变，
而且永远不想改变——
因为它联系着我们的母体。
不经意中，你还把
理想，人格，志气，勇气，
还有深情的祝福，
悄悄地放进了我们的行李。
时间，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
我们头上的白发，
和额头深深的皱纹，

描述了我们人生的经历。

我们有的成功了，

有的失败了；

有人成了富翁，

有人家徒四壁；

有人成了闻名的学者，

有人还是默默无闻，

没有创造出什么惊人的业迹。

有人顺风顺水，事事如意；

有人时乖运蹇，筚路蓝缕；……

但是，你的这些子女，

都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都曾经拼了全力，

既为了我，也为了你！

你的子女众多，千千万万，遍地桃李，

不可能记着每一个子女。

但是你的每一个子女，

都不曾把你忘记，

一直把你深深的刻在自己的心里。

我们为你的每一点成绩都激动不已；

而你有一丝一毫的不顺，

又使我们无比的焦急忧郁。

正像对待我们自己的生母，

我们可以说她有什么地方不是，

但是如果别人说起，
我们马上会断然回击，毫不犹豫。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
何况我们的母校，
你阿娜多姿，青春永驻，
仪态万方，端庄秀丽！
我们为你自豪，为你骄傲，
我们心里都记着，
永远记着，
我们是你的子女！
敬爱而且亲爱的母校，
我们爱你，永远爱你！



紀念李世英

■/ 李志傑



2016 年 2 月 15 日李志杰高喜爱夫妇在李世英家门前与李世英合影

2017 年 3 月 27 日，我的微信中出现了一则令人吃惊的信息：李世英 3 月 27 日凌晨 3 时 39 分去世了！对此消息我感到疑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看起来挺好，很健谈，怎么会走了呢？下午 4 时，我拨通了李世英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郭根英。根英说，前些日子世英查出患了肝癌，他怕劳顿大家前来探视、慰问，就一直对外封锁消息。在与病魔抗争的最后时刻，世英叮嘱，他去世后不发讣告，不告诉单位和友众，丧事一切从简，不留骨灰！所以没有通知各校友。现在有几位校友闻讯前来，发出了消息，感谢大家的关心，就不劳顿校友奔波吊唁了。

听了根英的叙述，我更感到了世英博大的胸怀和澹泊名利的人生信条。我同许多校友一样，委托现场理事的几位校友在挽联上署名哀悼，祝世英一路走好。

我在西安，世英居咸阳，相距不远，多年来常有走动。有一次交大校庆时，我在校园图书馆前碰到了世英，他正同他们810—41班的同学在这里聚会，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不时有外班的校友和熟人拉世英合影，搞得世英应接不暇。我和世英攀谈了几句，就说咱俩也合个影吧。他们班的一位同学看到世英忙不过来，就打趣地说："谁再要和李世英合影，就要收费！"逗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我和世英合影后，也就赶紧分手了，免得给他们的同班同学聚会添乱！


李志杰和李世英在交大图书馆前合影

我经常去咸阳，去了总要到咸阳市科委的家属楼去看望世英。有一次，我到世英家，问他最近忙什么，他说他正在研究汉字拼音化的课题，并说他已把一万多条汉语词汇拼音化，可惜电脑出了故障，把这一万多条词汇全冲掉了！我对他说，汉语拼音化是个十分困难的事，许多人都尝试过，没有成功。汉语虽然复杂，但有它独特的魅力，不是拼音化能替代的。我建议他写写回忆录，把他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写一写，给社会留下一些文史资料财富，他说可以考虑这件事。

在后来的几次接触中，世英再也没有谈过研究汉字拼音化的事，而是说他最近写了些什么稿子。我建议他将有些稿件发给交大，或让交大保存资料，或在交大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后来，世英给我发来一首歌颂交大的诗《母校，我爱你，永远爱你》，让我帮他投给交大的刊物。他说，如果发表，署名李世英不方便，可署李工物。我将此诗转给交大校史研究中心，希望能在校史中心网站发表。校史研究中心杨澜涛老师读了此诗，深为李世英热爱母校之情所感动，让我转告李世英表示感谢。

后来李世英又写了一篇《我与彭康校长》长文，托我转投交大刊物，我发给了《校友之声》编辑部，编辑部对李世英的来稿表示感谢。

2016 年 9 月 23 日，西安交大举行纪念彭康诞辰 115 周年及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交大校友联络部和校史研究中心邀我参加会议。我告诉校友联络部和校史研究中心，李世英写过一篇《我与彭康校长》的文章，我邀请李世



2016 年 9 月 23 日任庆昌（左一）、李志杰（左二）、王玉璋（左三）、？？？（右三）、李世英（右二）、韩国利（右一）参加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

英同我一起参加座谈会。这天，世英早早从咸阳赶到交大，参加了交大在南洋大酒店举行的纪念彭康诞辰 115 周年暨彭康教育思想研讨会，会上，世英用摄像机拍了大会盛况。会后交大校史中心宴请了参会校友，世英同大家相聚甚欢，侃侃叙旧，充分体现了交大师生对世英的忠诚友情。

交大师生对世英的评价普遍很好。我在写《钟兆琳传》时，采访钟兆琳老师的长子钟万劢教授，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钟万劢教授动情地说：“李

世英、戴慕蓉是好同志！”事后，我将这一情况用电话告诉在咸阳的李世英，世英在电话中平静地说：“公道自在人心，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世英走了，他所奉行的做人原则和践行的老交大传统永远留在交大人的心里！

2018 年 2 月 25 日完稿



作者简介

李志杰，陕西省岐山县雍川镇杨柳村人，生于 1943 年 11 月 7 日，1969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 43 班，就职于新闻出版系统，主任记者，著有《李志杰高喜爱文集》五卷，《孙继元临床实录》《汪应洛传》《钟兆琳传》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居西安市。



我與交大文革總會

■/ 沈荣水

一

交大文革总会是如何反击“打砸抢”浪潮和坚决反对“武斗”的？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西安交大文革史的回忆录

我是一九六二年入学西安交大，力学二一班的学生。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却被推入了文革这一政治的漩涡之中。我们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人。因为被卷入这段历史而被打上了某种政治烙印，造成后来十多年来经受不公正的待遇。

我一九六八年九月毕业分配去安徽丹阳湖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中途就被勒令回陕西省参加《原陕西省两派革命群众负责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地点在蓝田汤浴。实际上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审查，历时半年。再回农场后，连队干部都是对我冷眼相看。

到了单位以后，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又被三个人从上海押到西安接受“清查五一六”隔离审查，当时陕西省已内定我为重点审查对象。在西安火车站出站口不允许见家属。一到交大，就给我一个“下马威”，402 大会议

室召开大型批斗沈荣水大会，高呼口号。完全像对敌斗争一样，气氛十分紧张。先大会批斗，接着小会审问。当时连睡觉和去食堂吃饭都被监管着，看见戴慕蓉也是被人跟着去食堂，我们之间只能当作没看见，不能有表情，更不能说话。房间窗子都用铁条钉死，没有自由。就这样被审查了一年，说不做结论，但是这些所谓的无中生有的材料全都放进了交大的档案室。

再回到工作单位，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看法可想而知。后来上海单位里又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所有那些材料都转到了上海单位，这就成了重新审查我的依据。我就更成了上海科技系统的一条“大鲨鱼”，我这个“带拉链的麻雀”就没完没了地被审查，一查又是好多年。尽管给我做了结论：“沈荣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政治认识性错误”。但是我仍然被单位列入了“黑名单”，一有运动随时要再接受审查。从此以后我只有干活的命，没有提职和分配房子的份，等于属于了“另类人”，直到离开单位前，我一直还住在单位单身集体宿舍里（即“筒子楼”）。就这样一直过着不太愉快的生活。我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连续两次因肝炎病发作住进传染病医院。就是因为心情长期忧郁而得病。戴慕蓉能来看望我，十分感动。可见原 21 军军长胡炜给我们栽黑脏造成的后果影响多么大，时间是多么长啊！

一九六六年还没弄清文化大革命是咋回事的时候，我却被推上了西安交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一九六六年八月被选为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的副主任，一九六七年七月被选为西安交大革委会的副主任。我是西安交大文革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作为亲身经历者不来写这段历史，那么西安交大这段真实历史就是一段空白，真相就会被淹没，甚至会被描绘得一团漆黑。所以，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对西安交大文革的重大事件说出真情。公正地说，李世英和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在西安地区形势极其复杂艰难的情形下，为

维持西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安宁，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坚决反对“打砸抢”，坚决反对“武斗”，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交大，在西安，在陕西，文革中幸有李世英，幸有交大总会，幸有西安交大，才减少了许多的损失！少死了多少无辜的冤魂！才少了许多因为参加武斗而行凶杀人进监狱的犯人！历史是公正的，无论多久，良心，善良和好人总会留取丹心照汗青，会还李世英，还交大文革总会和革委会及当年西安交大一万二千名革命师生员工一个清白。

（二）我在西安交大文革期间所承担的工作

我在文革总会和后来的革委会中都分管交大的外事，总会负责人武登才，陈柏荣，杨文等人全面负责校内各种事务。因为当时交大与西安地区的文革紧密联系。常委戴慕蓉及委员尹茂林也负责对外事务方面的工作，当时他们要负责的对外办公室（包括驻京联络站，六六通讯社，拥军办公室，向工农办公室，院校联络处等等对外联系机构）。戴慕蓉手下的对外办公室的具体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不仅活动能力强，而且富有正义感；还有一些影响力很大的战斗队，譬如沈元秋（已故）等人的193战斗队，杜洪江等人的东方红战斗队和郝卫东等人的红旗战斗队等等。还有交大在西安地区编发刊物影响很大的苏建农（已故，负责《惊回首》）及何正嘉（已故，负责《飞鸣滴》，此人很可惜，离院士只差一步之遥），他们都为西安地区革命群众的团结和安宁做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李世英是对外工作的总负责人。李世英与我经常要参加“碰头会”。西安当时四大组织中的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中各大院校文革负责人要经常开会碰头沟通信息。一开始交大是这一组织主要负责单位，会议主要主持人，并及时处理涉及校外的事务。后来“反右倾”运动激烈的时候，其他院校又想把我们交大从“统指”中开除出去。这是本文的后话。

当年参加“统指”碰头会的各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员有：

西安交大	李世英、沈荣水
西工大	孙福林、李盛茂
西军电	李洪明、缪俊达
冶金学院	杨梦云
西北大学	高凌云
矿院	王　斌

（三）文革总会应该感谢交大摩托车队校友的积极支持

“统指”联络机构在西安音乐学院。距离交大不近每次开会都是临时通知，而且总是安排在夜晚。

每次去主要是要辛苦开摩托车刘震宇同学，有时候请陈飞帮我们送去。我们在那里开多长时间，摩托车司机就得等多长时间。在交大文革期间交大摩托车队的司机们确实非常辛苦，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冰雪寒天和烈日当头，只要校外发生紧急事情，就要请他们出动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且经常是深更半夜出车。我们确实很感动，很感谢他们。

（四）由于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执行团结大多数方针而引发分歧

从交大文革总会一九六六年八月份成立起，李世英为首的文革总会坚决以团结大多数群众和组织为宗旨，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出发点，主张以温和及柔性的方式处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

校内　西安交大不分造反派和保守派。不仅团结了省委工作团时期的旧文革成员，也做好团结非常激进同学的工作。所以西安交大整体就是一派，这样西安交大校内就不存在派别斗争。以李世英为首的交大总会这种团结大多数的英明方针是受到了全校一万二千名革命师生员工的一致支持和称赞，也受到西安地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连周总理也称赞西安交大是“全国

独树一面旗帜”。这为西安交大以后坚决反对武斗和坚决不参加西安地区武斗打下了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

校外　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同样以积极热情的团结精神对待西安地区大专院校中后起成立的组织。但是却被“统指”主流派认为是“保皇派”。后来他们因受到打压，就联合成立了西安地区高校联合会简称“高联”，但他们是少数派。我们交大文革总会认为应该本着“革命不分先后”，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团结。

西安地区许多大型工厂企业，尤其是大型军工企业中有着大量观点不同于“工联”组织的革命群众。他们被“四大组织”的“工联”排斥和打压。他们后来在西安地区也成立了人数众多的组织称为“工总司”，但是他们却被工联组织认为是“保皇派“，造成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我们交大文革总会认为观点不同或者迟参加革命组织的群众不应该排斥，不应该打压，都是革命群众，“革命不分先后”。后来相对于原“四大组织”观点不同的其它系统相继成立了各联合组织。

（五）西安地区“四大组织”发起了“反右倾运动”

就在这种形势下以“统指”和“工联”为主的“四大组织”对李世英为首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的大团结路线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李世英和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支持他们的对立派，支持他们认为的“保皇派”。批判李世英和交大文革总会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由此开始。“四大组织”说持交大观点等许多组织都是“大杂烩”，是“保皇派”的大本营。对“右倾机会主义”必须批倒批臭。

1966 年 11 月起，西安地区由“四大组织”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向李世英为首的交大文革总会冲击而来。西派开动了所有宣传机器对准交大文革总会。他们所有掌控的报纸和广播台都对我们进行猛烈的攻击。光

是他们的广播宣传车就有十一辆，整天在西安市大街上围着转，进行“反右倾”宣传。

（六）李世英代表交大文革总会发表“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声明

就在这种形势下，李世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代表西安交大文革总会阐述了我们的观点。他阐明了以下这些观点：“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团结大多数，为了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永远不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和绝不参与西安地区任何形式的武斗。”；“对待工农运动态度，支持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起参加运动。”；“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1967年1月1日　人民交大　（第五版）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級領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

編者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世英同志代表我校文化革命委員会在討論会上发言，闡明了我委員会所一貫堅持的基本观点，在此发言前后，外面咸傳“交大右了”，“交大变修了”等等流言蜚語。为了消除一些同志的誤解，为了使那些别有用心的傢伙撈不到半根稻草，在此全文刊登李世英同志的发言。

革命的战友們！敌人还沒有睡觉，还在進行垂死掙扎。让我們更加緊密地团結在毛澤东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結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战线，为將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奋斗！

李世英同志代表西安交大文革委員会在討論会上的发言

首先我要說明，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犯了不少錯誤和缺点。我們懇切地希望今天到会的所有革命同志们，向我们提出严厉的批評，猛烈地炮轟我们文化革命委員会，为把我校文革委員会变成一个无产阶級的、眞正战斗化的革命集体而努力。

下面是我们文化革命委員会一貫堅持的基本观点：

一、我們的政治路線

正如陈伯达同志所指出的，要善于发展壮大无产阶級的革命队伍，以及眞正的左派队伍，沒有括号的左队派伍。同时要争取动搖不定、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結大多数，彻底孤立資产阶級右派、揭露那些頑固派和文化大革命中一心玩弄权术的人。

我们堅决按中央指示办事。

二、我們斗爭的大方向

我们堅定地認为，我们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确的，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我们从来都是堅定不移地把斗爭矛头指向陝西省委、西北局中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頑固地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人，指向刘瀾涛之流，并且与陝西省委、西北局中的一小撮頑固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进行不屈不撓的斗爭。我们永远不会将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过去我们这样做了，现在继续这样做，将来更要这样做。我们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錯误，然而必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們的错误和缺点是前进道路中的错误和缺点，是不难克服的。我们是一定能在斗爭中学会斗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什么“保皇派”，什么“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这一点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

三、严格区别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

我们要用阶級分析的观点，对西安地区文革联絡站、西安紅卫兵司令部的成員进行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

我们与西安地区文革联絡站、西安紅卫兵司令部的分歧，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线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之間的大是大非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我們和他们出现两派对立这本身就是阶級斗爭，两条路线斗爭的产物。在省委和西北局中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頑固地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人操纵下，西安地区文革联絡站、西安紅卫兵司令部执行了一条資产阶級反动路线，做了西北局、陝西省委推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工具。对西安地区文革联絡站、西安紅卫兵司令部所执行的一条資产阶級反动路线，必須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他们中間极少数頑固堅持資产阶級反动路线和炮打无产阶級司令部的人必須彻底孤立，堅决打击。

我们也堅定地相信，他们中間絕大多数的群众是要革命的，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願意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正如《紅旗》杂誌十五期社論所指出的：“暂时受他们（講話者解釋：“他们”是指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頑固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覺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絕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認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謀、耍詭計，反对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眞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我们和西安地区文革联絡站、西安紅卫兵司令部当中的群众之間的矛盾，一般地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要堅持采取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堅决使用五大（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大串連），堅决堅持文斗，不許武斗。我们有責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团結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过批評或斗爭达到新的团結。使他们改正錯誤，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滿腔热情地欢迎他们改正錯誤，和我们站到一起，为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斗爭！

四、对工农运动的态度

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是革命学生的堅强后盾，不发动群众，沒有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彻底，不可能取得根本的胜利。青年学生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受鍛炼、受教育。一定要与工农群众相結合，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堅决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承認在十一月上旬，我校“炮轟总会，开門整风”以前，是有“怕”字当头的思想，当时对工农群众支持不夠得力，經革命的师生員工和广大工农群众严厉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我们委員会把支持工农运动的問題提到委員会工作的中心內容上，后来立即加强了工农接待站、外事办公室，并成立了“向工农办公室”。在这以前，我们就派政治部一些工作人員和几个战斗队一起下厂試点，总結了一些经验，以后又继续組织大批同学、教师下厂下乡和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实行五同，共同批判資产阶級反动路线。虽然我们出现了一些缺点，但是我们的下厂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績是主流。受到了广大工人同志、农民同志的热烈欢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下厂下乡的同学、教师总数共达两千多人，分布到西安的各个角落，各个部门，而且在咸阳、宝鷄、兴平、户县等地都有我们的同学。我们每天平均要支援五十多个单位，最多的达八十多个单位。从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月十五日，我们外事办公室共支援外单位1580次。按照毛主席指示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的方向走对了，以后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五、掌握斗爭的大方向

掌握斗爭的大方向，团結大多数，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彻底地孤立一小撮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頑固堅持資产阶級反动路线的人，矛头对准刘瀾涛之流。我们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以后还是要这样。万炮齐轟刘瀾涛，不把刘瀾涛之流頑固执行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线彻底地批倒批臭，不把西北地区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死不瞑目。

六、堅持原則，堅持团結，反对分裂

堅持原則，堅持团結，反对分裂。在目前，在兄弟院校，在革命群众中进行这次大辯論，进行大串联，大調查，大学习，大交朋友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对西安地区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是大有帮助的，通过这次大串联大学习大辯論，我们同学打破了校与校之間的界线，傾心相談，开誠布公，实际上是一次生动活潑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講用会、交流会，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很多宝貴的經驗，我们已經学到了不少，但学习得还很不夠，我们以后还要更虛心地学习。通过这次辯論，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誼和团結不但不会分裂，而且会更加牢固，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加团結，任何别有用心的人休想从中撈取半根稻草。我们文化革命委員会，一貫主张在堅持原則的条件下，更加緊密地团結起来，一切革命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下团結起来，为完成毛主席交給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历史使命而奋斗！

我们需要再一次声明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錯誤，广大的革命群众已經給我们指出了一些，但是还有許多沒有指出来，我们热烈欢迎到会的同志对我们文化革命委員会的形形色色的錯誤进行批評和批判，广大工农群众和各兄弟院校的战友们对我们提出宝貴的批評意見，我们一定虛心接受，堅决改正。

最后再让我們共同学习一段毛主席語录：

“因为我們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对，我們就改正。你說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們就照你的办。”

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緊密地团結起来，为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頑强奋斗到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

1966年12月16日李世英在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个讨论会上的长篇声明刊登在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人民交大》校刊上。但是“四大组织”对交大文革总会一片诚意和愿望却置之不理。“反右倾“的浪潮越来越高涨。

（七）“统指”碰头会成了对李世英和交大文革总会的“批判会”

在“统指”的碰头会上，我们交大就成了他们集体围攻的对象。他们串通对我们采取车轮战，把这会变成了对李世英和我的批判会，集中火力对付我们，几乎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但是李世英和我在第一次与他们交锋时，我们还是非常耐心和心平静气地向他们阐明我们团结大多数的原则和愿望，说共产党历来主张最大限度的团结大多数，从不对普通群众采取排斥和打压的做法，革命的对象不是群众，更不是朋友。我们劝他们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冲动，要改变做法，好好把人争取过来成一派，不要对立。

他们铁了心，极端极了。根本听不进。真是不可救药。面对他们这种极端无理的攻击，我们只能与西派强烈的极左思想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尽管对我们压力很大，气氛很紧张，气势很凶猛。但是我们心里很有底气，我们很平静，很沉着。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丝豪不妥协。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对，我们没有错。他们骂我们是“背叛”了造反派，是“叛徒”，说交大文革总会变“修”了，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且要李世英承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在全西安市作检讨。否则“统指”就要把西安交大开除出去。我们批驳他们“反右倾运动”是犯了方向性错误，打压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把革命的群众和革命的朋友当作斗争的对象，斗争大方向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他们在误导自己的群众，把运动引向歧途。从此以后，我们还得去参加这种没意义的“碰头会”，否则西派会造谣说“交大搞分裂”。每次去都是谈崩了，结果总是不欢而散。

（八）交大广播台和《人民交大》积极配合批判“反右倾”运动

我们每次与其它组织开碰头会时，都把与西派交往的情况都通告给《人民交大》，交大广播台宣传的负责人安排批判“反右倾”运动，其它组织宣传机器也一起配合。

应该说交大广播宣传车和《人民交大》在西安地区的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所以西安地区广大群众信任和支持交大文革总会，尤其交大一些播音员的声音对西安市民很有吸引力，例如王经，李耀华和段曼瑜

等。广播台和《人民交大》的编辑也写出很多高水平的批判文章。

（九）西安地区“四大组织”在“反右倾运动”后不久就掀起了“打砸抢”浪潮

反李世英和交大右倾运动不久，“工联”首先在西郊一些大型工厂中对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干部在厂区和家属区实行了“打砸抢”暴力行动。许多持交大观点观点的工人和干部被打伤，车间的国家财产，办公室和家庭家居被砸毁及个人的财物遭受抢劫。这种野蛮的浪潮由西郊蔓延到东郊，由工厂扩展到学校，以及整个西安地区笼罩在法西斯恐怖阴影之下。西派不仅在行动上采取“打砸抢”的暴力行动，而且舆论宣传上制造法西斯的口号。尤其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头头和“红造司”的“革命造反报”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竟然明目张胆地叫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和“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等法西斯口号。还说什么“没有革命的打砸抢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等等危险的论调，其它院校的宣传机器一起参加这一反动口号的大合唱。

（十）交大文革总会在“统指”碰头会上强烈谴责和反击“打砸抢”极左思想

在这种严重的“打砸抢”形势下，我们多次在“统指”碰头会上拿出他们“革命打砸抢万岁”的校刊报纸及被西派暴徒将人打伤和砸坏财产的照片，强烈谴责和抗议他们操纵和制造野蛮的“打砸抢”事件。这已经是严重的武斗事件，这种行为是法西斯行为，应该立马制止这股“打砸抢”浪潮和武斗事件发生，追查凶手。如果再发展下去，造成严重后果，你们这些头头要负责。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和舆论都是你们策划制造的，并且明确指出你们就想发动西安大规模武斗。我们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形式的武斗，如果谁胆大妄为，想挑动武斗，谁就要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十一）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组织反击“打砸抢”浪潮和坚决反对“武斗”

我们交大文革总会与其它持交大观点组织的有关负责人也多次开会研究如何对付。大家都认为不能以暴制暴，不能武斗，否则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必须要用文的，要拿起宣传武器，各组织要全面配合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这一反动口号，要在整个西安市范围内对“打砸抢”展开批判和声讨运动，一定要声势浩大。让参与“打砸抢”的暴徒“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没有市场”，并且要想法把西安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十二）程XX同学通宵达旦起草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反动口号的声明

正当文革总会在考虑组织人员起草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的反动口号的声明的时候，力学二一班的程XX同学在行政楼下面遇见我。他刚刚参加完挺进徒步长征队返校，大概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五号，他问我学校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做的？我就把前一时期西安地区蔓延的“打砸抢“的事件和反动口号向他介绍，他听了也很气愤。我说我们正要找人起草文革总会的声明，我问他这件事请你做，你怎么样？程XX同学文才在我们班上是一流的。程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我当时很高兴，我就把他请到行政楼三楼一间办公室，向他说明了总会讨论的内容和要求，而且希望这份声明以特别快报的形式要张贴到西安大街上，希望能尽早出报。程听完后，一口答应通宵就写。我很感谢他，我说：“这样太辛苦你了，只要你写好，我们明天就立即召开文革总会开会讨论。”我们就这样说定。他就在总会的一个办公室里动手起草，整整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他真的写好了，就交给了我。我真的被他这股真诚和满腔热情而感动。也非常感谢他，程XX为西安地区的和平和安宁做了一件大事。

（十三）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关于当前形势“八项声明”

这个声明的基本要点是：

“四大组织”对李世英和西安交大发起的“反右倾运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组织和广大的革命群众；挑起内战，制造分裂，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犯了斗争方向性错误，希望能“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四大组织”宣传的“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反动口号。我们坚决反对，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打砸抢”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其危害的野蛮行为，必须追查凶手和幕后筹划者，对造成后果绝不姑息，由肇事者负一切责任。

“打砸抢”行为，“打”的是阶级兄弟，“砸”的是国家财产，“抢”的是人民私人的财产。这种恐怖浪潮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和人民的个人安危的地步，必须加以制止和反击。

“打砸抢”已经是变相的武斗行为。西安交大和西安广大的革命群众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武斗。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挑起武斗，否则要承担由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

1 月 6 日的清早，我们先把程 XX 起草的交大八项声明交给李世英、武登才及陈柏荣看，我说这篇声明是程 XX 通宵写出来的。他们看了后一致同意，他们都说“写得好”，我说要召开全体委员会，进行讨论。我在广播上通知全体委员立即到总会会议室开会，李世英主持会议，我在会上读了总会关于“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这一反动口号的“八项声明”的全文。请大家认真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声明写得很有水平，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表达了交大总会坚决反对“打砸抢”和反对“武斗”的坚定的立场，全体通过这“八项声明”。我说这一声明要以“特别快报”的形式尽快印刷并要张

贴到西安市各繁华大街张贴上。工总司也要在东郊，西郊等大型企业区域配合张贴和宣传。

会后，文革总会把负责宣传的张国强，曹克明，申成仑及徐文明留下，同时把印刷厂的厂长徐尔昌师傅和负责《人民交大》校刊的房立民老师一起请来，分别商量加班印刷交大“八项声明”和全面配合宣传等事宜。要求交大广播宣传车和《人民交大 > 校刊全力配合反击“打砸抢”的宣传。也请有关后勤部门配合。印刷厂的厂长徐尔昌保证明天早晨八点前把“八项声明”的“特别快报”印刷完成。

1、行政楼 402 大会议室开大会

下午，总会在行政楼 402 大会议室召开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向大家宣布我们交大马上要行动反击野蛮的“打砸抢”浪潮。并且向大家宣读了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的反动口号的“八项声明”。总会决定明天全校出动去西安市各繁忙大街按系分区分块张贴交大总会的“特别快报”。大家一致地表示坚决支持。。

2、召开各系分会负责人布置任务

大会后，我们召集各系分会的负责人到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把第二天上午要去西安市繁忙大街张贴的区域划分了一下，告诉大家明天早晨八点后可以去交大印刷厂领取印刷好了的“八项声明”“特别快报”；另外后勤部门会分配给各系张贴用的东西。

3、召集其它各组织开会配合宣传

七日，交大又召集了其它持交大观点的各组织负责人在交大开会。我们介绍了西安交大开展反击“四大组织”“打砸抢”运动的行动。他们都说我们早该行动了。交大希望他们在东，西郊区，及纺织城尤其要在军工大企业中张贴，宣传，尤其包括发生过打砸抢的单位，要加强宣传，要连续展开批

判“打砸抢”的运动。我们也分给他们相当数量的“特别快报”，对其他组织也一样安排，希望大家在西安地区和附近的郊县充分发动反对“打砸抢”的宣传运动，要让“打砸抢”土匪行为没有市场。大家都分析认为，如果“打砸抢”极端思潮不加以制止，就会发展到大规模的“武斗”，那就极其严重了。大家都感到问题的迫切性，所以，都很积极负责去发动下面基层群众进行广泛宣传运动。

4、西安交大广播宣传车反对“打砸抢”的宣传受到西安市群众的热烈欢迎

八号的下午，我们去西安市大街观看形势，全市热闹的主要大街都张贴了西安交大反对“打砸抢”的“八项声明”。很多市民都在观看和议论。我还看见我校的宣传车正在宣传交大反对“打砸抢”的稿件，听的市民真多，气氛真热烈，经常为播音员的宣传鼓掌。群众对“打砸抢”的野蛮行为非常反感，非常赞同交大的“文明，友好”的做法。

（十四）西安光学仪器厂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周恩来总理定性“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为反动口号

“四大组织“中一些头头不仅不知悔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工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打砸抢”事件。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号西安光学仪器厂的“工联”组织头头发动大规模的“打砸抢”行动，造成部分工人被打伤，大量设备和重要产品遭到破坏和损失。这就是西光厂 2·10 事件。我们先派了郑叔良，秘书吴翼剑及王希平去北京，后来李世英和戴慕蓉去北京。我们把陕师大“革命打砸抢万岁”，“革命打砸抢好得很”的校刊，及西安交大彻底批判“革命打砸抢万岁”这一反动口号的西安交大“八项声明”等材料，都一起交给交大赴京汇报代表团。请他们交给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看。彻底揭露“四大组织”极左的真面目。

一九六七年二月及三月初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多次的接见中明确表态“打砸抢”是反动的，坚决要制止。三月初周总理接见西安地区造反派头头及军队等领导时，已发生了西安 2·10 军工厂的严重打砸抢事件，当时军区上报 2·10 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就此周总理严厉批评了西安工联负责人，对军工厂的 2·10 事件调查核实后，必须予以法律制裁。

接见时中央决定成立陕西支左委员会，由二十一军、省军区、蓝空、总后等四大家组成。军工厂要由解放军实行军管。接见中最后周总理指示，回去后四大院校（西交大、西工大、西电、冶院）将学生全部召回学校，由解放军进校进行军训。李世英等回校后向全校及西安各界，全面传达了中央首长接见的情况。

四大高校将学生召回校内军训，就这样西安地区才平稳下来。

二
交大革委会为保护交大师生员工和交大学校安全决定“大疏散”

（一）我为啥要写西安交大文革中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

文革的发起都是从大学开始的，因为青年学生最单纯，最易盲目崇拜，又最易被激发热情，也是最易被误导的。大学运动起来最早，但是也是乱得最早，基本上都是大打派性战争，发展到武斗而死人、伤人以至毁坏国家财产，学校弄得一片狼藉。结果，有的成了无辜的冤魂，有的成了监狱中无知的杀人囚犯。

但是文革中，全国唯一有一所大学，没有分派，既没有校内武斗，也没有参加校外武斗，更没有破坏学校，毁坏国家财产的事件发生，而是团结一

致投身于运动，它就是西安交通大学。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交大革委会在学校和一万二千名师生员工面临形势极其危难的时刻，采取了果断举措，它对保护交大师生员工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当时，我是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感到有必要把这一历史事件的事实写出来。这样，后来人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交大革委会是如何带领万余名的师生员工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渡过那么艰难的困境。

（二）西安交大发起的“八五”静坐改变了与胡炜军长及 21 军的关系

西安交大发起的“八五”静坐运动改变了与胡炜军长及 21 军的关系

回顾西安交大文革史，两大事件错误的阴影是绕不过去，也抹不掉的。一件是 1967 交大发起的“八五”静坐事件，另一件是 1968 年 3 月 28 日的彭康校长之死。这两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当时那些激进的同学面对复杂的文革形势，缺乏冷静的思考，没有考虑过他们行动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又是越过革委会的集体研究，擅自做出极为过激的行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后果对交大的影响是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晚，先是革委会成员叶雄波在 402 主持关于西安形势的辩论会，但是很快被一些激进的同学轰下了台。他们呼吁付登华上台主持辩论会，讨论当前形势。在讲到支左委员会批准了由西工大等支持的“革命造反报”派性报纸的复刊，并由 21 军的军车正在运出发行……时，付登华提出应去找支左委员会解决，对支左委员会的不一碗水端平提出抗议。受到会场上同学们的拥护，付登华便带领一部分 402 辩论会同学冲出校门走上街头，要找支左委员会解决问题，但是军方领导置之不理。当晚交大这些同学并没有被带回学校而留在抗议现场，第二天又转移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后来发展成了静坐行动，向 21 军负责人胡炜表示抗议和示威。这样西安交大就成了“八五”静坐行动的发起单位，给交大和西安地区带来一系列极坏的后果。

我当时在武汉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要求赶快把静坐的同学撤回来。当时大多数革委会委员是反对用静坐行动，可是身为交大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却坚决不同意撤回交大八五静坐的同学，使交大错失了最初及时挽回错误的机会。交大负责人“八五”静坐不撤回的主张，而又继续用这种强迫和示威的方式来对待当时在陕西省，西安市掌控支左大权的21军的军长胡炜，实在太不理智了，不冷静了。本来是可以用谈判等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八五”静坐，等于把21军完全推到了交大的对立面，这样就造成感情上空前对立。开始就坚持不撤回静坐，对以后造成的后果，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负有相当的责任。

自从“八五”静坐发起以后，“工总司”和其他总司的负责人及其组织下的部分群众很快一起加入了这一行动。而在“八五”指挥部中交大慢慢被架空，指挥部逐步几乎被“工总司”及其他总司中的激进派掌控，成了“工总司”等调动各总司人马的指挥部。其它总司中的激进派是坚决反对撤回“八五”静坐的。就在那时交大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已感到当初不撤回交大静坐同学是错误时，已无力挽回了。所以，工总司及其它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中激进派应对“八五”静坐长期不撤离，而造成西安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负有最重大的责任。

现在来看看交大发起的“八五”静坐运动所造成的后果：

1，交大与21军胡炜的关系空前对立。一点缓和余地都没有了，进入了死胡同。21军胡炜完全站到了“四大组织”一边了。

2，西安地区两大派更加对立，双方的激进派都蠢蠢欲动。

3，加剧了武斗气氛，尤其导致了“九二”武斗事件。

4，逼迫交大作出大疏散的痛苦决定。

交大与21军胡炜这种对立的关系的发展，“四大组织”是十分高兴的，

他们认为交大这次愚蠢的做法对他们以后的胡作非为大大有利，大大方便。这就是“八五”事件发生后的西安真实形势。

彭康之死的情况我具体了解不多，请见文集中有关文稿。对于这一重大事件革委会监管不力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1967 年的 8 月“工联”和“统指”中的极左派疯狂地抢夺军火

就在八月份西安地区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时，“四大组织”已作好了要在西安地区发动武斗的计划。所以“工联”和“统指”第一步就是到处抢劫军火仓库，公安局和武装部中的枪支弹药，非常奇怪几乎都被他们轻易得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些部门应该大都是由驻军部队战士严密把守的，然而武器却轻而易举地都流到了“工联”和“统指”组织人员的手里，这等于敞开了大门让他们抢，我们认为这就是“明抢暗送”。这等于是为“四大组织”不久发动武斗壮了胆。这种做法就是犯罪的行为，它为西安地区的以后的武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认为 21 军的负责人胡炜应该对西安日益加剧的武斗局面和制造的血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因为 21 军军长胡炜在西安明显地“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矛盾更深，后来就导致了大面积地区的武斗爆发。引起一桩桩血案的发生。

（四）1967 年的 8 月下旬开始西安地区笼罩在严重的武斗的气氛中

八月二十一日“工联”激进派首先向西郊的西安变压器电炉厂的“工总司”发起攻击，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惨无人道的血案。胡炜的 21 军没有干预，没有阻止，不介入。

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向西安劳动技校开火，不仅造成血案，而且火烧了学校。21 军也不管。

同时又在西安胡家庙地区“工联”激进派调动大量人马向西安筑路机械

厂的“工总司”发动非常激烈的武斗，制造极其严重的血案。胡炜的21军当作没有事发生一样。

八月底，从北郊红旗厂，发展到东郊的庆华厂，纺织城和东方厂，华山厂，秦川厂和西工院等等全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火药味和枪声都已蔓延到交大的周围，这是“四大组织”对交大警示，这意味着对你交大动手为期不远了。21军长胡炜明明知道，却按兵不动。

最最严重就是发生在九月一日和二日，西郊西工大，西军电及“工联”调动东方厂，华山厂，西铁总会，773部队和宝鸡的秦岭公司及XX厂共三千多人，全副武装。他们分别包围了544厂，西安制药厂和西安钢厂，还对向厂外撤退的“工总司”群众进行猛烈地扫射，共打死五十多人，打伤二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周总理的西安“西郊九二武斗”。奇怪的是西郊这么大的动静的人马调动和这么惨烈的武斗，胡炜领导下的21军部队驻军竟然无动于衷，一点也没有出面阻止。

西安庆安公司“工联”与“工总司”中激进派也同时发生了多次武斗。21军也不出面阻止，他们好象不在乎革命群众的死亡和受伤多少人，同样不管。

经过西安地区这些武斗，大约伤亡共数百人。“工总司”伤亡很多人，元气大伤，情绪低落。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胡炜21军支持的“工联”和“统指”的实力远远在“工总司”之上。这就是当时西安地区的真实形势。在周总理面前，我们感到胡炜向总理汇报的情况，许多不符合事实，使人不能心服，我们感到非常冤枉。

（五）八月底到九月初“四大组织”中的激进派开始对交大进行野蛮的和武力的挑衅

就在西安东郊，西郊和北郊纷纷发生武斗的同时，“工联”和“统指”激进派开始了对交大实施阴谋计划。

首先发生陕工大学生及部分东郊“工联”的工人故意多次用车撞击交大正校门和人为地摔坏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这种野蛮的行为是想故意伤害交大的尊严，引起了交大群众的公愤。当交大学生围着他们伦理时，他们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们只得说是他们头头叫他们干的，后来又换批人继续这么干。这对我们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装甲兵学院中部分激进派奉“四大组织”中激进派之命几次开着坦克架着机枪来回在交大门口示威，气势汹涌，这是一个要攻打交大的信号。

“工联”和“统指”激进派精心在交大对面的兴庆公园，和周围的陕工大，计量局，第八设计院和和平门城楼都已架设了机枪，到时候对交大实行封锁。这一切都很清楚了，就是快要对交大动手了。

还有“工联”和“统指”激进派对交大人员有些地方的通行戒严。交大 193 的许幼玲去北郊的路上就被“工联”的人查问，因为她不加思考地说了她是交大的学生就被抓了，被关进西工大。后来 193 战斗队的沈元秋（已故）和阎保定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救出来。通过这件事足以说明“工联”和“统指”激进派快要对交大进行封锁了。

（六）交大及时通过交大驻京联络站向中央总理联络秘书报告西安形势

就在西安地区各个区域发生武斗的时候，交大对外办公室及有关的战斗队的同学冒着危险去武斗的现场采访，记录和收集材料。有时候甚至于夜晚深入到工厂的家属区秘密调查真情，然后整理成第一手材料交给交大六六通讯社及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我们几乎每天与驻京联络站通报西安最新情况。他们随时向中央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吴斌报告。九月三日西安形势非常紧张，革委会特别委派常委戴慕蓉带着汇报材料与庆安公司工总司负责人王焕如乘坐货运飞机去北京紧急汇报“九二”武斗的情况，希望中央能尽快出面解决西安地区的武斗问题。

（七）交大革委会多次开会分析西安形势，一致同意决定师生员工立即“大疏散”只留少部分人护校

就在九月初，也就是西安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突然来电，说总理交给李世英一个紧急任务，叫他去兴平县处理农民抢劫军火库的任务。这情况肯定是21军胡炜等人向中央报告的，李世英到了那里，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根本没有发生这么一回事。这就是所设的“调虎离山”之计，当时交大面临最艰难的形势。他们以为李世英一走，交大就没有了“主心骨”，交大就肯定会乱。

李世英临走前，只是留下话说，交大若实在呆不去就全部转移到终南山去。当时在校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武登才，沈荣水，杨文（已故），陈柏荣以及所有在校的常委和委员曾经多次在东大楼256实验室召开全体委员会对形势，进行分析讨论。大家都对交大面临的形势和可能的后果进行认真分析，并对多种可行性方案细致地进行探讨。形势对交大来说的确是愈来愈严峻，面临困难也愈来愈大。我们一直不断向中央上报西安严重的武斗的材料，但是中央至今还没有下达指示。按那时情况，西安地区还看不到一点稳定和安全的希望，而交大的一万二千名师生员工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全在我们的肩上，“怎么办？”大家都认为交大人员那么集中在学校，目标太大，随时可能被进攻，到那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我们都无法向全校交待。我们也讨论过李世英曾提出的交大集体转移去终南山的方案，普遍认为这一方案正中了对方的所设的包围圈的计谋，这样的话，交大伤亡就不可估量，李的方案不能考虑。只有化整为零，才是最安全的方案。我们预计只要大部分人员离开了学校，目标就会变小，对方进攻交大的可能性也就会越低，因为他们认为交大人都跑了，再进攻交大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

最后一次会就是在“九二”武斗发生之后召开的。经讨论，最后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全校师生员工“大疏散”的决定，这确实是被迫作出的决定。请师生员工暂时各自“投亲靠友”，等待中央下达处理西安地区武斗问题的指示后，就马上招大家回校。现在只留少数人护校。

革委会负责人召开了各系分会负责人紧急会议宣布交大全校“大疏散”这一被迫的决定。要求他们留下必要的人：1，保护好实验室　2，看管好特别的人员（包括干部和教授）。系里交待好疏散后各地定期联络地点和联络人。疏散只是等待中央处理西安问题的决定。一有消息就返校准备全面复课。

校革委会政治部负责人王春杰，邓正德，郑叔良和张国强等人负责保护原校级干部，档案和图书馆。专门安排人员保护印刷厂和金工厂。

校革委会朱奎林（已故）和罗洪涛（已故）等人负责组织护校工人纠察队，其中包括许多复员军人，他们负责校内巡逻，和校内安全。决不允许任何人捣乱，制造混乱。

治安保卫部门冯承武等人组织人员保卫两个大校门和校牌的安全，及严格检查进出校门的人员。

值得一提的事，先是李世英把在西安武斗期间被“工总司”抓到的西军电的负责人李洪明，保护在交大，后来武登才把李洪明安全地放回去了。可见交大多么人道主义啊！

我们广播通知了在行政楼402大会议室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交大革委会负责人武登才、沈荣水和陈柏荣一起在场都向大家讲清交大所面临的艰难形势。我们的阐明的原则是坚决反对武斗，但是不能让交大的师生员工作无谓的牺牲，也不能让交大的国家财产受到损失。所以决定“化整为零”，全校人员“大疏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疏散是被迫的，就

是等待中央对西安地区武斗问题的处理决定。不会太久，一旦有消息，就会通知大家立即返校准备复课。

大家听了我们的介绍和决定后，一致表示拥护和支持，表示信任我们这些“交老总”，都说我们决定“大疏散”做得对。就这样，全校师生员工立刻行动，开始疏散了。

对于西安的混乱局面，周总理再次出手解决。就在李世英从兴平回校后，总理秘书吴斌通知交大，让李世英将八五马上撤了，武斗必须立即停止，去北京等候接见。

九月十八日周总理接见李世英等人时，严厉地批评了交大和工总司的“八五”静坐，说一开始就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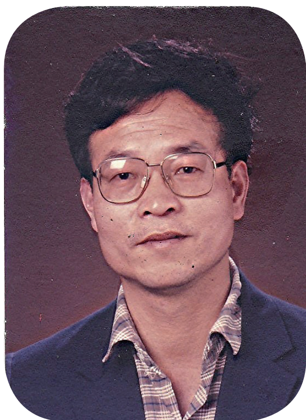
在周总理关注下，西安地区的武斗渐渐地平息下来。交大师生员工大约九月二十日后陆续返校。

（八）历史的评价是客观和公正的，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回顾交大的文革时，都异口同声地说当年的“交老总”为交大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李世英和交大总会团结全校师生员工成一派，没有发生武斗事件，所以没有因为武斗而死亡一个人，甚至没有打碎过一块玻璃。

第二，交大革委会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期间，西安地区武斗急剧蔓延的形势下，坚决反对武斗和不参加武斗。为保护一万二千名师生员工和交大的国家财产的安全被迫作出了全校“大疏散”的决定，还收容了上千名因为西安地区武斗而来交大避难的干部，革命群众和伤员，使得整个交大和师生员工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非常时期。



作者简介

沈荣水，1943 年 10 月出生於上海，藉贯浙江绍兴。1962 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数理力学系应用力学專业。毕业后先经农场劳动后再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工作，先从事超低温及激光应用研究，后長期从事超高温力学的研究，1988 年为副研究员。1989 年赴澳大利亚 CSIRO（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协作研究，主要从事高温断裂力学与材料显微结构关系的研究。现退休，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



西安交大文革飄絮錄
——我的回憶與反思

■／鄭叔良

前　言

一九六六年，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古城西安，我国最高学府之一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率先全国发生的六六事件、8 月 16 日省委门前的静坐示威、9 月 6 日的绝食斗争、西安地区造反派两大派《反右倾》的大辩论、八五静坐、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伴随着这场汹涌的革命洪流，当时尚为年轻共产党人的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中心。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当年许多令人难忘的往事涌现心头，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不已。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都是由许多无数个平凡小人物的参与汇合而成，每个人都在历史大舞台上扮演着自己各自不同的角色……，我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往事如烟，我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尽量真实地纪录下当时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所经所历，重新汇合这些小人物的平凡经历，当能比较真实地再现当年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为后人对这场我们民族历史上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做出真实、客观的历史评价！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革命的洪流，把我卷入了西安交大文革的政治漩涡中心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国处于一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之中，当时的我却仍是一头扎在兰州西固，自一九六五年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兰州炼油厂常减压装置计算机优化控制”的科研课题之中。这一科研课题是由汪应洛老师（现工程院院士）牵头，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单位联合参加的国家重点课题。兰州炼油厂是我国一五期间 156 項重烹工程之一，常减压装置是对原油进行分馏，在不同的分馏温度下生产出汽油、航空煤油、柴油、渣油等不同产品。该科研课题主要是利用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等数学工具，对大量的生产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建立数学模型，使用电子计算机求解，对常减压装置的生产实现优化控制，实现某一个产品（如航空煤油）产量最大或总产值最高等目标，以取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在兰炼科研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了另一項亦由汪老师领导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兰州化肥厂自动化试烹項目，参与了《用“多组合试验”寻求连续生产过程静态最优问题》的论文撰写，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埋头科研时，西安交大发生了六六事件，省委工作团多次电令我们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省委工作团的多次催促下，我们这一行人不得不于 6 月 18 号赶回学校参加在学校大操场举行的万人“声讨彭康黑帮”大会。三百多人组成的省委工作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把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规模地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查上当，放包袱”运动，广大师生员工遭受残酷迫害，回校后就在这一片恐怖的气氛下惶惶不安地度过了近两个月的难熬時光。

八月初，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正式公布，全

校师生员工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九六六年八月，省委工作团撤离，校党委瘫痪，学校的领导处于真空状态，全校师生员工对当时由省委工作团成立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原人武部部长董树梧）的领导不满，决定采用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选举成立新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全校分級建立文革领导机构：每个教研室、班级建立文革领导小组；每个系、部推选出学生和教工代表，成立系、部文革委员会，当时推选出的学生委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日后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如我认识的机制专业学生委员温熙森（中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锻压专业学生委员潘连生（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是在 1966 年初刚入党的青年共产党员。学校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会的委員由各系、部推荐产生，正式成立了以李世英（毛主席在“四·二三”批示中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为主任的交大文革总会。

我当時在机械系生产组织教研室任职，最初机械系推选到原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教工代表是金工教研室的顾光锡老师。在选举新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时，她坚决要求更换重选，主要理由是她不是红五类，对外联系、工作都不方便。当时反动的血统论盛行，于是机械系只好召集全系教职工大会重新推选教工代表，因为我出身工人家庭，又是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因此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机械系的教工代表参加文革总会工作。我因群情难却，只好走马上任到文革总会报到，并被任命为代组织部长。就这样，我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西安交大文革的政治漩涡中心。

二、全国仅有、独树一帜的“交老总”与李世英的“三句半”

文革初期，由于工作团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群众之间严重对立与分歧，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与单位，都分裂成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之间争斗不休，打砸抢，甚至武斗。可是在西安交大，在工作团撤走以后，却始终是一派统一领导，校内从未发生过打砸抢和武斗的情况。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1967 年 2 月 11 日下午，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礼堂接見我们和西安地区造反派代表时的情景：

首先周总理就亲切地问我们：你们是什么組织？

我们荅：文化革命委员会。

总理问：交大就一个组织？

我们荅：就一个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

总理说，啊呀！全国仅有，是啊，这是独树一帜。

西安交大一派領导的情况的确是全国仅有！ 1972 年，当时原西安交大的老总务长任梦林同志，到北京高教部参加有关会议，在会上介绍了西安交大在文化革命期间，全校的校舍建筑、教学仪器设备、档案資料全部保存完好时，所有参会的兄弟院校都表示出极大的惊奇和贊賞。

李镜吾同学在《我的大学时代》一文中写道：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浩劫中，全国高校大多存在两派，在校内互相斗争，甚至演变成武斗，很多学校，校园变成战场，打得学校一片狼藉，就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未能幸免。唯独西安交大只有一派，校内没有派性斗争，更没有武斗，也不参加校外的武斗，全国武斗死的人成千上万，唯独交大没有死一个人。当时西安大多数市民都支持交大，戏称交大文革总会为“交老总”。就从这一点看，李世英和交大文革总会是值得称道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我想，独树一帜的“交老总”现象虽然是偶然的，但是偶然性中包含必然性。“交老总”之所以能做到全校团结一致，没有两派对立，没有打砸抢，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下面四个原因和情况，使之成为必然的结果：

（一）首先是当时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同志对待曾经迫害过自己的群众，有着正确的认识和宽容的胸怀。

1966 年 6 月 5 日晚，工程物理系 810（41）班学生、青年共产党員李世英等人贴出“工作组十大阴谋”、“工作组十大罪状”等大字报，提出“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口号。6 月 7 日，工作团就举行全系批斗会，在会上群众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世英！”随后就是一系列的游街批斗，对李世英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李世英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道：

“同学们把大字报、标语口号貼在我的身上。有的同学甚至用扫把向我身上刷漿糊，给我头上戴废纸篓作的高帽子。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世英！”“反革命分子李世英向人民低头认罪！”“李世英老实交待”等口号。拳头有的伸到自己的脸上，有的打到身上……，于是，又将我拉了出去，身上塗满了浆糊，贴着标语，脖子上里还插着一根棍子，带上高帽子在学校里游街，象一个动物一样给大家展览。棍子插在脖子里，把脖子插破了，竹刺嵌在肉里，火辣辣地痛，可是我所受的人身污辱使我感到心里更是火辣辣地痛……，我心里还有很多话要给同学们讲啊！同学们我了解你们，你们大都是受工作組的煽动来斗的，我了解你们大都是好人，可是你们也要了解我呀，我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都斗错了啊！……”

在残酷迫害下，6 月 9 日，李世英被迫服毒自杀未遂，自杀前写了三封遗书。在写给同学们的遗书《最后几句话》中，他写道：

“这些天，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很坏，但是我并不怪同学们，同学们这样

作完全是对的。这正反映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个别人除外）。在我，如果是将谁看作反革命，我也会对他毫不留情……

要永别了，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若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临终遗言，情真意切，真实地反映了李世英同志对曾经迫害过他的同学们的拳拳之心，因此，日后李世英同志能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采取完全正确的、积极、宽容的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李镜吾同学生动、系统地记述了李世英当时的认识和看法：

“初识李世英是在 8 月 13 日交大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经历过生死劫的以及学生斗学生之痛的李世英，跳上主席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第一，他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反对那些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第二，他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特别是出身好的学生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反对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谬论；第三，全校要一致对上，“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提出要通过深挖工作组的问题，深挖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里的黑根黑线。

李世英的讲演受到了全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会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正是李世英后来所总结的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真实的思想基础。

（二）当时文革总会委员的实际构成，是李世英同志“三句半”观点坚实的组织基础。

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当时的文革总会委员，都是各系、部采用巴黎公社

的方式，推选出来的群众代表，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受党的教育多年，有较好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因此文革总会的委员们在思想上都贊同“三句半”观点，在行动上都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思想上完全同意李世英的观点，实际行动上坚决支持。这也完全是由我个人的经历所决定的，1956 年入学，第二年恰好经历了整风反右，当时就仅仅因为自己对所学的专业和党支部书记有些意见，而在团内受到多次批判，还受过纪律处分。因此，我深切感到必須要正确对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以后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六二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曾系统学习过《资本论》，认真学习过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参加过六四年农村社教的四清运动，因此自己对党的政策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执行。

反对抢黑材料

我刚到文革总会工作，就遇到少数红卫兵要到人事处档案室抢所谓省委工作团整的黑材料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烧抢“黑材料”成风，人事处王明志等同志告诉我，国家的档案材料必须保护，绝不容许任何个人随意抢掠烧。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李世英、武登才商量后，他们曾派了一些红卫兵来保护档案室，从而保证了我校档案材料的完好无损。

正确对待临委会

六六年八月，省委工作团撤离后，全校师生员工不满当时由省委工作团成立的原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决定采用巴黎公社方式，选举成立新的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有极少数群众不同意文革总会继续革命，深挖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黑线的观点，组织成立了西安交大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

西安交大临委会成员主要来自：交大少数复转军人，如校五七工厂工人

武永泰；原交大党政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和政治辅导员，如保卫处科长齐涛，极少数学生，如原学生会副主席唐素等人。武永泰是我国第一批防化兵退伍军人。在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由他们负责现场清理，因而多数受核辐射影响，白血球减少。文革前，陕西籍的这批防化兵约有五十人复员到交大校办工厂工作，这批同志根正苗红。临委会中多数人员对原交大党委感情较深，不同意西安交大文革总会的观点，因而要求另立临委会。

我当时任文革总会代组织部长，因工作关系，与当时同意临委会观点，或参加临委会的原交大党政部门工作人员有较多接触。他们成立临委会时曾来找过我，要求文革总会提供话动场所与必要的宣传用品。我告诉他们：按照宪法，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现在由文革总会掌权，应该提供一定的方便。但我无权答应，此事可找文革总会李世英主任，他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要求。

果然李世英批给了他们几间房间作为临委会的活动场所，我记得还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宣传用品与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少数同学对文革总会这样处理有看法，认为应该像其他学校一样，对临委会采取《打、压》政策！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文革总会正确处理了与临委会的关系，因而没有多久，西安交大临委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从而使西安交大真正成为一派统一，全国仅有，独树一帜的交老总！

正确对待曾加入过临委会或具有临委会观点的同志

由于我负责文革总会组织人事这一摊工作，因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原来在学校党委、行政部门工作过的同志，我认为他们都是些可靠的好同志，不管他们是否加入过临委会或是否贊同临委会的观点，我基本上都予以留用，如毕镐钧、凌安谷、朱钰鹏、包德南、王丽华等同志，保卫处的唐余璜、朱长庚同志更是我日后的工作助手，沈桓粉同志一直在文革

总会、革委会组织部勤恳工作多年。

总之，正是文革总会各个委员的支持和赞同，构成了李世英同志“三句半”观点的坚实组织基础。

（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是李世英同志“三句半”观点切实的理论基础。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出版的《敢教日月换新天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专集中，详细、系统地总结了如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观点群众的策略方针和方法，明确提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次，是建立一个左派领导核心，只有坚定依靠革命左派，才能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第三，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斗争中把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团结起来。这也就是说，通过实际的斗争，把李世英同志的“三句半”观点系统地提高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四）是充分发动群众，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自己教育自己，这就是有名的“402”大辩论，它使李世英同志的“三句半”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交大行政楼东侧四楼有一个402号大会议室，可容纳数百人开会，或举办活动。文革期间，这里就成为了统一全校思想和行动的辩论会场。从1966年的8月中旬到10月中旬，这里每天晚上，差不多都会自发地就文革的重大问题举行辩论会，谁都可以上去自由发言，发表演说。这就是交大有名的402辩论会，有些像当年的巴黎公社，显示出了一种造反派们的民主空气。”（李镜吾）

付登华同学在《风雨春秋——从交大红卫兵到创业者》一书中提到“402”精神是我们学校这一时期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对“402”精神作了详细的叙述：

“1966 年 9 月 22 日，以李世英为首的校文革总会，按“十六条”“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求，安排全校在国庆之前开展“大学习、大辩论”，总结前段斗争。……总会及时在行政楼 402 大教室组织辩论，统一认识。讲究民主，广开言路的“402”精神就这样诞生了。她是整个文革中西安交大内部统一，步调一致的基本保障。……1966 年 10 月 29 日起，西安大专院校“临指”已变身“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12 月 12 日，李世英作为“统指”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谈了“统指”近一时期内部发生的分歧。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李世英认为，“联络站”与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反对继续“挤、压、砸”搞关门主义；对其群众要区别对待，帮助教育，以孤立刘澜涛、霍士廉及其顽固追随者。“统指”中的西工大、西军电等单位把李世英的观点归纳成“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从 12 月中旬起在各种场合予以批判，说李世英“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调和了”，……“打倒右倾！”“打倒折衷！”……。元月 28 日下午，“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将“文斗”变成“武斗”，把反“右倾”演变为“打、砸、抢”行为。”

正是通过 402 大辩论，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统一了思想认识。使李世英的三句半，深入到全校师生員工的心里。电机系同学李志杰在《人生的拐点——西安交通大学生活回忆》中，对这段时期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有过生动的描写：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各单位大都出现过两派争相“夺权”的情况，谁抢到了单位的“公章”，谁就宣布自己“掌权”，交大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交大反对文革的过激行动，遭到一些人“反右倾”，但还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对于各级政权组织和领导人，群众中出现了“保”和“造反”两种群体，当时被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唇枪舌战”，往往火药味很浓，大字报相互攻击，大辩论争执不休，有的家庭里由于观点不一致，往往出现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局面。各单位出现两派，社会上也形成两派，两派互相打“派仗”，互相攻击，甚至动刀动枪搞武斗。……西安交大当时在全国是一个特例：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交大内部没有分成两派，只是一派。在社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之外，西安交大被视之为“右倾”。在人们高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对“当权派”戴高帽子游街，挂大铁牌批斗，搞“喷气式”体罚的大气候下，西安交大却大声疾呼“反对打砸抢”，于是社会上曾一度出现反交大“右倾”的浪潮。在宝鸡，曾有一个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队为反交大“右倾”，在街头演活报剧，以反面角色出现的“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唱道：“坚决反对打、砸、抢……”，这一现象说明交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独特的立场和作法。”

由于交大坚持反对“打、砸、抢”，所以西安市不少单位受到另一派迫害的保守派群众，纷纷到西安交大避难。我有个大学的同学，是西安公路学院某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被打成保皇派的小头头，被打腰部受伤，只好跑到我这里，躲避了近一个月。在西安武斗最激烈时，交大收留保护西安其他单位被另一派打出来的保守派干部和群众最多時近万人，交大不少教学楼大教室中都住滿了人！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西北光学仪器厂的造反派头头竟拿着枪来对着我，要到西一楼把他们单位的另一派群众抓回去，可見当时情况之严重。交大为維护当时西安地区的安定，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三、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我们，明确指出，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

一九六六年 9 月后，“统指”继续大批李世英的‘右倾’，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统指”一共只有 11 个高校，10 个高校反对李世英的‘右倾’。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参加“统指”头头会议，会上十个学校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批判，李世英和我据理力争，李口才雄辩，我平时不善辩论，但在情急时突然思如潮涌，全力助阵，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面对西安地区两大派日益加剧的对立与分歧，不少单位‘打砸抢’事件日益严重，文革总会决定要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争取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由于我在北京求学多年，不少同学在国家各部委工作，因此我自告奋勇到北京去反映情况。当时正值革命大串连时期，十月十八日我校红卫兵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后，我就曾在西直门外的北京电影学院，负责建立了西安交大文革总会驻北京联络处。白天吃的是免费的“大串连”饭（多数是水煮大白菜加馒头），晚上就住电影学院教室，躺在上面铺了稻草的地上。负责了解北京高校的文革形势，打听中央文革的最新动态，及时向学校汇报情况。

一九六七年一月，西安两派分歧对立的形势日益严重，月底打听到“统指”将向中央文革汇报西安地区的文革情况，文革总会决定立即派我、吴翼健同学和王希平同学三人赴京汇报。据王希平的回忆如下：

“……晚上 10 点沈荣水、戴慕蓉突然让我立即赴京，当我跑步拿上洗漱用品坐到停在行政楼下的三轮摩托时，还不知道让我赴京干什么。沈对我说這是总会组织部长郑叔良你听他的指挥，那个是总会秘书吴翼健。在寒风中到了车站，在西铁联帮助下把我们三人硬是塞进了挤满串连人员的车厢。

火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挤着一齐坐在了车厢的地上，此时郑叔良才告诉了我赴京的任务，我才想到让我去也许和一周前我和杨梦云交谈过有关……

一到驻京办郑叔良立即临时拟定汇报提纲，吴翼健写出了汇报草稿，是按1、2、3…逐条写的交大的观点，西安的文革情况和分岐点，然后几经郑、吴、王、贺相等人的讨论修改，由郑逐字定稿，然后驻京办每人一页用复写纸复写，总共八九页纸，同时制定出闯入电影学院汇报会的时间方法等。……

当我们三人进到汇报会教室，讲台上听汇报的是个穿军装40余岁的军人，西大头头主持说要举手待他同意后发言。我们都举手却得不到发言机会。在批了一顿交大右倾的发言后，郑、吴分别发言说了交大团结大多数的观点，而我却始终得不到发言机会。有趣的是杨梦云和我面对面相距不到1米，在西大头头几次示意和耳语让她发言，她在汇报会上却始终一言不发。二个小时过去了，最后军人只说了一句话：“我刚调到中央文革西北组任副组长，不了解西安的情况，大家的发言，我会向领导汇报”。然后西大头头便宣布散会。此时我站起来较大声说：“等等，我就一句话，交大对刚才的发言有不同的看法，這是交大对西安情况的汇报和我们的观点，请领导过目”。说完一步向前将材料交到這位西北组副组长的手中。……

连续的作战已使我们三人疲惫不堪，商定睡个懒觉后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准备返校，谁知陈毅秘书来电话说第二天陈毅要在中南海听取交大代表汇报。除郑、吴、王、贺等人外，我们又多报上驻京办的几个。

汇报中陈总只是和蔼的提问和认真的聆听，……郑、吴、王、贺等先后都发了言，过了约40余分钟我看到陈总看表，知道可能快要结束，由于我就坐在陈总右手边距离不到半米，写了一小条子传递到隔我两人的郑叔良，郑写上“同意，你办”，在陈毅起立和我们告别时，我将在臂上戴的红袖章取下对陈总说：“我代表交大革命师生向陈总献上红袖章”。说完即给陈总戴

到手臂上。此时陈总豪爽的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好，交大，革命的交大！"

此次赴京，主要是通过周总理办公室的吴斌进行联系，最后中央终于决定着手解决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两大派的分歧与对立，2 月 5 日陈老总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我们交大和西医八三一代表后，我立即告诉了总会这个好消息，李世英、戴慕蓉等同志赶到北京，等待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一）毛主席的"二一四"批示，是西安地区反右倾的分歧与争论得以解决的关键

"统指"一派在六七年一月夺了西安晚报社的大权，于元月 14 日创办了《革命造反报》，并从翌日开始，在全市开展对"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运动。在西安晚报上长篇累牍地发表大反所谓交大右倾的社论，把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无限地扩大到全社会，两派对立日益严重，从 2 月 5 日开始、2 月 11 日、2 月 13 日，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見双方代表。

就在周总理、陈副总理接见西安代表解决双方的对立与分歧時，2 月 10 日，西北光学仪器厂的两派为该厂夺权又发生武斗，东郊韩森寨国防工厂的 1000 多工人前去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武斗规模超出了本厂范围，成为轰动全国的 2·10 事件。

3 月 1 日晚 9 时到 3 月 2 日凌晨 3 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等接見西安地区双方赴京代表。3 月 2 日下午 4 点 40 分到 7 点 55 分，敬爱的周总理再次接見西安地区造反派的双方代表。在会上，敬爱的周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长达三个余月的反"右倾"，方正式告一段落。

此时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在教育部招待所，已由研究生賀相、陶文铨（现中科院院士）主持工作，一封封'北京来电'、一篇篇'中央首长讲

话’及时传回西安交大，全校师生员工欢呼雀跃，一时传为佳话。

事隔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西安地区反右倾的分岐与争论，之所以在 2 月 14 日以后，有了关鍵性的转折，并得到迅速的解决，完全是因为毛主席作了“二一四”批示！

2·10 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电话向中央请示报告说要：“站到西军电和西工大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2 月 14 日上午 9 时，毛主席在《要事汇报》第八号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毛主席作出“二一四”批示的前后过程，《文革史话》（刘朝驹著，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在第 490 回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2·10 事件发生后，“省军区把这一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 6 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当天，陕西省军区打电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汇报，第二天，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又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更正。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2 月 12 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关于西安两派分歧和工厂武斗的电话请示报告。王明坤说：

（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

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应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

（二）西安东郊二八工厂10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20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2月14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要事汇报》第八号上作了“二一四”批示。

当天，周恩来接见陕西代表，对解决西安地区造反派内部分歧提出两点意见：

“（1）在未解决问题以前，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2）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国防工厂。”

陕西各位代表向周恩来提出“四条保证”，“一定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

2月22日夜，刚刚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21军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次日晨乘专机到北京领受任务。

次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京西宾馆举行。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11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也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

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就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了。

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天，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进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3 月 1 日，周恩来再次接见西安"统指"、"工总司"和西安交大的代表，他说：各造反派组织"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

（二）陈毅副总理的'黑话'与所谓的'二月逆流'

2 月 5 日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小会客室，亲切地接見了我们一行九人和西医八三一的代表二人，一开始就谆谆教导我们说：

"万里长征本身是光荣的，但是万里长征是垮台的结果，毛主席上了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本来没有必要万里长征。马上可以从江西北上，解放上海，中国解放就可以提前十年，就是因为打倒一切，党内打倒一切，包括把毛主席也打倒，党外打倒一切，党内所有犯了错误的都要打倒，党外打倒一切，所有资本家、手工业者、地主、富农都要打倒，那时象你们三个戴眼镜的人，

都是知识分子，穿长袍的人，都不行，都要打倒。现在中国又有了这个情况，国内打倒一切，国际打倒一切，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不要一打倒就打倒一切，我们是没有这个本领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打击面不能过大，要象毛主席那样分化一切，瓦解一切。不论他几十年老革命，犯了几个月的错误，都要打倒。有打倒一切之风。我们要争取一切，分化、瓦解一切，孤立一小撮。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说：中央里面还要有几个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中央是不行的。这个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否则就不得了（陈总和同学们都笑了）。”

接着陈毅副总理说：“好，言归正传，我希望活泼一些！交谈交谈活思想。

郑叔良同志交来的材料我们看过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谈的，或者重复谈一谈。”

我们就扼要地向陈老总汇报了两派分歧的由来，最近出现的严重情况和1·28大会的真相等。

最后，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毛主席在1月22日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战犯犯了罪，不杀他，对我们还有些好处，也许我观点右了，讲了这番话。文化大革命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毛主席说：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在革命中改正错误，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刘澜涛愿意改正错误的话你们不能拒绝他，他不愿意改正你们就砸烂他的狗头。今天晚上接见时你们不要闹对立，今天跟你们谈了，对西安的情况更清楚些，李世英可能讲了错话，可以在内部自我批评，指挥部作法不好，他们作自我批评，你们不要去指责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文化革命中革命左派有分歧就非要对方投降，一讲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

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根本不是这回事，自己做自我批评就行了。掌了权，天天都会犯错误。你们年青人还可活几十年，我们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刘少奇、邓小平看了他几十年，不要马上下结论。我这个话是“黑话”，（众笑）水平高的一看就理解，水平低的就认为是黑话，不要说陈老总又在和稀泥了。”

当时正值 1967 年 2 月文革处于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老总等一批老同志坚决反对江青之流‘打倒一切’的错误做法。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的记得当年陈老总疾恶如仇、大义凛然的神情。陈老总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当时的观点：

一是坚决反对江青之流的‘打到一切’：“现在中国又有了这个情况，国内打倒一切，国际打倒一切，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

二是要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毛主席说：中央里面还要有几个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中央是不行的。”

三是“刘少奇，邓小平看了他几十年。不要马上下结论。”

陈老总最后风趣地说：“我这一个话是“黑话”。”我们听了以后当时大家都笑了，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不幸被陈老总所言中。

2 月 16 日下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一场激战开始了。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谭震林越讲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面走一面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不要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满腔怒火的陈毅喊了一声。被气糊涂的潭震林，如梦方醒，走干什么？是退却，是临阵脱逃，要在这跟他们干，干到底。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陈毅接着发言。他

针对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陈毅仗义执言，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坐在斜对面的康生继续说道："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从 2 月 22 日起，在怀仁堂召开七次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强加"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批判这些老同志。并在社会上煽动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三）鞠躬尽瘁的周总理

2 月 11 日下午 2 时半，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礼堂，接見我们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代表。总理进入会场后，亲切地和每个代表一一握手，并带领大家共同念了三段毛主席语录。随后，一一点名，认识每一个代表，详细询问每个代表的年龄、籍贯、家庭出身、工作职务，及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至今还能清楚的记得当年敬爱的周总理问到我时的情景：总理見我身材较高大，就亲切的问我，你是山东人吗？我回答说，我是浙江宁波人。

最令人难忘的是 2 月 13 日下午六时，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客室，单独接見我们交大七名代表时的情景，当时敬爱的周总理详细地听取了李世英当时讲'三句半'的全部过程，并询问了西安交大西迁的有关情况，同时谆谆教导我们要很好地处理好两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谈话不知不觉已经从六臬钟谈到了八点，这时总理的秘书吴斌同志进来，给总理送了一杯开水和面包。敬爱的总理，为了工作到这时候还没有吃晚饭，八点以后还有一个会议等着他，当我们亲身目睹敬爱的总理一杯开水一片面包充饥、然后站起来

边走边和我们招手示意，和大家告别离开会客室时，望着他渐渐远去的清癯背影，心里油然涌起敬仰之情，啊！敬爱的总理真是鞠躬尽瘁、一心为人民的楷模！敬爱的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四、八五静坐与九二武斗

（一）八五静坐

1967 年 3 月初，中央首长接見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西安两派回校整风。3 月 9 日，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总后、第二十一军共同组成了《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编者注：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并对全省的要害部门和省公、检、法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时组成《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3 月 15 日二千多名干部、战士进入西安交大、西工大、西电、冶院四校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

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支左部队不断受到部分造反组织的冲击。4 月 17 日，西安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联络站不满西安驻军关于西安的军事院校不介入西安两派造反派组织的决定，率先喊出了“打倒拿枪的刘邓”、“揪出刘邓在军队里的代理人”等口号。7 月 27 日《工联》所属的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

1967 年 8 月 5 日，是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壹周年纪念日，校革委会决定派人去揪刘澜涛、霍士廉等人准备开批斗大会，因为部队保护，一直都没有找到人；同时得知，西派四大组织以武汉三钢的名义出版了《武汉烽火》，大肆攻击漫骂交大；下午又得知，支左委员会的个别人单方面批准当年因大肆鼓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而停刊的《红卫兵报》复刊，工总司下午就上街游行。当即，付登华写了一张大字报《胡炜必须悬崖勒猪！》，并呼吁

晚上在402召开辩论会。当晚辩论会由校革委会常委叶雄波主持，辩论到晚上九点多仍没有结论，当时就有同学们高喊“请付登华上台！”付登华由三楼办公室到402，接替叶雄波主持辩论会，十点多钟，付登华把当时讨论的意见，归结为对支左委员会提出四点要求：立即军管刘澜涛、霍士廉等人；立即把刘澜涛、霍士廉等人交由革命群众批斗；不准《红卫兵报》单方面复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等。随即一批学生跟着他和叶雄波出发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反映要求，否则第二天《红卫兵报》出版就迟了。就这样，一群激动的年轻人在付登华的带领下冲出校门，走到玉祥门省总工会支左委员会的接待站，叶雄波无奈地跟着大队伍一块前往。当晚因没有找到接待站的有关人员，6日早上决定把队伍带到建国路支左委员会联络站。

李世英事后才知道，于8月6号凌晨到达静坐现场。此后‘交大派’的各总司人马陆续到达现场助阵，发表造反声明，并成立了以工总司马希圣为司令、交大李世英为政委的《八五造反指挥部》，8月11日，‘八五’指挥部公布静坐单位已达799个，人数达98000人，其中外地区组织90个，1900多人。从而开始了在建国路上旷日持久的《八五静坐》。直到9月16日在周总理‘八五静坐’是“派性高于一切”的严肃批评下，历时42天《八五静坐》才得以终止。

（二）进驻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正在八五静坐期间，北京传来‘砸烂公检法’的消息，公安总司要求交大革委会配合行动。8月16号晚上，校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由沈荣水副主任主持，要求革委会立即派人进驻省、市公检法和兰空、省军区等单位，当时校革委会决定由机械系革委会负责进驻省公安厅，并决定由我带队。我因不了解情况，也从未与省厅有过任何联系，故明确表示不愿意带队，但当时大多数委员都认为我原是机械系教师，又负责组织人事，工作比较稳重，

所以我带队去省厅最合适，我只好勉强同意带队前往。当时，还决定由蔡元基带领动力系同学去市公安局。我就和蔡元基说："省厅和市局都是军管单位，我们去一定要听军代表的安排，不要和公安总司的人接觸，也不要参与他们任何具体的行动"。所以，我到省公安厅后，首先找省厅军管会卲主任（兰空），经他同意先开了个大会，只是造些声势，说明我们来意后，就留下少量同学住到省厅后面的招待所，负责一些批斗走资派的材料调查工作，不参与省厅的任何具体工作和行动。进驻省厅前后不到两个星期，参加了一些造声势的大会后，就偃旗息鼓回了学校。尽管进驻不到半个月，也没干什么具体事情，可是在日后却受到校工、军宣队的多次审查，因为不管如何，在《八五静坐》期间，采用进驻省厅和市局的错误行动，无疑是加剧了当时的动乱局面。

（三）九二武斗与全校大疏散

1967 年五、六月份以后，西安两派的对立情绪日益严重，陆续发生武斗事件，如国营红旗机械厂的"红总司"（工总司）、"红旗总部"（工联）两派造反组织间发生武斗事件"六二五血案"等，特别是 7 月份，江青公开支持'文攻武卫'口号后，更是加剧了两派间的武斗。

8 月 18 日，两派在西郊庆安技校发生冲突；8 月 20 日，东郊大华纱厂、农机厂、筑路机械厂，西郊变压器电炉厂发生武斗；8 月 24 日，东郊胡家庙、纺织城地区发生武斗；8 月 25 日，东郊纺织城地区再次发生武斗，西郊庆安、北郊红旗也发生武斗。8 月 26 日，工联等组织开会，宣称要"在自卫的原则下选择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东郊秦川机械厂发生武斗；8 月 27 日，《工总司》所属西铁联抢劫铁路公安处武器弹药库，西郊 544 厂发生武斗；8 月 29 日凌晨四点，《工联》等组织千余人攻打东郊筑路机械厂、西北金属结构厂等，双方各有伤亡。8 月 30 日，《八五指挥部》凌晨派人携带武器去

东郊秦川厂抢枪被对立派发现，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死 2 人，伤 9 人；9 月 1 日下午四时，《八五指挥部》调集 2000 余人、近 50 辆汽车、攻打并占领西郊 544 厂、制药厂等，从三面对庆安公司形成包围。

9 月 2 日，西郊终于发生震惊全国的大规模《九二武斗》。尽管 1 日晚上支左委员会曾召集工总司、工联负责人，三方达成三点协议，但西郊的武斗仍不断升级。2 日凌晨 3 时许，《八五指挥部》一方开始冲击庆安公司，推倒围墙，动用土枪、土炮、燃烧弹等，占领部分厂房和驻厂部队营房；庆安公司《工联》一方在西郊其他工厂和西工大、西军电学生参与下，又将《八五指挥部》方面大部分人员包围缴械。冲突中双方互有死伤。直到晚八时，周总理专门为此作出“九二”指示，至 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双方才就贯彻执行总理指示达成《紧急协议》，《九二武斗》才得以制止。西郊的九二武斗最终以五十余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惨痛结束。

在西安武斗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校革委会在电机系实验室召开了紧急会议，坚持交大不参与任何武斗的原则，做好交大可能遭受对方武攻的应对准备，组织护校队，立即隐蔽学校的档案和贵重物资设备！我还清楚记得，我们在机械系的地下室，安置好档案和重要物资设备后，最后用砖块封死、粉刷，予以隐藏起来。同时决定一旦情况紧急，全校立即疏散。因此，当西郊九二武斗发生后，全校立即大疏散。我也随着全校的疏散队伍，乘上南去上海的列车，望着渐渐远去的古城西安，内心充满着惆怅和迷茫，久久不能平静。

（四）对‘八五静坐’的反思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每当夜深之时，文革中因武斗和清队而死去的那些无辜的亡灵，总会不时地呈现在我的脑海而不能忘怀。

我始终认为，67 年 7 月 1 日西安交大校革委会成立以后，校革委会最大

的失误就是没有能及时撤回八五静坐，如果我们及时撤回了八五静坐，九二武斗可能或许也就不会发生了。校革委会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彭康校长监管不力，如果我们监管得力，及时发现和制止了游斗，彭康校长也就不会被游斗致死。

在文革中，我一直从事校内工作，与支左委员会、《工总司》和《工联》的负责人没有直接的接触。对‘八五静坐’只能根据我经历的一些感受，反思如下：

‘八五静坐’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一群年轻人一时激动冲出校门到支左委员会去静坐，这样自发的行动，情有可愿。我曾问过机械系学生，常委叶雄波：“你凭什么跟着队伍冲出校门去支左委员会？你考虑到后果了吗？”当时，他无言以对，只是嘿嘿的朝我笑了两下，表示他做了群众尾巴的无奈之情。

据我所知，‘八五静坐’发生后，校革委会沈荣水等多数委员认为采用静坐的方式是错误的，应该尽快撤回。只要我们及时撤回了静坐，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既然多数委员都认为应该尽早撤回，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八五静坐’没能及时撤回，而是持续坐了 42 天，直到 9 月 16 日周总理严肃批评以后才最终撤离呢？

我认为，究其原因，固然当时外部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例如两派派性膨胀，加之 7 月以后江青鼓吹‘文攻武卫’，整个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当时支左委员会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制止武斗不力，武器枪枝弹药库管理松懈，甚至纵容武器流失，致使西安地区武斗不断升级等等。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八五静坐’之所以没有能及时撤离，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自身，交大校革委会应负主要的责任：

（1）当时校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高估了自己掌控局势的能力

‘八五静坐’刚发生时，李世英是不同意采用静坐方式的，但认为：

"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对群众运动不能压制，只能引导"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1967年3月周总理明确指出'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以后，毛主席'四．二三'批示又称李为'学生领袖'和'谈心活动很好'！所以，凭他当时的威信完全是有能力对'八五静坐'加以正确引导，立即撤回的，但是客观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八五静坐发生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特别是《八五指挥部》的领导权很快被工总司少数极左派分子所掌握，他已不能完全掌控局势，此时他想撤回也困难了。在'八五静坐'后不久，支左委员会就曾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希望把大批静坐队伍撤回去，留下一些代表和另一派代表、支左委员会一块上北京汇报情况和要求，解决问题。但被《八五指挥部》已实际掌权的极左派所拒绝，丧失了一次绝好的解决'八五静坐'的机会，以致八五静坐，一坐再坐，直到最后难以收拾的地步！

（2）错估了静坐的对象

一年前，1966年8月，静坐的对象是当时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领导，他们怕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因此很快就答应了提出的要求，静坐几天就结束了。可是一年后，静坐的对象是支左委员会，他们不可能作出妥协。他们提出了希望队伍撤回，留下代表上北京汇报、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但是掌权的极左派们却抱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错误地拒绝了合理建议，自绝了退路，从而连累了交大！加之，当时对立的《统指》和《工联》方，又千方百计制造陷阱，极力把交大推到了始终与21军对立的被动局面，而不能自拔。

（3）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前面已经讲过，当时大多数校革委会委员并不同意采用静坐这样错误的做法，但'八五静坐'发生后，最为关键的是，支左委员会提出合理建议

后，主要负责人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及时召开校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支左委员会的建议。我认为，如果当时召开校革委会讨论的话，校革委会肯定会同意支左委员会的建议，这样就不管什么《八五造反指挥部》是否同意撤回，即使他们拒绝撤回，我坚决相信，只要校革委会作出撤回的决定，参加静坐的绝大多数交大同学肯定都会回校。只要我们交大撤回了静坐队伍，‘八五静坐’也就会很快随之结束。

（4）是书生之见误事

校革委会委员绝大多数是学生和老师，长期生活在‘交大’这样的象牙塔之中，对外面的社会往往带着天真的看法：认为大家有不同意见，至多只是唇枪舌剑，口诛笔伐而已，决没有想到两派中的极左派最后真的会煽动一批无辜的群众进行武斗，动刀动枪直至流血死亡。因此，如果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能认识到长期静坐对立下去，最后会发生武斗的严重性的话，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下定决心采取一切措施，召开校革委会全体会议作出决议，退出八五指挥部，交大一方坚决撤回八五静坐，以避免日后两派间大规模武斗的发生。

1967年9月18日，周总理在接見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你们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了，用“八五”静坐来兑现五条声明。李世英说首长不接见，总理说你们来个声明不更造成抵触情绪，你们“八五”一定受了北京的影响——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用“八五”静坐的方法，我们打了几次电话，总想给你们主动。你们现在派性高于一切，有私心。”

八五静坐之所以成为交大文革，乃至西安、陕西文革的重大事件，关键是长期静坐直接导致了二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一是长期静坐，把交大推上了始终与21军对立的被动局面，而当时的大局是维持陕西文革局面的稳定；

二是加剧二派对立和武斗规模的不断扩大。最初至多只是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两派间小规模的武斗；长期静坐，则给了工联极左派调集大批工厂，学校对工总司派进行围攻的借口，而工总司极左派们则利用八五指挥部之名，动辙调动几十辆卡车，几千人进行反围攻，以致最后发生震惊全国的九二武斗，五十多名受蒙蔽的群众成为无辜的冤魂。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回首‘八五’往事，我认为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交大校革委会坚持了坚决不参与任何形式武斗的原则。在当时极端险恶的武斗环境下，毅然决然地坚决作出了‘大疏散’的正确决策，使交大又一次避免了武斗的劫难！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的师生员工。上一次则是交大文革总会，在 1966 年 8 月省委工作团撤走以后，坚持正确对待和团结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反对反动的血统论，坚决反对打砸抢，维护了全校的团结和统一，避免了象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都难以幸免的校园武斗，保护了交大，保护了交大的师生员工。使交大成为‘全国仅有’的一枝奇葩！文革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公道自在人心。交大文革总会、交大校革委会、‘交老总’的功与过，是与非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五、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和一份西安交大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员名单

1967 年 7 月 1 日，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委会）正式成立。

196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明确指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

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从此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在全国范围刮起了“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清队”持续两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

1967 年 11 月初，8118 部队派解放军干部进驻西安交大，由解放军主持，革委会負責执行清理阶级队伍具体工作。

在一九六八年，我记得当时校革委会委员的分工大致如下，革委会主任李世英、副主任沈荣水、常委戴慕蓉等，主要负责校外有关当时省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其余大部分委员负责校内的斗批改工作，革委会副主任武登才、陈柏荣、杨文负责抓总；常委王春杰、邓正德，叶雄波负责斗批改的具体领导；其他委员分工负责斗批改的各项具体工作，如蔡元基负责走资派的批斗；冯成武、程宗武负责治安保卫；我负责抓重大的特务、反革命专案，以及校内重大专案组的文档工作；张国强、申成仑负责宣传；苗俊德負責红卫兵总部等方面工作。当时的清队工作主要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校革委会统一动员，上下一齐行动，各方面工作互相配合。采用分级负责制：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由基层单位负责排队、摸底和清查；问题较严重的，由各系、部革委会成立系专案组负责清查；问题重大的由校革委会成立校专案组直接抓（如当时的彭康专案组、凌雨轩专案组等）。

我当时负责重大的特务、反革命专案，以及校内重大专案组的文档工作。专案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1966 年文化革命前，由原交大党委负责的内清办公室所掌握的调查资料；二是 1966 年 6 月到 8 月期间省委交大工作团移交的调查、整理材料；三是省公安厅转办的有关‘内控人员’材料，和敌特分子的专案材料。由于该组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本组工作人员，多系原交大党委内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文革前交大保卫处的有关同志组成。

目前，社会上和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师生员工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如下：

“一九六六年：

1. 王永婷，女，1943 年生，河南开封人，团员，23 岁。西安交通大学动力二系压缩 12 班学生。1966 年 7 月 9 日跳楼自杀。

2. 沈丙辰，男，1942 年生，江苏靖江人，团员，23 岁。西安交通大学电真空 31 班学生。1966 年 7 月 5 日服毒自杀。

3. 龚起武，男，1912 年 8 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职员。1966 年 7 月 21 日因对运动产生恐惧、害怕情绪而跳楼，8 月 16 日死于第四军医大学医院。

4. 陆家训，男，1925 年 9 月生，江苏人，1951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基础部理论力学讲师。1966 年 8 月 27 日跳楼。

5. 骆风峤，男，1916 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 年 9 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五级教授。1966 年 12 月 13 日跳楼。

一九六七年：

6. 胡俊儒，男，1919 年 10 月生，河北获鹿人，1939 年 4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行政十三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1967 年 5 月 10 日上吊自杀。

一九六八年：

7. 钱宪伦，男，1909 年 7 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 年 12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1968 年 4 月 3 日开煤气自杀。

8. 袁云文，女，云南石屏人，1919 年生，钱宪伦妻子，1968 年 4 月 3 日与其夫及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身亡。

9. 张淑修，女，云南石屏人，1884 年生，钱宪伦岳母，1968 年 4 月 3 日与女儿女婿一起开煤气自杀。

10. 彭康，男，江西萍乡人，1901 年生，1928 年 11 月加入中共，行政五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68 年 3 月 28 日在游斗中死亡。

11. 陶钟，女，上海人，1928 年 12 月生，1952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 5 月 19 日开煤气自杀。

12. 王海连，男，山东单县人，1921 年 1 月生，1949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总务处工务班工人，1968 年 7 月 3 日跳楼自杀。

13. 范步功，男，陕西乾县人，1944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金压 21 班学生，1968 年 7 月 21 日服毒自杀。

14. 王宏德，男，安徽合肥人，1908 年 1 月生，1951 年 12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修配组工人。1968 年 8 月 3 日跳楼自杀。

15. 黄钟秀，男，上海人，1922 年 3 月生，1950 年 9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8 年 8 月 3 日上吊自杀。

16. 任服膺，男，陕西户县人，1945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铸工 21 班学生，1968 年 8 月 10 日跳楼自杀。

17. 毛一鸣，女，江苏吴县人，1884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毛祖德的母亲，1968 年 9 月 4 日上吊自杀。

18. 张英玲，女，安徽合肥人，1921 年 10 月生，1949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保健室护士长，1968 年 9 月 15 日跳楼自杀。黄钟秀妻子。

19. 王鉴淑，女，江苏太仓人，1926 年 2 月生，1949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1968 年 9 月 24 日跳楼自杀。

20. 唐兴恒，男，江苏无锡人，1923 年 12 月生，1949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福利部理发师。1968 年 11 月 2 日上吊自杀。

21. 陆谷宇，男，浙江杭州人，1926 年 11 月生，1952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1968 年 12 月 2 日上吊自杀。

22. 汪国檠，安徽休宁人，1928 年 4 月生，1956 年 1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 350 教研室讲师，高教 11 级。1968 年 12 月 4 日上吊自杀。

23. 王振国，男，浙江宁海人，1936 年 2 月生，1957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 12 级。1968 年 12 月 18 日跳楼自杀。

24. 周寿根，男，江苏无锡人，1922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五七工厂工人，1968 年 12 月 24 日跳楼自杀。

25. 沈宗炎（沈仲炎），男，浙江余姚人，1937 年 3 月生，1956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 230 教研室实验员，1968 年 12 月 31 日跳楼自杀。

一九六九年：

26. 沈家本，男，江苏苏州人，1921 年 2 月生，1949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9 年 1 月 19 日逃跑，1969 年 1 月 21 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27. 刘继宏，男，浙江镇海人，1924 年 8 月生，1949 年 5 月参加工作，1952 年 10 月入党，西安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处科长。1969 年 2 月 4 日跳楼自杀。

一九七零年：

28. 杨文，男，山东文登人，1920 年 11 月生，1941 年 8 月参加工作，1941 年 2 月入党，行政十三级。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1970 年 3 月 30 日上吊自杀。

29. 姚培洪，男，上海人，1932 年 2 月生，1953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1970 年 5 月 17 日跳楼自杀。

30. 王敏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 年 1 月生，1956 年 9 月参加工作，

团员，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1970 年 7 月 5 日上吊自杀。

31. 陈子晴，男，江苏无锡人，1926 年 9 月生，1949 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力教研室主任，高教六级，1970 年 7 月 5 日上吊自杀。

32. 李希緩，男，山西灵丘人，1916 年 10 月生，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1970 年 7 月 12 日上吊自杀。

33. 许志中，男，上海人，1935 年 6 月生，1958 年 8 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 11 级，1970 年 9 月 30 日服毒自杀。”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统计表》（驻西安交通大学工宣队领导小组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0 年 10 月 30 日印制）、《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复查结论情况表》（1976 年 4 月 20 日印制）、《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干部登记名册》等档案原件复印件整理而成。西安交通大学文革中共自杀 34 人，有一名自杀未遂者未计入此资料内。”

从上述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安交大非正常死亡人员大致可分为下列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 1966 年 6 月至 8 月，省委工作团进驻交大时期，死亡 4 人；

第二个时期，即 1968 年 1 月至 8 月，交大革委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死亡 10 人；

第三个时期，即 1968 年 8 月 29 日至 1970 年 9 月，1968 年 8 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相继进驻学校，连同原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干部组成了工、军宣队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死亡 17 人。

（注：死亡名单中有 2 人，因死亡时间在上述三个时期段外，故末统计在内。）

我对第二个时期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人员情况，有所了解，因为有些善后工作是由我具体处理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彭康不是叛徒与彭康之死

1966 年 7 月省委工作团宣布原西安交大校长彭康为叛徒。8 月工作团撤离学校，我接收了这部分材料，详细审阅了当时定彭康为叛徒的全部材料，发现依据不足。

彭康于 1930 年 2 月 15 日与鲁迅、郁达夫等 51 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 4 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直至 1937 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 7 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当时定彭康为叛徒的主要依据是说他自首变节拥护蒋委员长。实际情况是彭康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当时已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根本谈不上是自首变节，所以说定彭康为叛徒是没有什么依据的。1954 年时华东局正式作过彭康不是叛徒的审查结论，当时学校成立了彭康专案组，史立民同学任组长，他更是认为彭康不是叛徒的坚决派。

史立民和我曾把看到的材料情况告诉了李世英同志，我记得他还亲自到彭康专案组看了有关材料，说彭康写的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逗号不是写在拥护蒋委员长的后面，而是写在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后面，说明他只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根本谈不上是自首变节。

没有想到过段时间，李世英把彭康不是叛徒的看法，告诉了“统指”方的一位战友，‘统指’就把李世英认为彭康不是叛徒作为李世英‘右倾’的又一大‘罪状’，进行大批特批。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公开站出来说彭康不是叛徒，只能含糊地敷衍了过去。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认为彭康只是走资派和有些生活作风而已，根本没有把他看成是叛徒、敌特、现行反革

命那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在工作团撤走后，我们对彭康只是在学校设立专案组做些调研、搜集资料、接待外调小组等工作。由于彭康的特殊身份，他的行政级别高，不少外调小组来西安找他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明确务必要保证彭康的人身安全。决定由常委邓正德负责指派监管小组进驻彭康宿舍，名义上是监管，实质上是保护。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极少数同学受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的‘彭康什么时候斗都没有错’的蛊惑，1968 年 3 月 28 日对彭康采用了革委会一贯反对的游斗方式，致使彭康在游斗中不幸身亡。彭康死亡后，蔡元基负责处理后事，我清楚记得他回来以后曾跟我讲，他看了彭康的尸体解剖，因为彭康长期吸烟，肺部下面都是黑稠的，因此显然是因为严重的肺气肿，游斗导致气绝而亡!

彭康的不幸去世，革委会負有显然的监管不力之责。如果我们监管得力，这一不幸事件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交大电制班同学在《彭康的最后日子——我在大学（1967.10—1968.3）》中比较真实地描述了彭康的最后日子：

"……班上的共青团支部书记邓正德在学校的革命委员会里担任着常委，弄回来一个革命工作，让我住到彭康校长的家里，组织一个看守小组，看守彭康和以他为首的学校主要领导人——一群大黑帮。

实际上，在那场革命中，对当时以彭康为首的交大校领导并没有查出他们本人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在运动开始时那样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和专政已经结束。但是，他们的黑帮帽子并没有革去，依然有审查他们的专案组，造反派或者专案组随时还会来提审他们，但是必须有我们看守小组的人在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住到彭康家里，监护他。同时组织其他的校级黑帮集中学习并且参加适合他们身体状况的劳动，主要安排在学校的果园。

记得那天我搬着被褥去时，见到了彭康的夫人王琏。我给她讲了三条：从今天起，我们几个住在你们家里，代表专案组负责监护工作；尽管你们已经是老人，而且有很高的身份，但是到这里来，和你们相处，只能直呼你们的名字；我们不会把你们以敌人对待，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随时找我们，我们会为你们负责，希望配合。……

三月二十八日早晨，我们中的一个同学带着彭康出门。大约九点来钟，突然他跑回来来给我说，彭康不行了。我赶紧跑出去，跑到东门口，看见彭康光着一只脚，被人抬上了救护车。我来不及上车了，就又跑回来，告诉王琏，今天不要去图书馆上班了。担心她在上班途中，知道彭康不行的消息，再发生意外。”

（二）钱宪伦一家三口惨死的悲剧

1968 年 4 月 3 日上午一上班，保卫处的朱长庚就急急忙忙的跑来找我说：“出事了！有人自杀了！”我一听，急忙跟着他跑到交大二村一个宿舍的一楼，推门一看，屋里的惨象不禁使我惊住了，只見：桌子两旁各自安静地端坐着一位衣着整齐的老人，在床上平躺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整个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死一般的宁静。这是我在交大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处理的第一起自杀事件，一家三口惨死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之中！好像条件反射一样，以后只要一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句话，一家三口惨死的景象就会清晰的湧现在我的眼前，久久难以忘却。

‘钱宪伦’，我是直到 4 月 3 日这一天才知道有这个名字！他自杀后，我进行了一些调查和了解，钱宪伦只是‘两航起义’的一般人員，所以他不是系、部专案组，更不是校专案组审查的对象，他只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属于基层单位负责审查而已。在审查中，也没有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可是，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呢？通常人们只有在极端绝望的情况

下，才会采取自杀这样极端的方式，甚至是一家三口集体自杀的方式，以死来证明他们的清白，来抗诉社会对他们的不公！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步了解了‘两航起义’的有关情况：

1949 年 11 月 9 日，十二架飞机（央航一架、中航十一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驻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回归新中国。到 1950 年底，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共 1725 人，直系亲属 2474 人，总计 4199 人。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

周恩来总理评价“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毛泽东主席更是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蒋帮，引起国际注视。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 27 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帮的分崩离析。

可是时过境迁！尽管往后两航人员为我国的民航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不少两航人员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间，不少人在精神上受到了迫害，还有不少人在肉体上也受到了迫害，有的被投入牢中。想当年，他们抛弃了香港优厚的生活待遇，抛弃了英国政府

同意他们作为香港公民的待遇，毅然决然的起义返回祖国，他们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那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干部，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和迫害，更何况是从香港回来的两航人员呢？我想，正是此情此景，使钱宪伦感到空前的绝望，生不如死，他无儿无女，又放心不下年迈的岳母，干脆一起撒手人寰，奔向‘天堂’。

唯一可以告慰三位亡灵的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发生三十三年后，起义者们已被正式确认并颁发了‘起义证明书’，你们的沉冤已得以昭雪，愿你们在天堂一路走好！

（三）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治，使我内疚终生

1968 年春天，我校革委会收到省公安厅转来的一封反革命匿名信，当时《公安六条》第二条（该条是公安六条的核心）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法律文件。因此当时校革委会如临大敌一般，决定集中力量偵破此案。我当即组织保卫处的唐余璜等人成立专案组，全力以赴偵破此案。

此案的唯一物证是该封匿名信，所以只能从书写匿名信的笔跡着手，我们从匿名信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作案可能性较大，所以决定先从学生开始查找，把当时在校的学生，一年级时的考卷全部调出来一一查找。组织了 10 多个同学在唐余璜领导下，调阅了几万份文字书写比较多的考卷（如

政治经济学、物理、化学等），从特征字的笔跡着手仔细对照，苦战了近十天，终于找出来几份特征字的笔迹十分相似的考卷，又经过仔细的筛选，最终找出书写这些特征字考卷的学生，然后将该名学生的所有考卷中特征字全部加以汇总，发现所有的特征字均相吻合，最后将所有的笔跡证据送呈省公安厅笔迹验证机构审核，最后认定确认无误。

笔跡确认后，随后对该同学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发现他经常在半夜收听他自制的一台大线圈、超长天线的矿石收音机，根据调查该矿石收音机如调试得当，可收听到当时被认为是敌台的‘美国之音’。所以最后确认该学生系反革命匿名信的作者，又有作案的条件（可收听‘美国之音’）。校革委会向省公安厅上报了破案报告，最后经省公安厅批准，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批捕。1968 年 5 月 20 日，校革委会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予以批捕、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斗转星移，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内心对当年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治一事，越来越感到疑惑和不安。

首先，所谓反革命匿名信，现在回忆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动之处，无非是对当时的形势和做法，对某些领导人有不满和牢骚而已，按现在的标准看是够不上什么反革命匿名信的，完全是当年无限上纲上线的产物；二，至于收听美国之音更谈不是什么问题，依据这样的所谓反革命匿名信和收听敌台就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显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错把一个有不同政见、对当时有不满情绪的一个青年学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我脑海中，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自责：如果不是我当年那么执着、努力的去破案，王治同学就不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了。我当时完全可以借口在交大上万名同学的茫茫大海中，要想找一个匿名信的作者，犹如大海捞针

一样的困难，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敷衍过去。可是，这样的假如是永远不可能了。残酷的现实却是，当年的我，为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全力以赴地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去破获一起本不是反革命的‘反革命’案件，把一个不应是‘反革命’的青年送进了监狱。

五十年过去了，我内心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王治同学，不知你现在身处何方？我愿意在这里向你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也愿你能顺利度过坎坷和打击，有着自己美好的人生。

六、西安交大文革中的一些往事拾零

（一）‘刘少奇式的大叛徒’霍士廉

1967 年 5 月 30 日晚上，文革总会副主任武登才叫我立即到‘四二’专案组办公室，我去后，他给我一份材料说这是‘四二’专案组刚从山东调查回来的材料，证明霍士廉（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四二年在山东工作时期，曾有叛变行为，所以准备把他定为大叛徒。

我仔细审阅了‘四二’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感到定为大叛徒的依据不足，至多他只是同意他人自首行为而已，和当时中央定刘少奇为叛徒一样，最多只能定他是‘刘少奇式大叛徒’，而且至多也只有百分之五，六十的把握而已！

武登才同意我的看法，把霍士廉拉到学校大操场上，以‘刘少奇式大叛徒’的罪名对霍士廉进行了批斗。为确保霍士廉的人身安全，武登才决定把霍士廉交由校红卫兵总部苗俊德所在的 810（41）班的红卫兵负责看管，允许家属送衣服探望，生活上予以照顾等。就因为我提出定霍士廉为‘刘少奇式大叛徒’，在以后几年中，工、軍宣队多次对我进行审查，要求交代详细情况，我说当时的情况很简单，就是这样：我认为霍士廉不是大叛徒！最多

只能定为‘刘少奇式大叛徒’而已！

想不到历史会有戏剧性般的变化！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薄一波、刘澜涛等“61 人叛徒集团案”，定刘少奇为大叛徒。胡耀邦接任中组部部长后，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这轰动全国的“61 人叛徒集团”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1978 年 12 月 16 日，“61 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 12 年后终于获得彻底平反。所以定刘少奇为大叛徒，本身就是一桩天大的冤案！刘少奇不仅不是大叛徒，而是营救了 61 名中共党员的功臣！所谓‘刘少奇式大叛徒’也就成为子虚乌有的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历史还真有些巧合，‘刘少奇式大叛徒’还真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原来刘少奇是受了中央委托，由北方局找地下共产党员出面营救 61 名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名关键的人物过之翰，他是我夫人过静娴（电制 21）的祖父！其营救经过大致如下：

1936 年，中共北方局为营救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防止狱中已关押多年、饱经考验的优秀干部遭日寇杀害，通过地下党员过家和，委托其叔父过之翰协助营救。过之翰早年在西北军时就曾和一些共产党人有交往，他的长子过家芳（抗日名将）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接受委托，他一方面把过家和调到 29 军任军政处中校处员，同时向宋哲元推荐其叔过俊伟任军人反省院副院长，以利于过家和到狱中和关押的党员秘密联系，开展营救活动。过之翰深知宋哲元不仅力主抗日，而且反对内战，是国民党军中极少数从不和红军打仗的将领之一。过之翰决定直接找宋哲元军长，商议释放军人反省院中的共产党人事宜。为了避开众多耳目，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法政字 2619 号训令”，大意是在反省院的犯人，反省期满，履行手续可具保释放。请宋哲元签了字。此后分批释放薄一波、刘澜涛等 61 名中共党员出狱。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前夕，过之翰让过俊伟将狱中在押人员全部释放。

过之翰，1911 年入南京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1912 年即参加冯玉祥部，历任北洋政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兼盐务总署署长、西北银行行长、西北军财政总管、总军需官兼军需处长、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冀察政务委员会财政厅长等职。建国后，过为民革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文史馆员。1965 年病逝。1980 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将其骨灰移放于龙华革命公墓。

还有个与过之翰有关的故事是：过之翰在北京毛家湾的故居，解放后，竟先后是高岗和林彪在此居住！！

（二）文革中干部三结合的一些往事

地下党员史维祥

2014 年 8 月，在美国底特律和我同寝室的好友郑嘉一相聚，我们两个都姓郑，巧的是他叫嘉一‘加一’，我叫叔良‘缩两’，两个名字合在一块儿，最后就成了‘减一’！谈起当年西安交大干部三结合的往事，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史维祥同志。

1967 年夏，当时交大要成立革委会，想找一位教师，作为革命干部进革委会，我 64 年到西安交大工作，基本上都在外地搞科研，对交大的情况不了解。郑嘉一大学、研究生都在西安交大，所以他听我讲起能不能找到一个教师出身的革命干部时，他一听马上就讲，那还不简单，我的研究生导师史维祥就最合适！

果然，我后来详细了解了史维祥的情况，确实是最合适不过了。史维祥同志是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1952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6–1960 年赴苏联加里宁工学院攻读副博士。是我国著名的液压传动及控制专家、机械系系主任。我马上向李世英等同志汇报后，大家一听都感到确实不错！

因此，在 1967 年 7 月 1 日成立革委会时，被选为革委会委员，此后历任

西安交大副校长、校长，为西安交大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令人不解的两位老干部自殺身亡

在干部三结合时，令人不解的是两位老干部的自殺身亡：

1967年春天后，为成立革委会，开始革命干部三结合的调查和了解工作，根据初步调查，多数同志认为原交大党委组织部长胡俊儒比较合适：胡俊儒，河北获鹿人，1919年10月生，193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原交大党委常委，党委组织部长，行政十三级干部。胡一贯作风严谨，工作踏实努力，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胡俊儒同志本人也了解我们文革总会有结合他的初步意图，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竟于1967年5月10日上吊自杀身亡。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深深的惋惜，也一直感到不能理解，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自杀呢？

另一位就是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杨文同志，也是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竟于1970年3月30日上吊自杀身亡。

杨文同志，山东文登人，1920年11月生，1941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入党，行政十三级。原交大党委会常委，曾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党委统战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7月1日任西安交大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在任期间，工作努力，和所有革委会委員相处都很好！杨文同志的不幸逝世，既使我们大家感到极大的惋惜，更令我们感到不能理解，他正在好好地工作，为何要走上绝路呢？

（三）小卖国贼的儿子，就是小小卖国贼！

文化大革命中，反动的“血统论”大行其道。红卫兵到处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省委工作团期间，西安交大作为我国的最高学府之一，解放前其人员组成必然和当时的上层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省委工作团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大肆宣扬什么“交大池深王八多，有

大卖国贼章宗祥的儿子，大汉奸周佛海的侄子，……”。

在清队高潮过去半年多的1970年3月，军宣队负责人还在全校党员大会报告时仍说：“交大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隐藏了一个很深的特务集团”，“交大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潜伏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等。正是在这种政治高压下，从1970年3月到9月，交大仍有六人陆续自杀身亡！

章宗祥的儿子章德安，交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他曾和我一起在校办工厂鋳工车间劳动，有一天，他正是因不堪忍受这种政治压力，竟然跳进铸工车间的大烟囱里自杀！结果自杀未遂，当他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时候，满身漆黑，只見两隻眼睛透着光亮！我见到他时，开导他说：“你爸是你爸的问题，你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何苦非要自杀呢！”他睁着两个红红的眼睛，悲愤的望着天空，幽幽地说：“象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卖国贼的儿子，是小卖国贼，我生的儿子，就是小小卖国贼！我不能有儿子！我结婚就找了位不能生育的做我妻子，不然的话，有了小小卖国贼就会生下小小小卖国贼！……”

这使我不禁想起，1956年曾风靡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流浪者》有力地鞭挞了大法官拉贡纳特信奉的“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谬论，想不到十年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谬论再次盛行，这真是时代的悲剧！！

（四）脑筋不开窍，放进去一把钥匙！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红色风暴年代，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怪事。当时交大动力系某实验室的一名老工人，常常怀疑别人背后讲他脑筋不开窍，从而产生幻听幻想，有一次，竟然当真用斧头把自己的脑袋劈开，放进去一把钥匙！

抢救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讷讷地回答道：“有了钥匙，我的脑筋就开窍了！”不禁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五）周寿根冤案与陈达时的解放

1969 年下半年，我着手校办工厂的重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任用，原西安交大五七工厂，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副厂长陈达時，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工作也很有能力，但始终处于被审查的阶段，不能使用。经过了解，原来他是因为包庇和重用“特务”周寿根而一直被审查。周寿根，江苏无锡人，1922 年生，原西安交通大学五七工厂工人，文革时被审查，于 1968 年 12 月 24 日跳楼自杀。

我详细审阅了周寿根的案卷，发现周只是在原国民党兵工厂工作过的一名普通工人，并沒有什么重大的历史问题，怀疑他是特务没有任何依据！但是当时原校五七工厂有一批复转军人，不同意给他平反！认为他沒有问题，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原来，他们是我国第一批复员的陕西籍防化兵，这批同志无产阶级感情较深，他们认为在原国民党兵工厂工作，并跳楼自杀！就是说明他有问题！

1969 年 10 月，我决定与他们中的一位代表蔡 XX 共同组成调查小组，南下浙江杭州，衢州，到周寿根曾工作过的工厂调查，走访当事人，调阅档案，调查结果足以证明周寿根只是一般的兵工厂工人，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样，就很顺利地为周寿根冤案平了反！及时解放了陈达時同志，并被任命为动力机械厂厂长，在日后 2300 台深井水泵和柴油机的生产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七、全校动员，日夜奋战生产 2300 台深井水泵，修筑地下防空洞

从 1966 年 6 月到 1969 年底，文化革命已经三年多了，经历了省委工作团、静坐、绝食、反右倾、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文化大革命的现实使自己日益感到迷茫，难道就这样每天停课闹革命搞下去吗？

回想自己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和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可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情况，使自己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与其如此，还不如尽自已所能做一些有益的实际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一份绵薄的力量。

西安交大作为全国有名的理工科大学，'北清华、南交大'的说法曾广为流传。

西安交大全校实验室就有工人 500 多名、校办工厂工人 200 多名，聚集了多名顶尖的技术高手，如原江南造船厂的八级焊工顾福根、工人技师徐祥、严申府等。于是我就和李世英、武登才、陈柏荣等同志商量后决定，于 1969 年底就把全校 700 多名工人全部集中起来抓生产，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将原来的校办工厂和各系修配组、实验室合并成立校"五七"机电厂。"五七"机电厂同时承担教学、科研、生产任务。"五七"机电厂下设四个工厂：机械厂、动力机械厂、电机厂和无线电厂。校革委会决定由我负责领导校办工厂，日后我曾任生产物资处处长多年。



深井泵零部件生产车间

1970年初，交大主动请缨接受了一项支援陕西农业生产的光荣任务——在旱季前生产2300台深井水泵！陕北地处高原，农业生产多依靠三四十米的深井抽水灌溉，所以亟需特殊的深井水泵。深井水泵中一个主要的部件，就是三四十米长的钢管，为便于运输、安装，几十米长的钢管根据需要由两米长的短钢管通过法兰盘（中空四周有螺丝孔的圆盘形另件），用螺丝加以连接。为提高生产效率和节省成本，工人师傅们创造性地进行了技术革新：把法兰盘零件直接用球墨铸铁铸造的毛胚代替原来由钢材锻造的毛胚；自制胀管机，直接把法兰盘牢牢固定在钢管上代替原来的焊接工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成本！


深井泵输水管除锈

为了在夏季前完成2300台深井水泵的生产任务，全校师生員工总动员，在操场上排列起胀管机、油漆流水线，大干苦干，挑灯夜战，流血流汗终于按时胜利完成了任务！原铸造教研室实验员胡源通同志，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4年8月，在美国底特律，我遇到金相教研室的石德珂老师，谈起当年全校教工苦战深井水泵热火朝天的生产情景，不禁感慨不已！胡不幸牺牲的那一天，他恰好就在铸工车间化铁炉前

劳动，爆炸时胡的脑浆直接溅到他的身上，既庆幸自己的大难不死，也甚是惋惜胡源通同志的不幸去世！

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向当年曾经为2300台深井水泵苦战的工人师傅和老师、同学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并向胡源通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之情！

我想，每一位曾经在西安交大度过文化大革命岁月的同志，都会深深地怀念和感谢西安交大的全体工人师傅们！在我们每次上街游行回来时，食堂大师傅们都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可口的热饭热菜；在我们两天绝食斗争回学校时，他们早已熬好了香喷喷的小米稀饭，蒸的像发糕那样软和的馍馍，还有清淡的小菜等着我们，令我们无不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我记得，1967年夏天西安武斗最激烈之时，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校革委会决定全校疏散，正是校革委会常委，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鋳工师傅朱奎林，挺身而出带领全校工人组成护校队，保护了国家财产。

我还记得司机班的贾长林师傅，每天开了十轮的‘太塔拉’大卡车，装着‘九头鸟’大喇叭，风里来雨里去，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宣传中央指示的情景，更记得他用二战期间美国四轮驱动的老军用吉普车，载着我跑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情景！在那个文革的动乱年代，和我校工人师傅们一起苦战的时光，是我在十年文革期间最愉快的日子！我校工人师傅们不仅生产了2300台深井水泵，还生产了近百台C616车床，二套300千瓦发电机组，大马力柴油机，还生产了几十台出口的电阻噪声测试仪，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农业生产！

在那文革年代，西安交大的工人师傅们不仅努力搞生产，还积极提高技术素养，请机切的屈梁生老师（已故工程院院士）开办了721工人进修班！

在那动乱的年月，西安交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不仅努力生产，还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搞科研，如计算机教研室教师经过10个月的日夜奋战，研制

完成西北地区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延安 701 型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全校还在微模组件、可控硅元件、射流元件等科研课题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当时的生产物资处，负责管理全校的校办工厂和实验室，以及全校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物资供应。在当时文革的情况下，也算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深挖洞，修筑地下防空洞

1969 年 10 月，中央发布一号战备命令，全国立即开始大疏散和深挖洞。校工军宣队当即雷厉风行地执行：全校人员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教工和家属疏散到陕西的风翔，略阳的农村；另一部分人在学校挖掘防空洞。

留校的人员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员工，由工物系的原政治辅导员权吾松，与原团委干部王玉璋负责防空洞所需砖块的供应，他们的任务首先是在原学校的果园土地上，修建一座长三四十米的砖窑，同时由校机械厂帮助自制了制砖机。他们日夜开工，挖土，压制，晾晒砖坯，搬砖坯到砖窑烧制，出砖，然而按质按量运送至防空洞工地！烧砖中最辛苦的工作莫过于，往尚在火热中的砖窑搬运和叠放砖坯，在高温下把刚烧好的砖块运出砖窑！大家虽然干得汗流浃背，但劳动情绪仍是十分高涨！我还记得曾累中取乐，用土坯雕刻了一个生动的熊猫蠋台，放在砖窑里烧制，最后用油彩装点修饰一下，成了一件很有情趣的文革纪念品，保存了多年，只可惜在以后的几次搬家中不慎丢失了。

另一部分人员则由原动力系革委会头头，锅炉教研室的徐通模老师（1998—2003 年任西安交大校长）带领，负责开挖地道，修筑地下防空洞。由于教职工多是文弱书生，挖掘地道的劳动量大，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如何用机械代替人力来挖掘地道，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熟悉的挖掘隧道和地

铁的盾构机。盾构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圆柱体的钢组件沿隧洞轴线边向前推进边对土壤进行挖掘。该圆柱体组件的壳体即护盾，挖掘、排土、衬砌等作业在护盾的掩护下进行。盾构机的掘进：液压马达驱动刀盘旋转，同时开启盾构机推进油缸，将盾构机向前推进，随着刀盘持续旋转，被切削下来的碴土通过螺旋输送机送到皮带输送机运至地面。

当时西安地区的几个军事单位和大型企业，已有相当于现今盾构机功能的挖掘机（当然性能差多了）。徐通模，我和校机械厂几名技术人員到这些单位进行了调研，回来后我们根据当时我校的机械制造能力仿制了一台功能比较简易的盾构机，主要結构是一个两米多直径旋转的大圆盘，上面安装了旋转的刀头，一面旋转切割泥土，同时一面前进，把泥土挖出来，通过传送带往后传送，这样一台雏形的盾构机，由于结构和功能都比较简单，因此功效没有能达到我们预想效果，但还是起到了减轻劳动强度的一定效果。大家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辛勤劳动，看到挖好的地道和修筑好的长长地下防空洞，充分体会到与地斗其乐融融的愉悦心情，一扫前几年与人斗时的郁闷和苦惱，这也算是另外一种解脱吧！

西安交大全体教职員工的确无愧于工人阶级和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八、后记

十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本来我会继续跟随汪应洛老师走科研之路，但是命运给了我另一个机遇，使我得以完成青年时的一个夙愿——实现管理的计算机化，造福于人类。

1979 年我借调到高教部设备局工作，在朱国璋，马维骧局长的领导下到全国高教部直属高校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制定了《全国高校重点实验室发展规划》，明确各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急需配备的仪器设

备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制定的发展规划论证清晰、说服力强，1982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首批的2亿多美元贷款，首先用于加强26所重点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科院校及农、医、师范院校的教学实验室，建立44个中心实验室和计算中心。

当时清华、北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复旦五所高校均获得贷款近千万美元。这五所高校引进了300万美元的DPS8和DPS6计算机设备；引进了600多万美元先进的理化分析、测试设备。从一九八二年起，我负责筹建西安交大计算中心，先后任计算中心副主任、主任，建设了14米×18米大跨度机房。1984年4月，西安交大负责全国第一套DPS8计算机系统的安装和验收，从上海包了7架飞机，安全运回总重18吨货物到西安机场，胜利完成了安装、调试和验收任务，并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程控电话分局，在全校普及了程控电话网。这批计算机系统的引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发展！

1984年夏，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计算中心进修计算中心的管理，从八六年起，先后负责完成了宾馆经济分析与预测系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信息系统、高校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组织了宾馆微机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广工作；从1992年起，任杭州大学中心实验室和计算中心主任，通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与德国、美国联网，成为全国首批连入互联网的高校之一，并先后负责完成了杭州大学管理信息系统、杭州市消防管理信息系统、浙江省消防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和开发。从1987年起，历任全国高校计算中心主任联席会副理事长，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为我国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和高校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尽的努力和贡献。

回顾我的一生，我的前半生：28岁前，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

生，从少先队，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工作后，埋头于科研课题之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 28 岁到 38 岁，在我人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前 3 年抓革命，后 7 年促生产。我的后半生：38 岁后，从事自己所喜爱的计算机事业，直至退休，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书画，颐养天年。

回首往事，我的一生，尽自己所能，努力过、奋斗过！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虽无显著的业绩，一生所为已聊以自慰！庆幸的是，在晚年，有相濡以沫的老伴，一双孝敬的儿女，一对可爱的外孙女和孙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安度晚年，此生足矣！！

2016 年六月六日

于西溪河下浙大启真名苑

作者简介

参见本文集首篇《全国仅有、独树一帜的“交老总”》一文的简介。



我的西安文革回憶

■/ 戴慕蓉

前 言

1966 年 6 月，全国在毛主席发动指引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在西安交通大学是个 1962 年入学的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师从沈尚贤先生（中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领域的奠基者）的工业电子学专业。

文革前我是研究生大班（全校有四个年级，共七十余人）的班长。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宋雅莼老师，并兼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大约是 1966 年 5 月份，可能是“五一六”通知以后，学校就停止了她的工作，宣布由我代理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在严克伦为首的工作团撤离学校后，1966 年 8 月 20 日学校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成员由各部门民主选举产生，研究生班推选我为代表，进入文革总会。

1967 年 7 月 1 日学校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革委会（简称革委会），研究生班仍推选我为代表，进入革委会。文革总会和革委会成员由学生、干部及教职员工各方的代表组成，他们大部分是党员、三好学生、基层优秀分子、教职工代表，作风正派，一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我校地处西安，高干子弟少，情况与北京高校有所不同，但也受到社会

思潮的影响。我比老五届的大学生略微年长，但受到的教育一直是共产党的正面教育，由于读政治书籍比较少，对于阶级斗争基本上一无所知，只知道响应党的号召，对毛主席的指示是出自内心的百分百的赞同并付诸实施，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就在这种背景下积极的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当年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日看来，实际上有的行为却是在错误的方向下“干革命”。由于年轻无知，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后，一些革命小将有时做了些错事，不断被审查，遭了不同程度的罪；有的遭到各种惩罚；有的甚至丢了小命。

文革中我抱着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但我始终认为我们没有搞阴谋诡计，是光明正大的参与了运动，但也有在派性指引下，做过些不利于大联合的事。后来认识到自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当时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阶级斗争。现在老了，虽然还关注着国家大事，但在日常生活中是安安心心的做普通百姓。这辈子我努力过、奋斗过、追求过，这就够了。现在能善待朋友、善待自己，目前有个基本健康的身体，有个好心态，过自己想要的自由的、平静的、有一定质量的生活，这就很满足了。

一

1967 年 3 月 1 日、2 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西安造反派

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对西安地区造反派分别在 1967 年 2–3 月份及 9–11 月份安排了几次接见。

我一直在文革总会和革委会工作，先后曾与有关委员分工联系学校与校外联络的机构和民间的有关战斗队，对于西安校外基层的部分情况有一点了解。加之其它的一些原因，有幸随同李世英参加了中央首长对陕西省及西安有关领导及造反派的接见。

毕竟已过去五十多年，很多往事已经忘却，但有幸找到了两次办学习班（1969 年元月至 6 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汤峪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及 1971 年 11 月至 1972 年 10 月交大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在校举办的批清运动——清查“5·16”分子学习班）审查时写的交代材料和中央首长接见记录，帮助我进行了回忆。

作为交大文革的参与者，对当时的过程做些客观的回忆记录，可还原交大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可给还关注这些事的人员有个交代。

（一）1967 年 2 月以前的西安形势

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高校学生带动下开始的。1966 年 6 月的西安，以交大为首的各高校学生起来造反，批判工作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待到其他高校都开始造反后，西安大专院校的头头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又成立了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

李世英是交大文革总会的一把手，交大文革总会是统指的主席单位，统指实际上起到了引领西安地区文化革命的领头羊的作用。交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我先后曾与邓正德、尹茂林、崔洪农、刘军智等多位委员一起负责与校外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后期还有与农民，机关及军队……）的联络，后称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下设办公室、六六通讯社及各战斗队、组。各战斗队主要是由学生，也有研究生和教职工自愿组成，确定校外的联系对象，长期联络，及时反映情况。这些战斗队有的是直属一办领导，有的是自己成立的，但也经常与我们联系，当时并不分得很清楚，但都是“无偿的、自觉的干革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很能理解这种情况。

文革开展起来以后，北京高校一直是运动的引领者，我们也很关注北京的动态。当时各种小报满天飞，1966年秋后，西安的高校中掌权的都是造反派，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如何对待所谓保守派，造反派如何团结大多数等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各高校的师生员工纷纷走出校门，去其他学校、工厂、农村和机关等单位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当造反派。

此时，交大李世英提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保守派应该进行帮助，让他们提高认识，和他们搞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通过"谈判"和他们消除分歧，共同对敌。交大校内绝大部分意见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其他高校的头头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交大右倾，此后便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大辩论。在这次的大辩论中，交大广播台的笔杆子，播音员和后勤人员全力以赴，坚持交大的正确理念，校内各战斗队也写各种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坚持团结大多数。两派的宣传车上街，双方不断展开辩论，交大的广播台开出的宣传车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树立正确舆论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形成了以交大为首的一方，以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西电（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为首的另一方，他们那派偏向极左。

辩论不断升级后就开始动手，出现武斗。后来他们那派就提出了"打、砸、抢"的错误口号。在此口号的指引下，统指派尤其在工厂，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即称为保守派，也对支持交大观点的大开杀戒，造成好几起流血事件，尤其东郊很多国防厂都不仅停产，对工厂的设备也造成了破坏。当时有"193"战斗队前身及"秦岭战斗队"等其他一些战斗队的人员就深入各工厂、学校、机关等地了解情况，及时反映各处的动态，每天有很多信息带回来。一般都是支持交大的一派挨打了，工厂被砸了……

西安统指一开始在北京曾设立联络站，便于及时了解北京的动态。后来由于他们反右倾产生了分歧，联络站内部也分裂了，各校又都自己派人成立

联络站。我校文革总会于 1966 年 11 月底也设立了自己的驻京联络站，派出人员有：贺相、万威武、尚军等若干人成立了交大驻京联络站，负责将北京的运动情况传达到学校，并将学校了解到的西安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在学校经常能看到“北京来电”、“六六通讯”等各种信息，让交大的师生员工了解多方面的情况，开阔眼界，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1967 年 1 月份上海夺权，更刺激了西安两派之间的争夺。在派性的支持下，为了夺权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武斗不断发生并升级。我们认为以西工大，西电为首的（简称统指派）他们太极左，光批判以李世英为首的交大派的右倾不说，甚至提出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等极端口号。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宣传，还付诸行动，挑动武斗，破坏了西安地区的正常革命秩序，工厂不能正常生产，与他们不同观点的人的生活都无保障。当时都造反，干部都被打倒，西安一片混乱。一办能较及时的将掌握第一手材料，提供给总会参考。我们认为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仅靠我们的力量已无法实现，觉得只有向党中央，向周总理汇报西安的情况，只有请中央来解决西安的问题。

（二）1967 年初文革总会去京向中央汇报

1967 年 1 月下旬，我们得知统指驻京办得到通知，中央文革要在 2 月初某日听取西安地区文革的汇报，但统指没通知交大。

交大文革总会即派郑叔良（校文革总会委员）、吴翼健（文革总会秘书）和王希平三人带了部分材料去北京，设法参加了他们的汇报会。

我们还通过交大驻京办与中央有关部门和总理办公室（原已有联系）取得联系要求汇报。很快就得到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吴斌的通知，将先安排陈毅

副总理接见西安两派的赴京代表。过了几天吴斌又通知交大驻京联络站，让李世英来京汇报，周总理要接见。这很明显是要解决西安的日益严重的局面，文革总会就决定李世英、张国强和我赴京汇报，我的主要任务是将平时收集的对方反右倾、打砸抢及武斗等情况整理成文的材料，主要是想把对立派的错误和罪状的证据带上，在周总理面前好好告他们一状！

2 月上旬赴京后，受到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的几次接见，前面几次主要是领导进一步调查，小范围的核实西安的情况。领导苦口婆心的开导我们：干革命会有成功，也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只要认识到改正了就好，让我们冷静下来，不要头脑发热……

我们很佩服周恩来总理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总理有调查组在基层了解情况，我们两派也各有情况汇报；总理还要把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召在一起全面核对落实情况，让大家取得共识后，再处理解决问题。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批评，让我们体会到都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总理和其他领导跟我们说，让我们到北京来，脱离西安的混乱局面，冷静地思考一下西安的问题。

（三）1967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中央首长的接见

1967 年 3 月 1 日晚，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领导人，3 月 2 日晚周总理分别接见了西安的学生、工人造反派代表，陕西省军区、驻军 21 军、兰空和总后西安办事处的领导，西安市委及总理派驻西安调查团的同志都参加。这两次接见主要谈的问题如下：

1、严肃批评西安发生的打砸抢问题。

总理接见一开始进入正题，就提出了 2 月 10 日发生的西安光学仪器厂（军工厂，简称西光厂）的问题。总理已经掌握了 1967 年 2 月 10 日在西光

厂（由工联指挥）发生的严重打砸抢事件的情况，直接问工联的一把手张培信，“东郊二分会（2·10 事件的肇事方）与你们有关系的吗？怎么你那天说东郊二分会与交大的影响大？现在情况不是如此。我问你二分会到底是你们影响大还是交大影响大？西工大，西电的影响大？”

总理几次询问张培信，总理很严厉的再三问“如果他们犯了法，你怎么样？”。直到张培信说“那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总理才说，“回去后你应该站出来。”张培信说：我应该站出来，按国务院指示办。总理才说：“你这态度好……（他们）确实砸了西光厂，你是工联代表之一，你回去以后，如果我们的调查属实，你应该站出来。”。

针对西安的混乱局面，由于对方的打、砸、抢给西安造成的严重局面让总理十分担心，还说二月份西安的打、砸、抢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总理还气愤的说：“简直好像是向我们示威！”。总理派了调查组在西安调查，“西安二十几个厂子被砸”，“调查组 25 日（注：2 月）离开西安，26、27、28 日还有被砸的。”“你们西电在前天（27、28）砸了西安造纸厂。并且拿卡车运了人，抓了 16 人……”，后来统指又调了各学校、工厂、军事院校的 300 人到 400 人去造纸厂打砸抢。“我们下了命令，要王副司令把西电的主任，副主任叫去……”

总理很生气的说“要他们写检讨他们不写，不写检讨不行！这是违反党纪国法！……李洪明（西电的一把手）你马上挂电话回去，问那几个同学承认了没有，写（检讨）了没有……这还有没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接见时将西安的武斗情况逐个摆出来，省军区的王副司令作了肯定的、明确的汇报，基本都是统指中西工大，西电等高校那一派的学生和工联派的工人高举“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口号，大打出手，把东郊的好几个军工厂打、砸得无法生产，总理把对方各学校的一把手先后点名质问：西电的

一把手李洪明、西工大的一把手孙福林、统指派的红卫兵造反司令李盛茂等等，批评他们分别从事打、砸、抢工厂、学校的详细情况，及造成的损失，还让他们一一表态。强调要他们发声明，要反对打、砸、抢，回去要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和事。

这部分内容是这次接见的重点。讲到对方的打、砸、抢、乱抓人，总理说“你看，你们那儿拘留了很多人，刘澜涛（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你们那儿，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你们那儿，现在霍士廉才来了（注：接见时在现场），还有其他西北局的人，王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在西工大，”孙福林说：不在，那是指挥部决定在我校放几天。总理马上说：“不，刚才来信还说在西工大，这怎么行？完全是无政府主义，完全目中无党！无政府！无军区！这二十多天帮助你们学习，做了多少工作还不行？！杨梦云（女，西安冶金学院一把手）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总之，在这次接见中对方受到了周总理的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总理还多次肯定了杨梦云（她在反右倾等问题上与统指有不同看法），总理说“他们冶院在西北地区也有发言权的，她（指杨）当着我的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容易呢！这些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女同志胆量反而大。不要以为我老称赞女同志，因为你们来的女同志少，以前有的来的全是男同志。”周总理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和杨梦云应该互相沟通，互相帮助，“交大的戴慕蓉同志你年龄比她大，你是姐姐，要帮助革命的妹妹，杨梦云的工作比你们难做，要帮助支持她，不要觉得就是你们这派对，‘打、砸、抢’中的有好同志，他们反对‘打、砸、抢’这提醒你们（交大）这样才能争取多数。”。总理还是支持我们，希望我们能更好的团结大多数，走正确的道路。对于他们的错误既有严厉的批评，对他们能承认错误，并愿意改正还是给与了肯定。

2、21 军为西安四所高校进行军训

两次接见时，康生和总理分别都给大家介绍 21 军军长胡炜同志，肯定了他们在山西的支左工作，介绍说他“是又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宣布中央决定调 21 军（军长胡炜）到西安，由陕西省军区、21 军、兰空驻军及总后办事处四大家组成支左委员会，由支左委员会来领导西安的运动。接见完就让群众组织的代表回西安，把学生都召回学校，由 21 军给四所大学（交大、西工大、西电、冶院）进行军训。军训时间不长，主要是政治学习，与整风相结合，要勇于自我批评，不要急于批评人家。

总理还指出“你们学生只能煽风点火，顶多当奶娘……要人家自己做主……你们回去搞军训，通通把人抽回来，不然，交大退了，你们不退，交大又有借口，又要进去。”“西安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自己做主？我才不信”。

总理让我们撤回校内，不再操控工人、农民的运动，让西安的秩序回归正常。在这个问题上总理还是相信我们会做到，并提醒对方也要把人抽回才是。

3、关于成立“工总司”的问题

由于 1966 年 11 月份西安造反派出现明显分歧，交大团结大多数的主张除了校内比较统一外，也得到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西工大西电派支持的“工联”坚持反右倾，打砸抢越来越不得人心，尤其工联派在厂内打压不同意见的群众，甚至进一步对厂里的设备也实施打砸抢……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铁路系统、东郊纺织城、胡家庙地区支持交大观点的人员较多，他们不愿意再服从工联的领导，酝酿从工联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交大是很支持的。筹备组提出希望交大来人协助筹备组工作，交大总会就派出“怒潮”战斗队的顾明芳、杨国康、顾光锡（教师），还有阎保定、张晓铭等人前往帮助筹备成立新的工人群众组织“西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上海一月夺权后，大联合、大夺权的呼声

日渐增高，西派就反对工总司的成立，造舆论指责成立工总司是搞分裂，破坏联合夺权……我们是坚决支持“工总司”成立的，1967 年 2 月 18 日“西安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西派在向中央汇报时大做文章，坚决反对，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压力。

然而在总理接见时，总理特别提到工总司的成立问题：“那因为你们（注：指统指，工联）还‘打、砸、抢’嚒！他们工人不同意，要成立新组织，是自然的。”“分、合是根据发展规律的，不能怪人家成立新的组织，你要是旗帜鲜明，反对‘打、砸、抢’，工人放心了，就不会分裂了。”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总理又讲到回去后，学校要军训，把人都撤回去（军训），不要干涉工人、农民的运动。“要让人家自己选择嚒！愿意参加‘工联’也好，愿意参加‘工总’也好，不要干涉，也许他们以后自己会合起来。西安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自己作主？我才不信。”至此对于工总司的成立，中央领导做了明确的表态！

4、关于联合夺权的问题

工联张培信刚说到夺权的事，总理马上就制止，说：“这个时间还早，时机不成熟，你们对立情绪很大。”最后总理说：“我看你们都回去……你们夺权还要经过一个时期……最急的是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还是希望我们两派能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回去学习、整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多次提到李世英：“李世英同志，你们也是常委（注：西安高校的统指），你们退出指挥部了吗？不怕孤立，孤立怕什么！你们不要骄傲起来啰，要欢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这样才能接近。你们要坚决贯彻，坚决反对‘打、砸、抢’。”“要听听人家的意见，好的吸收过来，这样才能服人。”又问到我们参加接见的总会成员郑叔良，张国强和我，问我们有多少总会委员，是清一色？意见都一致？我们回答一般都是经过一场剧烈争论，

我们有时是大吵大闹的，总理说："这样好……应该提倡争论的风气。"总理还说："你们好，你们还是支持李世英做你们的头头，这点好！"

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对统指派和工联的"反右倾"，"打、砸、抢"进行了极严厉的批评，并对工联和统指中的头头一个个点名让他们表态，让他们承认并表态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以李世英为首的交大派给以了肯定，但也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做好团结大多数的工作。两派都要接受支左委员会的领导。回校军训、整顿，搞好大联合。让我们在支左委员会的领导下，使陕西省的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正轨。

二

1967 年 3 月至 1967 年 9 月西安交大、工总司的部分活动

1967 年 3 月份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后，两派高校都回西安准备接受军训。大学的师生员工回校搞军训，基本上就不参与社会上的活动，但这段时间校外并不安静。

2 月份成立了工总司，接着支持交大观点的其它农民、机关等团体又要成立农总司（农民造反联合司令部），机总司（机关造反联合司令部），公安总司（公安系统造反联合司令部）……

工总司在 3 月 2 日周总理接见时已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他们这些要成立的其它总司就与工总司搞了好些联合行动，想与交大、工总司绑在一起以确立他们的正式身份，以便在联合夺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西安的两派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以致发展成严重的"八五"静坐及"九二"武斗。

总理为再次解决西安问题，9 月份又让李世英为首的交大头头和工总司头头马希圣等到京接见。现就西安 67.3 至 67.9 我所知道的情况叙述如下，主要分四方面：

（一）西安情况概述

1、校内情况

1967年3、4月份，21军到高校军训，学校文革总会号召师生员工回校参加军训。学校的主要力量都放在校内，在校内21军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双方通过沟通，关系也很融洽。对于在支左委员会领导下，搞好与西安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内的统指派的关系，促进西安的大联合，李世英是很有诚意的。1966年底开始，统指派的很多学校因反右倾造成了分裂，李世英实际已不再在统指的主席位置上了。军训后期，支左委员会曾提出要李世英同志到统指归位，继续担任统指的主席工作。我们文革总会从大局出发也支持支左委员会的工作，同意李世英复出。学校中的大多数师生是支持李世英，支持总会的，但全校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少数比较激进的战斗队会受到外面各总司的影响。

3、4月份在校外成立了几个新的总司，有机总司（主要是西北局和省委机关的人员）、农总司、公安总司……等等。在各总司来找交大联合召开的几次大会上，我们总会对于这些新成立的总司有些保留态度，校内以“六六兵团”，“抗大战校”（都是校内的战斗队）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有点抬头，在4、5月不止一次的402大辩论会上就提出“总会怕字当头”（实际上这也是其它总司头头的看法），提出要交大加强外事工作，要成立“大联合促进会”（要包括各总司的人员）。

支左委员会召集的“4·27”联合批判大会因机总司徐XX等人的“造反”而未开成，但李世英是同意参加“4·27”大会的。在一次402的辩论会上，“大联合促进会”及“六六兵团”等人轰了李世英的“右倾”，提出李世英不再代表交大去参加统指的会议，要求李世英“下连队当兵”（记不准后来

李世英是去了“抗大战校”还是“六六兵团”当兵），并把负责校内工作的沈荣水推到统指去代表交大工作，开始推行强硬外交，接着大部分各总司碰头会都由沈荣水参加或主持。不久李世英“当兵”结束才继续就位。

我们自认为是正确执行中央指示，实际上在各方面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有较强的派性，和其它总司一起力争在联合夺权中，为我们这一派争得应有的权益。1967 年 6、7 月社会上武斗逐步升级，尤其在江青表态支持“文攻武卫”口号后，对方又提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我们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响亮口号。

7 月 20 日、21 日交大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了两天外事工作。会上一办就霍士廉问题、21 军在工厂的支左问题、社会上的武斗问题和各总司的情况作了汇报。会上一致认为：霍士廉问题中央有指示，霍士廉身体好可以批斗，注意身体，材料上报中央。关于他是否叛徒问题，叛徒可不叫，应叫三反分子继续批判；军队制止武斗不力，红旗厂和西医都发生了武斗，支持交大派的群众组织被打；在当前形势下决定李世英也出面抓外事。

这样，学校从军训后原来准备集中力量抓校内，搞复课闹革命的部署，就被社会上的种种活动打乱，在各总司的推动下，又逐步全力投入到西安社会上的争斗中去了。最后决定革委会正副主任除杨文（干部代表）和陈柏荣外，全都抓外事工作，实际上最后陈柏荣带领我们一起负责向中央上报材料，也是不能脱离所谓外事的范畴。

7 月 31 日红旗杂志社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陈柏荣召开革委会组织学习讨论如何理解，如何联系实际。会上都觉得这是个新动向，不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意图。我们这些搞外事的委员分析我们经历的陕西省文革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军内一小撮，我们认为全国几乎已近瘫痪，军队是支柱。21 军是周总理派来的，我们对支左委员会（主要是 21 军主导）的工作有意

见，他们支一方压一方，但这是他们工作中的缺点或是错误，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些当做揪军内一小撮的罪证参乎其中。会上也有少数委员认为：中央认为在军内出现了一小撮，以后的方向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革委会经常会对中央的指示进行学习，领会精神，并结合当前的形势，就如何贯彻执行进行畅所欲言的讨论。大家对军内一小撮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以李世英为首的大多数委员针对陕西的情况，不同意搞军内一小撮，认为不要乱动，等待中央的安排。决定由陈柏荣按此精神向全校做广播讲话，动员大家认真学习社论，好好学习理解。

2、各总司问题

校外这个期间新成立的各总司与工总司搞了好多联合行动，他们想与交大、工总司绑在一起，以确立他们造反派的正式身份和地位。因 3 月份交大正在军训，这阶段基本没有和他们有统一行动，但他们有活动都希望交大能去参加，以壮大声势，也常来学校或通过与他们联系的师生向总会转达一些信息和要求。

3 月 6 日机总司要和农总司一起开成立大会，工总司参加，我们总会对成立农总司就有一定的看法，更不要说机总司了，对是否参加正在犹豫。交大以李世英为首的文革总会对学校的文革和社会上的动态基本总体上是比较一致的，校内大多数的人员也支持文革总会的观点，但毕竟还是会有各种思潮，也有少数比较偏激的。正在总会尚在犹豫之际，校内部分同学造反，要派部分人去参加农总司成立大会，最终考虑各方面原因只得去参加了大会。这几个总司只有工总司的成立是 1967 年 1、2 月份有我校总会派“怒潮战斗队”的顾明芳、杨国康、顾光锡，以及阎保定、张晓铭等人代表总会去大力支持筹备的。其它各总司的成立可能都有交大的人在联系，但不是总会派出的人员。

4月7日各总司在新城广场召开联合声讨大会，当时学校正在军训，总会决定不参加。但仍有部分人不顾军训师的劝阻去参加了大会。4月8日各总司又开会要发表“联合呼吁书”，要两派联合批判……总会决定派邵乐冲和我去参加，但“不表态”，这又引起各总司的很大不满。

5月4日晚各总司头头在交大东三楼，开会分析西安大联合的关键是什么？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总结前几次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交大文革总会有李世英、戴慕蓉、尹茂林参加，还有193战斗队的阎保定等。会上机总司和文总司对交大特别不满，认为交大只顾自己，“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注：指支左委员会和统指派）连几个总司都不承认，希望交大同学在西安文化大革命中作出新的贡献。交大现在不敢干了，前阶段对外面不关心了……”

在会上交大检查了自己对外面关心和支持不够。总结“4·27”大会的经验教训以后，特别是文总司等人谴责交大的大校沙文主义（主要指李世英），对军队迁就太多。并说对方正在打内战想吃掉我们，我们只有干才行！骂交大总会“好了自己，忘了战友”，“把风雨同舟的战友都扔着不管了”，还叫我们不要忘记以前“反右倾”时受围攻的过去……这样就把交大在校内的注意力逐步推向了校外社会上“内战”的火线，促使交大和工总司头头逐步形成“强硬外交”的思想。

这以后各总司经常来交大找我们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以后这种会议我们就简称Σ总司（碰头）会。后来在西安一系列的重大活动如大批判、对待霍士廉问题、对支左委员会不满采取行动等等问题上，都是让交大、工总司打头阵采取行动的。

1967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汉时，“百万雄师”群众围攻谢富治、王力等人；毛泽东匆忙之下登上飞机飞往上海。随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被指支持“百万雄师”而倒台，史称“七二〇事件”。7月22日被揪

斗和挨打的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7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7 月 25 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大报、小报不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7 月 26 日晚，李世英召开革委会，告知支左委员会通知，明日召开声讨陈再道大会，由军队出面召开，主席台除有军队四大家外，还有统指、工联等四大家，我们这边有交大、工总司两家，其它组织都参加大会但不上主席台。当时除了关注全国的大方向，每一项具体的活动安排都会联系到支左委对两派的态度与以后成立省革委会的考虑，两派也确实是出于派性考虑，都竭力为自己这派争取权利。我们开会主要讨论对方有四家，我们只有两家上主席台怎么办？李世英、沈荣水、我、李印生等大多数搞外事的委员都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军队这样搞就把进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定下来了，对方那么多，我们只有两家，不公平。明天开这样的大会我们不参加！但杨文（革命干部代表，革委会副主任）等人不同意，认为军队开这样的大会，要看大的方面（全国都在开大会，游行声讨陈再道），虽然这样安排有点问题，还是服从大局应该去参加。声讨陈再道，这是大方向，有意见可以给支左委提出来……后来沈荣水提出折中方案：军队上主席台主持，我们都参加，群众组织头头都不上主席台。

我们正在开会时，“193”战斗队的沈元秋（已故）来电话找我，说工总司马希圣等人找我们商量关于明天开大会的事，我与李世英等商量后决定请他们一起来参加讨论。沈元秋、阎保定他们把工总司的马希圣、吴文杰等人和机总司的几人带入会议室。机总司的人很愤怒的说：明天的大会是支左委员会的公开表态，只承认统指派的四大组织和我们这派的交大和工总司是造反派，为以后进入省革委会确定了名额，这是典型的支一方压一方，迎合了

对方的需要等等。又说支左委员会公开支持打、砸、抢，说打、砸、抢是枝节问题……交大和工总司不应该参加明天的大会；并说这是支左委支一方压一方的决策，应向中央汇报此事。马希圣他们也支持这个意见，在这种氛围下最后只好决定我们这派都不参加明天的大会，并向中央反映。李世英与支左委联系后，最后支左委决定：明天不开大会了，改为 28 日全市游行，军队四大家和群众组织都参加。这以后接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大、小报全国到处都是声讨陈再道，揪军内的走资派，揪军内一小撮。

3、霍士廉问题

当时领导干部站队，基本上是哪派支持他，他就支持那派。统指派是支持霍士廉的，交大是要打倒霍士廉的。4 月中旬，机总司的西北局红总连续几次与霍士廉拼刺刀，4 月 18 日由交大（主要是学校的一办的三结合组和大联合促进会，学鲁迅战斗队等）与西北局、省委的红总等组织曾发起“与霍士廉拼刺刀大会”，会议规模很大，由刘维娜和沈荣水主持。省委红总有意把霍士廉在对立派“烈火战团”（注：支持霍士廉的群众组织）召开亮相会上的讲话录音突然拿出来播放，其中有霍讲：“工总司是工农总部的变种”、“大部分是老保组织很复杂……”等等，严重挑起交大、工总司广大群众对霍士廉更加不满。

社会上两派为了争取支持自己一派的领导干部，就对刘澜涛（原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王林（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霍士廉等人进行大批判。5 月下旬开了好几次 Σ 总司碰头会，都是有关大联合和大批判的问题，决定 5 月 30 日晚 7 时在交大体育场开批判刘澜涛、李启明（原中共陕西省书记处书记，陕西省省长）大会，由李世英和马希圣分别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和大会主席。又定于 5 月 31 日和 6 月 3 日下午 4 时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揪叛徒大会。

5 月 28 日，我校参加中央专案组“三六”揪叛兵团的成员从北京打来电

话，告知北京六月份主要是批揪叛徒，还告诉了武登才（总会副主任）关于霍士廉四二年布置假自首的调查结果。这个消息开始并未向外公布，准备进一步核实后再宣布，总会好多委员也不知道。在5月30日的批刘澜涛、李启明的大会上，会开到中途机总司突然通知大会主席，向大会宣布霍士廉的历史问题（尚未核实），机总司认为他们在大会上放了“原子弹”。这以后在西安大街上刷满了“打倒霍士廉，气死保霍派（兵）”，“第一号种子完蛋了”（统指派是维护霍士廉，准备推荐霍当陕西省革委会的一把手）。5月31日又把霍士廉揪到“全市揪叛大会”上进行批判。

后来1967年6月中旬，社会上又传出中央有关于霍士廉问题的指示，支左委员会传达说：“把霍士廉放回去，恢复自由，有病治病”。后经核实有误，应是“立即将霍士廉接出来治疗，停止斗争，有关他的材料送中央审阅。”我们对支左委员会的信任度又打了折扣。

1967年7月3日革委会让邓正德和我去省军区了解有关批霍问题的总理指示及2·10事件的平反问题（注：2·10事件就是总理在3月2日接见我们时，严厉批评工联下属的东郊二分会搞的打砸抢事件）。当时军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经调查认为是“破坏事件”，给事件定性平反。当时我们又向王明坤副司令了解2·10事件的平反问题，得知2·10事件是破坏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关于霍士廉问题，军区政治部的一秘书告知，7月1日总理已有指示，是批斗可以，看身体情况，不能将人揪走，军区搞个地方给他住。这消息支左委还未向群众传达。当时校内刚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按中央指示，成立革委会后就复课闹革命，我和邓正德从军区回校向革委会主要头头汇报后认为，这消息对我们有利，学校应先回归正常秩序，故对批霍的问题暂不提上议事日程，决定不传达这消息，也未向其他革委会委员传达。当时也决定不把这消息告诉其他各总司，以免引起骚动，干扰我校的部署。

7月5日中午，马希圣及中革会、文总司、机总司张XX、屈XX等十余人开车来交大找到李世英、邓正德和我，即在行政楼碰头。原来机总司由军区得知总理有批示，可以批斗霍士廉。来了就说：军区告诉了四大组织（注：指统指派的），要让他们先斗，争取主动（因为统指派是保霍的），我们不能让对方先斗。交大认为让他们先斗也没什么，机总司说“不行，不能让他们先斗！”又说四大组织要去抢霍士廉先斗，我们要去支左委员会“造反”要霍士廉，要我与他们一起去军区。我建议邓正德与他们同行，邓是常委（当时我还不是常委）还是一办负责人，邓去比较合适。工总司头头说我和军区的头头较熟，比较好打交道，要我去。革委会当天下午开会研究复课闹革命的事，李世英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有问题及时与家里联系。我们这些“造反”的人到了建国路八号支左委员会，先了解总理7·1关于可以批斗霍士廉的指示，并要霍士廉参加批斗会。机总司说不管要不要到霍士廉，我们都要开批判大会，决定明天7月6日Σ总司上午9点在新城广场开斗霍大会。我考虑到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情况，建议改日，遭到他们的拒绝。我们就在支左委的建国路八号等着要霍士廉。后见到军区孙XX，问有无总理关于可以批判霍士廉的指示，他说不清楚，要去请示。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回来了，回复说“有”，并拿出本子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关于霍士廉可以批斗的指示，霍士廉可以斗，晚上送回来，身体不行可以休息几天再斗，要军区找地方给他住。我们就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开大会，要霍士廉到现场接受批斗。孙说他不能决定，要去请示就开车走了。我怕不落实，商量后我们就兵分两路，我和马希圣带人去了军区，其他人留守建国路八号。

在军区打听到孙XX已回，但找不到他。一会儿留在建国路八号的各总司头头们也来了军区。还是没有消息，头头们又开会研究如何办，有人说要调动大队人马来施加压力，我不同意，说可以打个招呼，做好准备。那天后

来顾桓（交大职工）也来了，他对军区比较熟悉，领着大家去康主任家找人，又听说支左委员会在袁政委家开会，我们进不去，他们说要翻墙进入找人，我和马希圣觉得不合适，他们说让我和马希圣不要出面，让我们就在三楼会议室等着。由李XX（工总司头头之一）、王XX（中革会头头，中学生及专科学校的造反组织）等其他头头带人去了。一会儿李XX回来说，他们（有人翻墙）进了袁政委家，进去后看到眼镜、报纸都在桌上，人影全无，说明他们闻风刚离开。

这时外面来了很多人，是机总司召集的人马，军区让我们在一楼的会议室等着，8点多孙XX回来了，又传达了总理进一步关于批斗霍士廉的新的指示，大意是霍士廉身体好可以批斗，不要天天批斗，晚上送回来让军区管起来（大意如此）。

我们又研究怎么办，机总司和其它总司头头坚持明天（7月6日）一定要开大会。在场的人很多，情绪很大，交大和工总司头头的意见是让群众先回去，留下头头进行交涉。机总司等人坚决不同意撤回群众，一定要等要到霍士廉后，军区宣布军管才走。后来不知怎么广播车传出说：上面已答应明天可以批斗霍士廉。我和马希圣都很生气，要辟谣。后来马希圣说已经这样了，就将错就错吧，就跟大家说：已要到霍士廉了，让大家回去吧！就将群众骗了回去。机总司一些人还在，他们知道还未要到霍士廉就不肯走，我坚持让他们离开，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他妈的，你们这些新当权派比老当权派还可恶！"。

后得知军区派车去第四军医大学要霍士廉后，我就向学校要了车，让学校的解放军接待站（学校的与军队联络的战斗队）的赵国凌直奔军医大查看情况。半夜12点多军区去要霍士廉的车回来了停在楼前，只听司机很生气的讲，到了军医大，军医大怎么要花招（军医大是支持统指派的），不给霍士

廉，把人藏起来了，还把支左委的介绍信也骗走了。赵国凌回来也如此说。一直等到 6 号快天亮我才回校，得知革委会已决定 7 月 6 日早上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李世英动员复课闹革命。

7 月 6 日学校复课闹革命动员大会前，我给李世英汇报了昨晚的情况，请李世英动员简短一些，不要太影响 9 点各总司的批霍大会。大会进行已经 9 点多了，李世英还在做关于把交大建成“花果山”的报告，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就造了李世英的反，向学校介绍了我们 7 月 5 日下午、晚上去军区要霍士廉的情况，又提出了“批判霍士廉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

然后我和尹茂林（也是负责一办外事的委员）带两个系的人马去新城广场参加批霍大会去了。上午霍士廉并未到会，我和尹茂林没上主席台，也未发言，只是在观礼台上站着看。大会结束了又决定带队伍向西游行一下就解散。不久队伍停滞不前，我和一些人赶往前面查看，原来是刘 XX（工总司头头之一）把队伍又带到军区去要霍士廉了。我到军区后看到一些总司头头已在那里，说派人去抓霍士廉了。我们赶紧调动了宣传车，呼吁群众撤出军区大院，不要干扰军区的工作。不久就说霍士廉要到了（后来听说是顾桓带着找到的），各总司又决定再到新城广场开批判霍士廉大会。队伍撤出军区向新城广场进发时，我看到我校的很多人打着旗帜，排着队向军区来了，后才知是其他总司头头嫌我校对批霍支持不力，中午去学校造反了，所以下午学校又开出大队伍来支援。当时已是 6 日下午，学校领导也来了，我就回去休息了，没参加下午的大会。

晚上听说批判大会后，一些人就把霍士廉带回学校来了。我们革委会很生气，认为把霍士廉控制在我们手里是十分错误的，既不符合中央指示（中央指示让军区把霍士廉管起来），各组织特别是对方还会来找麻烦，出了问题不得了！这就像把刺猬拿在我们手里一样，让他们马上把霍送回军区。他

们说军区不肯收，是支左委员会故意刁难我们（支左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军区来执行的）。和其他头头商量后，我们当晚就向总理联络员办公室打电话汇报此事，又告了支左委员会一状，并要求立即将霍士廉送回军区。不久中央回电，叫第二天将霍士廉送回军区，他们会给军队做工作（大意如此）。第二天就把霍士廉送回了军区，这更使我们对支左委员会不满，支左委员会起决定作用的是21军，我们更感到21军支持统指派，处处刁难我们。让我们体会到有问题还是要找中央才能解决问题。

以后就在围绕霍士廉的批斗上，两派在派性的指引下展开了更激烈的争斗。交大革委会在7月9日的革委会扩大会上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复课闹革命的第一课就是大批判课，中央是支持批斗霍士廉的。霍士廉的问题是西安的关键，要把霍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便决定由沈荣水抓大批判，由李世英向全校作动员，通过批霍促进大联合！ 7月中旬得知关于霍士廉的叛徒问题，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叛徒不能叫了！后来几次开会，沈荣水提出：霍士廉问题应继续批判，不应叫叛徒，叫三反分子，继续批判。并把这一精神向我们这派的各总司头头和群众做了传达。7月份在统指和工联派他们假借批判霍士廉，就把霍士廉送往北京保护起来不让批判。我们造舆论“霍士廉哪里去了？”又到军区去要霍士廉。

4、关于支左委员会的支左问题

自从1967年3月初周总理接见后，按总理指示，由21军到四大高校进行军训，师生们大部分都回校学习、整风。3、4月份军训期间，我们和21军的关系总的来说相处得不错。统指派的学校也进行了军训，军训者对于西安形势的认识、了解、看法，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让人眼花缭乱。统指派的“打、砸、抢”口号很容易迷惑人，很容易被当做符合“造反派”的标准，而交大的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反被认为没

有造反派的脾气。当时也有少部分师生仍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2 月份工总司成立并得到周总理的肯定以后，支持交大观点的农总司、机总司、公安总司、文总司、中革会……先后相继成立，我们都没有深入了解，所以还有一定的保留，支左委对他们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为此各总司对支左委不明确表态承认他们是造反派耿耿于怀，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到我们。在两派的联合行动中肯定统指派人数是多数，占上风，客观上我们也感到 21 军有倾向统指派的思想。初期还不明显，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就逐步加深了我们对 21 军在支左工作中，对待两派群众组织不一碗水端平的看法。

我们对支左委员会的不满是通过以下几方面逐步产生的。

首先是支左委召开全市大会，除了支左委的领导上主席台外，给统指派四大组织四个名额，给我们这边只有交大和工总司两个名额，这就很容易引起两派之间的矛盾，很明显开大会上主席台的名额等于是承认谁是造反派，以后成立革委会就有机会可以进入革委会，是夺权的关键问题，我们经常为此事找支左委提意见。又如 4 月 27 日召开全市的大批判会，我们是支持召开这次大会的，因为工总司在会上的发言问题未获通过，其它总司趁机造反，搅黄了 4 月 27 日大会。交大 1967 年 7 月 1 日要成立革委会，同学要撤回学校。会上有各种声音，机总司认为交大批判霍士廉不力，“21 军支左支一方、压一方，从上往下灌。”，“四月份以前支持我们，五月份以后逐步转向他们（指统指派）”，“21 军说打、砸、抢是枝节问题。8 月份为 2·10 事件翻案（注：2·10 事件就是总理在 3 月 2 日接见我们时，严厉批评工联张培信下属搞的打砸抢事件，当时省军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经调查认为是“破坏事件”，给事件定性平反，统指派认为对他们有利）”。上述情况一办的“火线组”也反映过类似情况，尤其对东郊国防工厂军队的表态问题反映极大，认为支左委尽支持工联派，不支持工总派。机总司对支左委员会一

直不承认其它总司极为不满，要进一步施加压力。在西安的社会上慢慢都让人感到在支左委员会中，省军区是支持交大派的，21 军和兰空是支持极左的统指派的。都知道支左委员会中 21 军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些具体事由军区执行。以后在武斗发生后，一办经常回来汇报：统指派发动武斗把厂里的工总司派的打了，找支左委，他们也不管……

其次在霍士廉问题上更让我们感到支左委对统指派的偏袒。正如前面已述，自 7 月 1 日总理下达有关西安问题的指示，可以批斗霍士廉。支左委员会没向我们转达（我们是从专案组人员处得知关于批霍的信息），也没征求我们的意见，而是先告知了统指派，并要让统指派先批判，我们考虑了校内的安排，原先同意让统指先批判，但 Σ 总司他们从机总司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赶到交大引起了 7 月 6 日批霍大会的风波。我们批判大会后，有人把霍士廉弄到交大，我们让马上把霍士廉送回军区而他们不接收。统指以批霍名义要去了霍士廉并将霍送到北京保护起来，这是违背总理指示的问题，支左委员会也默许了。

第三，在对待《红卫兵报》复刊出版的问题上更是明显偏袒、支持了统指的错误。1966 年时《红卫兵报》一开始是统指出版的小报，因他们坚持反右倾两派分裂，就成了统指派他们的派性小报。在周总理 1967 年 3 月接见后被迫停刊了。1967 年 7 月 28 日在交大召开的 Σ 总司碰头会上，有人来说《红卫兵报》要复刊了！听到这消息大家很震惊，情绪很大，一致要采取行动。但李世英一直未表态，会议快结束时，机总司一再说“世英再讲讲，世英再讲讲”。最后决定叫李印生去军区（向支左委员会）提要求：《红卫兵报》不能复刊，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支左委员会负责。当时也未得到答复。后就没有了下文。

7 月 29 日（还是 30 日）《红卫兵报》复刊了。我们革委会经研究决定：

再调查一下《红卫兵报》复刊的情况；若确有此事应向支左委员会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红卫兵报》停刊是周总理指示的，不应随意复刊，应向中央反映此事。可以与 Σ 总司一起研究对策，发表声明表明态度：我们反对《红卫兵报》这张单方面的派性报纸复刊。

会后我让解放军接待站的赵国凌去了解该报复刊的情况，因该报在陕西日报社印刷，陕西日报是军管的，故请他们去了解。赵国凌回来向我讲述了该报的复刊过程：开始是统指方面向支左委员会提出来的，后来支左委员会批了个意见。李盛茂（统指派的红卫兵司令）拿了该批示去找陕报军管组，陕报开始由军区军管，后变成 21 军军管，军管组的什么人签了字（当时有具体人名）同意在陕报印刷。我将此事向革委会报告了，李世英、武登才等头头讲到 5、6 月份胡炜军长曾征求关于《红卫兵报》复刊的意见，我们明确表示反对，后来就没有了下文。至此我们才知道对方要复刊的《红卫兵报》这张派性报纸，还是在支左委员会的批准下出笼了。这更让我们觉得支左委员会支持统指派，支一方，压一方。

7 月 6 日以后，曾有人在行政楼前的报廊贴出大字报说，胡炜原曾是霍士廉的部下，所以 21 军支持统指派保霍。我们看到后很慎重，和李世英、武登才商量后决定到批霍联络站（学校的官方战斗队）了解一下，我去了批霍联络站找到负责的苏建农（学生，已故），问到胡炜与霍士廉的关系。苏建农调查后告知，两人曾在某地工作，相当于一人在党政机关工作，一人在军分区下面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老部下，都是瞎说的谣言！往往这类谣传会很快传播起到恶劣的影响，我们革委会当时就辟谣了。我们对于好些问题注重调查研究，尽量做到不因派性而默认错误消息的任意泛滥，并对群众做了工作，维护支左委员会领导下的两派的团结。

8 月 5 日复刊的《红卫兵报》出版发行时，在陕报印刷厂往外运送时是

21军的军用汽车，这更引起我们的不满和气愤。

9月初，西安的形势很紧张。“九二”武斗发生后不几天，周总理办公室吴斌来电话，大意是总理得知兴平农总司一派发生抢枪事件，让李世英去兴平处理，李世英带人马上赶到兴平，联系了兴平的驻军和当地的两派，那边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又与部队处理了两派的冲突就返回西安了（此事见李世英的回忆文章）。

我们分析，这件事可能是有人对总理谎报军情，或者是统指诬陷我们，让21军在总理面前告状陷害我们。说是我们这派的人在兴平去302库抢夺武器，这是无中生有。胡炜军长也不如实汇报情况，说是李世英去兴平处理了我们这派的抢302库事件。这就更确认了21军的支一派，压一派的作法，让我们感到只有向中央申诉才能找回公平。

（二）“八五”静坐的爆发

1967年8月5日下午4点多了，在校内有人给我一张《武汉烽火》的小报，是“武汉钢二司”（武汉某高校的造反派）的人来西安出的报纸。内容是揪军内一小撮，有批判陕西军区的二月逆流，也批判了我们，他们应该是与统指联系并接受了他们的看法。同学说这是在陕西日报社印的，已印了几万份，快印完了，这样的报纸不能让它发出来。我马上去行政楼与李世英、陈柏荣（可能还有张国强）商量怎么办，李世英说要注意和武汉造反派的关系，不能派人去抢，先派人去看看再说。随即派了革委会委员尹茂林和张国强，并广播了一下叫了一车人去了。我们就在行政楼等消息。不一会有人拿了一封信给李世英，说是支左委员会派人送到传达室就走了，传达室让他把信捎给李世英。李世英打开一看，是支左委员会1967年6月19日关于同意

《红卫兵报》复刊的通知。我们觉得支左委太过分了，他们明知我们不同意（胡炜、黄经耀曾口头征求过我们意见，我们明确表示反对），《红卫兵报》已批准出版发行，到今天（8 月 5 日）才把 6 月 19 日的决定通知我们，支左委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太露骨了！当时李世英、陈柏荣、我还有付登华等人在场，付登华马上说召开辩论会，把这一情况告诉全校。当天交大附中要成立革委会，我们就没同意 5 日晚开全校辩论会，一开全校辩论会就控制不住，这消息暂先不告诉大家。6 点多钟，我回食堂在大马路东二楼前我看到一张大字报“专门欺负老子，办不到！”，落款是“129 评论员”，从字体及落款能判断是付登华所为。内容把刚才我们研究的《红卫兵报》复刊通知的事都写出来了，我感到刚研究的不向学校通告，怎么就用大字报写出来了？而且情绪不对，还什么“欺负老子”？当时去食堂吃饭，没有马上处理。

晚上学校广播要开辩论会，“193”他们找我说，晚上马希圣要找李世英和我谈心，我去了东三楼“193”的办公室。下午去陕报社的尹茂林几次从陕报社来电话找我，告知“武汉烽火”已印刷完毕在装车，马上就要出发。装运报纸的车是 21 军的车，车号是辛 1–17–####（后面的尾号不记得了）。再三来电话问要不要采取行动！我考虑到与武汉造反派的关系，李世英在交大附中参加他们革委会成立大会，我就去行政楼找陈柏荣商量怎么办。当时在 402 正在开形势辩论会，我们就说到 402 把情况讲一讲，让大家讨论怎么办。我到会场把尹茂林来电话的情况说了一下，还说了：如果不采取行动，让报纸发出去对我们不利。如果采取行动去抢报纸，就会影响与武汉造反派的关系，他们并不了解西安的情况，肯定是听了统指他们的意见。当时说有解放军报的记者要了解情况，就让我到广播台去接待，在广播台能听到 402 会场的情况。

辩论会开始是由叶雄波在主持，后来有人叫付登华上去主持辩论会。一会儿就听到付登华说：《武汉烽火》也好，《红卫兵报》也好，关键是支左

委员会！我们不应该去抢报纸，应该马上去找支左委员会！这提议马上得到402会场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陈柏荣提出派代表去，付不听，让陈柏荣靠边站，会场就乱了，人群就开始下楼，在付登华的带领下出发去找支左委员会，叶雄波也随同前往。

陈柏荣让我立即给李世英打电话告知这情况，让他马上回来，并决定马上召开革委会研究发生的问题，叫我找人拟些标语口号，怕有些激进的同学会提出些过分的标语口号会出乱子。我说给支左委员会打个招呼吧，否则天黑了去那么多人怕他们会引起误会。我们确实是为了与支左委员会配合好去做工作的。

我去给西北局那边的支左委打了电话，告知我校李世英和部分同学要去找首长反映情况，革委会会议我就没参加。我处理完这些事，陈柏荣告诉我革委会已分工，他和我还有尹茂林等人留在校内负责与外面的联系，就在秘书组等着。不一会李世英回来，我们让他快去西北局的支左委员会找队伍，我想也许他去了找首长能方便些，他自己骑上自行车就去了。一会有人回来说队伍没去西北局，带到玉祥门的支左委接待站那边去了。后来李世英回来说西北局那边没有人，我们又告诉他队伍去玉祥门那边的支左委去了，他又骑上自行车去了玉祥门那边，他就一直未归。

我们在秘书组，解放军接待站的赵国凌回来说他们去了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在楼上找到个房间，叶雄波，付登华等人在里边，里面有台外线电话，有了号码可以联系。学校人员去支左委员会，广播台的宣传车就主动随行了。有从支左委员会那边回来的同学到秘书组说，建议学校写个声明，说明我们去干什么，宣传车也好宣传。后来陈柏荣和我们商量后就与李世英联系此事，李世英建议学校写一份。我们和秘书组的段会林、吴翼健等人研究个大纲就让段、吴去写，要求说明大好形势，支持大批判，强调我们对支左委

员会支一派压一派已多次提出意见，但不见改变，所以才有此次行动，并提出我们的要求。后来在支左委员会那边的同学们写了一份声明派人送回，陈柏荣、我、沈文钧（革委会委员）看后都认为文中提的几条要求基本可行，但文章的头、尾部分调子太高了，尤其最后提到揪军内一小撮，我们说这次行动不是要揪军内一小撮，不同意这个提法。

来人说报上都再三提到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这稿子在那边李世英和 Σ 总司都讨论过，都同意了！让快去印刷，说天亮以前一定要发出去。我们只好让段、吴在个别细节上做了些修改，口气缓和一点，如原来直接点了胡炜和黄经耀的名，后改为支左委员会的某些决策者，对军管刘澜涛，霍士廉改为军管刘澜涛，看管霍士廉以示区别等处。陈柏荣签字后送印刷厂去付印，这时天已快亮了。在“造反声明”中记得具体提了五条要求（可到学校的档案室查看），大意如下：

1、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继续军管刘澜涛，看管霍士廉。

2、立即将刘澜涛、王林、霍士廉交给革命造反派批斗。

3、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宣传通讯机构的规定，不准单方面复刊宗派主义的《红卫兵报》，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周总理关于军管陕西日报的指示。

4、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

5、支左委员会必须对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作检讨。

后来付登华表示这个声明是他起草的。8 月 5 日晚上学校的人马去后，听说工总司有人员前往声援，大队人马在那里要等支左委领导出来答复我们的五条要求。

“八五”行动开始后，一办的成员都很关心“八五”阵地的情况，他们提出来我们应该继续大批判，我们不是去静坐的，“八五”阵地应变为大批判的战场，大家一致同意。

7 月末时学校成立了负责大批判的组织，我也曾让一办的三结合组、六六通讯社等要他们提供材料，写些有质量的批判文章带动学校和社会上的大批判，这些文章这次要发挥作用了。由崔洪农（分工一办的革委会委员）负责，在建国路 8 号门口，在大差市组织了几次批判会。

我们认为“八五”行动不是揪军内一小撮，是对支左委有意见，认为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多次提出后并未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红卫兵报》只是导火索，我们这是迫不得已才采取了这种做法。

8 月 7 日早上学校召开了革委会。李世英回校，讲了他们 5 号、6 号两天都找不到胡炜和黄经耀两位首长，建国路 8 号也没有人，讨论一下怎么办？大家说没想到首长不出来接见，有人提出去 21 军军部门口等着，看他出不出来。有人说派学生去，革命小将去没关系，决不能让机总司去（他们是黑爪牙）。决定派两个系和中革会去 21 军。革委会由叶雄波和赵瑛带队，派机械系和动力系的革委会主任带队前往。由他们负责这次行动，有事及时与指挥部和学校联系。李世英回“八五”现场告知 Σ 总司，他继续找胡、黄首长。

“八五”行动开始后，Σ 总司的头头开会成立了“八五指挥部”，各总司的头头都参与“八五指挥部”工作，学校革委会就有李世英、武登才两人参与。李世英回来召开革委会传达了现场的情况，告知指挥部分工：马希圣是司令，李世英是政委，决定把指挥部搬进建国路 8 号（我们大队人马去的第二天，支左委的人马就全部撤离了），并说为了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可以轮流去，有的下班后去。再后来好像说胡、黄首长都病了，其他首长也找不到怎么办？指挥部研究后认为我们的五条要求是合理的，首长不出来接见，不答复要求决不收兵！

“八五”行动就变成了“八五”静坐。静坐开始后，革委会开会分工，决定陈柏荣、我、尹茂林等人在学校，负责与现场的联络、支持工作，收集

整理各种情况，做好向中央汇报的工作。

8 月份以后，西安和全国一样，形势越来越乱，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武斗不断升级，孕育着更大风暴的来临。就“八五”静坐是否要坚持，校内革委会开过很多次会讨论，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必须立即撤掉，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揪军内一小撮，否则时间越长就会越来越被动。我们校内部分管外事的委员认为我们的五条要求合理，但越到后来，越感到现在的形势对我们解决问题不利，得找个借口赶快撤出“八五”阵地，坚持认为我们的行动不是揪军内一小撮。但“八五”静坐是否撤出决定权是在“八五指挥部”，而以“八五指挥部”为代表的马希圣、李世英等头头认为我们五条要求完全合理，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行。

8 月初武汉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的造反派）邀请我校革委会去参加华中工学院的革委会成立大会，学校派沈荣水副主任前往祝贺，同时让沈荣水了解一下华中地区文革的情况。8 月中旬沈回来在革委会上介绍了他此行所了解的情况，主要是武汉 7·20 陈再道事件后，在中央文革的指引下，全国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抓军内与地方的走资派结合起来迫害造反派的斗争。由于江青支持的文攻武卫，各地武斗风起云涌，十分混乱，很多造反派都去抢枪，掌握了各种武器，好些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造反派，或手中没武器的造反派被打得很惨。特别强调揪军内一小撮的对象是针对地方上的军区或军分区，他们与地方上的走资派容易联系在一起反对文革，不应该指向野战军。对我们发生的“八五”静坐，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行动就成了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 21 军是不对的，必须马上撤回。

我们给他解释我们不是揪军内一小撮，只是对 21 军为主导的支左委员会有意见，提出了五条要求，希望他们出面答复即可。就“八五”静坐是否要撤，革委会开过很多次会讨论，沈荣水、王春杰、郑叔良等相当一部分委员

坚持认为必须撤掉，否则越来越被动。沈荣水在革委会上提出以去北京揪霍士廉的名义撤掉“八五”静坐，学校又派人去京，与在京人员去侦察霍士廉的情况，后因霍在301医院住院，保卫很严无法下手，只得作罢，就这样一直拖着未撤“八五”静坐。

会上沈荣水又讲到华中地区一些造反派大搞武斗，弄了很多武器，没有武器的一方损失惨重，被打得很狼狈。我校是反对打砸抢，也没有武器，看到西安的情况，我们也得做点准备，好像是让学校的工厂加工些什么简单的工具，肯定没有研究去部队抢枪，因我不负责此事，就没有太多了解。

以后西安的秩序越来越乱，统指派借着人多，有21军向着他们，又弄了枪支等武器，甚至有支持他们那派的军事院校开出坦克到西安和交大校门口示威。对立越来越剧烈，两派的对立达到顶峰，直到9月2日西安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三

1967年9月至11月总理、康生等领导的再次接见

1967年9月2日，西安西郊发生了严重的大规模武斗，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武斗中，工总司派惨败。我们认为支左委员会对打、砸、抢制止不力，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是这次武斗的原因之一，必须向中央汇报才能解决问题。我安排刘军智负责的“851”战斗队，加紧把“九二”武斗的情况及恶果（死伤人数，工厂损失等）调查清楚。

“八五”静坐后，革委会分工让陈柏荣和我负责向中央上报材料，每次上报材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根据收集到的材料讨论后由秘书组执笔，经陈柏荣和我审阅，并及时与革委会主要领导沟通，有不妥之处再讨论、修改。对上报材料，我们都是很严肃认真地对待，绝不儿戏，这些材料都送到

学校的驻京联络站（1967 年夏，两派关系紧张后，学校再次设立驻京联络站），再由他们分别送往各上级机关部门。

“九二”武斗后，9 月 3 日李世英、武登才从“八五指挥部”回来召开革委会，那天有红旗杂志社的记者来学校采访了解西安“九二”武斗的情况，武登才让我去接待，我没参加革委会会议。一会儿又来电话找我，武登才（也可能是李世英）跟我说：庆安公司（工总司）他们要到北京去汇报“九二”武斗的情况，现有两张中午的飞机票，他们想让交大一起去一人。革委会研究了决定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马上走。并说已通知秘书组将整好的材料让我带上，其它的材料继续整理好再送去北京。到京汇报一下“八五”静坐的情况，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毫无赴京的准备，拿了材料，觉得西安形势这么紧张，在京花几天时间汇报完赶紧回来。

一会儿吴桂庆（我校负责联系庆安公司的同学）来了，带我见了庆安公司的王焕如（庆安公司工总司庆安兵团的头头）和庆安公司的一位女同志，她开摩托把我们送到东大街民航售票处。王焕如找了位军人买了两张票，告知机场要问起姓名，就按机票上的人名说，又说今天交通已瘫痪，民航班车没有了，我们要赶快，走着去机场，当时机场就在西大街，还不算远。王焕如很紧张，因为他们厂就在附近，他戴了一顶破草帽，压得很低怕被人认出（当时如被对立派的认出来就没命了），他叫我也注意保护自己。我觉得在西郊，我的名字可能有人会知道，但不会有什么人认得我。我们没说话，我跟着他去机场，上了飞机，很快到了北京，找到交大驻京办。在北京通过驻京办与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吴斌联系要求汇报，也曾找了中央文革西北组的谭某某汇报，谭只是听，没表态，只是最后说有些情况中央还是知道的。王焕如又去找了他们系统（三机部、国防工办等）的上级反映了情况。

到京后我与学校用长途电话保持联系，9 月 4 日（还是 5 日）晚我给学校

打电话，记得是段会林接的电话。他说西安形势很紧张，看来还有一场大武斗。我说我争取尽快回校吧。他说："你不要回来了，西安的形势很紧张，学校已决定疏散大撤退，一部分人去上海，一部分人去北京，能回家的回家。秘书组明天就就要搬到北京去办公了，你还回来干什么？交大已准备完蛋时，只有通过广播向中央呼救！"让我马上设法与中央联系汇报西安的情况。

我们"八五"静坐未达到目的，两派矛盾不断激化，发生了"九二"武斗，"八五"静坐始终不撤，西安的局势更为严重。我与学校驻京办的贺相、万威武讲后，大家都很不理解怎么这么严重了，马上设法向吴斌汇报了情况。9月6号（还是7号），万威武告诉我说：吴斌通知我校驻京办，总理已决定要接见交大和工总司代表，让李世英来京，让我不要回西安，在京等待接见。

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要将"八五"静坐撤了，再到北京接受总理接见，总理再次出手挽救我们，给了我们撤出静坐的一个体面的台阶。

过了一两天，万威武领了一位军人来，介绍说是中央文革的，要了解西安的情况，让我汇报一下。结束后请教他的姓名，他说叫诸定波，谈完他就走了。万威武告诉我，他是中央文革简报组的，简报是编给首长看的，向他汇报是有用的，他能把情况反映上去，他们以前好像找过他反映情况。后来9月18日总理接见我们时，他也在场。

过了几天，陈柏荣、段会林及李世英、付登华等人先后到京，陈柏荣等带来了有关"九二"武斗的一批材料，准备上报，但尚未整理、核实。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看了全部材料，有关于武斗发生的过程、谁打了第一枪、统指派虐待我方上千"俘虏"、对方攻打我方的地图、有关支持统指派的军事院校出动坦克的情况、还有8159部队（属21军管辖）参加武斗等情况材料中都有反映。

我们觉得有些材料不准确，经过对比，核实，去伪存真，重新整理核实，并将一些明显不利于军民团结的激进提法做了修改，比较客观冷静地摆事实，重写了汇报材料，把比较客观的调查材料作为附件，一起上报给了吴斌及其他有关部门。还有一份省军区写的关于“九二”武斗的调查报告，陈柏荣说是军区（应该是部分人吧）让带到北京交给中央的。我们看了军区的调查报告，觉得和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我们也一并交给了吴斌。

李世英，马希圣到京，并未撤出“八五”静坐，直到 9 月 16 日下午，武登才宣布撤出“八五”静坐，总理才安排了对我们的接见。

等待接见期间，吴斌安排我们住入西苑宾馆，学习文件并等待首长接见，在 9 月到 11 月间我们受到总理等领导的两次接见。其他时间都是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及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学习总理、康生接见我们的讲话。9 月 18 日第一次接见前我们当时的心情是：一方面再次能受到中央首长接见很感动，感到中央对我们（不是个人而是我们这一派）的关心和信任。更是觉得见了中央首长，要把我们在西安受到的不公待遇：如支左委员会（主要是二十一军）的支一派压一派，在武斗中我们这派普遍被打、被欺负等等情况向领导汇报，要讨个说法。

（一）9 月 18 日的第一次接见

1967 年 9 月 18 日凌晨，周总理和康生单独接见了交大和工总司的头头六人，交大有李世英、沈荣水、陈柏荣和我，工总司有马希圣、崔三河。考虑到西安的国防生产还请了粟裕和管后勤的邱会作一起参加。总理和康生谈到：把我们从西安叫来，单独和我们谈心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是最早的造反派，不愿意我们走向迷途。接见中对我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

一点思想准备没有，而我们仅停留在具体问题上，没有从大局出发，接见后我们好些地方不能接受，没想通。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批评我们派性大发作，不看大方向

李世英汇报说，我们把“八五”静坐撤了（总理要求接见前必须撤掉“八五”静坐），开了个抓革命、促生产大会，遭对方冲击，又去军区要求解决问题。总理批评我们总是开大会，像以前一样运动群众，派性大发作，你来挡，我来抓。人越来越多，打起来，你们的水平还是那么低，要高一点。总理也掌握了西安的情况，问了我们西安武斗较厉害的几个工厂、单位的情况，问到红旗机械厂、国棉三厂、国棉五厂、关中供电局、水泥制品厂的情况，工总司的崔三河一一做了回答，都是对方的错误。总理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一个都是你们对。讲到“八五”静坐，总理说：你们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了，用“八五”静坐来兑现五条声明。李世英说首长不接见，总理说，你们来个声明不更造成抵触情绪，你们“八五”静坐一定受了北京的影响——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用“八五”静坐的方法，我们打了几次电话，总想给你们主动。你们现在派性高于一切，有私心。这次找你们来也是想让你们转入主动。另外我给你们说，你们 6 个人不能走，西安问题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解决得了的。当时就让我们很感动，深感总理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特地接见我们，给我们撤“八五”静坐一个体面的台阶，确实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这让我想起 1967 年“八五”静坐后的两件事，一是中央发来的 8·10 明码电报（中发【67】242 号）。主要内容是为 2·10 事件定性平反和肯定黄经耀司令员和胡炜军长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有关 2·10 事件平反的消息和情况，邓正德和我 7 月 3 日去省军区了解情况时，省军区王明坤副司令员已向我们做了说明，2·10 事件应为破坏事件，定性为“严重的

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2·10 破坏事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损失估计过份严重，对被捕的几个人的处理还要请示总理。当时我们回来后向革委会和群众都做过汇报和传达。8 月 10 日中央又发来了明码电报，为 2·10 事件平反，明确了对 2·10 事件的性质和对当时逮捕者的处理意见。又再次指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我们 7 月 3 日了解的精神与明码电报是一致的，我们革委会在传达讨论明码电报时，讨论过为什么中央在“八五”静坐发生后发这个明码电报，会上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又讨论到对黄经耀、胡炜的评价时，杨文（革委会副主任，革命干部代表）认为中央已经说了胡、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我们的造反继续坐下去恐怕不大对头，意思是中央对“八五”静坐表态了。另一部分人认为我们没有否认他们是好同志，我们是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后来李世英说：既然他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那么电报下达后他们一定会更快的出来接见我们。所以明码电报对我们是支持，鼓舞我们争取“八五”静坐的胜利！很多人支持了李的看法，最后革委会基本统一了意见。

李世英又到“八五”阵地上宣讲，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又讲到 2·10 事件的平反，并不是给打砸抢翻案。被逮捕的罗有、王发发等人被教育释放时，工联派的人开车去接他们，给带上大红花并游行庆贺，李世英说他们是“把疮疤当纪念章戴”以此挖苦讽刺他们。这个讲话大大稳定了军心，并整理成传单散发。

另一件事是明码电报后，我们没有领会中央的提醒，继续坚持“八五”静坐。八月中旬某日，支左委员会四大家 21 军刘政委、省军区袁政委、兰空

方副司令及总后203的某首长（记不清是哪位了）等领导提出，要接见李世英和马希圣。上午李世英和马希圣去了（他们日夜都在“八五”指挥部），我们校内还不知道。后来指挥部来人告诉说刘政委他们出来接见李世英、马希圣了，我们就在行政楼等待李世英他们回来的消息。

一会儿，工总司章谦（领导人之一）带了机总司、文总司等人，还有付登华来学校，告诉我们李、马两人去谈判，支左委员会只找他们两人，这是阴谋。又吵吵说要承认“八五指挥部”，要承认其它总司，他们又吵着他们也要参加谈判……

我一看这么多人都参加谈判，肯定谈不成，支左委员会也不会同意，有人就提出让李世英、马希圣以“八五指挥部”的名义谈，大家同意了。来人要我和他们一起去找李世英和马希圣，陈柏荣等人同意了。我随他们去203（总后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李世英和马希圣。李世英说，一开始领导说与我们两人个人谈谈，他们也不代表谁，也是个人谈谈。李世英和马希圣提出要代表“八五指挥部”，这谈话的前提没统一，我觉得李世英已经提出了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留下，可以走了。他们不放心，经再三做工作后，他们提出让付登华留下，仅给李、马两人做记录，我们就都走了。最后李世英谈判完回学校说，没谈成，按照双方都是以个人身份谈，前提没统一就没谈成。

这次是支左委员会以四大家的身份出现，肯定是中央首长又一次想挽救我们，但我们却又一次错过了机会。这以后学校革委会就“八五”静坐是否继续的争论就越来越多了。有关情况在上文中已有叙述。

2、告诫我们西安的干部队伍很复杂，要有敌情观念

9月18日接见时，特别是康生多次向我们提出，西安机关情况是很复杂的，西安是刘、邓、刘澜涛……等的基地，刘澜涛的机构都是安子文安插的，我们反对的人一下都送到西安，韩XX、……点了好多干部的名，再三强调

西安是刘、邓反毛泽东思想的基地，安子文的死党都在那里，又点了已死去的公安厅的李 XX……这点希望你们有敌情观念和阶级的斗争的观念。

总理也点了上面提到的西北局等一些人的名，说都很有问题。还说到西北局有个 6 人（科长以上）组成的顾问组，问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说不知道。总理说你们像张宗昌一样，兵带多了，三四十万，事务主义了，辛辛苦苦说你们不努力也不是事实，动机是好的，但这样搞对革命不利。

康生又说，机关、公检法是老家伙，你们年轻人搞不过他们，公检法要特别小心。公安机关抢了人事档案烧了，你们知道不？答不知道，批评我们“尾大不调”。告诫我们和机总司，公安总司弄在一起很危险，反复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

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真是大吃一惊，确实我们不了解机关的那些总司还有那么复杂的背景。我们回去得好好深入了解，调查研究才是。我们感到康生真是大抓阶级斗争的，在这次接见时，康生曾问我：“彭康现在怎么样？”我说：“在批斗”。康生说：“这个人很早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了，我不是说过，你们什么时候斗他都是没有错的。”让我们感到确实要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是。

3、总理多次提醒我们到北京要接触大问题，把握大方向，摆脱具体事务，从全局出发搞好大联合

我们这次“八五”静坐一开始就是对支左委员会提意见，没有与当时国内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背景相联系。我们到北京也是要在中央首长面前申诉，整理了支左委他们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上报材料，在接见中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总理还是耐心地对我们循循善诱，肯定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让我们要把握大方向。

如李世英说到西安的派性报纸红卫兵报的出版是支左委员会批准，在军管的陕报社印刷，21 军的车往外运输……总理马上说，（支左委员会）这是

不对的，是派性的报纸。这一点你们有点道理，占上风。你们再冷静一点。

康生就曾说：我听了半天，你们的意思是主要敌人是21军，结论是把21军调走，你们转来转去是支左委员会。

我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李世英接见时就说："我们掌握政策是少了些，但是我掌握的事实如果能一个一个驳倒，我就服了"。

总理让我们告诉学校和工总司执行好6条协议，让我们保证执行，总理会要求另一派也执行，保证西安建立正常的秩序。又说到21军在山西支左很好，中央对21军的工作认为很好，要从大方向考虑，你们要好好跟上，这要比反右倾、反对打砸抢问题大得多，这是大方向问题、政治问题。你们到北京来，你们急着要回去，叫你们来北京就是叫你们接触大问题，头脑要冷静，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总理批评我们，动不动就开大会，全国开大会最多的是西安。最后总理一针见血地说："现在你们是西安一方之长，你们把自己地位悬空了，现在离了你们就不行。二、三月份来可以在这住一个月，这次来几天就要回去，好好想三、五天，叫家里保证实现6条协议。受点委屈不要紧，受到损失不要紧，干革命哪能不付出代价，毛主席全家为革命三人牺牲，一个儿子，还有老婆。毛主席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嘛。我们两人讲的（你们）好好想想。"最后还说"戴慕蓉同志你打电话回去，让李世英同志冷静三、五天，家里的事不要找他。过几天再回去"。还提醒我们，"今晚与你们谈心，不要出大字报压人"，总理太了解造反派的脾气了。接见最后说，让我们再过几天回去（回西安），国庆前回去，或过了国庆再回去。

可能总理认为我们接见后会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端正态度，回去在支左委领导下两派联合起来，开始新的局面。当时我们确实头脑膨胀，自认为我们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向中央指出支左委员会的错误，他们改

正了才能实现大联合。只是纠结在具体的事情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可能全面正确的理解、接受总理的讲话。一方面体会到总理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但不能站在高处全面正确理解总理讲话的精神，而且提到西北局、省委、公安的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觉得这些问题很严重，要回去好好调查才是。

（二）9 月 18 日总理接见以后我们的认识和态度

我们回来后就学习讨论整理总理接见的记录，各人根据接见时自己的记忆和记录，认真的回忆，无论是关心我们的，还是批评我们的，一定如实的全部整理出来。首先感受到总理对我们的爱护，耐心细致的再三规劝，我们心里很感激。但一些对我们的批评也觉得与事实不符。尤其是康生批评我们“不顾一切的搞分裂，砸了许多工厂”，批评我们说我们把 21 军当主要敌人，“要把 21 军赶出陕西”，我们很想不通。

记得前些时在韩森寨有老保贴了条“把 21 军赶出陕西去”的标语，我们知道后很生气并派人把它搞掉了。怎么就把这账算到我们的头上了！我们认为是支左委员会上报给我们栽赃，就此事我们还向吴斌作了汇报。吴斌要我们先从大的方面好好领会总理和康老的指示，不要急于抓具体问题。我们还认为这次挨了这么厉害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支左委员会汇报了不实的情况，但是机关的这么多干部问题我们确实太不了解了。

接见后，我们讨论是否要向群众传达，我们一致决定先不向西安传达。学校也来电话问接见情况，并寄来了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小报，上面登了 9·18 总理、康老接见我们的谈话纪要。主要精神与我们的基本一致，但上面有一句总理讲的我们“大方向错了”，并用黑粗体字标出。我们反复回忆，这是个原则问题，若有绝不能隐瞒。我们把西电的小报送给吴斌看，接见时

他也在场，我们问他要这次接见记录，并问他究竟总理是否讲了这句话？吴斌没有直接回答，叫我们按自己听的理解。吴斌要了一份我们整理的接见记录。因为接见时总理还给我们讲了“四·一二”大屠杀后，南京、上海起义，说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策略有错误，照样失败了。在我们的记录上有总理说的“八五”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了……我们还不放心，决定在下一次接见时再问总理，是否说过我们“八五”大方向错了？

11 月 2 日接见时，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总理说“八五”方法错了就行了，还要追方向对不对？”陈柏荣说“他们就是要追！”，总理说“这个不会，军队要做工作”。总理很会做工作，让军队做工作不要纠缠这个两派都很敏感的问题，以利于大联合。

我们不断接到电话反映西安工总司所属工厂、单位受对方欺压的情况，我们也经常与吴斌联系，后来吴斌通知我们留在北京过国庆，可以休息几天，不让我们回西安。我对于康生和总理点名的那么多干部心里放心不下，西安的情况也还惦记着，是否趁国庆再请几天假回西安处理一下，大家也同意，就向吴斌提出我们的要求。过了几天吴斌给了答复，同意陈柏荣、我和工总司的崔三河三人国庆节回西安，过了国庆回北京。我们研究了回去的任务（1）首先考虑目前情况，暂不向群众全面传达，只说总理的关心，爱护。还说留我们在京过国庆，可见到毛主席等等。说点好的鼓舞大家的士气。（2）接见的全部情况我们回去要向武登才（革委会副主任）详细传达，崔三河要向工总司的主要头头传达，不能回避，要让主要领导全面了解。（3）回去后不能再与机关的各总司联系。康生和总理提到的这么多干部的问题要分头调查弄清楚，看是否有与我们有联系的，但不向群众传达。（4）觉得西安的形势还很紧张，要进一步调查 21 军的态度，认为要争取下一次接见的机会再次阐述我们的意见。

当时我们确实没有从大方向来领会，只是局限于在眼前的具体事情中跳不出来，正如接见时李世英说的“我们掌握政策是少了些，但是我掌握的事实如果能一个一个驳倒，我就服了”。只是觉得支左委员会确实支持对方压制我们，只能在中央首长面前为自己申诉。

我们三人国庆节回了西安，就是按照我们研究的四点要求做的。原来大家对中央首长的接见抱有很大希望，但我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回去后又不向大家传达，也引起了大家的不满。9 月 18 日接见后沈荣水先回西安，按照我们当时的口径不向大家传达，引起大家指责和愤怒。我们回去后仅对武登才做了详细的全面的介绍，对群众又只是说说总理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责任，要看大方向。还说西安形势很复杂，要有阶级斗争观念，注意敌情等等。我们自己不能完全接受，还怕影响我们这派的情绪，更怕被对方知道我们挨了总理和康生的严厉批评，会长了他们的威风，灭了我们的志气。

回校后，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在 402 会议室大致讲了一次周总理接见我们的讲话精神。在一些人再三要求下，说纺织城一直是最坚定支持我们的，一定要去讲讲，我又按在学校讲的内容去纺织城给各厂工总司头头讲了一次。

对于康生和总理指出的那些干部的问题，我们还是认真地找我们革委会所属的，认为比较可信任的战斗队和团组向他们进行传达，希望他们能客观地了解和调查。就西电小报上的接见记录，问我们是否如此，我们就说有的对，有的不对，不做具体回答。

大家最关心的是关于“八五”静坐大方向错了的问题，在我们的接见记录里有总理说的：“你们‘八五’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了……”我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康生明确地批评我们大方向错了，但我们不愿承认。我和陈柏荣又去秘书组研究了关于上报材料问题，认为还要继续上报材料，但要力求客观，事实清楚。由秘书组召集有关部门来参加，布

置汇报材料的要求及重点。

我们回北京后，就和上班一样每天学习、讨论。学习的情况要向吴斌汇报，与他沟通。我们通过学习在大的方面，在思想上确实有提高，但在联系西安的实际情况时，也感到某些地方下面有些错误的言行在给我们抹黑（如韩森寨的把 21 军赶出陕西去的大标语）。但在好多事情上常常想不通，认为支左委员会（主要是 21 军）是西安的主导，但一碗水不端平，太偏向统指、工联派了，虽然西安两派都有上报材料，但中央肯定最相信支左委员会反映的情况。首长接见时，我们当面把问题反映上去（特别是 21 军的问题）这是最好的机会，让首长全面了解支左委员会在西安的工作，当时我们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无所顾忌的把我们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如实讲出来，正如马希圣在 11 月 2 日接见时说的："在西安地区的支左就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压得我们有一肚子的苦水，见了中央首长我们不说，我们到哪里去说？"。我们希望让中央首长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首长面前讨个公道。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等待下一次接见。

当时中央正在解决十几个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情，陕西省如何成立革委会的事也在考虑之中，把我们请到北京来也与此有关。9 月 18 日总理的接见从关心、爱护我们出发，让我们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看准大方向，斗私批修，作自我批评。11 月 2 日再次接见时请来了支左委员会的领导，就可以统一思想，商讨大联合，商讨成立陕西省革委会事宜。

（三）1967 年 11 月 2 日 周总理、康生、张春桥、吴法宪、邱会作等领导接见陕西省军区与驻军领导同志和交大、工总司代表

接见一开始就谈到现在已有十多个省市在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陕西省

就把我们这派找来，让我们回去谈，工作做得好，在支左委员会的推动下也许就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再成立筹备小组。西安的各群众组织，各派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和常委一起成立协商会议，共同讨论。

总理说，把你们调来有好处，你（李世英）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毛主席的声音还是听到了，中央指示多少都学了一些。康生问我们都学了什么？李世英答："学习主席最新指示，结合陕西情况，总的精神领会了，但在实际中贯彻，还有些思想转不过弯来。"总理问："是否电话干扰"，李说："总理上次说到（我们）搞分裂，我们总是处于受压地位，没有设想以我为核心。"康生说："李世英学习快两个月了，先把大方向把握住，然后从大的问题去解决小的问题……"总理又问马希圣，西安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马希圣回答了从 3 月 2 日接见后，回去整风，主动找工联谈联合，找支左委见不到人……总理说："你们两个月学习回答这两段话？李世英说还是不平等，没有受到应受的待遇。马希圣更冲，还想打内战，一个司令，一个政委还是打内战精神。说中央不重视你们，把你们叫来，我和康老，请张春桥同志来，把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请来，我以为你们回答，痛痛快快，斗私批修。现在的问题是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你们的地位还不够？交大全国都承认的，工总司也是承认的，还没有地位？一动就是几十万，你们政治地位，领导地位有了，但你们引导他们常常走歧路，你们的思想落后了，一回答问题就表现出来了。"后来总理讲到不要独霸天下，我又说"为了争取组织平等，我们有派性，但我们好像单方面要夺权怎么理解？"

总理和康生批评我们不是党性而是派性，"反右你们占上风，回去骄傲了，发展了那么多保守组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更觉得委屈，就是想着在中央首长面前把我们的委屈，想法全部吐露出来。后来首长讲到两大派对立情绪大，建议搞协商，两派多接触，谈得拢就谈，谈不拢下次再谈。

陈柏荣又说了跟 21 军的关系："开始好，后来就紧张，我们有些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在学习中已做了检查，如'八五'静坐。军队在支左中对两个左派不公平，回去我们有顾虑，怕还是那样。上次总理谈的精神是对的，但事实有出入，有的还相反。"总理说，你讲这些干什么，关键要多做自我批评，康生说：摆一摆是西安的问题，还是延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讲到西安韩 XX 和我们结合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搞机密档案？李世英回答"据我所知，没有"。总理又问："刘 X、韩 XX 和你们一起搞了一部分材料，放在什么地方，怎么处理？有没有特嫌、反革命嫌、侦察对象的材料？有没有这样的材料？"陈柏荣："我查了一下没有。"康生说，这个落到敌人手里可不行。"公安总司"要好好查一下。

从这些首长接见时的提问，我们更觉得支左委员会不知向中央上报了多少与我们无关而强加给我们的材料，更想在首长面前为自己申辩。

接见时多次讲到两派联合协商，如何分配代表名额，如何处理现有的组织问题，李世英，特别是马希圣一针见血的谈到"我们考虑的不是代表，而是考虑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周总理批评说："不站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什么问题也难说。""主席的指示宣传了多少次，难道在西安的工人阶级中不发生影响吗？"对我们讲的支左委员会支一方压一方，总理和康生都给与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我们"没学好毛泽东思想，小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强。我们说一句话，斤斤计较，就想不开。这样下去，你们回去还要碰钉子。"吴法宪说："你们对总理、康老的批评不满意，这是不对的。"李世英说："怎样把同群众的关系摆好，有些问题涉及到几十万群众。类似的问题对方提得多，但作出的结论是我们一直在搞分裂，群众不好接受。对于首长的指示原原本本的转达，对群众的积极性有所挫伤，也有（我们）几个人的思想问题。"总理马上说："上次我们是谈心，结合传达。这次主要是搞协商

会……你们现在离开人民大厦，这就是一大进步，说明我们的批评生效了。”总理还说：“在主席思想指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联合。过去的问题，原则问题要算，一般的问题不算。现在运动的发展，需要你们高姿态的领导，对方也是高姿态那就水到渠成。不要抓住领导的几句话。”

我们也遭到张春桥和康生的批评，张春桥说：“我认为李世英的这几句话不妥当，总理、康老的指示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不能那样说吧……用几十万群众吓唬人，几十万群众是党的。这样的话我听了很不满意。”

康生说：“上次总理和我的谈话批评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全部传达？”最后康生讲了很长一段话，对李世英说：“我对你是恨铁不成钢，今天对你很失望，毛泽东思想没学好。”“要把工人、学生组织起来对准刘澜涛、走资派。要求第一条必须学习主席的思想，用主席思想去斗私批修才能搞好大联合。第二条要深入批判走资派。警惕黑手，警惕工人、学生中的坏人，李世英，我不相信你们交大没有反革命（总理：同样西电、西工大、工总司、工联都会有的）。第三条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把自己的眼睛擦亮，分析西安的环境，西安是敌人潜伏的黑窝子……（接着又点了国民党打进我们内部的人，又把国民党的特务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李XX把档案毁掉……又点了高岗、刘澜涛……许多人的名，我怀疑你们的‘机总司’，又点了很多在西北局、陕西省委王林……等等很多坏人的名）。第四，主席指出的自我批评，包括个人的问题，坏头头的问题，批评别人缺点的问题。同样对解放军的一切活动，你们不抓拥军爱民、相信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主席讲的在你们那里就不灵了？我看二十一军对你们好多了，是当时过于偏在你们一边了，现在纠正了一下子，听那方的多，听你们的少，是可能的，但拥军爱民，相信解放军，我看你们现在对解放军的情绪不对，解放军是不会破坏你们大联合的。为什么毛主席把二十一军派到你们那里去？把黄司令派到你

们那里去？这是毛主席对你们最大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把思想搞通，还会犯错误。”

总理还说：“思想落后了，离主席思想更远了。”“对方几句话我们不管，你们要高姿态，你们还要赶上去，不要斤斤计较小事。”“坚定的左派要到斗争中去考验，不是自封的。”

总理和康生讲了这么多，让我们谈谈。我们都一一表态，按总理、康老的指示办！最后又问了工厂的情况，西安的很多工厂因武斗而停产了。工总司崔三河说，因为武斗，直到现在工人回不了厂，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有一部分被打后住在交大），有的工人没上班，生产任务不能完成……总理说让先解决工人回厂问题，对工人要帮助，但不能干涉。总理还问到铜川煤矿的问题……让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再召集他们研究解决。接见就结束了。

这次接见后我们感到大局已定，回去后再次认真的整理了第二次的接见记录，认真给大家做了传达。

1968 年初，一办的任务完成了，让我去了教育革命组。1968 年 9 月，为了稳定大局，支左委员会给学校派出了军宣队和工宣队一起抓校内的阶级斗争和斗批改。我就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开展教改工作。

随着学生毕业分配离校，1970 年学生全部分配完毕。交大革委会主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了。

后记

我因两地生活等种种原因，于 1971 年 3 月离开学校，调入大连工作。文革中，我们一些“骨干分子”曾被数次办“学习班”接受审查。

1969 年 1 月至 6 月参加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汤峪学习班）”。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全国展开清查“5·16”的运动，11 月 25 日学校派电机系的黄加崙、钱秀英两位老师到大连，通过单位将我“护送”回学校参加学习班，实际是隔离审查。由电机系辅导员王全荣负责，在系里抽调了十余名老师对我进行审查和帮助将近一年。

开始气氛很紧张，我到西安两三天后向学习班领导提出，可否给在大连的爱人贺相写封信报平安。领导说不用写信了，我很惊讶的听说，贺相也已来学校办学习班了。很庆幸的是我经历的各种“学习班”，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比起那些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的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吧！

当时领导认为我问题很严重，气氛很紧张，也很严肃，一天 24 小时都有两位“女警卫员”在身旁保护。每天去食堂吃饭，经常可以碰到沈荣水和他的两名警卫，为避嫌我们不能打招呼，路上见到很多熟悉的老师和员工也不能打招呼。但在食堂吃饭，都是食堂的师傅打饭、打菜，有好饭菜时我的那份会给得很多。有一次中午吃饭去得晚，食堂吃菜饭还有排骨汤，给了我满满一盆饭和一大钵汤，我和“警卫”们还在吃，食堂已开始收拾了，一位汉中籍的师傅（原来认识）到我桌子跟前和我说话：“戴慕蓉，你不认识额（汉中话：我）了？”我说“咋不认识？”，他问“你咋不跟我招呼”，我说“我参加学习班呢，咋能招呼你！”他说“额（我）是工人，怕啥咧！”。当时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

学习班后期，已没什么大问题了，学习班的老师就对我说：别看你是被办班的，每次食堂有好饭菜时，你碗里的肉总是比我们多！

后来知道几个主要头头和有嫌疑的人物也都被召回学校“办学习班”。领导还是动了不少脑筋，对我们几个被审查对象的管理，生活安排，每个人的重点问题都做了精心安排。

当时我认为我们做的事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是可以拿到

桌面上来说的，没有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所以我心里并不害怕，而是很认真的回忆文革中所做的一切，甚至苦思冥想地，把审查者认为我问题最大的1967年6月、7月、8月三个月中，每天三个单元的活动一一回忆写出，我的交代材料基本是事实部分在前，然后再进行批判。对于领导要求的定调的事实，我认为不符的还是以我的回忆为准，但批判认识可以按领导的要求来上纲上线，以求过关。交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地方，虽然政治上、思想上压力大，但很幸运没有遭受皮肉之苦，坦白说生活上还是比较照顾的。

1972年7月以后，我的审查接近尾声，看管也不那么严格，但还是要我们学习、提高认识。我周末就解除了看管，可以自由活动了。等待给我们做结论，后来告诉我，我不是“5·16”分子，办班是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最后学习班领导，要求我们把写的交代材料重新整理，要求将事实部分留下，把个人认识的自我批判的部分都删去，也不上纲上线了。我们要求学校给我们一个结论，1972年10月11日由王全荣传达了校党委书记楼绍文宣布的，省委对这次审查的意见，初稿如下：

戴慕蓉同志的审查意见（初稿）

戴慕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做出一定成绩。但由于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社会上极左思潮和派性的影响，一九六八年七、八月份在对支左委员会的关系上支持了某些错误的作法和观点，是属思想认识问题。

一九七一年我校开展批请运动，为了弄清问题，戴慕蓉同志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调回学校办学习班。在学习版期间戴慕蓉能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中共有关文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并能主动地协助组织弄清问题。

我提出的要求：希望明确说明调我们回来问题是否已查清。他们说向上面反映。后来再没给我们答复，让我们快回原单位上班。学习班领导解释

说：认为是属于认识性错误，可以不做结论！由学校（负责这次班学习班的第三办公室）起草写封介绍信，一式两份，一份留校，一份送单位，本人没有，由三办组织人去向被审查人的单位说明情况。

直到后来在大连党员重新登后，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档案里有“不可重用”的结论，所以不能提拔，不能出国。

我们在校时的革委会头头，在校时都是很坦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当时也有争论，有不同看法，但没有私心，确实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分手后后来也有联系。

我记得有一次和武登才见面，谈起文革往事，武登才问我：“老戴，1967年‘九二’武斗以后，为什么派你去北京汇报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武登才告诉我，1967年8月份西安两派对立很严重，双方派性都很重，西派（统指派）为了打击我方，曾计划要把我方的某些头头抓到手打伤或……以挫败我方士气，打乱我们的步骤。对方的目标就是沈荣水和我两人，因为我们两人是管外事的。已从不同渠道得到了这个消息，为了保护我们两人的安全，“九二”武斗前后，李世英与其他头头商量，决定让我以去北京汇报的名义离开西安，“九二”后学校决定撤离大疏散，就派沈荣水去上海负责也离开了西安。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震惊，这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这风雨同舟的战友是什么感情，在西安武斗这么严峻的形势下，首先考虑了他人的安全，李世英、武登才、陈柏荣等头头都留在了第一线，组织留守人员保卫学校的安全，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样的同志间感情？这样的情谊难道还能忘却？他们和留下的革委会成员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学校，疏散了大部分师生员工，保护了留校的师生员工及借住在我校的外部人员，将学校有关的各类档案、资料全部保存了下来。“九二”武斗后几天，听说学校决定撤离（我已于9月3日随庆安公司王焕如赴京），仅留很少人员留守。

王春杰、李能贵、冯成武、尹茂林等等都是留守人员，后来尹茂林曾对我说：我是保管当时交大最大的权－图章的，为了安全我只带了一本盖着章子的空白介绍信，把校印放在東三楼锅炉房一个排气门后的管子里，形势好以后很长时间我才取出来！撤离后各系各战斗队的印章都交到李能贵老师手里，只记得李老师用一块布包着一大包交给我，我交给保卫部冯成武（革委会保卫部的委员）和文革档案一起保管。文革档案和学校原档案没在一起保管，原档案是在地下室走廊端头用砖砌起来的，而文革档案是用和子弹箱大小的两个箱子装起来为了防潮还用牛毛毡包好，晚上我记得好像是和冯成武一起埋在东三楼锅炉房的院子里……

由此可见在“九二”武斗后，学校被迫撤离的危急情况下，革委会主要领导自己担任留守人员，组织好不多的留校人员，有条不紊的做好善后工作，将各类资料、各类档案、图章妥善安全的保管。王春杰也曾几次跟我说过，他们当时把学校的档案、革委会的会议记录、各种出版物如《人民交大》《六六通讯》……等等都保存了下来，武斗期间校舍、实验室、工厂完好无损，师生员工没有一人参加武斗在武斗中死亡。王春杰多次提到，当时高教部（教育部？）都承认，全国高校仅此一家！

西安交大的文革过程是有其特点的，我们也确实犯了错误，持续43天的“八五”静坐给西安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和影响。“九二”武斗后，交大革委会被迫做出的大撤离决策，保护了学校，保护了师生员工，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更大惨案。这种做法就是现在也值得赞许。若要了解交大在文化革命中的有关情况可以到学校档案室查阅全部的详细材料。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进入老年，再重温当时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记录，确实对我们当时的表现深感惭愧，更深的理解了总理的高瞻远瞩，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宽广胸怀，对于年轻人的爱护关怀，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混

乱局面下，依靠军队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多么不易。周总理不愧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偶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肩负重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注：以上内容依据

1.1969 年陕西省革委会举办的西安地区原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 1971 年西安交大党委三办举办的学习班中本人所写的交代材料底稿。

2. 两次学习班所发的 1967 年 3 月 1 日及 3 月 2 日、1967 年 9 月 18 日、1967 年 11 月 2 日等几次周总理、康生及其他中央首长接见的讲话纪录整理稿。



作者简介

戴慕蓉，1940 年 8 月生于福州。

1957 年 9 月由上海考入西安交通大学。

1962 年 7 月西安交大本科毕业，9 月考入本校研究生学习，1966 年 12 月留校工业电子学教研室教师。

1971 年 3 月大连电子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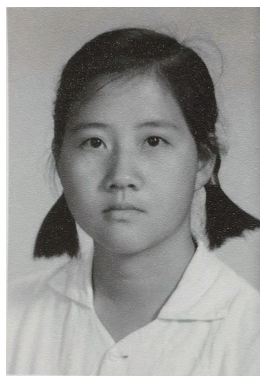
1979 年大连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

1995 年退休。

風雨未同舟

——我和李世英與楊克劍

■/ 劉維娜


大学时代的刘维娜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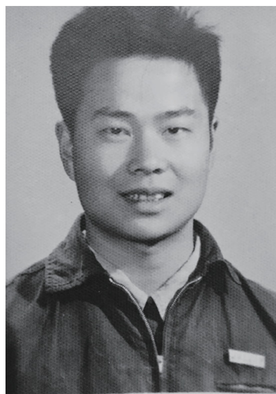
文革前，我是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的宣传干事，但我和学生会主席杨克剑素不相识，从未谋面，和李世英则更不认识。我们这一代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无限崇拜毛主席的一代人，从小就把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1966 年，毛主席一声令下，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狂风暴雨席卷了中华大地。我们交大学生毫不犹豫地奋起响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要扫除校内的一切“牛鬼蛇神”。此刻，以严克伦为首的陕西省委交大工作组（团），跟不上我们雷厉风行的革命步伐，相比之下，显得思想僵化，认识落后，畏首畏尾，言语含糊，不像一个旗帜鲜明的领导者，他们的表现使全校师生员工极为不满。

六月六日这天，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终于大爆发了！同学们群情激昂，以各种方式要求上级领导更换不能胜任交大文革领导职责的现任工作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文革运动，这完全是正当的行动。但是它触犯了工

作组的威仪，挑战了其领导地位，他们便恼羞成怒，迫不及待地对革命学生实行报复性镇压。他们首先把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再把各路带头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跟随者也不放过，通通打成反革命分子，还把是否反对工作组定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在广播台反复播放。刹那间校园里阴风四起，杀气腾腾。在工作组的操纵下，部分学生开始倒向他们一边，听从其指挥，纷纷写大字报批判六六事件中的带头人，给他们加上各种“罪状”。校园里到处都是“揪出 XXX”，“打倒 XXX”的标语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革命学生，掀起了一股群众斗群众的恶浪。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继而怒不可遏。

我非常理解杨克剑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去西北局反映工作组问题及师生们的要求，这怎么就是“大闹西北局”呢？他积极投身文革运动，怎么就说他的目的是“保彭康”呢？他是全校出名的又红又专、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怎么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呢？这岂止是不合逻辑，简直就是颠倒是非！



大学时代的杨克剑

显然，工作组正在把运动导入歧途，我要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上工作组的当。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我就连夜写了“坚决支持杨克剑”的大字报，疾呼同学们不要自相残杀了，要把矛头对准真正的敌人。

六月七日清晨，这张大字报刚刚贴出，就听见广播里又开始播工作组的错误决定。一怒之下，我就写了大字报“此地无银三百两”，要赶走工作组。于是祸从天降，我立即被打成比李世英、杨克剑更恶毒、更反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声讨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从此，我不是上会挨批斗，就是在宿舍写检查。

过了两天，又爆出杨克剑新的“滔天罪行”，说他怀着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把毛主席石膏像涂黑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宿舍写检查，两个情绪激动的女生冲进来喊着：“快去看你支持的杨克剑究竟是什么货色！”我被推进 12 宿舍一楼西南角的第一间屋子，见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生坐在窗前，旁边还有另外两个人。我环视了一下屋内，想看那个被涂黑的石膏像，没有看到。我本来就不相信杨克剑会干这种傻事。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喊：“谁是杨克剑？”旁边的两个人就抓住那个男生的肩膀，推到窗口让外面的人看。随着“打倒杨克剑！”的口号声，就有人向他丢土块，纸团等杂物。当时好像是把他作为批斗对象，把我作为受教育的对象，几拨人过后，他们认为我接受足了教育，就先放我走了。听说后来又有雷全俊、最后还有王永婷也被带进去了，此事被他们嘲弄称为“动物展览”。

如果这算是我和杨克剑的第一次见面，那第二次见面就是漫长的五十多年以后的事了。杨克剑后来告诉我，涂黑毛主席像纯属诬陷。宿舍里的那座石膏像因时间长了，表面上原来的金黄色粉发黑了，有个同学就揭发说是他涂黑的。大家都知道这是瞎说，就把实情告诉了工作组，工作组知道真相后故意不对外宣布，所以那次“动物展览”时，根本就拿不出涂黑的石膏像来。

工作组执导了长达五十多天的群众斗群众的悲剧，不仅被斗的人遭罪，斗人者也很苦。他们受到工作组的高压，要把假反革命当真反革命来批判，不得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自身先要忍受人格扭曲的痛苦，才有胆子去歪曲事实，造谣污蔑，加害无辜，事后还难免长久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一次在可以容纳好几百人的 1200 大教室的批斗会上，一个教工模样的人上台批判我，他指着我大声说：“刘维娜进交大是因为她思想反动，彭康亲自点名要的！”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 1963 年我高考的事，说明他是知情

者，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可以把事实捏造的如此荒谬，以此来对我进行污蔑和诽谤。我克制住了想要说明真相的冲动，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我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批斗，不可“嚣张”，更不能以卵击石。

7月9日午饭后我在宿舍写检查，忽然传来一种异样的重重的坠地声，不由得惊了一下。随即听见外面在喊：“跳楼了！”“有人跳楼了！”“王永婷跳楼了！”我住在一楼，立刻飞跑出去，看见四个人分别抓着王永婷的双手双脚，正从我面前小跑过去。可怜王永婷向后仰着头，鲜血顺着头发不停地滴落，惨不忍睹。我浑身像被冰水浇了一样，几乎崩溃。王永婷是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优秀的学生干部，我的好领导，六六事件被打成主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残酷折磨了一个多月，最后不惜用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向错误路线发出了最惊心动魄的反抗和控诉!

我是幸运的。在我感到极度孤立无助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冒着极大的风险向我走来。那是一天下午，我看没人注意，就想溜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家在外语学院，快到外院北门口时，管遵虞同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在悄悄地跟着我。不等我发问，他就主动地说：“我要去你家，把班上的真实情况告诉你父母，免得他们为你担心。”他对我父母说，同学们其实都同意我的观点，只是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多数同学家庭成分都不好，怕受到牵连，不敢讲真话，他觉得同学们不会对我太过分的。对他讲的情况，我并不感到意外，觉得他只不过是讲了真话而已。倒是我父母深受感动，多年后提起此事，他们还念念不忘地说：“管遵虞是好人！”

2013年大年初二清晨，管遵虞在家中突发心梗去世。噩耗传来，我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此事才在班里公开。写悼文时，我泪如雨下，悲伤不已。很奇怪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眼泪，一定是其中有他的眼泪也掺和着夺眶而出。

我还收到过一封长长的匿名信，那口气不像是本班的同学。信中详细地述说了对我的佩服，述说自己思想的矛盾和苦恼，恨不能公开支持我，只能写信来表达此心情。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许多人的心声，我默默地感谢他（她）。平反后，写信人也没有来找过我。虽然至今我也不知他（她）到底是谁，但我已经把他（她）永远记在心里了。

随后，猖獗了两个多月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清算，全校的“反革命分子”先后得到了平反和昭雪。1967 年筹建校革委会时，我被认为是交大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造反派之一，推举我进校革委会的呼声很高。但我的想法很单纯，认为自己仅仅是写过两张大胆表明真实观点的大字报，挨批斗时，内心坚守了自己不是反党、反革命的信念，仅此而已。无奈还是被推选进了校革委会，任常委和政治部主任，真有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感觉。

交大革委会是 1967 年 7 月 1 日成立的，我于 1968 年 12 月底毕业离校，当了一年半的校革委会常委。这一年半是我最困惑的时候，常因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革委会开会时总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行动上自然不能走在运动的前列，深感不称职。李世英对我很包容，没有批评过我，其他人就众说纷纭了。我回家时还能听到外院的人有说我不想当官的，有说我激流勇退的，校内人则说我是交大最大的逍遥派。不管他们怎么说，反正我不想稀里糊涂被潮流裹胁。也幸亏如此，在后来清理三种人时，压根就没有找过我，因此免遭一劫。



大学时代的李世英

1968 年毕业分配时，工宣队给我说可以留校，我婉言推辞，填报了去汉中褒河水库工地劳动锻炼。那时的我巴不得赶快远离交大呢。

修水库需要把原来沿河的公路改道、升高路基。1969 年初，我正在半山

腰干活时，看见山下公路边停了一辆白色小汽车，山下面传话要我过去，我惊喜地看见是杨文在向我频频招手。杨文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结合进校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的。他看见我跑下山来，非常高兴，慈祥和蔼地笑着说，他路过此地就来看看我，他问了我的情况，说：“瘦了，但更精神了！”

多年后，武登才告诉我，杨文从汉中回校一周后就自杀了，自杀前他是专程来汉中和几个人告别的，包括我。我大吃一惊问及原因，他说杨文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彭康，对彭康的死非常内疚自责，一直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努力追忆当年的情景，还是没有丝毫发觉他那时内心隐藏着这么大的痛苦。

1970 年劳动锻炼结束，我没有选择去中学当老师，而选择了去工厂当工人。我在西安自行车厂开了四年牛头刨床，然后才当技术员。先后在机动科、技术科、研究所、开发部工作。国企改制后，我们厂更名为天马机械厂，先后让我承包了新产品生产车间和轻工机械分厂。2000 年我退休。天马机械厂于 2003 年上半年破产倒闭。

在厂里，我认真做事，低调做人。虽然我学的应用力学专业在自行车厂不对口，但经过自学其它专业知识，生产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也没有难倒过我。厂资料室的国外期刊杂志都是英文版和日文版的，我以前学的是俄语，就晚上去交大学习科技英语，还请交大日语教研室的许振凯老师到我厂办了一年日语学习班。

1986 年工厂党委副书记胡继禹找我谈话，说我是中央组织部在册人员，按规定是不能用的，但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和群众反映，如果不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上级组织领导就会说我厂还没有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仍然划在被限制使用的文革造反派里，这个身份将终生保留。

1981 年 7、8 月份，我在咸阳轻工学院参加全国自行车力学理论学习班，听说李世英出狱了，就赶去他家看望。那时他家住在地委对面的二楼，他给我说抓他时不说原因就抓进去了，放他时也不说清楚就被推出来。这话后来听他说过多次，成了他终生难解的心结。

生活中的李世英很幽默风趣。有一天他说要和张国强来我家吃饭，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他俩哼哧哼哧地爬上六楼，我开门问："你们怎么找到的？"李世英笑着说："我们闻着香气就找来了。"我说："我还没做呢，哪来的香气，我怕你们不真来，就不敢先做好。"一年后我搬到新居，他俩又要来。这次李世英提了一大包吃的，有孜然炒肉夹馍，还有几个凉菜，我说："是我请你还是你请我呀？"他憨笑不语。

他也很聪明。退休后有了空闲时间，他就琢磨起汉字输入法来。有一次他告诉我找到了速度快很多的输入方法，只需要改变一部分汉字的写法就可以实现，还说有一部分汉字的写法本来就不合理。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轮"字，按他的构想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几年后我问他完成了没有，他说遭到一些传统文化人的阻挠和反对，搞不下去了，白费了几年的心血。

当然，他最想做的还是写回忆录。一天他来电话问我电脑里有没有 QQ，我说没有。他说有了 QQ，咱们和戴慕蓉他们几个聊天就方便了，我说不会装。不料他第二天就从咸阳过来亲自给我把 QQ 装好了，还教我怎么用。他不知道我已经很久不碰电脑了，自然一次也没用过电脑上的 QQ，真是对不起他，没有体谅他的心情，现在很后悔。

2017 年 2 月 19 日我在宝鸡的妹妹家。真是太巧了，中午忽然接到李世英的电话，他问我妹夫的肝病是吃什么药好的。我奇怪他问这个干什么，他说有一个熟人肝不好，帮他问一下。我说是不是你病了？他支吾了一会最后还是承认是他病了。我说妹夫就在旁边你问他吧。他俩在电话中交谈了一



阵后，妹夫告诉我，他的情况肯定是肝癌。当天下午我和老伴王大赤回西安经过咸阳就赶快去他家看望，郭根英开门后我吃惊她的消瘦，她说半年瘦了三十斤。李世英跟在她身后来迎我们，他看上去很虚弱，面部有点浮肿，看到我们他很兴奋，执意要请我俩去吃水盆羊肉，我们哪有这个心思，争执一番后他才作罢。我说看你在风雨同舟群里每天发那么多帖子，还以为你很好呢。他说要伪装嘛，因为保密做得好，半年多来连邻居都不知道。也要求我严格保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说今天要好好照两张相。他行动缓慢仍兴致勃勃地带我参观他的小院子，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批把树，每年结的果子他们吃了就把果核扔到地里，所以旁边长了许多小树苗，还指给我看那片四季常青的是马兰头，随时都可以掐来做菜。

他那天话很多，不仅详细谈了他生病的起因和治疗情况，也不回避谈到死，说死后不造墓，想把骨灰分成四份，一份跟父母合葬，一份撒到渭河（他工作生活的地方），一份撒到黄浦江（女儿在上海），一份撒到珠江（儿子在广州）。也许是那天他陪我们说话耗费了太多的精气神，听说从次日起就不下床了，也很少说话，病情每况愈下。

3 月 27 日噩耗传来，我怀着沉痛的心情 28 日即从深圳飞咸阳去他家吊唁。遵照李世英的遗嘱（见后附），丧事从简。29 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有 35 个亲朋好友参加，其中交大的教职员工和老校友不到 10 人。“头七”我又去他家祭

奠，和郭根英在他的遗像前合影，从他家小院里挖了两颗小树苗留念。

2017 年夏天，通过沈荣水和戴克刚的微信，我很偶然地和杨克剑联系上了。记得很清楚，我们是 7 月 1 日通上微信的。那时他正在美国的女儿家，慢慢地我知道了他这些年来的情况。六六事件平反以后，他却还有一个“修正主义苗子”的错误没有被纠正，以至于到 67 年毕业分配时，中科院到动力系来挑选毕业生，系里对他还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一种很好，另一种很坏。那个人查阅了他的档案后，决定录取他，这是杨克剑的幸运。几年后那人还到杨克剑工作的研究所看过他，特别说了这个情况。

由于在文革前，杨克剑就完成了大学的全部学业，他又有幸分配到了专业对口的中科院科研单位，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在科研岗位上他大展才华，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先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科学大会奖等诸多奖项。

他主持研制的一种超低温的制冷系统，成功的应用在多种型号的人造卫星的地面试验上，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发展“天然气液化技术”，推动了全国天然气液化工程的发展；他还参与了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主持了中科院负责的毛主席纪念堂制冷系统的研究，并作为获奖人员的代表，受到了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退休以后，他仍敢冒风险，成功地开发了一种煤矿瓦斯气的利用技术，这个技术不仅有利于煤矿的安全生产，能减少污染，还能变废为宝，把瓦斯气变成安全、可利用的天然气，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他还到山西一个煤矿工作了好几年，建设了一个示范工厂，拥有十多项国家专利。

此时此刻，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李世英。如果他能够有幸完成大学的全部学业，走上理想的工作岗位，以他的自身条件，他一定会取得和杨克剑一样的骄人成就，报效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生命的长河蜿蜒曲折，潮起潮落，仿佛冥冥中一切自有安排。2018 年金秋十月，在北京一次特殊的老同学、老校友聚会上，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和杨克剑再次相遇了。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杨克剑把它写进了一首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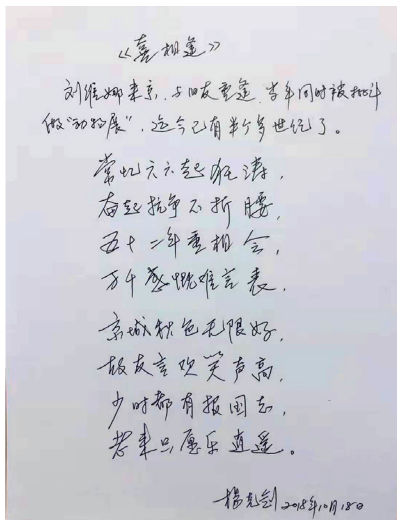
《喜相逢》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刘维娜来京，与旧友重逢，当年同时被批斗，做“动物展”，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常忆六六起狂涛，
奋起抗争不折腰，
五十二年重相会，
万千感慨难言表。

京城秋色无限好，
故友言欢笑声高，
少时都有报国志，
老来只愿乐逍遥。



《喜相逢》

刘维娜来京，与旧友重逢，当年同时被批斗做“动物展”，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常忆六六起狂涛，
奋起抗争不折腰，
五十二年重相会，
万千感慨难言表。

京城秋色无限好，
故友言欢笑声高，
少时都有报国志，
老来只愿乐逍遥。

杨克剑 2018年10月18日

附：李世英遗嘱（由郭根英提供）

我的遗嘱

一、关于此生的评价。

周培源先生在去世前曾经评价自己这一辈子说，这一生不是我想过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是想一心搞物理来着，但是最后搞了政治，没有全心全意的搞自己深爱的物理学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同感。我的人生设计本来是做“红色原子能专家”，最后完全介入了政治，原子能彻底离开了我。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跟随一个超越时代的、代表人类前途的伟人，参与了他最后的为了保卫人民利益的一场大博斗。虽然不到两年的真正的文革闯将的生活，换来终生被压在五指山下。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和千年伟人联系到一起，既是空前的，也可以是绝后的。

二、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收唁金。除至亲挚友外，其余的人，不必通知。

三、我去世后，不买墓地，不留骨灰，把骨灰分为三份，分别撒入渭河、黄浦江、珠江，让一个爱水之人在五湖四海之间畅游。得其所哉！

四、我去世后，大家不要悲痛。我，生逢其时，一生活出了人的尊严，离开人世时，我心情愉快，非常满足。何来悲痛？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地送我上路，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第五、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能够利用的部分，让医院尽量使用。剩余的部分，交给火葬场，烧成骨灰，按照前述条件，分成三份处理。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对于这个世界，做一点奉献。

第六、如果需要祭奠，可以在网上设计一个纪念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随时祭奠，非常方便。

第七、我去世后，属于我的动产不动产全部由郭根英继承。如果不足，由子女补足，保证母亲的晚年生活的质量。

李世英

2017 年 3 月 5 日



作者简介

刘维娜，1945 年 7 月生，籍贯重庆市铜梁县。1963 年毕业于陕西师大一附中，是该校五年一贯制第一届毕业生。同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应用力学专业。1968 年毕业，分配在汉中褒河水库劳动锻炼。1970 年 7 月分配到西安自行车厂，当刨工四年后从事技术工作。1986 年入党，高级工程师，2000 年退休。

